

КЛАУС ПОЛЬКЕН,
ХОРСТ СДЕПОНИК

КТО НЕ МОЛЧИТ, ТОТ ДОЛЖЕН
УМЕРЕТЬ

ФАКТЫ ПРОТИВ МАФИИ

根据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2年版译出

内 容 提 要

黑手党，这个具有恐怖神秘色彩的“怪物”，自它从意大利西西里岛萌生到今天成为有严酷纪律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经过一个世纪的演变。它犹如一个巨大的魔影紧紧地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竭力步入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域。

本书详尽地叙述了美国黑手党从意大利黑手党分支出来，在美国黑社会势力中残酷竞争发展的经历。他们走私贩毒，包娼聚赌，敲诈勒索，控制工会，搞职业暗杀，操纵各政党竞选，勾结政界、警方、司法当局进行一系列的犯罪活动。书中对争权夺利而策划各种血腥阴谋的黑手党新老头子们的精彩描写，如权力无比的“幸运人”卢恰诺、人称“教父”的卡洛、“杀手先生”阿尔贝特等，展现了他们的真面目。

作者在这部专著中运用丰富翔实的史料，生动系统地再现了意大利黑手党和美国黑手党的沿革，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释了这个资本主义天然疣生物的孳生、发展的根源。全书集趣味性知识性为一体，不失为研究黑手党的有价值的雅俗共赏读物。

目 录

序 言.....	1
白铁匠和火化炉.....	21
“荣誉社”的根系.....	28
“黑手”.....	46
阿尔·卡帕内的起飞.....	58
“长胡子的”退出舞台.....	80
“幸运人”不走运.....	94
“纽约的息肉”.....	111
黑手党和将军们.....	125
“母牛”和“马车”.....	146
芒杰列普雷之王.....	163
死亡判决书.....	179
蜘蛛网中的美国.....	199
经营幻觉.....	221
争权斗争.....	245
在“病人”乔·巴尔巴拉床边.....	263
纽约布鲁克林区的战事.....	288
在科莱奥内发生的凶杀案.....	315
修道院里的鲁巴拉.....	329
巴勒莫匪帮之战.....	343

白色死亡.....	363
黑手党会完蛋吗?	376
代结束语	396

序 言

此书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克劳斯·波根和霍斯特·茨波尼克所著，1975年在柏林由《军事出版社》出版。本书的宗旨在于指出，在资本主义同犯罪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作者不希冀探究有组织犯罪所以在资本主义世界产生和发展的根源，而是根据大量事实向读者介绍最早的犯罪组织之一的“荣誉社”，或者称之为黑手党的这个组织的历史沿革及其下述主要发展阶段：

一、这个组织在西西里岛的产生阶段。此时，正是岛上被压迫人民为反对外国掠夺者而进行斗争的时期；

二、西西里黑手党劣变为强盗和杀人匪帮，沦为封建主和西西里反动资产阶级工具阶段；

三、黑手党在适宜于犯罪活动发展的美国土壤上的形成和迅猛“繁荣”阶段。

黑手党在美国开始活跃，一般认为是在1920年所谓《禁酒法》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黑手党内部各个犯罪集团之间开始了残酷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当时，各个集团的犯罪分子都力图从《禁酒法》所不允许的制酒业，攫取巨额的收入。

本书将向读者介绍这场斗争的种种戏剧性突变，以及黑手党的关键性人物，揭示美国的和西西里的黑手党之间的关联。透过犯罪组织历史上变幻无常的众多事件，可以使读者清楚地认识到，黑手党已经成为一股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

把当今的有组织犯罪说成是经商活动的变种，毫不夸大其词。可以这样简单地确认，从法律的角度说，这种异化的经商活动同资本主义合法企业的经商活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美国的刑法所禁止的。

从经济学角度来评价“犯罪生意”可以发现，它同样服从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任何一个合法经营企业的活动所要服从的那些规律。比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企业间的自由竞争，通过建立大生产，排挤小生产，以最大型代替大型，从而形成垄断集团；而同样，各个小的、形形色色的从事“犯罪生意”的组织之间的竞争也导致庞大的犯罪辛迪加^①的建立。

要想对有组织犯罪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如何对资产阶级社会产生影响这一问题，有个正确的观念，首先必须确认这一社会现象，并给它下一个定义。

美国联邦刑事法典载明：

“有组织犯罪乃是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集团成员的违法活动。这种集团经营非法商品和服务，其中包括（但不仅仅局限于）赌博、卖淫、高利贷、贩毒和在相互工作关系中进行讹诈以及这种集团成员的其他违法活动。”

在美国，对有组织犯罪还有另外一些定义，不过都是联

^① 法文syndicat的音译。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之一。

邦和州一级的立法和司法机关所下的，基本上和刑事法典大同小异。

但是，任何一个定义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上述定义中，许多主要的、本质上的不准确的地方之一，就是其制定人看来仅仅指的是，经常被称之为黑手党的这个最强大的犯罪组织。然而有组织犯罪绝不是黑手党的同义词。黑手党即使在美国也并没有取得对有组织犯罪的垄断权。在这个国家，有数不胜数的各个独立的集团在从事有组织犯罪活动。通常，他们都按照“犯罪生意”的行业而分派。比如，贩卖毒品，从赌博、娼妓业捞取收入等。而在每一个行业范围内也有“劳动分工”，比如，采办毒品原料、在实验室进行加工，以及运输和出售等。

在美国本土上，最老、最大，比其他有组织犯罪集团优于一筹的是黑手党，也就是所谓的“我们的事业”联盟。

美国的“犯罪辛迪加”，或者说是“我们的事业”，最初乃是遐迩闻名的西西里黑手党的一个分支，而且时至今日仍保留着后者的某些古老特征。这个犯罪辛迪加现在的组织结构，大体上是从1931年开始形成的。通过残酷无情地竞争搏斗，其中包括从肉体上消灭对手，本来互不往来的各个匪帮，联合成为一个具有严酷纪律的“家族”。比如，一个集团的成员，由于同一个陌生人谈了“我们的事业”的存在，那么等待他的就是死刑。同样，由于打击同伙或者对本家族的成员行使暴力，也要得到同样的惩处。正是借助于这种手段，这个辛迪加才能保持严格的纪律，才能牢牢控制住自己的成员、同谋和受害者。

在组织这个犯罪辛迪加方面起过重大作用的，是一个绰

号叫“幸运人”的萨尔瓦托雷·卢恰诺。这是一个冷酷无情、头脑清醒、有很强组织才能的人。读者在本书中将会对他有一个详尽的认识。就是这个卢恰诺，一心要把各个分散的匪帮结为一体。在《禁酒法》实施期间，他同美国东部大西洋沿岸的七个匪首签订了协议，并依靠犯罪组织中年轻有为的分子，于1931年9月清洗了“老一代”首领。接着在纽约召集自己的弟兄们开会，成立了一个他们特有的行政管理机构——理事会，理事从主要头目中选举产生并享有同等权利。这个理事会相当于一个真正的政府，它负责解决“家族”之间的争端，确定辛迪加在政治上的总路线并审理整个组织感兴趣的问题。对那些破坏帮规的人，由黑手党的最高法庭进行审判，而判决的执行，则责成“行刑小组”负责。这个小组的头目被称为“杀手先生”（长期担任此职的是阿尔贝托·阿纳斯塔吉亚）。

继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很快又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此次会议在密苏里的坎萨斯城举行，这里是匪帮的都城之一。黑社会的头目都出席了会议，其中有“芝加哥王”阿尔·卡帕内。从此，犯罪辛迪加形成全国性组织。无怪乎1951年建立的，由参议员凯弗沃领导的一个调查有组织犯罪活动委员会坚信：“黑手党在确立两大犯罪辛迪加和许多二流匪帮，以及散兵游勇式的犯罪分子，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行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本委员会到哪里工作，都会发现这个不可捉摸的、秘密、凶恶的组织的踪迹。”^①

^① 引自《州际商业中有组织犯罪调查专门委员会第三个中期报告》华盛顿·1951年，第147页。

当前，领导着“我们的事业”联盟的是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被赋予“立法”、“审判”和“仲裁”权，同时具有管理业务性事务的一系列职能。联盟的各成员组织视“委员会”为组织上的最高执行机关。委员会由实力最强大的“家族”的领袖组成，通常是九~十二人。

但这不是一个实行代表制和选举产生的机构，其成员不享有同等权利，最高领导机构是“理事会”，参加者均系每个“家族”中最富有经验的成员。目前，在纽约、底特律和芝加哥都有这样的理事会在发挥作用。其头号人物被称做“先生”或“老板”，他甚至可以不是委员会的成员。

随着联盟的建立，加入其中的各个组织往往就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我们的事业”联盟的每一个“家族”都有四个，有时是五个官职等级。为首的叫“包斯”，即族长，有的也叫“先生”，他的职责是维系家族中的秩序，族长配副手。此外，在同族长相等的级别上，有上面所说的理事。一般说来，在这个位置上的都是年长、有经验的家族成员，他们甚至不直接参与犯罪经商活动；第二个等级叫“布费尔”，即“联络官”，通过他来传达族长的指令，转递金钱、情报。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可以使族长躲开警方的视线，也使他避免同一般成员直接接触；在“联络官”之下是“中尉”（也有称之为“上尉”），这是一个行动单位“十人小组”的头目（尽管其下属可能是另外一个数字），此人有一至两个助手，但这些助手不能同他分担行政权力；在“中尉”之下通常称之为“班长”；最后，最低一级是“战士”（即一个成员），一个“家族”大约有20—600个“战士”。这些“战士”可能是一个非法企业的主人，或者也有自己的合法企业，但要向族长供奉一定比例的利润。每一个

家族都分出专门人员，负责组织对官方公职人员的收买活动，以及执行对本组织成员和其他人员的判决。

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资料，“我们的事业”是一个相对说来不算很大的组织，其“核心”大约有5000人，分属24个“家族”^①。据统计，进入“核心”的都是意大利人，而其中绝大多数，又是来自西西里的移民。

当然，尚有数以千计同“我们的事业”联为一体的、被组织起来的犯罪分子，分属于各个不同的种族和民族。

在一些美国作者所写的大量有关研究有组织犯罪的著作中，以及官方文献和报刊上，一再强调，有组织犯罪是一种从外部引入美国的现象，而且力图使“百分之百的美国人”相信，这种有组织犯罪现象的特点就是它起源于意大利。然而，这种说法显然同现实是矛盾的。凯弗沃调查委员会早在当时就已经注意到，犯罪辛迪加的活动是在大量非西西里裔人紧密配合下进行的。在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写道：“必须特别突出强调的是，黑手党内西西里裔的成员所占的比例根本不大”。^②

要证实这一点，只要了解一下在美国西部各州定居的犹太移民的有组织犯罪活动，就足够了。比如，在加利福尼亚州，就有一些很大的犯罪集团，活动得相当猖狂。美国人已经开始把它们称之为“犹太人的黑手党”。这些犯罪分子以杀人为职业，帮派之间经常火并，并走私贩毒和进行敲诈勒

① 引自《时代》周刊。1977.5.16，第28页。

② 引自《州际商业有组织犯罪调查专门委员会第三个中期报告》华盛顿。1951年，第150页。

索，同“我们的事业”的活动在特性上毫无二致。此外，他们还同在美国各州、拉丁美洲以及近东地区活动的犯罪集团保持着经常的业务联系。

我们还可以以墨西哥的黑手党“黑猩猩军”以及其他一些犯罪组织为例。这些组织是在资本主义的美洲萌芽、开花的，其组织结构和活动都同“我们的事业”相雷同。这一点毫无令人惊诧之处，因为每一个犯罪群体都力求组织上的完善，这样就可以用最低限度的冒险，从犯罪生意中，捞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西欧从事有组织犯罪斗争的研究人员，通常总是把西欧的有组织犯罪的水平，同美国的水平相比。这样，由于还没有达到美国的水平，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便怀疑，在西欧各国是否存在着独立孳生的本国的有组织犯罪。基于此，便往往用来自美国的渗透，来解释欧洲存在着有组织犯罪这一事实。这样一来就出现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当美国研究人员把在美国领土上产生的有组织犯罪归咎于欧洲人，特别是意大利人时，欧洲人却又把欧洲产生的有组织犯罪这笔帐记到了美国身上。

其实，无论在美国，也无论在西欧各国，有组织犯罪有着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其母体是资产阶级社会，是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存在着固有恶习的资产阶级社会。

正如从国际刑警组织的通报中清楚地看到的那样，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犯罪活动往往都具有有组织的特征。同时，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产生和发展不仅限于一国之内，而且具有国际范围。许多国家的犯罪组织经常同美国的犯罪组

织相勾结，进而拿取自己那一份红利。当然，一旦这些组织相当巩固，感到自己有力量攫取更多的收入之后，它们就可能为在本国范围内或在好几个国家的基础上，争夺势力范围，而竞争厮杀。而美国的犯罪经商集团也同样用各种手段，其中包括暴力，来为自己清除市场。

有组织犯罪，比如对英国，就已成为一个重大问题。60年代，英国外交部对国内匪帮活动所进行的调查就证实了这一点。^①

类似状况也出现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比如，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就被公认为是西欧最大的毒品转运基地之一。在这一地区有多达30个犯罪集团在活动，而且近东一些国家的代表也积极参与了扩散毒品的活动。

有组织犯罪的主要目的是牟取暴利，而且这种暴利是靠经营违禁商品或者从事被禁止的服务行业而谋得。正如许多关于有组织犯罪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垄断经营这类商品和服务行业，可以有把握捞到巨额收入。他们从最大的潜在财源——恶行中榨取利润。推销淫秽书画，遍设暗娼明妓，制造、贩卖毒品，组织赌场聚赌，发放高利借贷，到处敲诈勒索——这一切仅仅是有消费者支柱的犯罪实业的若干品种。从事犯罪买卖的生意人为了获取巨额利润，往往采取“刺激商业”的现代化手段，即求助于广告。通过广告，把从其身上可以捞到利润的种种恶行，宣传为时髦的东西，从而人为地建立市场，利用市场。

有组织犯罪的财源之一是赌博业。赌博业不仅在美国，

^① 引自D. R. 克莱塞《犯罪组织及其基本形式》（伦敦，1972）。

而且在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相当普遍。美国的联邦法令确认赌博业是违法的，可是在许多州，聚赌活动却得到官方的允许。所以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把赌博视为罪行这一点，便不足为奇了。

从事赌博业是有组织犯罪所进得的基本金融，甚至是政治活动之一。因为它保证有一个预定收入比例，而且这个收入来源实际上是永不枯竭的。一般情况下，从赌博业捞到的钱，大都又用来作为有组织犯罪整个复杂的经商活动的资金。

以聚赌为基础的这门生意，相对来说是公开的，并不损害介入此道之人的名声。所以凡从事此行当的有组织犯罪分子，都是美国政党资金来源的最积极的提供人。

反过来，对职务的任免和擢升（比如对警察机构）颇具影响力的政界要人，也会对赌场老板回报以一臂之力。政界要人最为关心的是定期把党的钱库塞满，因而就极力要警方，不要追究向政党提供财政支持的赌场老板。^①

就这样，赌博业在不受警方干涉的情况下继续存在并日益发展，有时甚至还得到警方的庇护。

其他一些犯罪经商行业，如卖淫、赛马和讹诈等，也处于类似状况之中。

非法贩毒给有组织犯罪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神奇般的利润，比如在美国；其利润高达约300%。自然，在这种情况下，犯罪经商会日益扩大和完善，而最鲜明地表现出这种经

^① 引自J.F.阿赫思《不安的警方，我们在执行法律中可怕的危机》纽约，1972，第105页。

商具有国际特征的是贩毒。

有组织犯罪还通过高利贷获得大宗收入。一般情况下，借款的周息为二成，而且星期一早晨借出，星期五中午之前连本带息一次还清。如果借债人不能偿还，那么他的健康和生命就会遭到威胁。不过，要是借债人拥有使犯罪集团感兴趣的東西，债务可以“非金钱化”，也就是说允许借债人把家产，如自己经营的饭店或者是工厂拿出来做抵押。

最经常落入高利贷罗网的是那些小业主。合法银行和钱庄拒绝向他们的企业提供资金，认为他们不够可靠。于是，在危困时刻，这类小业主便不得不向黑社会的代表借款，进而往往坠入不可自拔的泥潭。有时候为了还债，必须想方设法弄钱，结果便使一些名声一贯很好的人走上了犯罪道路。借债人一旦处于没有支付能力的困境，他就要失去自己的企业，而这个企业自然就落到了犯罪集团的手中。而有组织犯罪集团在抓到这个合法企业之后，立刻把它变成了用来掩护各种非法业务活动的门面。不过，这样的企业，比如一个饭馆，仍然继续营业，为有组织犯罪提供合法收入。

讹诈也是有组织犯罪活动的种类之一。所谓讹诈，从习惯上讲，就是说一贯向小型合法企业的业主，比如咖啡馆、商店、洗衣房等勒索钱财。这种勒索是依仗恐吓、暴力和其他违法手段而得手。有时这种勒索达到相当大的规模，致使业主们由于不可能对组织的恶棍集团表示反抗，事实上完全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勒索表面上总是以“保护”或“防范”免受其他犯罪集团侵扰而付出金钱犒劳的形式出现的。

这种由业主为受到“保护”而缴纳的贡赋，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又都转嫁到纳税人和买主的身上。而这一点的实现，

一是通过把卖出的商品或所提供的服务的价格，提高到相应的总额；二是加剧剥削那些在受敲诈者“保护”的企业里干活的工人和雇员。

黑手党情愿把自己的巨额资金投放于一般的合法企业。所谓有组织犯罪对合法经商的渗透，也就是这样产生的。这种办法可以一箭双雕，既带来了利润收入，又可以用一种令人尊敬的迷彩，伪装了犯罪活动。这类企业成了一个理想的媒介，通过它可以把用犯罪行为搞来的钱“清洗”和“漂白”一下，进而使其合法化。同时它们也让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成员有可能“爬到表层”，戴上神气十足的实业家、令人起敬的社会人士的假面具，到处出头露面。

正如美国国会所确认的那样，当今，对合法买卖的渗透愈演愈烈。比如，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资料，到1977年，黑手党拥有的合法企业不下一万个之多。^①

与此同时，对一些职业团体的渗透也在加剧。在这些组织里，有组织的犯罪分子一只手向企业主勒索钱财，把另一只手又伸进工会的钱柜。^②

打入工会这个办法是战前犯罪界的一个“族长”想出来的。此人叫路易斯·列普卡，外号人称布哈特。爱德加·胡佛称他为“美国最危险的人物”。顺便说明一下，这是惟一被用电椅处以死刑的“老板”。

列普卡在服装制造行业工会堪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个工会联合了美国服装厂75%的职工。他专横地在该行业

① 引自《时代》周刊，1977年5月16日，第27页。

② 引自《1970年有组织犯罪控制论》公法91-139号。

企业中组织罢工，决断发给谁会员证或不发给谁会员证。每年除了开销之外，他大约要把3.5亿美元装进自己的腰包。

后来，拉普卡和卢恰诺一起对一些行业进行敲诈。比如，对兔毛加工企业、面包厂（在一个有700万人口的城市里，每卖出一个面包，拉普卡要索取两美分）、电影院、皮制服饰商店、鞋和皮革制造厂、饭店，甚至包括制帽女工和出租汽车司机。

“手段”并没有把杀戮排除在外，1948年沃特·雷特被杀未遂一事就是见证。雷特当时是汽车工业工会领导人，而黑手党则想用“自己的人”来取代他。

此外，有组织犯罪不仅拥有大量钱财，并将其投资于合法买卖和为了自身利益去收买国家机关、政党和工会的各个不同环节，而且还掌握一批从事职业凶杀的骨干。为了在商业、服务业和工业的各个领域抓到控制权，“辛迪加分子”不仅广泛使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法，而且还采取纯属刑事犯罪的手段，比如，诈骗、纵火和杀人等，以便挤走合法企业的代理人。这一切越来越使美国的社会人士感到不安。

以组织赌博、贩卖毒品、高利盘剥和敲诈勒索等为形式的犯罪，为“我们的事业”建立了坚实可靠的经济基础。根据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69年4月23日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的看法，犯罪辛迪加的收入浮动在200亿到500亿美元之间。前一个数字相当于国民经济总收入的2%，后一个数字则高于1951年财政年度整个联邦的财政预算^①。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材料，1977年以前，这个犯罪辛迪加每年至少收入480亿

^① 引自《同有组织犯罪相关的措施》，华盛顿，1969年，444—445页。

美元。①与其相比，美国最大的工业集团“埃克森”公司宣布的年收入才516亿美元。而据总统下属的一个委员会统计，犯罪辛迪加仅从赌博业一项，1965年就收入60—70亿美元。②

由于手中握有数以十亿计的美金，犯罪辛迪加必然要向国内的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渗透。“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生活方面的问题不被犯罪组织所触及。”③

有组织犯罪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危害越来越大。弗·伊·列宁说过：“美国托拉斯是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高表现。为了消灭竞争者，托拉斯并不局限于采用经济手段，往往求助于政治，甚至是刑事犯罪手段。”④这样一来，“当有组织犯罪着手从事合法经营的同时，通常总伴之以适应于非法经营的暴力和恐吓手段，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⑤

就这样，“美国的有组织犯罪削弱了国家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干扰了自由竞争，成为美国同外国贸易往来方面的沉重负担并威胁国内安全，损害国家及其国民的共同福利”。⑥

正如美国前最高检察官克拉克所说的那样，有组织犯罪的范围如此之广，活动如此猖獗，“如果没有司法机关的庇护，它是不可能如此兴盛的。作为数量最多的地方司法机关

① 引自《特遣队报告：罪行及其评价》，华盛顿，1967年 444—445页。

② 引自《时代》周刊，1977年5月16日，华盛顿，27页。

③ 引自《有组织犯罪：特遣部队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报告》，华盛顿，1976年7页。

④ 引自列宁全集30卷94页（俄文版）。

⑤ 引自E·J·约翰逊《有组织犯罪：对美国立法制度的挑战》。

⑥ 引自《1970年有组织犯罪控制法令》公法91—452。

大概是持中立态度”。^①而司法机关的中立是由于贪赃受贿。犯罪辛迪加的这种腐蚀活动渗入到美国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其贿赂的影响作用“从城市的街道深入到议会大厅”。^②

有组织犯罪本身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积极地利用并猛烈地加剧了这个制度的恶弊，腐蚀着某些国民。犯罪辛迪加腐蚀了那么多人，并使用了多么形形色色的手段来扩散罪行，“事实上，其影响已犹如城市机体上的一个恶瘤。”比如，积极广泛地推销毒品便导致成为社会一害的嗜毒者不断增加，这些人不仅搞坏了自己的身体，变成丧失劳动能力者，而且往往会堕落成罪犯——为了搞到钱买毒品，随时准备采用任何手段。这样一来，嗜毒者的增多必然造成社会刑事犯罪活动的猖獗。

由于认识到有组织犯罪对国家具有何等的危险性，美国立法和司法机关便定期向有组织犯罪宣战：组织调查，在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进行刑事追究等。但是，犯罪经商仍在发展，有组织犯罪有增无减，并且日趋完善。而坐到被告席上的，往往只不过是组织犯罪集团的二流成员。

美国国会对此的解释是：“有组织犯罪继续加剧，是由于起诉准备阶段法律程序存在着缺陷。它妨碍取得法律所许可的证据。而证据对从事有组织犯罪者的非法活动进行刑事或其他制裁和处罚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由于政府有权进行的制裁和处罚，在适用范围和批准权限方面，受到了不合理限制。”^③

① 引自克拉克：《犯罪活动在美国》，莫斯科，1975年74页。

② 引自J. F. 阿赫思OP. Cit. 160页。

③ 引自《1970年有组织犯罪控制法》公法91—452页。

按照这种说法，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加强对参与有组织犯罪的惩罚，简化提取审判证据的法律程序，换句话说，就是给“警察局松绑”就行了。

看来，资产阶级的立法机关是不会自己承认，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所滋生的这一社会现象所进行的斗争是无望的。

美国的一些研究人员也试图对这一社会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这些解释往往都归因于负责同有组织犯罪进行斗争的地方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贪赃枉法，并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应当用廉洁奉公的人员取代那些被收买的人。

在上述种种情况下，美国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人员，便不得不在这样或那样的范围内强调存在着一些困难。而实际上这些困难都是次要的。不过，把这些困难集中在一起就只能证明，试图消灭美国的有组织犯罪是毫无希望的。

这些困难包括下述几点：

1. 同有组织犯罪的斗争得不到居民的支持。在普通美国人的观念里，法制的根本使命是保证对个人人身和财产的尊重。而有组织犯罪同一般刑事犯罪不同之处，正在于它很少使广大公众感到不安。因为这种犯罪活动是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除此之外，它还为居民提供商品和服务。至于这种商品和服务的违法性，或者是需求者对此毫不关心，或者是被需求者所接受（如赌博、贩毒等）。

此外，甚至在美国这样一个有组织犯罪的发展水平，比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已高得多的国度里，很多美国老百姓仍然一直不相信有犯罪辛迪加的存在。

2. 由于有组织犯罪控制着大量物质财富,这便使其有可能,保证让开始受到刑事追究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成员,得到博大精深的高级律师的帮助。此外,属于有组织犯罪体系的一些专门性匪徒小组,也会通过恐吓或暗杀证人、归罪警方和法院等手法,帮助上述成员逃避判罪。

3. 犯罪辛迪加内部组织结构很适应于该组织的秘密特性。在这方面,包括事先进行严格分工,规定组织内最低层和最高层的人员不能接触。比如,匪徒(辛迪加成员)并不直接在街上兜售毒品,他们的任务是控制操纵批发市场。所以,一旦警方在街上抓住“闲溜达的人”,即毒品贩子,那么线索到此也就断了。

4. 中间和最高领导层的人员,一般情况下,都用合法经营掩护自己的非法活动。这就赋予他们一种令人尊敬的身份,进而加大了揭露他们庐山真面目的难度。

5. 有组织犯罪拨出专款去收买各级政权机关。

“据发现,当前贪赃受贿的形式五花八门,而且在各类政府部门的活动中都存在这种现象。”^①

从根本上说,贪赃受贿一方面涉及的是匪徒,另一方面是政府官员和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就是那些负责保护公民免受有组织犯罪侵害的国家政权机关的代表。

美国的报刊上定期登载了一些警察进行敲诈勒索和收受贿赂的报道。事实上,犯罪辛迪加为了感谢“保护”其免遭可能来自法律方面的某些不愉快,而向警方负责人定期送酬金,已使被收买的警察机关本身,成了犯罪界的一部分,因为

^① 引自《有组织犯罪:特遣队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报告》第23页。

它分享了这个黑世界的收入。

然而向地方政府部门行贿只不过是阶梯上的最低一级。贪赃枉法还出现在所有各级政府机关，下起一般的警察局，上至显赫的政界要人。所以无怪乎前美国最高法院院长奥勒·沃伦说：

“贪赃枉法实际上成了有组织犯罪的基础。”^①

6. 有组织犯罪所以具有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同政党的联系，而且包括同作为政党领袖的一些政治要人的联系。

工业垄断集团同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导致从政治上控制关键性职位，对互相竞争的集团，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在美国就是如此。政党之间在各级（联邦、州和地方）的明争暗斗，在很大程度上是“分享战利品”的那个体系在暗中加温。与此相应，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一方的人员，便抓住了一部分关键性和收入丰厚的官职。由此可见，控制选票就意味着控制国家管理机关职位的分配，而这也就意味着控制了警察局、法院、检察官、各类部门的视察员，城市委员会委员、州长和市长等职位。

相互竞争的各个政党之间和政党内部派系之间的夺权斗争，都需要有大量金钱。这方面所需的钱有各种不同的来源，来自企业家、教会、各种各样的团体，即来自所有那些出于本身事业上的考虑，对提名这个或那个作候选人感兴趣的人。而有组织犯罪也把一份钱投进政治机器，以便通过自己的候选人取得安全保障和最大限度的物质利益。对此，它

^① 引自《有组织犯罪：特遣队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报告》第23页。

选择了一条万无一失的办法，耍了一个“八面玲珑”的把戏。这就是，通过伪装渠道，把它的钱同时投进竞选双方的政党，尤其是站在政府一边的那个政党的金库里。

有组织犯罪就这样成了合法企业同政党这一联盟的伙伴。当两大政党及其内部互相竞争的派系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意见一致时，那些通常总要拿到公众中进行评判的分歧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时，双方的代表人物便开始玩弄象“清廉政府”一类的概念。可是，一旦两大政党内部的派系或两大政党之间的斗争尖锐化时，这些集团之中的任何一个集团，都会毫不犹豫地利用手头的一切武器，去揭发对方贪赃枉法。

然而，被揭发有贪赃枉法的政党却仍可以执政好多年，只不过在管理上做一些各种各样的改进。要推垮一个政党绝非易事，因为它是在幕后活动，总是通过被选上的官员发挥作用，而且一旦在万不得已时，便打算把这些官员中的某些人作为牺牲品，做出进行“清洗”的姿态。

有组织犯罪辛迪加就是这样通过向政党提供金钱、收买警察和审判机关保证了自己的安全，既可以逃脱刑法的强制手段，也可以避免政府的干预。结果，那些从事有组织犯罪买卖的人物，便活动在仿佛是一个越出法律之外的世界里。

与此同时，犯罪辛迪加也是一个组织相当严密的暴力集团，它经常具有对美国社会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进行卓有成效和无法控制的干预的危险性。它宛如一个国中之国，或者按美国研究人员的话说，是“第二政府”。

7. 犯罪辛迪加在国际上有着种种联系。这大大增加了各国同有组织犯罪进行斗争的机构工作上的难度。

比如，美国警方就无力根除支系庞杂的犯罪组织，只能打击这个组织在美国的某个分支。在这种情况下，对犯罪组织的任何打击都是局部的、地方性的和个别的，而且很快就可以得到补偿，即一些新成员进入犯罪生意界，从而该组织遭受打击的那个部分，事实上又复旧如初。在美国，即使是对有组织犯罪最沉重的打击，也只能迫使其猖狂的活动暂时有所收敛，在短期内对有组织犯罪的力量有所削弱，以致减缓其他国家的犯罪组织，打入美国非法贸易市场的步伐。不过，这些外国犯罪集团将在美国寻找同谋，引诱美国人组成新的集团去从事非法买卖。根据这种情况，只有在国际多方协议同具有国内和一国特征的措施相结合的基础上，如同非法贩卖毒品的斗争，当前就有可能奏效。

以上所分析的，关于同有组织犯罪作斗争的种种困难，并非仅仅是美国所独有的。正如本书作者所提供的大量资料所表明的那样，上述困难同样存在于黑手党的故乡。按照意大利进步活动家米凯莱·潘达莱奥内的话说，西西里的黑手党已经演变成“一股政治和经济实力，这支力量要竭力征服各地地方政府，渗入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域。”

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以政论的形式写成的，但读起来却饶有兴味。作者通过自己对黑手党活动的评价和论述，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劣根性。因为正是这个制度孳生了有组织犯罪并促使其日益扩大蔓延。

法学院博士B. M. 尼古莱奇克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白铁匠和火化炉

美国支系庞杂的匪徒辛迪加“我们的事业”，一向关心新一代……为了补充自己的队伍，如今它还试图把西西里人输入美国，而且已经有大约一千多名西西里人通过加拿大被非法引进美国……据纽约一家报纸报道，其中只有少数非法潜入者被揭露，因为这些西西里人很快就搞到假护照并在匪徒控制的企业里落住了脚。

《人民之声报》，维也纳，1971.10.9

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打开录音机，从监听耳机里传出他非常熟悉的声音。这是安杰洛·迪卡洛。这就是说：外号人称“鲑鱼”的迪卡洛，又下榻在新泽西州那家他平时作为据点的汽车旅馆里，而且眼下正在同野猫安托尼·鲁索通电话。

野猫用关心的语调嘱咐“鲑鱼”一定要谨慎从事，告诉他一年前已78岁高龄的鲁杰罗·博亚尔多在新泽西州里文格斯顿城博法尔大街328号买下一幢别墅。鲁索在电话里暗示迪卡洛，在别墅的花园深处，同花暖房并排，有一座焚化垃圾的炉子，炉子里安着很粗的炉条。如果博亚尔多突然心血来潮，想要邀请他去作客，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独自一人前往。鲁索告诫说：

“你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在那里被‘缝住’^①了吗？”

迪卡洛好长时间没弄明白这话的含义，于是问道：

“这跟那个带粗炉条的火化炉有什么关系？”

“我的意思是，去那里之前，要先好好动动脑子。这已经够清楚的了。”

鲁索挂上了电话。

联邦调查局的那位工作人员关上了录音机。帷幕又一次掀开了一条缝。几十年来，在这块帷幕后面隐蔽着那些老奸巨滑的匪徒和骗子。可是联邦调查局的人明白，他们的一切努力最终仍是付之东流。因为美国法院并不把电话录音纪录作为罪证审理。可联邦调查局在新泽西州录下的这类电话纪录，总计已有1200页之多。在这种情况下，1969年12月应检察官的要求，警方终于采取了坚决措施，在纽瓦克一举拘捕了50多人。这一来，报界可算有了轰动一时的新闻。报纸大喊大叫：“这是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猛力一击！”

而这一切最早起始于1967年的夏天。当时，所有美国的各家报纸经常报道在纽约附近的这座小城里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小城纽瓦克长期以来被人称为纽约的收容所，其40万居民中，有2/3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美国黑人和波多黎各人。这是美国东海岸一个极度贫困和落后的小城。有个记者对它的特征曾作过一番形象地描绘：“这是世界上最大城市凄凉的后院，几乎总是被厚厚一层黄褐色的恶臭所笼罩迷漫。”这个小城的居民有15%失业。据当局说，整个住房设备有三分之

^① 此系黑话，即有去无回的意思。这里暗指此火化炉经常烧死敌对家族的成员。

一不符合卫生标准。

1967年夏天，在纽瓦克贫民区爆发了一场因绝望而引起的暴乱。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奋起反抗种族主义和贫困。警察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了残酷镇压。但是，新泽西州州长却不得不任命一个委员会，调查纽瓦克这次“种族骚乱”的原因。后来，这个委员会在自己的报告中，描述了一些极不成体统的行动。至于发生这次骚乱的一个主要原因，按照该委员会的看法，是“贪赃枉法的极度蔓延”。居民们公开声称，“在市政厅里什么都可以拿钱买。”

贪赃枉法在纽瓦克的确由来已久。早在20年代，有组织犯罪就在这里问世。当时，走私贩卖酒精饮料大王之一的埃布纳·茨维曼当上了纽瓦克第三选区民主党的头子。而在第一选区主事的是鲁杰罗·博亚尔多。当时，在茨维曼和博亚尔多之间经常发生火并，直到1930年才达成“和平”协议。缔结和约那天，匪徒们举行了一次使纽瓦克全城议论不已的盛大宴会，出席宴会的贵宾，有新泽西州参议院和美国国会的议员候选人。

然而，匪徒的友谊并不地久天长。就在签订“和平条约”之后不久，茨维曼手下的人在布洛特大街打了博亚尔多的黑枪。但后者虽身中十六弹，可还是活了下来。不过除此不幸之外，后来他又过了两年半的铁窗生活，因为他曾持枪还击，但没有持枪证。不久，茨维曼也遭到匪徒之死的那种下场。而外号人称大马靴的鲁杰罗·博亚尔多则在里文格斯顿买下了那座别墅。别墅的花园里不仅有上面提到那个火化炉，而且还建造了一座纪念碑，碑上是博亚尔多骑着高头大马的塑像。鲁杰罗·博亚尔多简直是青云直上，最后成了美

国黑手党，即“我们的事业”联盟的领导人之一，而且具体工作，全由他手下的“中尉们”担当。

1962年，休·阿多尼其奥被选为纽瓦克市市长。“我们的事业”对他的竞选运动提供了资助。那么要求这位市长对此如何效劳回报，这一点联邦调查局的录音作了揭露。下面就是鲑鱼迪卡洛同他的两名同伙西·雷加和“小不点儿乔”，即德贝内吉克迪斯之间在选举前的一次谈话。

小不点儿乔：这件事还要持续两三周，不过，你可以不必怀疑，休吉(阿多尼其奥)将是我们的人。

迪卡洛：好。那么今天见面时，你就转告他，要是他还打算同别人搞什么交易，那么这个交易对他来说将是最后一个。

接着鲑鱼提出了象是指令似的建议：“如果你打算支持什么人去捞到官方职位，事先就要求他声明，一旦拒绝随着你的笛子跳舞，或者不再听你的话，那么他就请求辞去职务。”

一切都如计划得那样，阿多尼其奥在选举中获胜，并一直认真地跟着黑手党的笛子跳舞。随着他进入市政厅，“我们的事业”也就统治了整个纽瓦克。他们还把警察局长这个位子安插上自己的人，此人叫多米尼克·阿斯宾努。1969年颇有名声的黑手党头子托马克·佩科里在美国西海岸度假，给他做保镖的，就是纽瓦克的刑警！

继纽瓦克之后，“我们的事业”逐步控制了整个新泽西州。该州警方首脑多米尼克·卡佩洛也被列入黑手党准备收买的名单之中。可是，卡佩洛企图给自己提高价格。就此，鲑鱼迪卡洛也在电话里对黑手党分子路易斯·佩尔切洛和西·雷加抱怨说：

“伙计们，你们知道不知道，卡比（卡佩洛的外号）这个家伙要多少钱？”

佩尔切洛：不知道。要多少？

缸鱼：他提出朗布拉奇市要一千美元，埃什贝利也要一千。

西·雷加：每一个城市吗？

缸鱼：是的，每个城市。至于全区他可就要漫天要价了。

佩尔切洛：要是象埃什贝利这样闭塞的地方都要这么高，那纽瓦克他该要多少呢？

缸鱼：他说，每开一场赌，我们要给他1500美元。你想想，一个月就1500！

西·雷加：那么七、八、九这三个月他要翻一翻啰！

缸鱼：干脆让我们把所有的据点都搬到朗布兰奇，那就只付给他一份钱。

佩尔切洛：这个主意倒不错。

不言而喻，卡佩洛也必须提供什么作为交换，比如，遏制自己手下警察们的办案热情，佯装未发现非法聚赌的巢穴等（这是匪徒们的重要财源）。当时，非法赌博辛迪加的总头子就是“我们的事业”的“大人物”之一西蒙·德卡瓦尔坎蒂。此人表面上经营着一家建材商店。为此，朋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白铁匠山姆”。

在新泽西州，博亚尔多、迪卡洛和德卡瓦尔坎蒂都是受尊敬的人物。博亚尔多的儿子举行婚礼，客人达两千人之多，其中就有民主党国会议员比特·罗金诺。此外，多米尼克·卡佩洛所以能就任州警察局局长，应该感谢新泽西州州

长理查德·休杰斯的支持和哈德逊区民主党领袖约翰·肯纳的举荐，而后者同鲑鱼迪卡洛是莫逆之交。

然而，匪徒和政界人物的亲密友谊，当时未能阻止住法院对纽瓦克黑手党的审判。1970年7月23日宣布了判决，前市长休吉·阿多尼齐奥被判处15年徒刑，从此消失在铁窗之后。大约就在此事件之前一个月，休吉刚在选举中败北，一个叫肯尼特·吉布森的黑人成了他的接替者，被“有色”选民的多数票推举到纽瓦克市长的席位上。自此，表面看来“我们的事业”似乎在纽瓦克已经冰消瓦解。可是1970年12月吉布森市长宣称，自他就职以来，企图向他行贿的金额达3.1万美元之多。

鲁杰罗·博亚尔多没有被诉诸法律，迪卡洛·路易斯·佩尔切洛和西·雷加也是如此！而西蒙·德卡瓦尔坎蒂一如既往地逍遥自在，有充分的空闲时间举行豪华耀眼的婚礼。

在纽瓦克发生上述情况之前及以后，就美国有组织犯罪问题，人们写了数千篇文章，发表了无数见解，并制订了严厉的法规。但是无论在其前或其后，对“我们的事业”并未采取任何决定性措施。那么，自充满神话般传奇的阿尔·卡帕内时代起，至今难道一切都毫无变化吗？不，有变化。这就是黑手党变得比以往更强大。纽瓦克只不过是这座浮游的匪徒冰山上一个小小的峰顶而已。

就纽瓦克发生的种种事件，美国《时代》周刊撰文谈及“我们的事业”。文章写道：“这个组织存在的现实性似乎尚被怀疑。许多美国人不愿意相信，他们的国家在精心掩盖着事实上存在的恶疾。这种恶疾从这个国家窃走了数十亿美元，损害国家公职人员的威望，败坏实业界人士的正派作风，并经

常威胁普通公民的生命。”

然而，美国政府在同有组织犯罪的斗争中，却一直显得无能为力。无论是总统约翰逊或尼克松，都在美国国会提出过同犯罪行为进行斗争的新计划，谈过向犯罪行为“进军”。可是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必须找出犯罪的根源。其实，无论在美国或在其它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犯罪的范围包罗万象，从原因在于社会条件的违法行为，到“白领”阶层的有组织犯罪。而后者实质上是资本运用范畴在现金交易范围内的延续。所以，要消灭有组织犯罪就等于铲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这样一来，掌权者自然对此不感兴趣，从而所有的“进军”也当然就不了了之。比如，1965年12月31日，在纽约的一家饭店，警方逮捕了“我们的事业”的七个族长，后由于“证据不足”，很快就被释放；1966年12月初，纽约警察局又一次给匪徒们以打击：在上等人居住的“奎因斯”区的“星球”饭店里，警方抓住了“我们的事业”的十二个头子，其中包括坎托斯·特拉菲坎特，托马斯·埃博利和卡洛·冈比诺（这几个人读者在本书中将不止一次同其相遇）。然而，连一小时都没有过，在律师的桌子上摆出了130万美元的保证金。结果这十二个黑手党头子都满不在乎地又回到“星球”饭店继续进餐。

美国的司法机关又一次证实了自己在同“我们的事业”的斗争中的软弱无能。而且同样，它也未能斩断西西里的黑手党同“我们的事业”之间的联系。

“荣誉社”的根系

西西里有三个政府：罗马政府、地方政府和黑手党。而对黑手党必须绝对服从，否则就是死亡。

西西里传言

西西里的秘密团体黑手党的历史，衍生出大量的传说。随着黑手党统治权的日益发展和巩固，关于它的神话也日渐增多和丰富。政治家、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学家都极力深入探究这一现象的本质。黑手党的罪行无疑为一些带插图的杂志和各家日报提供了耸人听闻的素材。在这类文章里，总是把黑手党描写成是天然产生的现象，并非常愿意把在欧洲这个落后的一角里所发生的种种事件，解释为是一种神秘命运造成的恶果。但是，这种看法使许多问题得不到解答。比如，怎么会产生这一社会现象呢？这些“杂草”^①的根系究竟在哪里？意大利黑手党的组织名称是什么？为什么它最初要在西西里破土发芽？

^① 在意大利，人们通常这样称呼黑手党。

征服者的入侵

西西里岛位于地中海欧非两个大陆之间最狭窄的区段，成为二者之间的天然纽带。最窄处仅约三公里的墨西拿海峡使该岛同欧洲大陆隔海相望。在能见度高的时候，从西西里岛西部埃利克山顶可以清晰地看到构成突尼斯湾东界的阿达尔角。昔日强大的迦太基^①就立足于此地。

谁占据了西西里海湾，谁就能控制地中海东西两岸各国的商业要道。

西西里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早自远古就吸引了大量的征服者。他们奴役岛上的土著，进而和其同化。征服者们带来了自己的文化，其痕迹至今在大量的宏伟建筑物和古代废墟上仍依稀可见。

最早生活在这个岛上的是西甘诸人。后来，再晚一些，是西古里人。这些民族的起源至今尚未完全弄清。大约在两千八百年前腓尼基的商人在西西里建造了自己的城堡。不久之后，希腊人和迦太基人为争夺该岛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帝国首先征服了迦太基所占据的那部分领土，继而又夺取了希腊人在东海岸所控制的城市，最后完全侵占了这个地中海小岛。在其后的七百年里，西西里一直是罗马奴隶制帝国的一个省份。不过，这种统治，中间曾一度中断数年。因为在公元前二世纪起义的奴隶在西西里曾建立过自己的独立国家。罗马帝国覆灭之后，西西里一度沦落到日

^① 北非奴隶制城市国家。

尔曼的汪达尔和东哥特这两个部族的势力范围之内，直到拜占庭最后征服了这两个小国，随之也征服了西西里岛。拜占庭帝王的总督在这个岛上统治了近三百年。不过，几乎从第一天起，他就不得不防御西非各民族的侵袭。公元九世纪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入侵西西里，自此，西西里又落在了穆斯林手中。

在新的统治下，岛上的经济逐步消除了战争连绵的后果，居民的生活，在当时来说，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过，土著居民仍未能挣脱奴役的枷锁。1061年，在意大利南部已定居三十余年的诺尔曼人的军队，挥师南下占领西西里，继而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建立起诺尔曼王国并成为当时封建欧洲最发达的社会制度。由于拥有第一流的军队，它很快就在地中海地区具有了强大的影响。无怪乎后来另外一些大封建主也极力想控制这个“两个西西里王国”（直到十九世纪，由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组成的国家仍在沿袭此名称）。而第一个有幸得手的是德国霍亨斯陶茨人。但是1266年法国王子查理·安如斯基在罗马教皇的帮助下，从德国人手中夺走了王权。继而由他和他的贵族们在这个岛上建立起残酷统治。

1282年，发生了历史上所谓的“西西里晚祷事件”。根据那一时期的历史记载，当时对征服者的仇恨积满人们的心头。而法国的贵族则企图压制西西里人的反抗。

据说，只是一件不大的事端却成了开始进行惊人屠杀的口实。1282年3月3日，即复活节的第二天，教堂响起钟声，召唤巴勒莫的教徒们去做晚祷。当时有个法国人在教堂入口处纠缠一个西西里姑娘。赶来救助的当地居民打死了这个存心不善的法国人。于是这件事成了目的在于结束外国人统治

这个小岛的起义信号。但是自发的暴乱并未给西西里人民带来理想的自由。很快，西地中海的海上强国阿拉贡王国占领了这个海岛。这次外国统治者的更迭对西西里的封建老爷十分有利。因为这一来，中央政府和西西里的首府中间相距了数千里之遥。十五世纪末阿拉贡和卡斯提尔合并建立西班牙王国，自此，西西里的命运又同西班牙联在一起。而西班牙不仅仅给它带来了王权统治，还伴之以宗教裁判所。除了萨沃斯基公爵短暂执政外，直到1860年，西班牙一直统治着这个海岛，当然要仰仗历届“总督”或“独立的国王”，起初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子孙，后来是波旁王朝的后裔。1848——1849年，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波及到这个地中海小岛。西西里农民奋起反抗封建压迫者。但是波旁王朝把西西里人民的起义溺毙于血海之中。后来，加里波迪领导了争取意大利统一的斗争。只有他，才在西西里人民的帮助下，于1860年，使这个海岛最终从西班牙占领者桎梏下解放出来。

但是，无论是西西里人，也无论是南意大利和撒丁人都很快领悟到，意大利的统一联合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所期望的社会进步。岛上的农民和过去一样仍然缺乏土地。北意大利的资产阶级也没有打算履行自己的诺言。意大利总理兼内务部长弗朗切斯科·克利斯比只是代表帝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全靠军事法庭和特别戒严令来治理西西里。因此，意大利的统一并未引起大多数西西里人的特殊热情，便毫不足为奇了。此外，克利斯比还同那些害怕农民提出土地要求的西西里大地主建立了同盟。

通过对那些年代意大利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安东尼奥·格拉姆

希得出的结论是：“这个联合不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而是基于城市和农村之间领土关系上的，北方对南方的统治。也就是说，北方实质上是‘吸血鬼’，它依靠南方的血汗来养肥自己。它的工业经济的发展是同耗尽南方的经济和农业息息相关的。”

本人就是撒丁人的安东尼奥·格拉姆希继续指出：“意大利北部的资产阶级把西西里看作是自己‘国内殖民地’，并把这个岛视为自己向非洲推行殖民侵略的理想跳板。”

和国家的统一联合同时实施的关税制度，给西西里经济也造成极有害的后果。它伤害了意大利南部工业的弱小嫩芽，尤其损毁了西西里著名的丝绸纺织业。北方资产阶级千方百计阻碍南方工业化，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意大利南北两大部分之间的悬殊越来越大，致使南方的落后趋势一直延续到今天。

对这个海岛富有变迁的历史的简短回顾，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昔日促使黑手党在西西里产生的理由和动因。黑手党最早是作为一个反对异国征服者的自卫组织而出现的。西西里人把各个部族结成紧密联盟，秘密结社，同心协力向收税人、波旁王朝的走狗和自己队伍中奉行通敌政策的叛徒作斗争。正是此时，开始形成一种惯例：无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说出曾参与反抗外国统治者的西西里人的姓名；此外，还对波旁王朝任命的政府不予理睬，对其指令，只要一有机会就设法对付或者干脆不服从。

意大利联合之后，“荣誉社”即今天我们所说的黑手党，失去了作为一个爱国主义组织而存在的权利。不只一代西西里人一直生活在暴力之中，经受暴力的磨难。即使在这个小

岛，从外国压迫者的枷锁下解放之后，许多西西里人仍未脱离黑手党，继续作为其成员。这些人首先是从二地主，即转租土地的人中招募而来。他们作为管家、监工和保镖为西西里封建老爷效劳。而这些老爷在自己的领地里拥有无限的权力，残忍地镇压农民任何形式的反抗。实际上，被雇来担任上述职务的，主要是一些土匪。这些家伙用自己的竭诚效力而得到土地，然后转手出租。在西西里，这类人占有特殊地位，是一个介于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社会阶层。在西西里，对农民进行非经济性强制手段早已盛行，而且主要受益者是大领主。后来，这些二地主在黑手党的帮助下，终于羽毛丰满，拥有了实力，进而挤掉了封建主，自己取而代之。

这个“团体”名称的由来

“Mafia”^①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它首次出现是在什么时候？对这两个简单的问题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答复。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Mafia”这个团体名称来自于“西西里晚祷”事件之前。当时巴勒莫的居民以“Morte Alla Francia, Italia Anela”^②为战斗口号，向自己的压迫者发起进攻。于是，这些研究人员便认为，“Mafia”这个词是由这个口号的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所组成；另外一些史科学家的看法是，这个组织最早建立于1670年，因为当时在巴勒莫成

① 来自意大利文。英文、法文为同形，俄文为《Мафия》，当代汉译词典均解释为“黑手党”，实际早期并非此意。

② 意大利文：“消灭法国是意大利的渴求”。

立了一个“自由思想贵族联盟”。而且这个爱国团体的成员们都是在山洞里举行秘密聚会。于是有人提出，在过去的数百年里，人们都用“Mafia”的复数“Mafie”，即密谋家，来暗指特拉帕尼山的峭壁悬崖，因为隐蔽在此处的山洞乃是西西里秘密爱国团体集会和藏身之地。

而语言学家通过对渗透于西西里土语的各国语言的分析，也研究了“Mafia”一词的来源。

没有必要把解释“Mafia”一词的尝试都一一列举。实际上，时至今日，谁也没有能作出一个圆满的解释。只有书面的记载才能确认，第一次提到“Mafia”一词是在1868年出版的《意大利——西西里词典》里。这样，就无怪乎该字典的出版者把“Mafia”一词的意义，解释为是“Camara”的同义词，因为“Camara”是十九世纪活跃在南意大利的一个匪帮的名称，过去也曾经是一个秘密爱国团体。

当时，意大利南部地区很多置身于封建贵族暴虐统治下的农民，为了表示反抗，纷纷当了土匪。他们不愿意对统治者俯首贴耳，便用结伙打劫来回敬封建地主的胡作妄为。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好久以来，罪行在这个角落里却笼罩着浪漫主义光环。比如，在我们这个世纪的初期，卡拉布里亚地区赫赫有名的土匪朱塞佩·穆索利诺在当地居民中，就以无权者高尚的复仇者和保护神之美称而遐迩闻名。

西西里问题专家朱塞佩·皮特莱在当时就已经放弃了对“Mafia”概念的传统解释。1891年通过分析有关该团体的资料，他写道：“在近20年里，出现了大量关于‘Mafia’的文章，对于它和它的活动提出了极其不同的见解。所以，如果把所有这些互相矛盾的资料放在一起，就会容易得出一些错

误的结论”。

是第一份文献吗？

由于至今尚没有确定可信的文献记载，从而为各种各样的臆想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目前关于黑手党活动的最古老的文献，要算是1838年所写的一份工作报告。这是特拉帕尼地区检察官彼得罗·乌洛阿，写给西班牙国王、波旁王朝的斐迪南二世统治下的司法部的。这个报告中有一部分写道：“在很多农村都有一些小团体，大部分由七八人组成，而且自成一派。他们不聚会，全靠自己的头目从中联系。担任头目的，有的地方是公职人员，有的地方是教士。”

虽然早在1894年意大利内务部长吉罗拉莫·坎泰利就已经把黑手党称作“当代社会的祸端”和“瘟疫”，可是罗马中央政府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措施，以试图消灭这个“荣誉社”。

是不能或是不想？显然，仅仅依靠警方的行动是不够的，因为黑手党深深扎根于西西里的沃土之中，根除它，就意味着要破坏封建秩序的根基。况且，黑手党已经经营不是一个十年，而且建立和巩固了自己的营垒，大都分布在黑手党都城巴勒莫所在的海岛西部。一到西西里的这一地区，首先映入眼帘，给人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简陋的住房举目皆是。在这些疮痍满目的房子里，子女成群的家庭，在可怕的贫困和拥挤中哀戚度日。这里到处是文盲，而且一直沿袭至今。1960年的统计雄辩地说明了很多问题。比如，在核物理和宇宙飞行的世纪里，几乎有27%的西西里人目不识丁，还有20%的

人只会写自己的姓氏。

一位意大利记者，通过对这个组织的历史和被认为几乎是独立语言的西西里方言的研究，有一个惊人的发现，这就是西西里的动词没有将来时形式。啊，西西里是一个没有未来的小岛！但是，尽管灾难重重，大多数西西里人并不向命运低头，虽然大地主可以用暴力镇压，为争取土地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农民们，所进行的自发起义，可要想完全制止是不可能的。1893年一次农民们不可遏止的骚乱便演化成了强大的农民起义。

“到处啄食”

谁要是把黑手党同一般杀人越货的土匪相提并论，他就大错特错了，而且他的这种看法最终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这个在封建时代成长起来的团体，在当时（顺便说一下，也在今天）在西西里体现了有组织犯罪的最高形态。请想一想，恐怕未必能找到这样一种为了权利和利益无所不为的罪行。它犹如一棵毒树，把自己的大量根系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就连一些非常“尊贵和可敬”的公民，如律师和医生，管家和官员，都是这个团体的人。他们不仅靠黑手党发家致富，而且还毫无良心地用恐怖手段对付居民。一个地方黑手党的头目，既主持结婚祝福仪式，也下令处死不驯服的人。这个团体变成了国中之国。它的命令就是不容置辩的法律；它建立自己的税收制度征收赋税。它的手段表面看起来似乎极其平常；它为贵族老爷服务，为此要求定期犒赏。而贵族老爷则如数支付，因为黑手党帮助自己同无地农民和瓜分一些土

地的二地主进行斗争。此外，“荣誉社”也和二地主打交道，向他们提供自己的“商品”——保护。谁要是拒绝黑手党人的“效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的葡萄园被砍得乱七八糟，或者他家山羊的眼睛被挖掉。这一来，为了不受伤害，便不得不掏腰包。此外，就连小偷都要准时纳费，这样他就获得权利去偷那些不受黑手党保护的人。

承租少量土地的农民也惦记着及时纳“水税”，以便价钱昂贵的河水流进被烈日烘干的田里。而那些欠税未交或顽固不交的农民，其田里的禾苗便全干枯而死。同样，如果一个渔民不想失掉自己的船和网，他也必须把捕来的一点点鱼，按照黑手党的定价让出去。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除上述之外，“荣誉社”还制定了一套完善的讹诈办法，完全依照“小鸟啄食”的原则行事：即在社会各阶层，“小鸟到处啄食”，以此养肥自己。

《噤口律条》

波旁王朝统治时期，关于黑手党活动的最早文献曾记载，该组织基本上是松散型结构。但是，每个黑手党成员都在死亡的威慑下恪守一种荣誉法规，而且无论过去或现在，正是这一法规在维系各个家族之间的联系和团结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黑手党的首领要求的是无条件服从，而且对“荣誉社”成员的任何触犯，都被视为对整个黑手党的蓄意侵害，从而要受到相应的严厉惩处。凡是不听命于黑手党的人，起初先受到警告，比如，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会发现自己某个亲人被砍掉一只手，有时也可能是他家喂养的骡子被杀掉。如

果此人对此示意不加理睬，他本人就要惨遭毒手。

对叛徒，等待他的是死亡。一个羊头出现在他家的门口，就是表明已对他作出判决。有时候也会在出卖“兄弟们”的人的门坎上，扔上一条无头死狗。在黑手党人的眼里，再也没有比破坏《噤口律条》更严重的罪行了。所谓《噤口律条》乃是一种绝对保密的誓约。黑手党不成文的法规宣称：“不缄口默言者，必丧命”。在西西里，不仅要求黑手党成员要“缄口默言”，岛上的所有居民也不例外。《噤口律条》始终是支撑黑手党政权的首要强大支柱。正是仰仗《噤口律条》，这个“荣誉社”才进行了，而且如今仍在进行着残酷的统治。

黑手党在宣布了上述死刑判决之后，“族长”便找来被叫做“孩子”的杀手，首先吻他的嘴唇，接着说一句：“母亲有所求，孩子必从命！”此后，被选中的杀手就拿起一种叫“鲁巴拉”的短筒猎枪去执行命令。作为黑手党传统武器的“鲁巴拉”，最初是用来打狼。不过作为复仇的武器，其弹药略有差异。一些研究资料指出，在杀人时，黑手党徒通常都再往弹壳里掺入一些盐。照他们的说法，这大概会加剧死者的痛苦。按照惯例，杀手从正面或脑后开枪，而且枪一响就要让任何一个被害者都不能侥幸逃生。“孩子”由于行刑杀人而得到对自己功劳的首次嘉奖，事后还可以博得“公牛”的美称。

此外，还有一些严重事态促使黑手党从事暗杀活动，比如，一些政敌由于无视该组织的再三警告，也会被无情地剪除；有时，黑手党家族之间会突然发生争执，某个家族企图扩大自己的地盘，侵入了另一个家族的“世袭”领地。一旦双方族长未能达成某种和议，那么就要诉诸武力，而且往往都是以杀掉对方家族的一个成员为开端，以各方家族发誓血腥

复仇互相杀戮为结局。然而，事后虽然死者的家属清楚地知道谁是凶手，但却不向警方供出任何人的姓名。此时，只有全岛的黑手党领袖才可以平息这场鲜血四溅的械斗。

黑手党的组织结构、帮规习俗，曾经长期地被《噤口律条》这块厚厚的帷幕所遮盖，为外人所鲜知。“荣誉社”的队伍是怎样补充的？有一点，多多少少尚被人所知，这就是那些实力雄厚、颇富影响的黑手党成员的儿子和亲属，按照传统，总是沿循父辈和男系亲属的道路走下去。可是，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哪些人可能是“荣誉社”这个圈子里的人呢？一般说来，不必费很大气力就可以知道还有谁是黑手党人。比如，大凡那些很快就飞黄腾达的年轻的官员、律师、议员、教士和医生，人们有充分把握可以认为，他们都是“荣誉社”的成员。至于谁是族长，甚至谁是一个城市或者全省的黑手党头目，有时几乎就是公开的秘密。不过，了解黑手党所有帮规和礼仪的人，却只有那些“被选中的人”。

一个黑手党徒的供述

社会公众对上述一切只是到60年代初才有较为详细的了解，因为1962年元月22日西西里的《时代周报》以耸人听闻的标题：《我，一个医生，是怎样成为黑手党徒的》，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家报纸很早就着手对黑手党的罪恶行径进行调查。当不顾风险开始进行有关这个黑手党医生的例行调查时，黑手党为了杀一儆百，决定教训一下“执拗”的办报人，以迫使其停止私下调查。于是一声巨响，该报编辑部大楼的一半飞上

了天，轮转印刷机遭到了严重破坏。需要说明的是，这家报纸作为耸人听闻的内幕揭露所发表的这些材料，其实同其它报纸时而披露的内容，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之处。可是刊载在《时代周报》上的这篇黑手党医生的供词，却大大震动了社会公众。说真的，这位敢于公开自己姓名、住址的大胆的黑手党徒，不再惧怕由于触犯《噤口律条》而招致报复，恐怕事前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梅尔基奥雷·阿莱格拉大夫（人们都这样称呼这位黑手党医生）1937年因参与谋杀罪被警方逮捕。在狱中他认罪招供，向审讯人员供述了，他怎样被吸收加入了“荣誉社”，交待了他所了解的有关这个组织的内幕。作为该组织一个颇受尊重的成员，他同黑手党的强有力人物保持着密切接触。所以他所提供的有关这个组织的情况是极有价值的。大概，万幸的是局势的巧合，才救了这个絮叨多言的阿莱格拉一命；他向警方的供词长期锁在档案柜里，因为墨索里尼执政时期的司法机关，对把这份文件变成公开、有价值的东西，不感兴趣。相反，意大利法西斯却公开吹嘘，他们已经使西西里完全摆脱了象黑手党这样的社会瘟疫。

《时代周报》的编辑完全有权认为，这份文件能一直保存在档案里，实在是件偶然的幸事，因为黑手党长长的大手经常可以伸到警方最上层官员和检察官那里。而这些人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能以“研究案情”为由，调阅阿莱格拉大夫口供纪录一类的文件。大部分有损于黑手党声誉和揭露其内幕的材料，往往都是这样不翼而飞的。有时还会假黑手党的那些中间人之手，用一些内容不痛不痒的伪制品换掉上述文件。而这位黑手党医生的供词记录，25年后，居然能落到西西里

这家报纸手里，实在是出人意料之事。当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已故的阿莱格拉才在1962年身不由己地成了反对黑手党的主要见证人。

鲜血和灰烬

这件事要追溯到1916年。此时西西里的这个封建帮会正处于鼎盛时期。当时在意大利北部，即阿尔卑斯山和伊松佐河一带，意大利人正在同奥匈帝国的军队兵刃相见，越来越多的西西里农民被征入伍去为意大利帝国资产阶级效力。但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并不愿意为罗马当局卖命，因为罗马政权总是象对待半殖民地那样来对待西西里。人们用地图上的图形位置暗喻说：“意大利的靴子踩住西西里”。但此时，西西里岛上的黑手党头子同意大利北方的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样，也不放过大发战争之财的良机，只不过他们是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进行而已。他们根据同军方签订的协议，包揽征购军用马匹，并把付给马主人的补偿费的大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里。而他们向军方提供的马匹，却根本不适于军事用途，结果“荣誉社”的一些人被诉诸于法律。然而，同以往多次一样，还是抓不到证据，最后不了了之。

就是在这个时期，阿莱格拉大夫正在巴勒莫军事野战医院供职，为伤员治病。当时，伤员中混杂一些装病，甚至是故意自伤的人。有一次他发现，仅仅使用普通碘酒就治好了一个病号的丹毒性炎症。于是阿莱格拉大夫就威胁这个患者说，要把他这种明显装病一事报告有关当局。可是，还没等大夫来得及付诸行动，一位自称叫朱利奥·达加特的人找上

门来，要同他谈件事。大夫是西西里人，他当即猜出步入他办公室的是个什么人。而且此人那种傲慢的言谈举止也表明，这是“荣誉社”中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

达加特开门见山地提出自己的要求。他说，大夫打算去报告的那个人，据说是个可怜的人，一家老小靠他养活。还提出，让他长期住院治疗，尽快治愈为好。达加特丝毫没有对医生进行恐吓，可是大夫却明白事态的严重性，所以当即执行了貌似请求的命令。

此后不久，达加特对医生再次造访。这一回他是在两条大汉的陪同下，来邀请阿莱格拉大夫到巴勒莫一家水果店去谈谈。军医同意前往。会见在水果店帐房里举行。首先，这几个人向阿莱格拉大夫表示无限感激，因为他给予了他们如此无私和真诚的帮助。然后，他们就转上了正题。

20年后，在警察局接受审讯时，阿莱格拉医生对这次会见作了如下描述（《时代周报》发表的就是这次审讯纪录）：

“这几个人向我毫不隐讳地表明，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的成员。人们称他们是‘受尊敬的人’。我当时想，这个组织大概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黑手党。不过，大多数人对它并没有一个明晰的概念。接着，这几个人对我解释说，违犯这个组织的法规要受到严厉制裁。比如，严禁成员行窃，但相反在一定情况下，却准许杀人，当然必须得到‘族长’的应允，在黑手党内擅自‘干湿活’要被处以极刑。当时，达加特似乎越说越兴奋。他又说：‘只要族长批准去杀人，那么考虑如何去完成这项任务的人，就可以指望得到组织的协助，特殊情况下，甚至是具体的帮助。’”

阿莱格拉大夫还谈到了当年黑手党这个封建帮会内部

的组织结构：

“就我所知，整个组织分成若干‘家族’。领导每一个家族的叫‘卡博’，即族长。通常，一个家族由相邻的城镇或乡村结合而成的几个小组所组成。不过，一旦一个‘家族’过大，控制管理起来有困难，它就分成若干‘十人小组’；每个‘十人小组’都有自己的头目。至于各县、区之间的关系，按照黑手党的规矩，各个家族各自独立，互不依附。尽管如此，各县区的黑手党首领之间仍联系紧密，经常互相协调行动。此外，这个组织在北美、南美、突尼斯和摩洛哥都有强大的分支。”

在阿莱格拉供述之前，通过其他渠道，社会公众已获悉，以组长为首的“十人小组”，又分成两个“五人小组”，该小组被称为“手臂”。此外，每个“家族”的族长都享有“先生”的尊号。由他们和自己的副手共同选举出全西西里岛黑手党的首脑。

在三个黑手党人如此开诚布公地向阿莱格拉大夫泄露了“荣誉社”的神圣秘密之后，再向他提出是否愿意加入黑手党这一问题，就只不过是形式而已了。他们对医生出其不意地进攻，使医生甚至来不及考虑表示异议。对这一点，阿莱格拉大夫是这样说的：

“我明白，我已经知道了大量隐秘。如果我拒绝，就别打算活着离开会见地点。因此，我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立即表示同意，而且还要显得非常兴奋，乐意。”

接纳入帮要举行中世纪式的仪式。两名作为新成员“教父”的老黑手党徒，把这个新成员领进一间幽暗的房子里。桌子上摆着两支点燃的蜡烛，中间供奉着圣像。阿莱格拉大夫对自己的入帮仪式描述说：

“他们先用针刺破我的右手中指，挤出血来，用血滴透一小片纸，接着把纸放在蜡烛上点燃。然后，我手里托着燃尽的纸灰进行宣誓。誓词的内容大意是：‘我宣誓永远忠于我的兄弟们。任何时候都不欺骗和出卖他们，要竭尽全力给他们以帮助。如果我违背誓言，就象这片圣纸一样，立刻化为灰烬，永不为人。’”

一旦进入“受尊敬的人”的圈子里，这位年轻的医生就开始享受到一切可能享受的优惠和特权。参加黑手党给他换来了叮当作响的金币。在巴勒莫附近的卡斯泰尔维特拉诺这个小地方，他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仰仗此收入，很快就买下一家设备齐全的医院，而且他的“兄弟们”都挺操心，不让他缺少大量的就诊病人。

当然，黑手党把这个大夫搂进自己的怀抱，绝非没有私念。“兄弟们”要求他用忠实的服务和各方面的效力——从偷偷治疗枪伤，到协助暗杀不合“荣誉社”心意的人——以作为自己对财源茂盛、飞黄腾达的报答。

在成为有影响的黑手党人之后，阿莱格拉大夫开始从找他看病求助的年轻人中，为组织物色“骨干”。凡是生活在黑手党控制地区的居民都可以被考虑作“物色对象”。因为每当居民们想求助于解决某一问题时，既不去找警察局，也不去找地方政府，因为他们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而是去找黑手党。比如，有的人去征询，是否同意自己的婚事；有的人请求黑手党准许自己移居国外。除此之外，黑手党还负责调解一些重大争端。当然，他们处理和解决一切问题都是依照自己的见解，而且首先考虑的是自己要从中取利。

阿莱格拉大夫所描绘的画面，同“荣誉社”的封建特征是

一致的。而这一特征，又同当时主宰这个地中海小岛的封建的社会关系，再也没有那么吻合的了。到了本世纪50年代，在意大利北方和北美资本主义的帮助下，西西里的工业化才开始畏缩起步，而且正是在此之后，黑手党才在新的条件影响下改变了自己的行动方式和方法。

“黑手”

在文明社会，法律就象舰船靠大海撑浮一样，要以道德为支柱。

联邦法官奥勒·沃伦

1962、11、11于纽约

新奥尔良，1980年。这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城市，但是它把州首府的美名让给了不大出名的巴吞鲁日。它是个重要的海港城市，由法国人1718年建立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新奥尔良曾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时期。在那场北部工厂主剥夺了富有的南方庄园主政治统治的长期流血内战之后，工业在南部的—些城市开始生根发芽。正是此时，工业化的热浪扑进了新奥尔良。

自1890年起，外国移民从四面八方开始涌进这个城市。要在异国他乡谋生，而且要在为求生存而日日夜夜进行的无情竞争中，站稳脚跟，对这些移民来说，实在要付出不少的劳动。在美国，传统性移民主要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及爱尔兰和德国。所以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的境遇就特别困难。从1890年起，南欧各国的移民数量剧增，而北美大陆上的早期移民，便不得不迅速适应那些自己并不习惯的新邻居，而后者也要付出极大努力，去习惯自己觉得异常的新环境，

这样，同一个国家的移民便不得不互相依存。在这种情况下，“黑手党的本能”不仅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更加强化。因为这种本能激励人们去求生存，在政府之外谋得保护。无怪乎一部分移民仿效匪徒集团这种典型的美国社会现象。过去，那些恬不知耻的政客们，为了在竞选斗争中恐吓选民，而组织了犯罪集团。这些职业匪徒们，一方面抢银行、敲诈、行窃，同时还忠实地为政客们效劳。如果需要镇压罢工，除掉某个不合心意的政界人物，只要给大价钱，他们随时准备行动。为了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和铲除竞争对手，企业家们也情愿经常求助匪徒。当时在美国，资本家雇用犯罪分子已成了司空见惯之事，因为只有强者才有幸在无情的竞争搏斗中生存下去。

一般情况下，匪帮成员都来自社会的最底层，因为这个阶层的极度贫困，为无业游民的大量增殖创造了良田沃土。在每年都有数十万人移居而来的美国，大多数没有一技之长的人成了移民的主体。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不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和习俗，遭受着民族而且经常是宗教的歧视，居住在象黑人区那样的贫民窟里。此外，移民们对民法和刑法的任何触犯，都被视为特别残酷的行为，而新闻界则将其称之为“非美国的固有现象”。当数十万失业和饥饿的人们离开绿岛爱尔兰时，报界不惜浓墨，大书特书爱尔兰人所犯的罪行；而当犹太人为了逃避浩劫和独裁统治，由沙皇俄国逃到美国时，美国报刊就又对犹太匪帮的胡作非为拼命地大喊大叫一番。这一来，就使一般的美国人形成了一种观念，似乎有组织犯罪是由外部输入美国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在那些对祖国的黑手党仍记忆犹新的

西西里移民中间，便萌发了建立一个“新的”，即第二个黑手党的念头。而这个组织的首批受害者是移居美国的农民同胞，因为对付他们不用花多大力气。如果以提供“保护”为交换条件，向一个意大利裔的小店主索取“酬金”，根本无需费什么口舌，小铺的掌柜的或者手工业小业主立即照付不误，尽管他可能向朋友或邻居抱怨说：“你瞧，朱塞佩，还是老样子，一点儿也没变。我们走到哪儿，黑手党都跟着我们。”

就这样，“新世界”的黑手党徒们开始迅速的发家致富了。1890年新奥尔良的每个居民都知道，有一个叫“黑手党”的匪帮。不管这个名字听起来多么离奇，但是匪帮成员们，都对好象是借用自庸俗犯罪小说的这个名称，极为自豪。同时，对投寄具有强烈神秘色彩的“警告”和恐吓信也感到特别骄傲。

对所有匪帮都相当了解的新奥尔良警察当局，对黑手党表现出令人费解的消极态度。从巴勒莫移居而来的安东尼奥·马特兰加和卡洛·马特兰加兄弟领导着这里的意大利犯罪团伙，这一点对这个城市的居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这兄弟俩起先在新奥尔良开了一家菜店，后来买下一家经营水果进口贸易的商行。黑手党在新奥尔良站住脚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抓对港口的控制权，因为这里是日趋兴旺的水果贸易转运点。当时，凡是船主未向马特兰加兄弟按规定进贡之前，港口里的任何船只都别打算卸货。

当然，社会公众对此不可能没有所闻，可是也有不少人固执己见，不相信这一点。这些简直是幼稚的人认为，“黑手党”纯属西西里的社会现象，并非美国所固有。这些人当中就包括一些公开表示妒意的人，因为他们自己也一心要控制新奥尔良海港。

在那几年里，新奥尔良地区发生了不少野蛮凶杀事件。

新奥尔良的私刑

新奥尔良警察局长戴维·汉内克西有一次十分惊奇地发现，他的部下——大部分是意大利后裔——简直明显地又瞎又聋。似乎他们什么都看着不着，听不见，也什么都不知道。于是，他只好亲自动手调查发生在港口的罪行，最后终于查明，西西里人普雷文札诺兄弟和马特兰加兄弟之间的明争暗斗是一切罪行的动因。

几周之后，汉内克西搜集到了足以有损双方声誉的材料。检察官在熟悉案情之后，支持起诉并组织了陪审法庭。

就在要把案件移交给法庭的头一天晚上，汉内克西局长决定再把全部材料看一遍，以列出犯罪分子和幕后指挥者的全部名单。深夜，工作结束之后，他决定步行回家。当走到街角拐弯处，突然枪声大作，汉内克西一下子栽倒在地上。断气前，只来得及向听到枪声跑过来的一名警察说了一句：“这是那些狗干的！”

次日清晨，整个新奥尔良就象神话中的油锅一样，一下子沸腾起来，所有的人都在议论“狗”，这是当时美国人对意大利移民的卑称。全城居民一致认为，黑手党走得太远了！尽管新奥尔良在美国以贪赃枉法最猖獗的城市而闻名，可是杀人在这里一直被认为是可耻的罪行。不久，逮捕并向法院起诉了十九名西西里人。他们都是暗杀警察局长戴维·汉内克西的参与者和幕后策划人。在审讯过程中，有六十个人出庭作证，其中还有几个人辨认了凶手。不过，只要涉及法律，

黑手党可从不抓小事。他们立即动员出最优秀的律师为凶手辩护，而且也并非毫无成效。最后，只有三个黑手党徒分别被判处不同刑期，其他人均宣告无罪。看，新奥尔良多么容易被收买啊！

这件事使该城居民忍无可忍，就连那些原先只是耸耸肩膀表示无可奈何的人，在了解到接二连三的贪赃枉法的事实之后，也都怒不可遏，对如此轻微的判决感到极为气愤。

于是，就在上述审理结束之后两天，即1891年3月13日，新奥尔良的居民举行了群众集会，抗议法庭的不公正判决。起初，集会的气氛还较为平静，但越来越激昂，很快数以千计的人群冲进了该市的监狱。当他们砸破了监狱的大门，涌进去寻找一直囚禁在那里的西西里人时，没有一个人打算去阻拦这些发怒的居民。狂暴的人群把两个西西里人拖到大街上痛打，并当即吊死在大街的路灯上，其余九个黑手党分子被强迫站在监狱的墙上，一声令下，人群用猎枪和手枪朝他们猛射。接着，这几个黑手党分子的尸体又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密西西比河上的这个港口城市，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群众性私刑行动。

发生在新奥尔良的这次屠杀证明了，在美国的一些地区，移民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冲击新奥尔良监狱表明，要利用这种紧张关系是何等的容易。

新闻界详细报道了新奥尔良发生的上述事件并迅速将其传播到美国的各个角落。而且这次事件很快就产生了后果。对意大利移民来说，这些后果是加剧了美国本地居民对他们的不信任，激起了种族歧视的新浪潮。这种令人不快的变化甚至影响到意大利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国家关系。意大利

驻华盛顿大使向美国政府的代表递交了一份抗议书，抗议美国报纸掀起广泛的诽谤浪潮，在报道中把所有的意大利人毫无例外地统统称之为黑手党徒。意大利国王甚至以断绝外交关系相威胁。后来，这件事总算被压了下去。美国向意大利支付3000万美元作为所受损失——十一人被打死——的赔偿费。而新奥尔良当局对发生的一切则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因为把罪责都推到“狗”——意大利移民——身上，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希望以此转移公众的视线，使其不再注意他们本身的恶迹。

“绿色团”

新奥尔良市长约瑟夫·埃莎士比尔在向市议会所做的工作总结报告中断言：“只要我们社会内部存在着这样的组织（黑手党——作者），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是健康的。所以，必须铲除这个组织，否则，社会就有毁灭之虞。移居我国的西西里人应当成为美国公民，尊重其法律，否则，在我们中间就没有他们的位置。”

但是，在弱肉强食的法则左右一切的社会里，黑手党已经定居下来。而且这个犯罪组织同这个社会也颇为适应协调。当然，应当承认，比起社会本身，黑手党要更粗暴、笨拙和露骨。可是它已经成为这个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在这个社会里找到了适宜自身成长发展的肥沃土壤。所以，在新奥尔良，匪徒之间互相火并和警方人员被害，并非是有组织犯罪在美国的最后一次，而恰恰是开始。正是从这时候起，西西里人和美国人的秘密匪徒组织，就象发了酵似地在美国

到处开始膨胀起来。

1915年春天，黑手党人又在密西西比河下游的圣路易斯城安营下寨。他们把自己的组织命名为“绿色团”。按照行之有效的老传统，他们也是以向自己的同胞征收“保护税”为活动开端。靠这种办法积累“资本”之后，就着手从事牲畜贸易，然后逐步“垄断”了肉类批发。与此同时还使用了“劝告”和“再次警告”等行之有效的手段，为了杀鸡给猴看，有时他们也从肉体上除掉一些执拗的人。仅在几年间，“绿色团”就杀死三十多个“不好说通的人”。

黑手党不仅在圣路易斯动手杀人，在芝加哥也是如此。在芝加哥，犯罪分子的秘密集团忠实于新奥尔良的传统，把自己组织的名称也叫“黑手党”。这座因一条不大的印地安支流芝加哥河而得名的城市，创建于1850年。当时只有十五幢房子和一百多个居民。可是到了1875年，芝加哥已经拥有近百万人口，并成为世界最大的谷物、牲畜、肉类和木材贸易中心之一。这个城市经历了工业高涨时期。美国资本主义疯狂发展所导致的最突出的弊端，象焦点一样，都聚集在这个城市。而且这种发展在一百年之内，为犯罪活动的加剧创造了理想的条件。早在本世纪初，就发现一种明显的趋势，这就是芝加哥将很快成为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城市。比如，1910年有25起无头谋杀案，1911年有40起；1912年，33起；1913年已达42起之多。

芝加哥警方把所有罪行都记到了黑手党的账上。关于这些罪行的消息大多来自“小意大利”。这个芝加哥的贫民区位于好泰罗大街，格兰特林荫大道，乌克大街和温特沃尔特大街之间，美国人把其卑称为“意大利面条区”。1913年5月，

这个美国第二大城的公民们在《芝加哥每日新闻》的社论里读到下述内容：“从今年年初起的93天里，在‘意大利面条区’爆炸了五十五枚炸弹。这些爆炸是用来再次警告那些执拗的人。据一位在意大利区工作多年，颇有经验的警探说，在每十个定期向黑手党纳贡人中，至少有一个执拗的人，他们在没有被炸弹警告之前，一直拒不从命。如果真是这样，黑手党从元月一日起，就已经向550个人征收了金钱。一个外号叫‘脏手指头’的黑手党分子，从来是少一千美元不要。据消息灵通人士估计，黑手党每年收纳的贡金要达50万美元之多！”

然而，尽管黑手党如此不加掩饰地进行犯罪活动，芝加哥警方却一直处于一堵不可逾越的沉默大墙之前。《噤口律条》又来到大洋彼岸发挥作用了，炸弹和恐吓信以自己的特有语言在说话。有一次，从一个偶然被抓住的黑手党徒约瑟夫·金内蒂身上，警方搜出了一封尚未发出的信件。内容是：“最最尊敬的希尔瓦尼先生！烦劳给敝人两千美元。当然，如果您珍视生命的话。但愿敝人的请求不过分给您增加负担。请您于四日之内把钱放在贵府的门口，否则，一周之后，就让您和您的全家粉身碎骨。勿谓言之不予也。切望永远做您的朋友——黑手党。”

就这样，新奥尔良就有了失掉“犯罪率最高的城市”这一名声的危险性，因为出现了象芝加哥这样的竞争者。数年之后，黑手党越出了自己传统活动的框框，在五花八门的商业、手工业行业中扎下了根。当后来几个帝国主义大鲨鱼为争夺统治世界的权利，在凡尔登和索姆兵刃相见时，芝加哥匪徒——其中主要是意大利人——也在为控制该城的各个地区大打出手，而且残酷程度不逊于前者。

1916年匪徒们为争夺芝加哥第十九区，开始了人们称之为“鲜血淋淋”的火并。自1888年起，这个区就在埃伦·约翰·布埃尔及其团伙的完全控制之下。后来，昔日的苦役犯，并当过教士，后来是妓院老板的恩托尼·丹德利亚同前者公开相争。当时，布埃尔认为，自己同西西里人弗兰科·隆巴尔多建立了联盟乃是聪明之举。然而1916年2月丹德利亚却在隆巴尔多多的啤酒馆里被人打死。看来，在芝加哥建立黑手党一统天下的时机暂时还不成熟。

警察局中尉之死

黑手党在东海岸的首府纽约也定居落户了，而且，依照惯例，也首先抓住对港口和肉类、鱼类及果品批发经营的控制权。纽约警方在美国首开先例组织了一个专门同黑手党作斗争的机构，其负责人是巴勒莫出生的约瑟夫(乔)·彼得罗西诺。此人还是孩子时，就同父母一起迁居美国并取得了美国公民权。

1909年初，纽约警察局首脑特奥多尔·宾厄姆召见了乔·彼得罗西诺，给了他一项秘密使命，要他实地考察研究一下黑手党的活动方式，找出犯罪分子从意大利潜入美国的渠道，并和意大利警方配合，切断西西里黑手党和美国黑手党之间的联系。

27岁的纽约警察局中尉彼得罗西诺情绪高昂地离开了美国大陆，随身携带的那封纽约警察局长宾厄姆的介绍信，更大大增加了年轻警官竭诚效力，追求功名之心。信中写道：“兹委任约瑟夫·彼得罗西诺中尉对一些意大利裔犯罪分

子的活动进行秘密调查。这些犯罪分子有的已在美国定居，有的正打算向这里移居。如果阁下能在彼得罗西诺执行任务过程中给予积极协助，我们将极为感激……”

使命的绝密性要求彼得罗西诺必须化名旅行，所以发给他的护照上写的名字是古尔埃尔莫·迪西蒙尼。到达罗马后，他先拜访了意大利内务部长佩西诺和警方首脑莱奥纳尔迪。这两位高级领导人让彼得罗西诺中尉放心，他们一定鼎力襄助。

得到了这一保证后，彼得罗西诺便于3月28日抵达巴勒莫，下榻在马里诺广场附近的头等大饭店“佛朗克旅馆”。考虑到安全和保密，他通过“意大利商业银行”这个颇有声望的银号进行通讯联系。

但是，这位年轻警官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了。早在他踏上长满橙子树的海岛之前，黑手党的美国分支就已经把这个美国警探的秘密使命一事，通知了西西里岛黑手党的总头目维托·卡肖·费洛先生^①。这位年轻时曾在美国黑手党里“培训”过的维托先生，连一分钟也没让彼得罗西诺离开自己的视线。这个美国人每走一步，都有维托先生手下的人盯梢，就连他发给纽约的第一份密报，也落在了这些人手中。彼得罗西诺竭诚效力地在巴勒莫企图同与黑手党有联系的中间人挂钩，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具有极高信誉的“意大利商业银行”的每一个窗口里，都坐着“荣誉社”的成员。黑手党寸步不离地监视着彼得罗西诺，而且很快发现此人特别喜欢参观

^① 有的译为唐·维托。

巴勒莫的名胜古迹。当他们把这一点报告给尊敬的维托先生时，这个黑手党的头目当即做出了一项邪恶的决定。

3月12日，一个盯梢人通知维托先生说，密探彼得罗西诺正朝马里诺广场的加里波迪纪念碑走去。此时，维托正在一个朋友家里吃饭，接到通知，便向主人表示歉意，说是必须暂时离席。接着，维托先生在意大利争取解放斗争英雄的纪念碑前截住了彼得罗西诺。他毫不动声色，沉着老练地连开四枪，打死了这位纽约警察局的中尉警官，随即从容不迫地登上来时乘坐的马车扬长而去，又回到朋友家里继续进餐。在罪行发生时，有一百多人在马里诺广场。然而，当警方寻找见证人时，有的说，根本没听见枪响；有的说，“很遗憾，没看见凶手”；还有人说，不认识那个凶手是谁。总之，《噤口律条》在牢牢保护着维托先生。

纽约各家报纸都以通栏大字标题报道了彼得罗西诺遇害的消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亲自对遇难身亡的警官表示哀悼和敬意。彼得罗西诺的遗孀，因丈夫的夭折得了一块金表和每年1000美元的抚恤金。至于纽约警察局长宾厄姆，对在巴勒莫未完成他的使命的同事之死，也只是说几句严厉的警诫之词：“我希望这次谋杀事件能使美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黑手党是我们面临的巨大危险。”

巴勒莫警方负责人一再让美国当局相信，他们立誓要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把杀害约瑟夫·彼得罗西诺的凶手捉拿归案。可是，除了保证之外，就再也没有下文了。凶手就这样一直没被找到。

此事件发生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西西里黑手党分子

还在津津有味地忆述这件事的详情细节，谈论有关尊敬的维托先生这“天才一招”的铁闻趣事。因为他曾亲手教训了那个来自美国的警方奸细。

阿尔·卡帕内的起飞

约翰逊：我想，一个真正的讹诈者不应当感到良心有愧，而且是在内心深处。他大概深信，其他所有的人也一样干这种事。

参议员考普林德：按照他的看法，自己一点也不比某些财政巨头坏，是吗？

约翰逊：他就是这样认为的。

摘自1934年在考普林德领导的参议院委员会上，对宾夕法尼亚州刘易斯堡的法官艾伯特·维·约翰逊的质询记录。

1920年元月16日，第十八次修改的宪法在国会以多数票获得通过，并在美国开始生效。宪法第一章宣布，“自本文批准之日起一年之后，在合众国及其所有附属领土，禁止生产、销售或运输，包括输入和输出醉人的消费饮料。”

也就在这一天，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市举行了一次象征性葬礼，埋了一口棺材，里面装的是象征醉人饮料的“约翰”——大麦。在葬礼上，福音派教徒比利·桑迪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说教，他热情奔放地高举双手大声喊道：“永别了，约翰！你是上帝的真正敌人，魔鬼的真正朋友，我从心底里仇恨你！”

1920年元月16日，美国开始实施《禁酒法》。从法律角度说，既不能储存大麦制的啤酒，也不能储存威士忌。不过，在这个“上帝选定的国度”里，并非所有的人都从内心深处仇恨酒精饮料。相反，一些先前对酒并不感兴趣的人，禁酒后，反而开始喝酒了，对烈性酒的需求比以往更高。而且在酒类行业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如“蒙西纳尔”^①“布特勒格尔”^②和“斯皮克西”^③等。“蒙西纳尔”就是指地下手工酿酒工人每逢晚上在月光下偷偷地制酒；“布特勒格尔”就是指酒类走私分子，通过海路或加拿大边界把禁卖的酒类搞到国内；而“斯皮克西”所指的是，在非法藏匿酒类的地方，人们意味深长地小声说要杯茶，而得到的却是一杯酒。非法经营酒类可以赚取惊人的利润。在美国境外用15美元搞到的一瓶威士忌，在国内就可以赚70至80美元。但是，走私酒类绝非毫无风险的买卖。要同警方周旋，就不得不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巧妙手段，首先必须有一个严密的组织。这样一来，经营酒类就成了急剧产生的，或者早已存在的，那些匪帮的活动领域。而且只有这些匪帮才能使同经营酒类相关的大量“职业”协调行动。

首先，干这个行当需要海员，他们可以通过海路搞到威士忌。走私团伙大概相信，只要一个海员收住几万美元的买货钱，他就不会空手而归，也不会说碰上了什么把他手里的钱都抢走的袭击事件；其次，拥有一批车主也是不可少的。这种人大概不在警方怀疑之列，而且善于收买警察，知道该

① 来自英语 Moonshiner，即“月光”。

② 来自英语 Bootlegger，即“非法经营酒类”。

③ 来自英语 Speakeasy，即“小声说话”。

给他们多少钱——虽然不太多，可也不算少；最后，还必须建立一个庞大的销售机构。

1920年，匪徒们的生意已经搞得很兴旺。芝加哥一度成为酒类走私的中心。在从事这个行当的匪帮中也有黑手党。外号大吉姆的科洛西莫，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是该组织富有经验和谨慎警觉的首领。1915年另一个黑手党人琼尼·托里奥从纽约迁居芝加哥，在科洛西莫手下供职，一直到晋升为第二把手。此人从1911年起，在纽约严厉无情地控制着港口，为此得到了一个外号，人称“可怕的约翰”。

20年代，芝加哥大约有13万意大利移民，这些人是黑手党进一步扩大实力的可靠来源。在《禁酒法》，即禁止生产和销售酒精饮料的法令生效前，科洛西莫已经控制了芝加哥北部城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托里奥从纽约召来一个名字叫阿尔（阿方索）·卡帕内的年轻人。此人以前在纽约曾为托里奥效过劳。

卡帕内不是西西里人，1899年出生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后来同父母一起移居美国。卡帕内是在纽约的“小意大利”，即意大利贫民区长大的。那些来自西西里的贫苦移民都在这里找一块栖身之地。这里是滋养犯罪的少有的肥田沃土。早在少年时期，卡帕内就加入了青少年犯罪团伙，仿效大人经常去菜店行窃。有一次在械斗中，他的左面颊被人深深地砍了一刀，为此，就落了一个绰号叫“疤拉脸”。后来这个年轻的匪徒参加了可怕的约翰的帮派。从这时起，托里奥就成了卡帕内尊崇的偶像，而托里奥对这个年轻的黑手党徒的才能也颇为信服，欣赏。

圣瓦连金节的大屠杀

1920年科洛西莫遇害，琼尼·托里奥继承其位。此时，芝加哥黑手党的收入每周约10万美元。尽管科洛西莫去世，但互相竞争的帮派之间的斗争并未停止，托里奥面临的主要敌人，是一支基本上由爱尔兰移民组成的戴奥思·欧贝尼奥恩匪帮。托里奥和自己的副手卡帕内决心要给自己的对手以致命打击。于是几个专门受过暗杀训练的黑手党徒，接受了他俩下达的任务。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暴徒叫做“特里格曼”，来自英语 Trigger，即扳机手，因经常总是把食指放在手枪的扳机上而得名。1924年的一天，芝加哥的“啤酒大王”戴奥思·欧贝尼奥恩突然身中数弹，而且命中率极高，当场身亡。枪声大作时，他正手执一束丁香花走出花店。

欧贝尼奥恩匪帮一心要复仇，死者的继任人海密·贝斯打算亲自杀死托里奥。他在采取行动时，使用了当时匪徒界从未动用过的新武器——冲锋枪。贝斯用冲锋枪朝着托里奥的汽车猛烈扫射。给芝加哥这位“先生”开车的司机，当场饮弹身亡。而“可怕的约翰”，只是帽子被打穿了两个洞，本人幸免一死。几天之后，在一幢楼房入口的台阶下，欧贝尼奥恩集团的“扳机手”再次进行伏击。这一回，他们打得比较准，朝“可怕的约翰”射出的五十发子弹中，有三发命中。这个芝加哥黑手党的首领，在生死之间滞留了一个多月，后来，伤愈出院，就决定洗手不干了。他手里有的是钱，足够他去过无忧无虑的生活。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他还经常帮黑手党出主意。不过，芝加哥黑手党“先生”的宝座却一直在空着。

托里奥在离去之前，把所有族长召集在一起。当时，芝加哥黑手党内部重新奉行西西里的古老传统——鲜明的等级制，即一切以“先生”为首，各家族长必须服从“先生”（美国报纸把各家族长称为“尉官”）。在会上，托里奥提出了一项引起强烈反响的建议，要卡帕内作他的继任人。当然，在黑手党里有不少的非西西里人，甚至非意大利人。可是，要占据统领一切的高位，在此之前，都必须是在地中海这个小岛出生的人。托里奥详细介绍了自己要提拔的这个人的突出优点：处事谨慎和具有组织才能。族长们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在黑手党历史上，开创了非西西里人跻身于“先生”之列的先例。

“疤拉脸”卡帕内，这个热衷于政治的人，没有辜负黑手党兄弟们的期望。社会公众根据警方的报告，可以猜出在密执安湖畔的这个城市里，黑手党首领的宝座上换了人。自此，匪徒之间的拼斗，其规模至今少见。仅1924年至1929年间，芝加哥死于枪口之下的匪徒就有五百多人。卡帕内无情地铲除了欧贝尼奥恩集团、道尔迪和比尔·莫兰集团。除了使用冲锋枪还加上了机关枪和手榴弹。就连在汽车里安装爆炸装置，也成了匪徒们的斗争手段。这种装置，只要汽车一起动，只刻就爆炸。

这一系列杀戮的开端，是已经载入美国犯罪史册的“圣瓦连金节大屠杀”。

阿尔·卡帕内决定在1924年2月14日搞一次行动。这一天恰恰是宗教节日“圣瓦连金节”。这天在预定时间，卡帕内集团的成员身穿芝加哥警服，冲进一座汽车房。这里是莫兰集团储存走私威士忌的仓库。当时莫兰手下的人都吓呆了，

纷纷举起双手，以为真的是警察来了。他们老老实实地靠墙站成一排等待搜查，然而却代之一排疯狂的射击，结果七个人全部中弹，其中包括该集团的头目，外号“甲壳虫”的莫兰。被枪声所吸引的过往行人都聚集到汽车房前。当身着崭新警服的卡帕内手下的小伙子，撤离鲜血流淌的屠杀现场时，围观的人们对这些警察们的机敏灵活，无不感到十分惊叹。

讹诈的出现

阿尔·卡帕内的才干，不仅仅表现在组织杀人活动，对做买卖，他也有特殊的嗅觉。他发现，完全可以把走私酒类赚来的钱，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除此之外，卡帕内还是在广泛领域进行讹诈(racket)的真正发明人。

最初，“racket”一词并没有后来所具有的这种意义。据说，它来自英语的“球拍”一词。1897年，在芝加哥球拍的制造曾是垄断专营；另一种说法，认为这个意义起始于上世纪末。当时纽约的某些俱乐部有举行舞会的习惯，人们通常把这种舞会叫做 racket。出卖舞会入场券是这些俱乐部的主要收入，而且俱乐部的管理人员，往往都要对出售入场券稍稍“施加影响”，以迫使人们购票。

卡帕内把注意力转向在广泛领域组织讹诈之后，首先在芝加哥付之实施。在这方面，他利用了黑手党以往积累下来的经验，如在新奥尔良强征香蕉“税”；在圣路易斯垄断肉类经营等。当时讹诈人的活动方式是这样的：比如，卡帕内集团中的小伙子，走遍芝加哥的数百家洗衣店，对店主宣称，打算每月总共收十美元的“保护酬金”。如果店主不想给，那

他就失去了保护，这也就意味着橱窗被打破，店门被泼上硫酸，招牌被砸碎，顾客存放的衣服被撕烂。这一来，所有的店主很快就都纷纷出钱纳贡了。

这些方法可以“纵向”实施，即按照手工业和商业的各个不同行业进行敲诈勒索；也可以“横向”使用，即在某一领域之内。这一来，卡帕内就为黑手党开辟了一个新财源。第一步，这个匪帮从保护妓院入手，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使这个系统的讹诈手段日趋完善，其收入的基本分成是黑手党、妓女各半。不过，这绝不意味着黑手党从这个领域捞取好处的可能性就到此为止。妓女们象奴隶一样倍受盘剥，所以警方完全有权称其为“白奴”。在这方面，有一个妓女的自述颇令人注目：

“我每周最多挣556美元，其中一半被老鸨拿走，这样，还剩下278元；另外，不管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还要拿出25美元给我在妓院里的拉线人卡杰利，拿出36美元给举荐安排我来这里的贝鲁其奥；除此之外，15美元用于一周的吃喝，5美元支付每周一次的体检费；另外还要从我们手里勒索走25美元，给什么筹措‘政治基金’的人，10美元的警察体育节的门票钱，10美元的县长‘野餐费’；此外，还要用50美元定期去买某个帮派经常硬性塞给的夜礼服。老板娘对我们说，我们必须买，否则这个帮派就会把妓院炸得飞上天。至此，我还没有说，每两天要梳理一次发型，因为这可以给当地的政界显要带来欢娱，可为此，我每周就要破费15美元，再加上大约4美元的交通费，10美元的住房费；有一回，我们了解到，有两个警察打算来妓院进行搜捕，为此，我们每个人不得不拿出5美元，这些钱也要减下去！这样，总计起来，我每周要支出221.30美元，也就是说，我只落56.70美元。而剩下的

这些钱，我理所当然要花到靠我卖身而生的情人莱蒙德身上。通常，每到周末我都同他相会，然后找个地方痛饮一番。”

有人会问，象杀人害命、非法卖酒、敲诈勒索、盘剥妓女这样一些罪行，为什么会不受惩罚而横行无忌呢？应该说，是因为阿尔·卡帕内把他所有前任组织的这些犯罪体系已经发展到了完善的境地。由于他的这个组织手里有了巨额利润，阿尔·卡帕内就不仅可以收买警方，还可以贿赂芝加哥大多数政界要人。曾使芝加哥人颇为震惊的一例是，在法庭审理托里奥一案时，出庭辩护的居然是芝加哥民主党主席的挚友。不言而喻，托里奥被当场宣告无罪。正如后来所表明的那样，阿尔·卡帕内惯于扩展这种关系网。政府当局发现的好几份相当有份量的文件便证实了这一点，这些文件揭露了黑手党同美国司法机关关系紧密的丑闻，其中就有芝加哥法官约翰逊致阿尔·卡帕内集团中一个族长麦克斯·沃尔普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麦克斯，感谢您在选举日所给予我的帮助。您竭诚关心此次选举的进行，没有您，我恐怕不会体面地摆脱我当时所处的困境。谢谢您，老人家！这一点我将永远不忘。盼望同您尽快相会！

当时，阿尔·卡帕内的影响相当大，据证实，有关当局甚至就1928年总统大选一事找卡帕内商谈，因为担心黑手党介入竞选运动。而且，不管怎么说，负责同犯罪作斗争的芝加哥刑警队队长罗特士和“伟大的卡帕内”之间的私下会谈还算友好。卡帕内向罗特士承诺不干预总统竞选活动，至于罗特士以什么作为回敬，历史至今保持沉默。不过，在那些年月，黑手党不参与总统竞选活动仅具有次要意义。这绝不意味着，觊觎美国国家最高职务的人，根本未享有强盗们的协

助。而且根据报界的一致看法，黑手党只不过是支系庞杂，遍及各地的有组织犯罪的一个部分而已。

黑手党徒的妻子保持沉默

负责监督执行美国第十八次修改宪法《禁酒法》的督察处的侦探们，也被卡帕内牢牢掌握在手中。国家每周发给每个侦探44美元的薪金，而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还可以从对此感兴趣的人那里拿到多达两倍到三倍的钱。而且要说明的是，他们之中很多人也真的这样行事了。

如果说当时阿尔·卡帕内根本不怕警方，那末他对来自纽约的同行朋友倒颇有顾忌，而且这也不是毫无根据。20年代中期，在美国还不存在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各个地方的黑手党，即各个家族，互不相关，而且往往忘记了同属于一个民族，只为夺地盘，争利益自相残杀，互为仇敌。在纽约的一个黑手党族长中有一个叫朱塞佩·阿耶洛。此人对“疤拉脸”卡帕内极为仇视，因为他对让一个非西西里人当上黑手党家族的领袖，并指挥西西里人的这个主意，实在不能容忍。起初，阿耶洛以间接反对卡帕内表示这种仇恨，比如，有一次在芝加哥附近的西塞罗城，阿耶洛手下的人暗杀了商人安东尼奥·隆巴尔迪，而此人正是卡帕内任命为其统治下的一个族长。接着，阿耶洛又按照黑手党的传统方式，策划了第二次谋杀，对象是卡帕内的故交和战友帕斯瓜拉·罗拉多。

一天，朱塞佩·阿耶洛手下的小伙子来到罗拉多陈设华丽的芝加哥寓所拜访，自称是罗拉多在纽约的一个朋友的商

务帮办。他们随身还带来了送给主人妻子的礼品和鲜花。罗拉多的妻子往桌上摆好茶具，端来饮料之后，就避开到厨房里去了，以免妨碍丈夫谈“事务”。她一直在厨房忙碌着，突然听到枪声大作，当即跑进客厅，可是她丈夫已经脑袋开花躺在血泊之中，而从纽约来的“熟人”，已经无影无踪了。

盛怒之下，罗拉多夫人向警方详细描述了其中一个凶手的特征。可不久之后，她又否认了自己的证言，声称自己什么也不知道。看，就连黑手党的妻子也必须恪守缄口默言的法规。

朱塞佩·阿耶洛并未停止在这些“警告性行动”上。他还图谋从内部搞垮卡帕内集团。这个纽约黑手党的先生用重金收买了卡帕内的两个心腹，一个叫乔万尼·斯卡利切，另一个叫阿尔贝托·安塞莫。他们俩同詹尼兄弟一起，在芝加哥黑手党的一家经营走私酒类的分部工作，而且应该说是很有成就。詹尼兄弟是一家商行的老板，这个商行外表看起来毫不显眼，而且完全合法。其实，这是他们走私贩私的掩护体。此外，这一对黑手党兄弟实际上指挥着所在地区的警察局。一些在警察局供职的人员，每周都先后依次到这家商行的帐房里来，按照名单，严格检查，发放贿金。而名单则是从坐落在麦克斯维尔大街上的警察分局寄来的。

有两个未在名单的警探试图捣毁詹尼兄弟的商行，结果，不幸的命运落在了他俩的头上，死于安塞莫和斯卡利切的枪口之下。当然，正如在芝加哥必然料到的那样，凶手被宣告无罪。不过，在审理过程中却发现了，在人们都称之为“詹尼兄弟世袭领地”之内的警察局贪赃枉法的关键性材料。为此，当局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把暴露出来的警方受贿人员调

到其他地区。

此后不久，一个叫朱塞佩·琼达斯的来投靠斯卡利切和安塞莫，而且后者还举荐此人进入芝加哥黑手党的领导层。阿尔·卡帕内责成他直接控制的“G—2”小组去摸一摸琼达斯的底。“G—2”小组是卡帕内的最新发明，实际上是一个负责搜集情报、进行间谍和反间谍的行动部门。当时全芝加哥的理发师、酒吧的侍者、旅馆的服务员、饭店的守门人、擦皮鞋的、市政厅职员、警察和出租汽车司机，都知道，一旦可以给“伟大的卡帕内”提供使他感兴趣的情况时，去拨那个电话号码。因此，“G—2”很快就确认朱塞佩·琼达斯是阿耶洛手下执行死刑判决的“枪手”。他被指示，一有方便机会就干掉阿尔·卡帕内，然后以纽约阿耶洛帮“二号王”的身分，掌管芝加哥黑手党的大权。而斯卡利切和安塞莫的任务是协助他夺取权利。

血 濺 午 宴

有一天，阿尔·卡帕内邀请黑手党全体成员参加一个盛大宴会，借口是任命琼达斯为族长。黑手党徒们都聚集到一家大饭店的宴会厅里。这些人事先已经得到卡帕内要他们届时如何行动的指令。“伟大的卡帕内”亲自恭迎客人，向所有来宾殷勤微笑，对每一个人都友好寒暄，紧紧握手，尤其是对斯卡利切、安塞莫和琼达斯更是彬彬有礼、和蔼可亲。餐桌上端来了包括意大利面条在内的传统饭菜，以及香气诱人的馅饼和大肚子瓶装饮料。

作为贵客，琼达斯被恭居首位，值得提拔的斯卡利切和

安塞莫分居其两侧。

卡帕内端起一杯香槟酒站了起来。所有的人也都紧张肃立，恭候举杯祝酒。可是，突然卡帕内脸上笑容顿失，面孔可怕地痉挛扭曲，脸色变得象死人一样苍白，左面颊上的疤拉几乎渗出血来。“叛徒！孬种！三条臭狗！”卡帕内发疯似地狂喊怒吼，把酒杯冲着呆若木鸡的琼达斯猛力砸去，接着，另一只手从桌子底下抽出一根沉重的棒球棍。此时，参加宴会的其他黑手党人都掏出手枪对准三个叛徒。卡帕内不慌不忙地绕过桌子，站到了斯卡利切的后面，旋即抡起沉重的球棍，照他的头部连续猛击，对琼达斯和安塞莫也如法炮制。然后，这位“芝加哥王”把血淋淋的棒球棍扔到地下，示意自己的“士兵”去收拾尸体，自己则大步流星地走出大厅。这时，安塞莫和琼达斯还没有断气，在场的黑手党分子又给他们补了几枪，送他们进了天堂。

第二天，在离芝加哥不远的一条公路旁的水沟里，警方发现三具尸体。凶手的名字尽人皆知，但指控他的证据却一无所有。

在这次谋杀之后，又过了几个星期，美国各个角落黑手党的“先生”都接到了一封请帖，邀请他们到大西洋城去。匪徒们预定要在那里召开一次会议。美国各地的黑手党派别，如纽约、底特律、芝加哥、克利夫兰、费城、波士顿、圣路易斯和新奥尔良等，都派自己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是芝加哥黑手党的头子阿尔·卡帕内打算着手实现自己的前任琼尼·托里奥的宿愿：划分势力范围、签订相互协助和长期合作的协议、永远结束黑手党人之间的倾轧拼斗。阿耶洛阴谋的破产和继而导致的三名黑手党徒的被杀，颇具说服力地使各地

的“先生”们感到，迫切需要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而且当时纽约黑手党用事实证明了，分散的匪帮协调行动会具有何等的好处。

人们公认，纽约黑手党的奠基人是外号人称“野狼”的伊格纳齐奥·萨伊塔。1899年他因杀了人逃出西西里，同自己的妹夫朱塞佩·莫雷洛一起，成立了纽约第一个由西西里人组成的匪帮。在依斯特—卡尔区125大街，这个集团把一个从前的马厩变成了基地。正如后来警方所宣布的那样，这座马厩“目睹的凶杀事件比马还多”。起初萨伊塔集团仅限于向自己的同胞敲诈勒索，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第一回试着敲诈之后，这些同胞绝不会跑到警察局去诉苦申冤。“不缄口默言者，必丧命”这一《噤口律条》也在这儿发挥着作用！就连莫雷洛前妻的儿子也难免被活活折磨而死，因为他破坏了“荣誉社”的这个首要戒律。

不过，萨伊塔有一回犯了一个非常不幸的错误：伪造纸币。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30年的狱中之苦。他的继承人是纽约的“蔬菜大王”奇洛·泰拉诺瓦。此人依靠组织得井井有条的讹诈体系，控制着全城所有的菜店。不过，泰拉诺瓦控制的仅仅是纽约黑手党的一部分力量，而且他也不想追求过多的东西。他认为这已经足够了。这样一来，在纽约的其他地区每一个族长，象阿耶洛，瓦伦蒂诺和其他几个人，都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这一来，争夺城市下游区的曼哈顿和布鲁克林这份产业的斗争便势不可免了。

乔先生和他的国王助理

此时，有一个年轻大胆的黑手党徒在觊觎着城市下游区的王位。此人就是朱塞佩·马塞利亚，1907年从西西里迁居至此。由于在自己家族中，在争夺权利上表现得坚决果敢，他的一伙朋友们都亲切地叫他乔先生。当然，没有一个竞争者会不经过较量就让出垂涎已久的王位。这类人中有一个叫翁贝托·瓦伦蒂诺的，此人是非法卖酒的老手，一直梦想成为纽约这两个地区的霸主。他把自己所有的追随者都动员组织起来，以加强实现这一追求的實力。这一来，又轮到纽约经受一场匪徒大战了。

朱塞佩·马塞利亚建议瓦伦蒂诺举行和谈。“会议”就在一条人烟稀少的大街拐角处，面对面地进行。两人以握手证实停战协议的达成，并向老朋友一样分手告别。可是，就在附近的十字路口，马塞利亚集团的“扳机手”已经在暗中等候着瓦伦蒂诺。枪声一响，瓦伦蒂诺急速跑到大街上通行车辆的地方，拦住了一辆出租汽车。他刚刚要打开车门，整整一排子弹全打到了他的背上。他一头栽倒在马路上。从此，马塞利亚便完全有权以乔先生而自诩了。

为了更好地治理自己的王国，马塞利亚任命了两个“国王助理”。掌管布鲁克林区的是弗兰吉·韦拉，1920年暗杀芝加哥犯罪界头目科洛西莫的就是他；负责曼哈顿区事务的是萨尔瓦托雷·卢卡尼亚，此人后来以“查尔斯”或“幸运人”卢恰诺的大名，在黑手党的历史上发挥了突出作用。

卢恰诺1897年2月24日出生于西西里莱卡尔——弗里吉

小城的一个矿工家庭。1907年全家移居美国。他象琼尼·托里奥和阿尔·卡帕内一样，在纽约的那个小意大利的少年匪帮里“上的学”。最初，卢恰诺从当一名普通工人开始了劳动生涯。他每天干十个小时活，一周才挣七美元。后来，他加入了一个匪帮。大约在1920年，他引起了黑手党的注目，在争夺曼哈顿和布鲁克林两个地区的斗争中帮助过乔·马塞利亚。但他连族长都不是，只是马塞利亚的左右臂。但正是卢恰诺出主意建立伪装商行，在其掩护下黑手党可以从事非法的酒类生意。当时他曾两次同警方发生冲突：第一次是由于经营酒类，第二次是因为非法携带武器。不过，两次他都平安无事。

萨尔瓦托雷·卢恰诺以自己勇敢的行动增加了可以填补未来黑手党头目空缺的可能性。当时，美国工业出现资本集中已非鲜事，比如制造各种各样肉制品罐头的工厂“阿摩尔”、“斯威弗特”、“莫利斯·赫尔贡”就联合成为一个托拉斯。他们共同把市场控制在自己手里，操纵价格。而这一点成了卢恰诺效法的榜样。他在非法经营酒类方面也建立起托拉斯^①，这可是个英明之举。

走私经营威士忌的托拉斯

卢恰诺召开会议商量讨论，说服别人，最后着手组织。很快一个“七家大型联合体”应运而生。这是一个匪徒的超级托拉斯，后来控制了美国当时被禁止的全部酒类买卖。在这

^① 英文Trust的音译。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产品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组成的高级垄断组织。

个托拉斯里代表黑手党的是卢恰诺，琼尼·托里奥和乔·阿多尼斯；其他几家合伙人是“纽约独立派”和“纽约独立酒类经营者”，即吉格尔匪帮，以及兰斯基和新泽西州、波士顿、罗得岛州和大西洋城的酒类走私集团。

从此，在美国，没有一滴从大西洋搞来的酒不经过“七家大型联合体”之手的。这个匪徒托拉斯有自己的船队，自己的武装保卫，在加拿大和巴哈马有自己的转运站和仓库。“七家大型联合体”的总部设在纽约市中心莱辛顿大街的一家旅馆里。在这里，走私分子同自己设在法国的圣彼埃尔岛，纽芬兰附近的麦克兰和巴哈马岛上拿骚城的电台，保持着无线电联系。在发往总部的无线电密码电报里，通知走私酒类船只出发和到达的时间，还包括货物数量和质量，以及价格和接收货物的相应方法等。

“七家大型联合体”同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的托拉斯一样，经营有方。它确定了统一的强制性价格，规定了走私酒类的进口限额，以便控制市场价格。此外，还注意不让各走私集团破坏给他们划定的经营地界。象大型康采恩^①一样，“七家大型联合体”通过自己的外事人员收买政界人物。这个匪徒托拉斯也非常舍得往警察、海关人员和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官兵身上花钱。

一句话，“防线”固若金汤，仅仅在极少的情况下才出现一些破绽。比如，有一次，“七家大型联合体”的一艘快艇《剪刀号》，大白天在纽约古荣港卸走私货物，便被海岸警卫

^① 资本主义经济垄断的一种形式，系德文Konzern的音译。它由不同经济部门的许多企业联合组成。

队当场拿获。可是，正打算把走私分子抓起来带走的海岸警卫队，却遇到了“意外”，迎面朝他们射来了重机枪密集的子弹。而且使他们更加吃惊的是，他们发现走私分子对回击毫不在乎，因为厚厚的装甲板，万无一失地保护着走私快艇。

在“七家大型联合体”活动的年代，美国官方仅有一次算是成功地没收了一大批走私货。不过，这次得手，既不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对犯罪分子进行追踪缉拿行动的结果，也不是由于警方使用了什么巧计绝招，而纯粹是偶然所致。警方对匪徒们的这次成功的打击，发生在1927年8月22日夜到23日凌晨之前。

事情是这样的：美国当局决定在8月23日执行一项死刑判决。这件事引起全世界公众的不满和愤怒。当时有两个意大利移民已经在波士顿的死囚牢房里关了两年，其罪名是行凶杀人。可是他们根本没有干这种事。请读者注意，这可不是科洛西莫，也不是托里奥和卡帕内，而是两个工人积极分子尼古拉·卡科和巴尔托洛梅奥·万泽蒂。美国警方和司法部门对形形色色的刑事罪犯相当手软，可对工人及其领袖却极为心狠，即使践踏法律也在所不惜。因为匪徒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资本主义体系，而工人及其组织却威胁着这个体系，威胁着这个合法和违法的犯罪体系。卡科和万泽蒂成了挑拨离间的牺牲品，基于伪证被判处了死刑。在此之前，已经好几次确定了行刑日期，但每一次，全世界劳动人民都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抗议这一恶行，从而制止了刽子手的行凶。可是，美国当局还是无视世界公众撤销判决的一致要求，最后决定8月23日处死这两个无辜的意大利人。由于预料到卡科和万泽蒂的行刑日，工人们一定要举行新的示威和群众性

活动，警方便宣布了总动员。经过加强的警察值勤人员不停地在街上巡逻，严格指令所有警察对每一件小事和任何可疑的发现，都要迅速上报给警察总部。

正是这一原因，有个警察注意到一只小船熄灯偃旗驶向斯塔腾岛，并悄悄地靠了岸。这个警察当即觉得，这不是件好事，马上跑到最近的一个自动电话亭。事后，他对采访记者说：“当时，我以为是俄国间谍！”

走私分子把一桶桶的威士忌从船上往下搬，扛在肩膀上，毫无一点疑心地径直朝已经埋伏在那里的警方巡逻队的网中走去……

萨尔瓦托雷·卢恰诺出了什么事？

致力于建立经营酒类托拉斯的萨尔瓦托雷·卢恰诺很快就成了“七家大型联合体”的首脑。他在这个匪徒托拉斯中所占据的富有影响的职位，不仅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权利，也招致了未被他封官进爵之人的妒嫉。“七家大型联合体”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匪徒垄断集团，但却远非所有的黑手党家族都在这个联合体里有代表。所以，卢恰诺的突然飞黄腾达，使这部分黑手党人心里感到很不是味儿。

1929年初的一天早晨，警方巡逻队截住了一个走起路来一摇三晃，象是喝醉酒似的男人。此人行走在离斯塔腾岛不远的、从里特经休格诺特到海滨浴场的公路上。他看起来的确令人生疑：上衣被撕破，满脸是血，手上有被刀刺破的伤口。警察把截住的这个人送进了医院。而刚一给他包扎好并使他苏醒过来，好几个警探就急忙开始对他进行询问。

原来此人就是萨尔瓦托雷·卢恰诺！

那么，这位“七家大型联合体”的权力巨大的“先生”出了什么事？大概这永远是个秘密，只能做一些设想。当时不论怎么讯问，卢恰诺对警探的回答并没有使这件事有什么眉目。他对讯问的回答是：“我站在第五十大街和第六十大街的拐角处等一个女朋友。突然一辆拉着窗帘的汽车朝我开过来，从里面走出三个男人，他们掏出手枪，把我推进汽车，然后给我戴上了手铐，用破布塞住我的嘴。后来，在城外的一个地方停下了车，把我从车里推下去，接着一个劲儿地拳打脚踢，还用刀子捅我，用燃着的烟头烧我。后来我失去了知觉。大概他们以为我死了。但不管怎样，早晨在休格诺特至浴场的公路上，我总算醒了过来。”

“这些人是什么人？”警探问道。

“他们中间的人，我一次也没见过。”卢恰诺随口回答。

当然，要让卢恰诺这样一个黑手党的主要头目向警方说实话是不可能的。至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只能猜测了。

根据最可信的说法，这次袭击是美国黑手党其他一些“先生”们发出的再次警告，要卢恰诺不要忘记他是个黑手党人。不管“七家大型联合体”有多么重的份量，黑手党应居于首位。而最终使黑手党不能容忍的是，在大规模的酒类走私活动中，他们赚的钱比很多非西西里帮还少，而且在美国的一些地方，黑手党人的收入还减少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在遭受这次袭击之后，朋友们给卢恰诺送了个美称叫“幸运人”，因为他们天真地认为，卢恰诺所以身遭袭击又能活下来，全是由于偶然的幸运。

匪徒代表会

就是在上述背景下，阿尔·卡帕内建议召开黑手党头目的大型代表会。在此前一年，他们曾在美国的克利夫兰举行过首次会晤，但一件偶然的趣事，破坏了黑手党的原定计划，因为在黑手党各地代表下榻的旅馆里，有一个管理人员看到，21个身着同样服饰，头戴同样帽子的房客，个个狐疑，不断左顾右盼，心里感到莫名惊诧，当即给警方打了电话。警察来搜查时，发现每个人身上都带有手枪，而且没有一个持枪的人，能向司法当局出示官方颁发的持枪许可证。这一来，黑手党原定的会议就没有开成，而代替的则是，所有来参加会议的人，都被判处监禁，当然，是缓期执行，另外每人罚款50美元。

1929年5月，黑手党的“精华”们又来到大西洋城豪华的海滨疗养区。这一回，他们可谨慎得多了。走到哪里，保镖都寸步不离，一刻也不让自己的主子失去保护。此外，柯尔特式手枪就挂在他们上衣里面特制的皮带上，而且是子弹上膛以备所需。

这一回，卡帕内的外表举止犹如一个高级外交官。表面看，根本想不到此人就在不久前，曾兽性大发，用棒球棍亲手砸死了同自己竞争的另一个家族的三名成员。

卡帕内向与会的黑手党人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代表了他本人以及这次会见的“精神之父”琼尼·托里奥的意见。他声称，为了共同的事业，必须彻底结束黑手党内部各自为政、互相为敌的局面。这个芝加哥黑手党的头号人物还展示

了一幅未来的图画，指出，只要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这个组织就可以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整个美国。他说，《禁酒法》可能很快就要废除，对这一时刻的到来，必须有所准备，应该开闢招财进宝的新领域，如赌博、卖淫、讹诈、赛马、贩毒等行当。

在大西洋会议上，黑手党人一致同意采取下述具体措施：

一、美国黑手党的各集团应以祖国西西里黑手党为典范，组合成为一个统一的联盟^①。该联盟从即日起，取名为“我们的事业”。

二、黑手党的家族由各个帮组成。

三、每个家族的首领为“先生”，他向隶属于自己的各帮的头目下达命令。

四、在本次大西洋城代表会上，“我们的事业”联盟已给各个家族划定了活动范围，必须严格遵守所划定的区域界限。

五、“我们的事业”联盟由一个最高委员会领导，各个家族的首领，即“先生”，均为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负责调解产生的一切分歧和争端。

六、为了把整个美国的犯罪界置于“我们的事业”联盟控制之下，同非西西里帮派共同合作不仅是可能的，也是众望所归。但是，在这一合作中，“我们的事业”联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起领导作用。

七、在“我们的事业”联盟中，同西西里一样，也奉行不容置疑的《噤口律条》。

“我们的事业”联盟以通过上述各项纲要，建立了自己不

^① 西西里黑手党的统一联盟叫“荣誉社”。

成文的法规章程。大西洋城协议既没有签字仪式，也没有付印成文，甚至连一页会议记录都没有。可是，其约束力却不亚于在公证人监督下签署的条约。

“长胡子的”退出舞台

同股票相比，万能钥匙算得了什么？同开办银行相比，在银行里撬锁行窃算得了什么？

贝尔托尔德·布莱赫特

对政治颇感兴趣的卡帕内，在大西洋城度过了自己最辉煌的时刻。但此后不久，就被法律的铁拳紧紧抓住。事情是这样的：在会后返回芝加哥途中，他必须在费城停留几小时等候转车。为了随便消磨时间，他和自己的保镖去看了一场电影。电影散场后，这位芝加哥的黑手党首领返回了车站。可是就在此刻，两名当地刑警认出了他，当即把他扣留。在当地警察分局搜身时，查出他身上带有一枝手枪。这枝枪装在一个装饰华丽的手工制作的枪套里。当时卡帕内镇静地出示他在芝加哥发的持枪证，深信这一来风波就平息了。可是，警方人员却心平气和地说：“很遗憾，卡帕内先生，这张持枪证在我们这里不管用。您被捕了。”

以前，黑手党经常成功地利用美国复杂的法律地位，而且时至今日仍从中捞到不少好处。在美国，这个州要惩处的罪行，在另一些州就不受法律制裁。而且，只有罪行发生所在地的那个州的有关当局，才能对罪行进行追究，相邻那个州的法律巨掌对犯罪分子就不能触动。此外，警察的职权范

圈从组织上也有严格分工。大城市的警察局，小乡镇的分局和这个州或那个州的警察局都各尽其责，各行其事。就连直接隶属于美国政府的联邦调查局对此也一筹莫展，只有在国家一级法律被破坏的情况下，它才能采取决定性措施。另外，美国财政部就不依靠上属警方机构，而是通过隶属于自己的税务管理部门和海岸警卫队以及同毒品走私作斗争的机构，来完成警方应完成的任务。这种组织上的混乱，对有组织犯罪非常有利。不过，这次是另外一回事了。

搜身以后半小时，惊恐不安的卡帕内已经坐在费城警察局局长的办公室里。局长面带笑容，相当客气。卡帕内的心绪也安然了许多。他一再申明，自己已经有好几年同犯罪界没有任何瓜葛，说实话，这次是打算去佛罗里达州过清静的生活。可是，由于自己结了不少仇敌，这些人时刻都在威胁着他本人及全家的安全，所以，他当然不得不随身携带着武器等等。

警察局长微微一笑，卡帕内也随之一笑，当时在场的警察也都笑了。这时，卡帕内走上前去同局长握了握手，转身就要走，而费城的警察局长则不慌不忙地对手下人说：“把他带下去。”

又过了一昼夜，卡帕内被提交陪审法庭并被判处非法持枪罪的最高刑期——一年监禁。就这样，这个拥有无限权力的黑手党头子便在霍尔姆斯堡监狱的大墙后面，消失了整整一年。当然，同其他有影响的黑手党人一样，他也受到了特殊优待——安排在监狱图书馆里工作。

阿尔·卡帕内被捕的消息震动了整个美国犯罪界。迷信的人认为，这是在劫难逃。他们说：“这第十三次被捕，是不

能以别的方式了结的”。在此之前，警方拘捕过卡帕内十二次，可又放了他十二次，有的仅以罚款了结，而且数额自然不会使卡帕内感到增加负担。这十二次是：

- 1919年： 伤害罪——免刑；
- 1922年： 在芝加哥走私威士忌——免刑；
- 1923年： 在芝加哥拉皮条和赌博——罚款150美元；
- 1924年： 在芝加哥参与杀人——免刑；
- 1925年： 在纽约州犯有流氓行为——免刑；
- 1926年： 在伊利诺斯迪克尼城选举中使用卑鄙伎俩——免刑；
- 1926年： 在芝加哥再次走私酒类——再次免刑；
- 1926年： 在芝加哥参与杀人——原告撤回控告；
- 1927年： 在芝加哥拒绝作证——免刑；
- 1927年： 在伊利诺斯州的乔利埃特市私藏武器——罚款二千六百美元；
- 1929年： 在佛罗里达州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罚款。

趁卡帕内暂时服刑(此时期由其弟弟拉尔夫领导芝加哥黑手党)，美国税务部门悄悄地着手调查卡帕内的财产状况，主要目的是估算一下卡帕内的“商行”的各个部门共获得多少利润。调查结果确认，该“商行”从非法经营酒类收入5万美元；从被禁止的赌博业收入2.5万美元；从卖淫业收入1万美元。此外，在佛罗里达，卡帕内还拥有好几座别墅、数艘游艇和好几辆最现代化、最昂贵的小轿车。税务人员还研究了卡帕内的报税单。这个匪徒可以随心所欲地破坏刑法，可与此同时，他不应该忘记及时纳税！

税务部门从“秘密六家集团”那里搞到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情报。这个“秘密六家集团”是芝加哥商界的一个联合组织。这些商人早就在寻找机会收拾黑手党，因为后者的活动大大降低了他们本身的利润收入。“秘密六家集团”估算，卡帕内每年仅用于贿赂警方的花销，就达1.5万美元。这一来，芝加哥商界的这个联合组织在进行调查时，就别指望得到当地警方的任何支持了。

此外，还有一些因素给税务部门的调查工作增加了困难。首先是黑手党的交易一贯用现金结算；其次卡帕内有一个杰出的财政谋士，此人叫亚科布·古吉克，外号人称“脏手指头”。这个古吉克犹如一个魔术师，把百万钱财熟练巧妙地变来变去。这些钱忽儿无影无踪，忽儿重新再现；最后，收买情报对黑手党来说也不是什么难题。不过，只有一件事使税务人员找到了犯罪分子的踪迹，抓住了他们的把柄，这就是给匪徒队伍造成混乱的一场“神经战”。

密执安林荫大道上的“神经战”

1930年，阿尔·卡帕内刑满释放，重返芝加哥。在这里，他受到了堪称迎接王驾式的欢迎。可是刚一回到芝加哥，他就不得不马上投入和自己的死敌埃利约特·涅斯的斗争。涅斯是美国司法部的官员。由于艰苦而细心的工作，他侦悉了黑手党几座秘密仓库和啤酒厂，并通过一次狡诈而精心设计的行动，迅雷不及掩耳地控制占领了这些场所。这样，卡帕内在监狱整理图书期间，就有三十多个制造威士忌的非法工厂和秘密仓库，以及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设备，统统毁于一旦。

此外，还有五十多辆属于黑手党的载重汽车也被充公。

当这位芝加哥黑手党的头子重返“自己”的城市时，涅斯就策划发动了一场“神经战”。他在匪徒之间散布流言蜚语，造成黑手党队伍中出现混乱和惊恐，播下对卡帕内不信任的种子。这一手还颇有成效，因为在费城受挫之后，这位脸上有疤之人头顶的光环是有些暗淡了。

有一天，在密执安林荫大道“莱辛顿饭店”卡帕内的住房里，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有个陌生人打来电话说：“11点钟在旅馆前将要发生某种有趣的事情。”好奇心笼罩着阿尔·卡帕内。从他住房的窗口，透过百叶窗，可以对密执安大道一览无余，而且不会被外面察觉。同他一齐观察的还有他的几个贴身保镖和朋友。

使这几个黑手党徒吃惊的是，就在11点正，从旅馆前，沿着大街，缓慢地通过一长串别开生面的车队：四十五辆原来属于黑手党的载重卡车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警察。看到这一情景，“芝加哥王”勃然大怒，砸碎了室内身边的一切物品，同时狂吼要象宰狗一样杀死埃利约特·涅斯。

但涅斯还活着。不过最终也不是“神经战”决定了卡帕内的未来命运，而是税务警探弗兰克·维尔松无声无息、精心细致的调查工作。这个看来毫不起眼的侦探，是专门派到芝加哥对“我们的事业”联盟进行侦查的。由于一次偶然的机遇，他掌握了一家年周转金额为300万美元的“希普”赌场的一批记帐簿。维尔松花费了好几个月的工夫研究其笔迹，然后把它同芝加哥数百名匪徒的笔迹留样核对，最后确认，这批帐簿的执笔人是路易斯·沙迈。而此人正是阿尔·卡帕内手下的记帐员和信差。税务人员很快就使路易斯·沙迈身陷困境。

要么伏法被捕，要么揭发卡帕内。沙迈最终选择了后一条路。

可是维尔松对此并不满足。他下令监视一个名叫弗雷德·里斯的人。此人每天把各个赌场的收入集中起来，然后送到芝加哥的“潘克特银行”，把现金换成支票。而一旦这些支票转交到卡帕内手里后，税务机关的侦探就掌握了物证链条上的最后一环。

1931年6月16日，阿尔·卡帕内及其弟弟和其他68名黑手党成员和匪徒，都以逃避缴纳所得税罪，被提交陪审法庭审判。这一案件一开始就轰动全城，而且卡帕内很快也供认逃税达五千次之多。仅此一项，根据美国法律，从理论上就要判处他2.5万年徒刑。

济贫慈善食堂

阿尔·卡帕内如此轻而易举地认罪，既不是出于心血来潮、胆小软弱，也不是什么理智行动。在此之前，当局和卡帕内的律师已进行过长时间、认真地讨价还价。对于隐瞒应交所得税一事，律师们建议拿出500万美元抵补税款。这个条件被当局采纳。卡帕内的辩护人还提出，推迟开庭审讯，并把这个黑手党头目交保释放。法院也照此办理了。

1931年7月30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法官看起来是那么威严冷峻，仔细倾听了律师的辩护。后来，法官在自己的讲话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被告应该明白，不可能在案件审理结束之前，确定惩罚的程度。同法庭搞交易是不行的！”

这一次审理又推迟了。这就足以使阿尔·卡帕内有时间

扮演一个全新的角色——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慈善家。当时，经济危机笼罩着美国，伴随而来的是群众性的失业和饥饿。1932年失业人数已达1320万人之多。当时整个美国到处是失业者的群众性示威活动。

芝加哥的这位黑手党头目决定为失业者建立一座食堂，饥饿的人们在这里可以免费就餐。阿尔·卡帕内还亲自出马分发食物，同就餐者亲切交谈，轻轻地拍打他们的肩膀以表同情。

“机遇”又给了卡帕内一个机会向全国显示自己的“仁爱”。恰恰此时，在芝加哥有一群匪徒绑架了腰缠万贯的赛马马厩主林齐。林齐的朋友们请求阿尔·卡帕内利用自己在黑社会的影响，敦促释放林齐。啊，简直是奇迹！几小时之后，林齐就又出现在自己的朋友当中。其实，这是耍的花招。于是全城传遍了流言，说是卡帕内本人策划绑架了林齐，目的是好充当救星。在这种情况下，卡帕内举行了一次大型的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声称“要同一切绑架者作殊死斗争”，并对七名被绑架者的不幸命运失声痛哭。阿尔·卡帕内的这场表演就发生在最后一次开庭审理的前五天。

与此同时，芝加哥黑手党的族长们也没有袖手旁观。他们手里拿着枪，口袋里装着成沓的百元一张的钞票，拜访了一百多个人，其中包括十二名审理卡帕内案件的陪审员。可是福气从“伟大的卡帕内”身旁溜走了，几乎就在开庭前一分钟又任命了新的陪审员。

10月6日最后一次开庭审理，一直持续了12天。又过了一个星期，宣布了判决：由于隐瞒1925年至1929年底的个人收入罪，被判处11年徒刑，5万美元罚款，而且还要补偿诉讼

费3万元。

宣布判决时，卡帕内一副沮丧相。他的律师曾力图要求缓期执行判决，但未能成功。于是卡帕内便被发往大西洋城的一座监狱里去服刑了。

1939年11月17日，服刑未滿的卡帕内获得了自由，因为监狱的医生发现他患有不愈型梅毒症。据认为，当时他手头大约还剩有500万美元。获释之后，他就隐居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城的一座堂皇富丽的别墅里，最后于1947年元月25日，在这里安详地离开人世，时年48岁。

不幸的是“幸运人”在洗手

1931年卡帕内离开舞台一事，在美国犯罪活动的发展史上，乃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由此在黑社会发生的变化，大概可以和伴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而出现的变化同日而语。自此，实业家代替了杀人好汉。当然，尽管这些黑手党实业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屏弃杀人手段，但他们不再希望仅靠使用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相抵触的手段发财致富，而力求适应新的条件，力求在资本主义社会生存下去，而且同其共生共存并以它为生。他们在《禁酒法》年代学会了一些从事商业活动的经验，后来也一直未停止向资本主义讨教。

此时，一代新人在黑手党内成长起来，其杰出代表人物就是“幸运人”卢恰诺。新老之间的差别甚至连外表都截然两样。黑手党年轻的一代一点也不象那些传统的匪徒，他们穿戴俭朴，但很入时，看起来很象那些“受敬重的人”。比如弗

朗切斯科·卡斯蒂利亚(人们还叫他弗兰科·科斯泰洛)和约瑟夫·多托(外号人称乔·阿多尼斯),根据其举止风度,很难看出他们同银行家的后代有什么不同。当然,活动方法的改变,也不次于外表的变化,“我们的事业”联盟新一代的首领再也不用“脏活”沾污自己的双手,而成了实业家了。

“老头子们”,或者叫“长胡子的”,对所发生的变化实质老是搞不清楚。马塞里亚可以严格控制一个“家族”,玩起枪来堪称技艺超群,但老实说,他不懂得如何使酒类走私托拉斯发挥其职能。黑手党内部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刻已经来临了。可是马塞里亚却没有料到这一点。

而他的疑窦初生是在1930年的一个夜晚。当他同两个保镖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中了伏击。这件事使马塞里亚警觉起来,他觉得自己的助手萨尔瓦托雷·卢恰诺或者查尔斯·卢恰诺(他这样称呼自己),在觊觎权力方面是否走得太远了。他同乔·阿多尼斯私下谈了自己的疑心。可是阿多尼斯早同卢恰诺一起成为“七家大型联合体”的领导成员。此人想来想去还是认为,什么都不如把自己这位首领有关疑心的议论报告给卢恰诺为好。

1931年4月11日,卢恰诺在科尼岛上的“斯卡尔帕多”饭店宴请马塞里亚。这里是纽约人城外散步最理想的场所。他们俩先玩了两个小时牌,后来卢恰诺看了一下表,对马塞里亚表示歉意说,必须暂时离席一小会儿,说完就进了盥洗室。

后来他向警方一再申明,在盥洗室里他听到枪声,赶紧洗了一下手返回大厅,看见马塞里亚已经死在那里。

“斯卡尔帕多”饭店的老板证实了卢恰诺的供述。据他说,

当时有三个大汉冲进饭店，一下子跑到马塞里亚面前，突然开枪。验尸表明，马塞里亚身中五弹，而且都是致命之处。不言而喻，这位西西里裔的饭店老板对开枪的人，当然也是一个都不认识。

在这次谋杀事件中，警方怀疑以下三个人：乔·阿多尼斯，阿尔伯特·阿纳斯塔吉亚和一个全城有名的非法卖酒的本杰明·吉格尔，可是又没有拿到证明他们犯罪的任何证据。

“……把黑手党美国化的时刻”

埃拉·马塞里亚一命归天了。可是一如既往仍不让“年轻人”抓住权柄。“长胡子的”根本没有想到要挑选一个“毛头小伙子”卢恰诺作为马塞里亚的继承人，让他登上纽约黑手党领袖的宝座。相反，他们一致举荐了“严肃的”萨尔瓦托雷·马兰扎诺。此人从事一种独特的行当——运送走私人员。1925年西西里黑手党在本组织被缉捕时期，曾向一些成员提供假护照，要他们远渡重洋到国外“工作”。马兰扎诺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的事务所设在同纽约火车站并排的“中央大厦”，挂了一个“地产经营事务所”的招牌。

就在“长胡子的”把他推上宝座前不久，马兰扎诺和一个叫路易斯·布哈特的黑社会大人物发生了磨擦。布哈特在缝纫和制革业、面包业、饮食业和纽约出租汽车司机中间进行敲诈勒索，尤其是发达的工业部门——制革业使布哈特得到非常高的收入，虽然他的掠夺对象仅仅是一些小业主。

但是马兰扎诺也想尝尝从事敲诈的味道，于是他提出，

要对已处在布哈特“庇荫”之下的制革业进行“保护”。一个小业主同时要向两个集团“纳税”，显而易见，是力不胜任的。于是，有一个意大利裔的小业主菲拉利首先拒绝纳贡。这一来，马兰扎诺手下的人就砸了他的商店橱窗。事后菲拉利就向警方求助。而马兰扎诺就下令手下的年轻人“好好教训一下这个菲拉利”以作为回敬。可是这帮黑手党徒错杀了同此事毫无瓜葛的菲拉利的弟弟朱塞佩。

在发生这次小的纠葛之后，路易斯·布哈特同卢恰诺勾结一起并把自己进行讹诈的秘密统统告诉给了卢恰诺。不仅如此，他还让卢恰诺成了自己的伙伴，因为他很想同一个权力无限的黑手党人成为朋友。至于他同马兰扎诺冲突的实质，布哈特对卢恰诺是这样说的：“你以为这场争斗就是为了制革业？不对，马兰扎诺打算把整个‘家族’都攫为己有。他知道，咱们俩是伙伴，而且心里非常清楚，挤掉我，就等于挤掉了你。”

卢恰诺对此结论深信不疑。加之几天之后，马兰扎诺真的当上了纽约黑手党的领袖。这一来，“年轻人”就决心要结束“长胡子的”统治。于是选定1931年9月11日为“大清洗”日。

在预定的这一天下午一点半，五个“扳机手”走进了马兰扎诺的办事处，命令正在会客室的来访者都站起来面对墙壁，把双手放在脑后。接着，留下两个匪徒监视他们，其他三个人走进马兰扎诺的办公室。后来，等这五个人都走了之后，人们发现，这位黑手党“先生”已经被割断了喉咙。

此后，48小时之内，在美国有四十多个有影响的老一辈黑手党徒都告别了人世。关于这两天，后来有个匪徒说：“这

是我们把黑手党美国化的时刻。”

美国作家查尔斯·哈米尔顿对这句话作了如下解释：“只有匪徒集团的头目知道，这场暗杀流行病，掀开了犯罪活动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暗杀团”

不过，哈米尔顿上面提到的“发展”二字，涉及的是“业务”这一面，而“我们的事业”联盟的基本原则还是一成不变的。不仅如此，他们比“老头子们”统治时期奉行得还认真。那条绝对沉默的法律——《噤口律条》仍被奉居首位，而且另外又增加了四条新制定的原则：

一、手里永远要掌握有优秀律师；

二、任何时候都不对国家公职人员采取暴力行动，因为对此处罚甚重，而更主要的是，这类行动会激起警方在整个联邦范围内采取积极行动的危险性；

三、经常缴纳收入所得税；

四、除了黑手党成员，任何人都不要相信。

在接收新成员时仍保留西西里古老的入帮仪式。1930年加入“我们的事业”联盟的黑手党徒约瑟夫·瓦拉其，1963年在参议院罪行调查委员会上这样描述了这一仪式：

“我被带到纽约北部的一幢房子里去参加秘密聚会。桌子后面坐着30个黑手党人。桌子上放着一把刀子和一把手枪。我必须用西西里语庄严宣誓，内容已经记不很清楚了，大意是，‘我生为刀枪生，死为刀枪死’。然后手里拿着一张点燃的纸，说道：‘如果我出卖组织，就让我象这张纸一样化为’

灰烬。’最后，根据30个在场人用数字占卜的结果，为我指定一位教父，他割破我的手指，这样我就成了他的血缘弟兄。”

不过，这个中世纪的习俗此时已具有了新的含义：割破手指就等于买了犯罪集团的股票。杀人成了一种业务，一种日常的买卖。不久卢恰诺就找到了一个方法，它可以使自己摆脱“脏活”并不让杀人害命给黑手党的生意增加麻烦。而1930年纽约匪徒的内讧，为他建立一个专门从事这项血腥活动的中心，帮了大忙。

1930年在纽约东部地区活动着两个对立的匪帮，一个以外号人称“山羊胡”的埃布·里尔斯为首，另一个的头子是海比·迈奥内。这两个匪帮干的是同一个行当。这个行当在匪徒的黑话里叫“海杰金格”，即专门进攻非法经营酒类的人，目的是抢夺他们的货物。正是由于这一点，黑手党极力要消灭这些专干“海杰金格”的人。而这两个对立集团之间的拼斗是个很合适的借口，不过卢恰诺想了个新招，他指派阿尔贝特·阿纳斯塔吉亚加入他们这场明争暗斗。

阿纳斯塔吉亚1917年15岁时来到美国，很快就在纽约黑手党中享有“冷面杀手”的盛名。1921年因杀人罪被判死刑，可是他的律师发现在诉讼程序里，从法律上说，有一个不大的、纯属形式上的错误漏网，基于这一点，经过努力终于撤销了原判，使自己的委托人暂时获得了自由。而当1922年重新开庭审理此案时，起诉一方的证人都已“突然死亡”，这一来就以“证据不足”为由开释了阿纳斯塔吉亚。可是紧接着他又因非法持枪罪从1923年到1925年底一直坐牢。

直到1930年年底，阿纳斯塔吉亚才使里尔斯和迈奥内这两个敌对集团开始和睦相处，并吸收他们共同从事黑手党的

营生，而且这两个集团合二为一，并起了一个符合自己主要活动的名称：“暗杀团”。这些人都是必不可少的干将，后来卢恰诺曾广泛利用他们为自己效劳卖命。

美国记者赫斯·泰勒在揭露该组织犯罪活动的一本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暗杀团”的实质：“主要目的在于加强暗杀团在犯罪界的地位，利用其巨大威力从肉体上除掉竞争对手，扩大经济、政治势力范围。这样一来，这个犯罪辛迪加（指黑手党——作者）就可以很现实地防止帮派之间的战争，避免‘偶发性’罪行。而一旦他们想制止在工业市场上出现的竞争性斗争，那就干脆把冲突的基础，连同属于合法垄断和卡特尔所固有的那种精明能干的办事能力，统统消灭殆尽。所以，绝不能以械斗、枪战和杀人的通常统计数字来衡量犯罪分子犯罪行动的大小。”

当然在暗杀团达到这一既定目标之前，还要流不少的血。在其成立后的十年间，“暗杀团”的“扳机手”大约搞了一千次暗杀活动。长期在“暗杀团”供职的职业杀手月薪为125到150美元，而“学员”则每人每月发50美元的奖学金。

“幸运人”不走运

我和举世闻名的康采恩的总经理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
我经营的不是石油，而是另一种商品。

萨尔瓦托雷·卢恰诺，即查尔斯·卢恰诺

第二十一次修改的联邦宪法于1933年12月5日生效，取代了1920年通过的第十八次修改的宪法。《禁酒法》废除了。自此非法经营威士忌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此时黑手党早已把自己赚来的数以百万计的金钱，投资到另外一些合法和非法实业中去，而且又得了不少收入。

领导着纽约黑手党诸多家族中一个家族的萨尔瓦托雷·卢恰诺，在“我们的事业”联盟最高委员会中，享有很高威望，实际上成了美国黑手党的领袖，可是他还觉得不满足。这位美国黑手党首领的虚荣心比天还高。卢恰诺还想搞政治。

在美国，搞政治就意味着要从属于两大政党之间的任何一个政党，而最好是脚踩两只船。民主党建立于1828年，起初是捍卫南方富有的庄园主、奴隶主及同这些人有关联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创建于1845年的共和党最初代表北方资产阶级，反对南方各州的民主党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政党之间的区别已经不甚明显，无论前者或者后者都成了唯一的帝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

当然，也有一些政治家在两党中属于例外，比如，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1933年他当选为总统，后来推行了某些自由主义的改革。

在20年代，纽约民主党的领导人是汤姆·弗里，外号人称大汤姆。此人是一家运输公司的老板。当时，不仅在纽约市辖区之内，就是在白宫都颇为尊重这位举足轻重的先生的意见。他有个助手叫阿尔伯特·斯·马里内利，人们都叫“竞选运动队队长”。他的职责是谨慎地驾驶本党这条船，绕过选举中的一切暗礁。当1931年弗里退出政治舞台时，卢恰诺毫不加思索地建议推举马里内利为候选人，竞选民主党纽约地区负责人这一空缺。

可是，对这个位置垂涎的还有另外一个竞争对手，此人叫加里·斯·佩利。黑手党洞悉美国选举中的机关奥妙。有一天卢恰诺手下的小伙子们突然出现在佩利的事务所里，他们把手枪往这位竞争对手的写字台上一放，客气地，但却是坚决地，要求佩利马上表示拒绝提自己为候选人。临告别时，这些人还说了一句：“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老婆，孩子！”

不言而喻，阿尔伯特·斯·马里内利当选了。从此，坦慕尼厅，即纽约民主党总部，就落到了卢恰诺手中。30年代及其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坦慕尼厅一直是民主党主要阵地。1789年5月12日，木工兼政治爱好者韦尔西姆·穆尼在小城纽约创建了这个政治俱乐部，并以领导列尼列纳普斯的印地安部族的传奇性领袖坦慕尼名字为名。该部族以特拉华人这个名称而闻名于世。

1800年，圣坦慕尼协会在竞选总统的斗争中，帮助过托马斯·杰斐逊。1805年，作为“慈善和公益团体”被列入纽约

的团体登记册。“坦慕尼俱乐部”的大门对所有的人都是敞开的，只要有钱交会费就行。在这个俱乐部里决定重大政治问题，同时还签订贸易协议。坦慕尼厅慢慢地，但却准确地一步步登上了权力的高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名字逐渐成了贪赃枉法、收买行贿、徇私舞弊和欺骗选举的同义词。

这个政治俱乐部似乎就是为了匪徒的渗入而建立。几年之后，检察官托马斯·久依对马里内利的统治，同时也是对黑手党对坦慕尼的控制，进行过总结。此时，纽约人才知道，在纽约民主党竞选委员会的二十五个成员中，每个人都至少有一次（很多人不止一次）因抢劫、杀人、窝赃或非法卖酒被送交过法庭；而二十二个负责监督选举进程的督察员中，八个人曾有前科。

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这样描写坦慕尼厅：

“这个贪婪怪物的魔爪紧紧攫住处于一切社会条件下的劳动者。其恶徒打入工会，肆无忌惮地欺骗掠夺工人；其警察只要一声令下就残忍地大打出手；其来自保健部门的视察员把质量低劣的牛奶发售给工人的孩子。坦慕尼厅还自行向商人征收‘贡赋’。而这些不现形迹的赋税又使生活用品的价格急剧上升；这个贪婪残暴的恶魔还把自己的人安插到城市教育管理部门，自然，这些人在这里也要危害社会。坦慕尼厅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吮吸工人鲜血的吸血鬼，任何一个祖籍纽约的居民都同意下述说法：这个鬼怪的魔影笼罩了我们整个国家。”

此时这个鬼怪早已转到卢恰诺，当然也就是黑手党的手中。在马里内利当选为纽约民主党主席之后，又过了一年，卢恰诺又企图登上更大的政治舞台。1932年11月即将举行总

统大选，卢恰诺决定，应把1928年上届大选中，被共和党人赫伯特·胡佛^①击败的坦慕尼厅的代表埃尔·斯密特提出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竞选总统，可是，在黑手党古老的都城芝加哥召开的，旨在确定竞选候选人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作出的决定却不利于埃尔·斯密特，而有利于罗斯福。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新方针》纲领，帮助罗斯福在1932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获胜。可是，纽约同美国其他城市一样，仍一如既往地还是一个“肮脏之城”。

在《3—12》电话机旁

这次失败并未使卢恰诺垂头丧气，因为他如今领导的不仅仅是一个“我们的事业”联盟，还有一个“六家大型联合体”。这是在《禁酒法》废除后，积极活动着的又一个美国匪徒大联合。这个匪徒辛迪加在美国犯罪界具有巨大影响。同卢恰诺一起进入最高司令部的有：

一、弗朗切斯科·卡斯蒂利亚先生，外号人称弗兰科·科斯泰洛。纽约黑手党一个家族的族长。此人通过自己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朋友吉米·汉斯控制着整个坦慕尼厅。

二、约瑟夫·多托，也叫乔·阿多尼斯，一个有影响的黑手党人，对去在“七家大型联合体”中，曾是“荣誉社”的代表。

三、路易斯·布哈特，外号人称列普凯。犹太匪帮的首领。从事讹诈和经营酒类，卢恰诺的故交和伙伴。

四、埃布纳·斯维曼，外号人称大个子。主要在纺织业

^① 前美国总统(1929—1933)。

从事讹诈。

五、本杰明·吉格尔，绰号疯子。老一代匪徒杀手，以赌博业为主要经济来源。在这个“六家大型联合体”里，他也代表自己的朋友，尽人皆知的匪徒迈耶·兰斯基的利益。

这个“六家大型联合体”继承了前一个走私酒类的超级托拉斯“七家大型联合体”的传统，把分布在赛马、赌博、在工商界进行讹诈、经营毒品、雇佣杀人等犯罪活动领域里的黑手党和其他美国匪徒集团的力量都联为一体了。

无论是什么，也无论是谁，都阻碍不了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总头目萨尔瓦托雷·卢恰诺象一个工业大王那样奢侈阔绰。他喜欢穿做工考究的丝绸衬衫，乘坐最新型号的小汽车。他有私人小飞机；做衣服要在适合上等人口味的第五大街的服装店里，找要价最高的裁缝；住，则要住在头等高级旅馆；每逢打电话，他总是回答“我是3—12”。3的意思是拉丁字母表上的第三个字母“C”，这是他名字的第一个字母。“12”是字母表上第十二个字母“L”，这是他的姓氏的开头第一个字母。卢恰诺把“3”和“12”这两个数字组合一起，使自己具有某种魔幻色彩。

卢恰诺有一个为老朋友举办晚会的习惯，这种晚会向来是贵族老爷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了让客人开心，还请来了一些“宴会女郎”。这些姑娘用上流社会那种无聊文雅的闲谈，挣得真可谓之豪奢大方的犒劳——一晚上50美元！

当然，并非这位有影响的黑手党人的所有“业务上的老朋友”，都能很快适应这些变化。就在这样的一次晚会上，应卢恰诺邀请，来自底特律“下层民众团”的匪徒，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评价“新鲜事儿”。在晚会结束前，这些人便开始向

“宴会女郎”直截了当地提出陪自己过夜。当这些客人们闹得实在太过分时，主人便在大厅里大声喊道：“诸位听着，请这些姑娘来这里是为了文雅的娱乐，没有别的任何意思！”可是，这个解释并没有说服这些“落后于生活”的底特律的“贱民”。于是，卢恰诺就给纽约一家豪华妓院的老板娘巴丽·阿特打了个电话。阿特当即给他派来一些自己手下最好的“姑娘”。

巴丽·阿特如此迅速执行这位赫赫有名的黑手党人的请求是可以理解的。警方早就知道，对职业卖淫进行组织完善的讹诈，加上经营毒品是卢恰诺主要的财富来源。其实，从职业卖淫业捞取好处的这个想法并不是什么新招儿，以前，阿尔·卡帕内早在芝加哥就推行过。从1933年起，卢恰诺把卡帕内的这套办法搬到了纽约，当然规模要大得多。

有一次，有人通知纽约各妓院的老板和以妓女为生的人，要他们在指定时间都到马尔贝利大街里尔·戴维·贝尔蒂罗的饭店开会，而且说对他们有好处。于是所有的人都准时到达。在会上，他们的代理人卢恰诺对把他们召集到这里来的目的做了简短的解释。他说：“伙计们，我们正着手开办一个新的实业，请诸位之中每个人在本周内入股，谁想加入这个实业，用十个‘辫子’就可以得到一股。”卢恰诺所说的每个辫子就是一千美元。当然，大多数的与会者都接受了他的建议。

晚上八点正

卢恰诺把对卖淫业的敲诈搞得相当完善。具体业务委托里尔·戴维·贝尔蒂罗负责。敲诈者把总部设在马尔贝利大街的一家糖果店里，这儿离警察局没有多远。贝尔蒂罗手

下设了几个专业部门。占第一位的是安全保卫部，其任务是保护妓院免受竞争对手的帮派和警方的骚扰和干预，防止发生来自竞争对手的敲诈勒索事件，同时还负责让执拗不听话的人“脑子复位”。这个部的领导人是拉尔夫·利果里，外号人称“吃妓女饭的拉尔夫”。而总会计师尼克·蒙塔纳负责及时把“被保护”的妓院老板过期未付款的情况及时提醒通报给利果里。比如，有个叫达戈·金的老板，当他开始不按期付款时，利果里手下的人就冲进他的店堂把桌椅板凳、碗勺全部都砸了个一塌糊涂。

敲诈者的情报中心设在一家旅馆里，所有极为重要的信息都源源汇集到这里。领导这个中心的，是以在一家妓院当看门人起家的安多内库菲洛。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法律事务处。卢恰诺对这个处颇为重视。这个处负责向同警方发生不愉快事件的妓女提供法律咨询。主管这个部门的是一个对自己的业务相当熟悉的埃布·卡普。此人以前当过检察官。最后，贝尔蒂罗手下还有几名医生，他们负责定期给“姑娘”进行体检。

黑手党的敲诈者从二百多家妓院捞到好处，令大约一千名妓女进贡纳税。据纽约检察机关估计，卢恰诺组织的对职业卖淫业的敲诈，仅1935年就为黑手党挣得两百万美元的收入。其中，有20万元落进了卢恰诺本人的腰包。

当1936年纽约市检察官托马斯·久依着手对职业卖淫业的敲诈活动进行调查时，他对这个行当的内幕当时尚一无所知。只是后来出于偶然，在加利福尼亚州抓住了吃妓女饭的戴夫·米勒之后，这位精力充沛的检查官才摸着了这个行当的脉络，因为米勒告诉久依，对职业卖淫业进行敲诈的头目是里尔·戴维·贝尔蒂罗，而贝尔蒂罗的后台是卢恰诺。久

依心里很清楚，要揭露罪犯只有一种可能，这就是要有足够数量的证人出庭作证。但显而易见，谁也不敢自愿出庭去触犯“强大的黑手党”，既然如此，就必须用其他方法找到证人。

这位纽约检察官以军队司令部的那种战斗精神，制定了一套行动方案。1936年2月1日晚上，一批身穿制服的刑警人员在久依的办公室里集合，然后两三个人分成一个小组，并发给他们一些封住口的信封，信封上都写有地址。临行前，下达了命令：要等到达信封上写明的地点附近时，再拆开信封，然后按信中指示准确行动。

晚上8点正，刑警人员准时走进曼哈顿区和布鲁克林区的妓女院，逐一登记下所有在场人员的姓名、地址，没收了帐簿。第二天早晨，久依就向报界宣称：此次行动逮捕了100多名女人和十七名男人。其中包括里尔·戴维·贝尔蒂罗和他的副手多米·皮诺基奥。可是所有被捕的人都缄口默言，就连“姑娘们”也什么都不说。

妓女特尔马·乔丹对自己不想供述是这样解释的：“我早就知道那些年轻人会怎么来处置我们多嘴的伙伴。他们要用点着的烟头烧燎身体和赤脚，还要割舌头。这就是我说的一切，再多一点也不说了。”

因此，当在第二十三大街一个妓女院里抓住的妓女汉希·普雷塞尔同意招供时，久依便心花怒放了。

汉希的供述

正是汉希的供述成了这条长线的一端，顺着它，久依揭

开了“卢恰诺事业”的内幕。汉希是一个波兰女人和一个斯堪底那维亚男人的亲生女，长得并不很漂亮。她16岁离家出走，从在美国的奥尔巴尼当餐馆女招待开始了自己的“生涯”。

年满17岁时，一个参议员玷污了她少女的贞洁。同年，汉希辗转来到纽约，成了一个有名的“应召女郎”，并首次同匪徒成了相识。

当时，她的女友贝吉正和一个名叫卢恰诺的年轻黑手党徒“相好”。有一次贝吉还介绍卢恰诺同汉希相识。当时，贝吉并不害怕失去这位男朋友，因为他此时还不是黑社会的上层人物，而汉希只赏识“大人物”。事过几年之后，在乔·马塞利亚家里举行的一次晚会上，汉希的一个男朋友把汉希带到卢恰诺面前，并说：“这位就是幸运人，他想同您交个朋友。”

此时，汉希正同吃妓女饭的拉尔夫相好。拉尔夫·利果里没有愧对自己的绰号，汉希挣来的全部收入，他都定期从她手里要走。但是，最后汉希对此实在忍受不住了。有一次他去找卢恰诺，对他说：“我需要一笔钱，如果我弄不到这笔钱，就不得不进妓女院了。”

卢恰诺以真正绅士的口吻表示异议说：“妓女院可不是您这样漂亮的女人呆的地方。”

“可是利果里老逼我，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如果整个事情就取决于钱，我给您。”卢恰诺平静地说。

就这样，萨尔瓦托雷·卢恰诺成了汉希·普雷塞尔的主顾。从此，汉希也成了卢恰诺豪华公馆的常客。此外，要说明的是，卢恰诺给汉希的酬金也相当慷慨。不过，有一次汉

希触犯了这个有影响的黑手党人的自尊心，从此卢恰诺就拒绝再充当汉希的保护人。

结果汉希又重新落入利果里的手中，当然他对汉希曾企图摆脱自己的控制要耿耿于怀，于是就把她送进了妓女院“珍妮商行”，和其他妓女不同的是，汉希从利果里手里连一分钱也得不到，而且还要遭受可怕的冷嘲热讽及残酷的剥削。利果里坐在楼下的会客室里亲自监督，看汉希同嫖客一起呆多长时间。如果有那一位超过了一刻钟，他立即上楼猛敲汉希的门，大声叫嚷：“听着，朋友，不可以快点吗？”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1936年2月1日晚上被捕后，汉希才决心把一切都向警方和盘托出。

检察官久依向报界宣布说：“卢恰诺是纽约的头号公敌，是阿尔·卡帕内的继承人。”

但是，警方却长期抓不住卢恰诺。据传说，他已经乘坐自己的“洛克希德”飞往佛罗里达了。在那里，警方对他不熟悉。不过，在阿肯色州一个警察认出了他并把他就地拘留。在小石城的监狱里，卢恰诺等待把他引渡给纽约州当局。这一来，“我们的事业”联盟可就惊慌失措了。黑手党人从四面八方开始向小石城集中。当局加强了监狱的保卫，在塔楼上设置了重机枪。

用武力救出这位有影响的黑手党人的企图未能成功。很快在纽约，对“我们的事业”联盟这位有巨大影响的首领及其三名同谋，进行了轰动一时的审判。四十名武装到牙齿的警察布满法庭大楼的走廊。检察官久依向法庭传唤了六十八个证人，其中有四十名妓女和妓院老板，另外还有十二个专吃妓女饭的人。

穿着考究的卢恰诺泰然自若地就坐于被告席，而且把头靠在椅子的后背上。可是，当1939年7月6日陪审法庭确认，他的罪过已触犯八百零六条犯罪中的六十二条时，他才完全失去了镇静！在宣布判决前，让卢恰诺做最后陈述，他对法官说：“先生，我只能说一句话，这就是我是无罪的。”

第二天，法官宣布了判决：卢恰诺被判处50年徒刑，利果里15年，其他两名各判处25年。不久，卢恰诺就被押送到丹内莫尔监狱服刑去了。

几个月之后的一天夜里，在华盛顿的一个警察分局里，响起了电话铃声。电话里一个女人拼命地大喊“救命！”几分钟后，警方确认电话来自新汉普西大街的一座公寓。按照地址，警方人员及时赶到现场，在充满煤气的房间里，一个棕红色头发的姑娘，双手被绑，睡衣被撕破，躺在地板上的血泊里。她被用刀子致命处狠狠捅了几下。大腿上还让人用刀子划了大写的字母“C”、“L”和阿拉伯数字3—12。警方很快就确认，死者是玛格丽特·路易斯·贝尔，她在卢恰诺的案件里，曾作为起诉一方的证人出庭作证。

“科斯泰洛及伙伴”公司

给卢恰诺定罪并非是三十年代当局给予“我们的事业”的唯一打击。

1933年罗斯福当选总统后，美国参议院曾任命了“匪徒暴行调查委员会”，主席是参议员库普林德。虽然这个委员会广泛收集了大量揭露匪徒暴行的材料，但都缺乏有力的根据，所以参议院的这个委员会所进行的调查及其做出的结

论，其作用仅仅是做为资料存档而已。不过，在此之后，纽约警方对匪徒的行径（更确切地说，是对其若干表现）的斗争，是稍微活跃了一些。

尽管下面这件事听起来有些异乎寻常，但黑手党的确充分利用了自己在坦慕尼厅的全部力量，去阻止一个意大利裔的美国人当选为纽约市长，但是最终未能成功。新市长菲奥雷洛·拉瓜尔迪亚竭诚尽力要以罗斯福总统宣布的施政纲领的精神，同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弊端作斗争。

弗兰克·科斯泰洛及其黑手党家族所从事的赌博业讹诈是非奥雷洛的眼中钉。科斯泰洛1893年出生于西西里，他以在纽约当上一个名不经传的“扳机手”开始了自己的匪徒营生。1908年因参与抢劫第一次坐牢。1915年又因非法持枪被判了一年徒刑。在《禁酒法》时代，他被公认为是一个坏透了的非法卖酒人。1927年又因收买美国海岸警卫队人员被起诉，再次被送交法庭。可是，由于“证据不足”旋即被释放。1929年科斯泰洛已经是黑手党的上层人物，参加过在大西洋城举行的那次著名的黑手党会议。他属于“我们的事业”联盟中精明能干的“年轻人”之列。这些少壮派在大西洋城会议之后很快改变了行动方针，开始从事“合法”生意。

卢恰诺在自己执政时曾联合了非西西里裔匪徒，如布哈特、吉格尔、兰斯基等。同卢恰诺一样，科斯泰洛也把一个美国人当成自己的伙伴。此人叫卡斯蒂尔，外号人称“冒险爱好者”，专门从事对赌博业的讹诈。科斯泰洛和卡斯蒂尔决定大干一场，为此成立了一个合法的商行，名字叫“纯真薄荷公司”并在官方注册登记。卡斯蒂尔向这个专业公司提供业务知识，而科斯泰洛则把在《禁酒法》时代赚取的巨额利润中

的一部分拿出来作本钱。

以这个新开业的商行的名义，卡斯蒂尔在芝加哥米尔斯新玩具公司采购了几千个自动玩赌机，还起了一个颇具讽刺意义的名字，叫“独臂强盗”。这种玩法很简单，赌者往机器的一个口里扔进一个硬币或几个硬币（不取决于投入的赌注），于是摇把，即所谓“手臂”就转动起来。结果带动上百带有图画或数字的圆盘也随之转动。当圆盘停在刻在机器玻璃上的分度线上，于是就显示出一个图画或数字。然后，把三个图画或数字加在一起，就显示出其一定的组合。此时，机器就抛出所赢的钱。1929至1934年间，在纽约，科斯泰洛和卡斯蒂尔安装了五千多台“独臂强盗”。这可苦了那些不愿意安装“独臂强盗”的饭店或药店的老板们了！这一来，消灭“独臂强盗”就成了拉瓜尔迪亚市长本来要发动的反匪徒运动的首要任务。他以组织一次声势浩大的表演为名，把全城所有的这种赌具机器全集中到一个地方。在摄影记者一片耀眼的镁光灯下，纽约市长用沉重的铁锤朝几架机器猛烈砸击，并吩咐把碎片扔进了赫德森河。对此内幕一无所知的纽约老百姓，还真以为这一下子可算是真正卡住匪徒的脖子了。

黑手党的先生收买议员

在拉瓜尔迪亚把几台色彩斑烂的机器扔进河里时，五千台这样的机器也报废了。不过，在此之前已经捞到了不少钱，一台这样的赌具，一周之内纯利五十美元。再者，科斯泰洛和他的伙伴早就极力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的目光转向了南方，转向了路易斯安那州。美国黑手党1890年

就诞生在这个州的最大城市——新奥尔良。

有一次，弗兰克·科斯泰洛在纽约结识了该州的议员休·朗。当时这位议员正处于困境。因为有个不知名的小匪徒掌握了朗的风流韵事，企图以此敲诈这位议员。朗向科斯泰洛说明了自己的苦处，这个黑手党徒答应除掉那个匪徒，当然也希望有所报答。

作为交换，休·朗也真能给黑手党匪徒提供东西，甚至连整个州都行。朗从当商品推销员起家，后来又研究法律，搞政治，从而步步高升。在他作为商人，推销商品的那个时期，他理解到了生活的某些真谛。34岁时，几经努力当上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在竞选活动中，他提出的主要口号是“每个人本身就是国王”和“同他人共享一切”。朗向选民承诺，要精简行政机构，把节约下来的钱建立一座结核病医院。选举过后，不仅这些漂亮话统统被置于脑后，更有甚者，休·朗使路易斯安那州陷入贪赃卖法的“泥沼”。他利用威胁和收买手段，把州议会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有一次，在讨论他提出的法案时，大多数议员都表示反对，可是这位州长不加思索就吩咐重新表决。这次表决时，他手下武装到牙齿的御林军开进议会大厅，严阵以待，这一来，“人民的代表们”便明白了自己该如何行事，于是法案被一致通过。后来，朗被选进美国国会，但是他还把州长一职的继任人紧紧抓在手中，把这位州长当成跑腿的小伙计使用。

总之，国会议员休·朗不用特别费劲儿就保证弗兰克·科斯泰洛及其伙伴得到了极为有利可图的租让合同。于是如同匪患一样，“独臂强盗”开始蔓延扩散到整个路易斯安那州。不言而喻，赢利非常可观。到了1938年，即得到租让权

之后3年，美国税务部门就因偷税漏税79.8万美元对科斯泰洛的公司进行过起诉。

可是案件发生在休·朗的“王国”里，当然法庭要认定弗兰克·科斯泰洛及其伙伴无罪。

杀人犯救了检察官的命

尽管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可黑手党仍安然无恙。《禁酒法》时期积累的资本，不仅又用于非法经商活动，而且也投入大型地方性公司和颇有声望的实业之中。他们知道，拉瓜尔迪亚和休·朗的时代都不会长久。至于那些背后没有象“我们的事业”联盟这样强大组织作后盾的匪徒的日子也很难过。一个曾在荷兰的哈勒姆城饭店业干敲诈行当，绰号叫荷兰鬼舒尔茨的阿图尔·弗莱根海默就属于这类匪徒。他在黑人区组织非法抽彩，另外还是“暗杀团”的扳机手。这个荷兰鬼舒尔茨，有时还同“六家大型联合体”合作处理一些事务，不过，并没有进入这个匪徒辛迪加的领导层。1932年联邦税务总局对舒尔茨的活动进行过调查，但是，对他的刑事追究中途不了了之，因为负责处理此案的当地检察官威廉·道奇是在舒尔茨的资助下当选此职的。舒尔茨曾提供3万美元供道奇使用。可是，纽约的检察官久依不同意道奇的决定，并亲自动手调查此案。

眼看着久依不声不响，细心地进行调查，舒尔茨实在忍受不了。此时，卢恰诺正在服刑。科斯泰洛及其伙伴卡斯蒂尔躲到了路易斯安那州；而阿多尼斯、阿纳斯塔吉亚、吉格尔、布哈特和兰斯基都上了久依的黑名单。

舒尔茨决心要搬掉不可贿赂的检察官久依这块拦路石，于是便去求助于“暗杀团”。“暗杀团”的头目们讨论了舒尔茨的建议，甚至征求了在狱中的卢恰诺的意见。结果，除了舒尔茨一人外，所有人都一致认为，不应该杀死久依，因为暗杀一个引人注目的检察官会激起社会公众的不安和愤怒，必然会导致警方采取行动，集中全力打击黑手党及同其合作的匪帮。

舒尔茨怒发冲冠地离开了“暗杀团”召开的这次“细心协商”的会场。临别时，大喊大叫说：

“如果你们这样胆小的话，我自己干！”

“暗杀团”的首领们望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地直摇头，他们反对杀死久依。虽然舒尔茨决定自己单独干，可是由此而产生的危险后果则要落在黑手党的头上。既然如此，舒尔茨必须离开人世。头头们宣布了对荷兰鬼舒尔茨的判决，执法的理由是“藐视法庭”。

舒尔茨定于1936年10月25日对久依下毒手。这个匪徒精确地研究了这位检察官的行动日程。久依有个习惯，喜欢每天大清早在同一个时间从家里出来，到最近一家药店往自己的办事处打电话。他解释说：“我不能在家打电话，害怕影响妻子睡觉。”每逢打电话时，久依的保卫人员总站在药店门外的街上。按计划，舒尔茨手下的一个匪徒就在这个时候，事先呆在药房里，装着在挑选药用牙膏，接着用安着消音器的自动手枪打死久依，然后诬罪于售货员。

“暗杀团”的头头们委托团长阿纳斯塔吉亚亲自指挥这场防止谋杀久依的行动。为了完成委托给他的使命，阿纳斯塔吉亚挑选了自己手下最优秀的扳机手，外号人称克劳普的查理·沃尔曼。另外，又派了两个匪徒曼迪·贝克和比吉作沃

克曼的助手。

10月23日，即舒尔茨预定谋杀检察官久依的前两天，“暗杀团”的枪手走进了舒尔茨和他的保镖通常落脚的一家小饭店里。曼迪和比吉用枪对准吓得呆若木鸡的顾客。与此同时，查理·沃尔曼手持自动武器穿过大厅跑向另一些房间。突然，他的视线落在厕所的门缝里，于是猛地一脚把门踢开，见一个人正背朝他站在那里，沃尔曼不加思索地当即开枪，旋即朝一个单独的办公室飞奔而去。猛的一下推开门，冲着坐在桌子旁边的三个男人连续扫射几梭子子弹，然后逃遁而去。

第二天，舒尔茨在医院因伤势过重，一命呜呼。他就是那个在厕所里沃尔曼偶然朝其开枪的那个人。

可是被救了一命的检察官，为这次行动送给查理·沃尔曼的酬劳是“黑心的忘恩负义”：以预谋杀害四条人命罪将他起诉。结果沃尔曼被发落到铁窗后去度过整整23年。

“纽约的息肉”

无论是奥德威尔，也无论其手下亲信，对从事包赌贩毒、受命杀人、赛马赌注、港口讹诈线上的人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自己的行动阻碍可以导致彻底揭露匪徒犯罪活动的调查工作的进行。

——摘自1951年3月参议员凯弗沃领导的参议院罪行调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尽管检察官久依和忠实听命于他的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的事业”联盟中的匪徒始终平安无事。关于这一点，只要仔细了解一下美国的政治，就很容易找出其因由。在美国，条条道路对大亨们总是畅通无阻的，所以抉择也很简单：要么买通检察官，要么安插一个新的、比较好商量的人来占据这个位置。

这样一个所需的人很快就找到了，而且比预料要快得多。年轻的爱尔兰移民威廉·奥德威尔1917年进了纽约警察局，由于果敢坚毅，博得了上司对他工作的高度评价。后来他修完法律课程，在纽约开了一个法律事务所。不久，奥德威尔对政治产生了兴趣，于是加入了民主党。当时，在纽约，民主党有两方代表势力，一方是同黑手党誓不两立的斗士拉瓜尔迪亚；另一方是被黑手党征服的坦慕尼厅。可这个追逐功名

的年轻律师很快就博得拉瓜尔迪亚的信任，也得到坦慕尼厅上层领导人的支持。1938年奥德威尔被选为地区法官，不过任职没多久，因为他要担负一项更重大的使命。这个使命牵涉到纽约港，因为阿纳斯塔吉亚兄弟（阿尔伯特·阿纳斯塔吉亚是“暗杀团”的领导人）在这里把持工会进行敲诈活动。

在30年代，美国垄断集团企图把经济危机的恶果转嫁到劳动人民肩上。这一来导致了阶级斗争的加剧，罢工浪潮此起彼伏，遍及全国各地，使整个工业陷于瘫痪。同以往一样，资本家当然力图用暴力镇压劳动人民为争取自身权利而进行的群众性示威活动，而参与对工人和农场主镇压的不仅有军队和警察，还有匪徒。仅1934年至1936年底在这场斗争中就有88个工人死亡。

阶级斗争的激化导致1886年创建的“美国劳动联合会”（简称劳联）内部分歧加剧。

为了表示对工会头子执行的反动政策的抗议，1935年11月在“劳联”内部另立了一个委员会。后来该委员会被“劳联”开除。于是1938年这个委员会成员成立了“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产联）。这一来，当时在美国所有的基层工会就归属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究竟归属于那个组织？是留在“劳联”，还是转向“产联”？

在工会的这场为争夺势力而开展的斗争中，匪徒们站在资本家一方，希图从中取利。

而先于其他匪徒最早觉得有利可图的，是黑手党人阿纳斯塔吉亚兄弟。在这里，他们通过明目张胆的恐吓；在那里，则施展狡诈欺骗手段；而在另一些地方干脆使用暴力，这样就把持了一部分码头工会的领导权，肆无忌惮地把大手伸进工

会的金库。在这方面，他们的活动到了极端无耻和猖狂的境地，致使社会公众一致要求当局立即采取有力措施。下述统计数字最雄辩地说明了阿纳斯塔吉亚兄弟当时的活动情况：从1936年至1938年底，在纽约港，仅警方记录在案的无头暗杀事件就有20起。

坦慕尼厅也参与了这场斗争。这个被《工人日报》恰当地称之为“纽约的息肉”的俱乐部早已被黑手党所控制，并渗进当地的民主党组织。正是这个“纽约的息肉”举荐奥德威尔当上了布鲁克林区的检察官。按照黑手党人的看法，这个精力充沛，有多年警龄的律师，应该以自己的坚毅的性格博得社会公众的好感。他们还真是没有看错！

奥德威尔利用自己的声誉和办事干练、充满活力之人的名望，大搞投机钻营，两年之后，在整个纽约就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1940年他夸下海口，似乎一定要给讹诈活动和“暗杀团”以致命打击。

老实说，在奥德威尔担任检察官期间，暗杀事件的数字是有所下降，也抓住和判处了十几个其他匪徒，虽然，后来弄清楚，这只是一些单干的无名小卒。但是，曾对奥德威尔检察官拼命吹捧的各家报纸是否会料到，正是这位检察官牢牢地庇护着臭名昭著的“暗杀团”首脑阿尔伯特·阿纳斯塔吉亚，使其免受缉查。在这位检察官和“暗杀团”的首领以及下述工人积极分子死亡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呢？

1939年7月6日，在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全国海员工会成员约翰·瑟尼克被暗杀。

7月12日在芝加哥，埃利克·赫斯勒神秘死亡。第二天他就要控告“国际收割机公司”的几个老板。

同一天，在肯塔基州的哈兰，国民自卫军打死了站在罢工工人纠察队一边的多克·科德威尔。

当时在美国思想进步的工人被杀或失踪，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仅1939年7月份的11天里，在美国五个州就发生了10起政治暗杀事件。

1939年7月14日，纽约工会积极分子皮特·潘托失踪。

同一天，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当警察驱赶工人游行示威队伍时，16岁的埃米尔·伯格斯特龙遇害身亡。

又过了一天，在肯塔基州的斯坦福，工贼打死了35岁的矿工比尔·罗伯茨。而在这个州的威廉斯——克里克，当矿工举行罢工时，国民自卫军列队警戒，“不知是谁”打死了30岁的布雷德利·辛普森和35岁的弗兰克·布雷恩。

最后，7月16日，还是在哈兰，又打死一名工人积极分子，39岁的矿工丹尼尔·霍伊。

皮特·潘托哪儿去了？

皮特·潘托这个年轻进步的码头工人敢于挺身而出反对阿纳斯塔吉亚兄弟权力无边的讹诈行为。起初，他鼓动自己的同志要求自由选举，提出把那些出卖灵魂的工会积极分子从工会组织中清除出去。

既是“工会活动家”，又是阿纳斯塔吉亚集团成员的黑手党分子埃米利奥·卡马尔多不止一次威胁皮特·潘托，要他停止自己的活动并离开港口。

当1939年7月14日皮特·潘托失踪后，警方依照传统发布了寻人启事并着手进行调查。后来找到了几个见证人，他们

曾看见过皮特·潘托，看见他正和几个“工会积极分子”坐进一辆阿纳斯塔吉亚集团的小汽车。还有几个证人说，卡马尔多如何威胁过潘托。看来，这已经足以构成刑事案件，但却根本不再进行任何调查。

1951年奥德威尔曾重新被叫到参议院“潘托事件”调查委员会。下面是参议员托比和这位纽约前检察官在会上的对话：

托比：纽约的侦查机关当时是否对一个叫潘托的被杀和布鲁克林港口地区的讹诈活动以及卡马尔多控制六个工会组织等事做过调查？

奥德威尔：做过调查，先生。

托比：您是否知道，这些工会组织被阿尔伯特·阿纳斯塔吉亚，埃米尔·卡马尔多，杰克·佩里西和安托尼·罗密欧等人所把持？

奥德威尔：就我当时所掌握的情况证明，卡马尔多……据我的记忆，在工会里是有好几个领导人，但是我们知道在港口称霸的是阿尔伯特·阿纳斯塔吉亚。

托比：这么说，他就是讹诈分子的头目了？

奥德威尔：是的，先生。

托比：根据对一百多名证人的询问确认，阿纳斯塔吉亚，罗密欧及其他几个匪徒，从工会的经费中窃取不止10万美元，还销毁了工会的账簿、报表和报销单据。是这样的吗？

奥德威尔：如果相信证人的证词，那就是这样的。

上述表明，奥德威尔在位时根本无视明显的证据，未采取任何措施指控阿纳斯塔吉亚、卡马尔多及其一伙，甚至在外号

人称“杂种狗塔克”的埃利·坦纳鲍姆，为了活命把自己的供词放在奥德威尔检察官的写字台上的情况下，这位检察官也还是不采取任何措施。坦纳鲍姆一口咬定，是曾参与密谋杀害匪徒荷兰鬼舒尔茨的曼迪·贝克和阿尔伯特·阿纳斯塔吉亚以及绰号叫“脏面孔”的吉米·费拉科等逼着皮特·潘托同他们一起乘车去了费拉科的寓所。

关于此后发生的情况，贝克对坦纳鲍姆是这样说的：“这个年轻人一迈进门坎，马上就明白自己已陷入绝境。我上去卡住了他的脖子，开始打算憋死他。可是他拼命反抗，这时候，我真忍不住要拚死他。”

坦纳鲍姆的供词就在奥德威尔的手里，但被束之高阁。直到1941年元月29日，在新泽西州的林登赫斯特露天石灰场发现了皮特·潘托的尸体，这份供词仍原封不动地扔在那里。

几个月之后，又发现另外的证据，无可置疑地证实阿纳斯塔吉亚匪帮与这件谋杀案有关。这是“暗杀团”的一个头头所做的供述！

事情是这样的：1941年3月22日下午5点半，一个身穿毛皮领子、浅色大衣的年轻妇女从布鲁克林市政厅四楼的电梯间走出来，然后沿着长长的走廊，疾步朝钉有“区检察官”小牌的房门走去。

已经是要下班的时间了，接待已经停止。可是这个女人眼泪汪汪地一再请求女秘书向检察官通报她的到来，并说：“您就说是埃布·里尔斯的妻子求见。”

当女秘书把这位这么晚的来访者向奥德威尔的副手巴顿·塔卡斯通报后，塔卡斯象被马蜂蜇了一下似地，一下子跳了起来。外号人称“山羊胡”的埃布·里尔斯的名字在这个

部门是尽人皆知的。他曾和海比·梅约内匪帮进行过残酷的明争暗斗，后来他们联合起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以阿纳斯塔吉亚为首的“暗杀团”。眼下里尔斯因杀人罪已被囚禁好几个月了。

埃布·里尔斯的“履历表”上最醒目的是：1923年因两件罪行被判刑，但缓期执行；1925年因参与袭击被判一年监禁；1927年又因武装袭击罪被提交法庭，后因证据不足而无罪释放；1928年由于持械抢劫和撬锁行窃被起诉，第一项罪行免受惩罚，第二项罪行被判半年徒刑，后提前释放；1930年因两起强盗式袭击，其中一起使用了火器和因两起杀人罪被判刑，但服刑中断；1933年因袭击和杀人被起诉，但未判刑很快即释放；1934年因袭击和杀人被判处徒刑，但缓期执行；总之，只要一被放出来，里尔斯就又重新作恶。

“暗杀团”的行动总是策划和组织得非常好，致使警方长期抓不住里尔斯的把柄。可是这一回，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显然面对电椅的威胁，里尔斯的精神崩溃了。来访的里尔斯妻子说：“我的丈夫不能死，我们的孩子元月份就要出生。埃布打算坦白，他想同奥德威尔先生会面。”

埃布·里尔斯的记忆力

塔卡斯当即给自己的长官打了电话。奥德威尔在获准同这个在押人员会面后，立即驱车到了监狱。而里尔斯的妻子则在四名警察的陪同下离开市政厅，因为他们要随时保护她免遭“我们的事业”的报复。

晚上9点，里尔斯在奥德威尔的陪同下来到区检察官办

公室。当里尔斯被取下手铐时，他对检察官说：“我向您担保，在我的帮助下，您可以在全美国声名大震。我能把一系列神秘暗杀事件讲得清清楚楚，使全国震惊！”

接着里尔斯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奥德威尔同意照此执行。这些条件是：一、撤销部分起诉；二、要考虑到减轻罪责的因素；三、里尔斯所做的任何供述都不应用来作为惩罚他本人的根据。

里尔斯连续坦白了十二天，供词记录达二十五本之多。看来，里尔斯有着非凡的记忆力，他细致地供述了罪行发生的详情细节，说出了日期、具体时刻、人名和地点。他还详尽地描述了在布鲁克林区“干得非常出色”的八十五起罪行的前前后后，讲述了“暗杀团”的组织结构并供述了其活动情况。此外，还说出了就他所知的一切有关“我们的事业”联盟支系庞杂的组织状况以及阿纳斯塔吉亚，科斯泰洛，卢恰诺，杰诺维塞及其他一些头子们的情况。

此时，这位区检察官手里已掌握了大量证据，足以发动一场同黑手党进行较量的大型战斗，给“我们的事业”联盟以致命打击并彻底消灭“暗杀团”。可是奥德威尔没有急于行动。1951年在参议院罪行调查委员会被质询时，这位前检察官就回避正面回答参议员托比的提问。

托比：请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谁是“暗杀团”领导委员会的委员长或主席？

奥德威尔：我所能说的，都只是从里尔斯供词中所知道的东西。他说，下达指令的是“组合会”^①。据他所知，这个

^① “暗杀团”的领导委员会。它是通过一种复杂的抽签组合，从有影响的黑手党人和匪徒中挑选组成的。

组织没有常任的固定首脑，仅是个“组合体”。但是这个概念可以作多种解释。此外，虽然里尔斯经常提到黑手党，但我的印象是，他对黑手党的情况知道的并不多。

托比：您知道谁给“暗杀团”提供经费吗？

奥德威尔：“暗杀团”从不按每桩罪行发放酬金。所谓“部队”大多数是由十六七岁的年轻人组成，而“组合会”则使她们有机会捞到工资以外的好处，比如通过赌博机、妓女院或其他方面的东西，不过我对此知道的并不多。大概还准许搞一些“违法”活动，象在附近地区进行敲诈勒索等。再如，如果必要的话，“部队”随时准备去偷汽车，因为汽车对执行暗杀任务或不留作案痕迹和放风都是必不可少的。嗯，还有，一旦阿纳斯塔吉亚下令除掉相邻地区的某个匪帮成员时，也都是这些人去干。

就这样，1951年奥德威尔对很多事情都保持了沉默。那么，已经无影无踪的那25本供词中究竟都说了些什么呢？是什么卷入了这件事情之中？根据谁的命令，奥德威尔于1941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指控黑手党？当时他又打算如何处置里尔斯呢？

埃布·里尔斯坦白之后，断然拒绝返回监牢，他害怕由于自己“变了调”而遭到黑手党的报复。而且，这种想法也并非毫无根据。为此，检察官奥德威尔安排把他送到了科尼岛。有关方面把他安置在“哈夫门”旅馆六层的一个单间里，外面有六名警察日夜看守。

尽管采取了防范措施，可是还是于1941年11月12日清晨，在旅馆的院子里发现了脑浆崩裂的里尔斯躺在地上。从他所住的房间的窗户上，象旗子一样，挂着结在一起的几个

床单。指控黑手党的主要见证人呜呼哀哉了，他已经再也不能在法庭上供述有关黑手党和“暗杀团”的情况了。

在科尼岛的这家旅馆里究竟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1951年凯弗沃领导的参议院罪行调查委员会对这一点很感兴趣。参议员托比对当时负责看管埃尔·里尔斯的纽约警察局副局长弗兰克·巴尔茨进行了质询。

巴尔茨：里尔斯害怕匪徒报复。我相信，他是想逃跑。此外，里尔斯非常贪生怕死，所以他不会决心自杀。

托比：在进行现场调查时，是否提出过里尔斯是被人从窗户上推下去或扔出去的解釋呢？

巴尔茨：我认为，里尔斯是打算跟我们开玩笑。他大概想顺着结起来的床单，滑到下面一层，然后沿着楼梯上来，吓唬我们。可是，结果玩笑没开成，脱手摔了下去。

托比：那么走廊里的六名警察难道就没有察觉什么可疑之处？

巴尔茨：当时他们都睡着了。

托比：所有警察都睡着了吗？这是您，一位负责警卫里尔斯的人所说的话吗？那么您就没想一想，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简直是笑话！就连欧·亨利恐怕也不会编造出比这更令人吃惊和荒谬的故事！

曾就里尔斯一案，也接受过托比所在的参议院罪行调查委员会质询的奥德威尔，也不同意巴尔茨的“解释”。他断定，里尔斯是想逃走，但脱手了。可是在做调查总结时，参议员托比却做出了只有一种解释的结论，这就是：“里尔斯是被谋杀的！”调查结果，委员会查明了下述这一极其引人注目的事实：在里尔斯的供词里含有关于纽约警察局副局长巴尔茨

同黑社会有牵连的情报。而奥德威尔却始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仅没有把巴尔茨调离其任职，反而委派他看管里尔斯！

1963年10月，另一个参议院黑手党罪行调查委员会也就里尔斯事件询问过黑手党徒约瑟夫·瓦拉契。此人直截了当地声称：“不要自找麻烦了。要是这样，也可以猜测山羊胡是被警察打死的！”

豹皮上的花斑

1941年对皮特·潘托的神秘失踪就这样没有再进行调查。当时，阿纳斯塔吉亚明白，总会有一天就连奥德威尔也再不能庇护他，所以他暂时离开了纽约一段时间，并参加了美国军队当了志愿兵。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继而美国参加二次大战之后，美军的数量急剧增加，把一切愿意参军的人都吸收到军队之中。

后来，就连奥德威尔也应征入伍。当然，他一开始就当上了校级军官。他把纽约的事务交给了自己的副手弗兰克·乔·莫兰。就是此人在“潘托事件”中听取了埃里·坦纳鲍姆关于暗杀这个工会积极分子的供词，并把记录送交给了奥德威尔，而后者却将其束之高阁。不久，遵照莫兰的指示，从缉捕名单上划掉了阿尔伯特·阿纳斯塔吉亚的名字。而间接参与暗杀皮特·潘托，于1942年5月以涉嫌杀害潘托被捕的安托尼·罗密欧则坐了几几天牢，后来由于莫兰的努力也被释放，不过三周之后，罗密欧便神秘被杀，一命呜呼。

此时，奥德威尔已经官运亨通地当上了空军准将，同时

却没有中断同纽约的接触。拉瓜尔迪亚市长仍然在位执政，但是此时人们却都把弗兰克·科斯泰洛称为纽约至高无上的人物。

在路易斯安那州，科斯泰洛在参议员休·朗的关照下，发了横财。他的生意是从赌博机“独臂强盗”做起，后来在新奥尔良又买下了“比沃里城郊俱乐部”，在里面开了一个赌场。他认为利用自己熟人的赌欲没有什么坏处。他曾说，“99%的人都会有一次产生希望靠赌博发财的强烈欲望。法律在同这一丧失理智的行为作斗争时是无力的。总会找到逮住猫的钩子，要想去掉豹皮上的花斑是不可能的。只要一个人赌上了瘾，他就敢使用最狡诈的手段，一直寻找合适机会来最终满足自己的欲望。”

科斯泰洛是一个善于轻而易举就能煽起赌欲之火的人。与此同时，新奥尔良的市长约翰·克劳什也没少捞钱。由于他对匪徒们的勾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匪徒们定期把一沓沉重的钞票送到他的家中，其送礼总数有1.5万美元。

1936年到1937年，科斯泰洛及其伙伴卡斯蒂尔赚的钱达250万美元之多。

科斯泰洛的候选人

1942年12月刚被晋升为准将的奥德威尔拜访了纽约的黑手党的先生弗兰克·科斯泰洛。当时后者住在中央公园西区这个贵族区。这是一次相当奇怪的访问，而更令人奇怪的是奥德威尔对此所做的解释。正如他后来所断言，这次谈话似乎仅涉及军务，更准确地说，涉及供应军服的某一合同。可能这是

真的。科斯泰洛如果把赌博业捞到的钱再投资到纺织工业是大大有利可图的。

如果是这样，黑手党分子科斯泰洛为什么不可以发一笔战争财呢？！

但事实上，有一点却同奥德威尔对这次拜访的解释是相矛盾的，这就是陪同他一起到这位黑手党先生家里去的，是自己以前的副手莫兰，而此人同军务毫无任何瓜葛，而且他一直被认为是科斯泰洛的挚友。

当时在科斯泰洛陈设典雅的寓所里等待来访者的，还有一个叫依文·谢尔曼的人。此人是科斯泰洛和另一个黑手党先生乔·阿多尼斯的好朋友（战后，奥德威尔竞选纽约市长时，谢尔曼成了其竞选运动的负责人）。除了谢尔曼之外，参加这次会见的还有坦慕尼厅的领导人迈克·乔·肯尼迪（同后来的总统同名）及其秘书伯特·斯通德。

毋庸置疑，会见时要谈及纽约的政局。要知道，肯尼迪是多亏科斯泰洛的支持才当上了坦慕尼厅的领导人，而且坦慕尼厅另外的30个头头，也都是科斯泰洛的朋友。当时，纽约州最高法院的选举马上就要举行。科斯泰洛坚持让提名意大利人托马斯·阿·奥雷里奥这个黑手党人担任法官。可是，坦慕尼厅的领导人认为，这样一个候选人同“我们的事业”的联系太明显，故有些举棋不定。科斯泰洛把肯尼迪叫去，大声呵斥说：“您是个男子汉大丈夫，还是个窝囊废！”肯尼迪试图辩解，可是最后这个黑手党的首领还是达到了目的。1942年8月28日民主党提名托马斯·阿·奥雷里奥作为法官竞选人。

选举后的次日清晨，区检察官霍根接到一份耸人听闻的

速记稿，因为早在此几周前，霍根就吩咐窃听科斯泰洛所有的电话谈话。

奥雷里奥：早上好，弗兰切斯科，近来怎么样？非常感谢你给予我的支持。

科斯泰洛：祝贺你。看来，一切顺利。如果我要做什么许诺的话，就是您可以信赖我。

奥雷里奥：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希望使你确信自己是奉公守法的，我忘不了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可是，奥雷里奥此时已经当选了，霍根已无力改变一切。而此时，奥德威尔正准备去赴新职。在意大利暂时被美军占领时期，他将要在盟军最高委员会工作。而在意大利，人所共知，黑手党是非官方的统治者。在它的帮助下，奥德威尔准将是可以大有所获的！

黑手党和将军们

此人智力一般，本性卑劣；好寄生，但富于感情。他的生活理想就是金钱、美女、丝绸衬衫和优裕的生活。就其实质来说，他只是个孩童，性格残忍、渴求行动；平时只读报纸，而且只对报上的插图和小幽默感兴趣。他的文化需求极为狭小。

摘自丹内莫拉监狱精神病医生对查尔斯·卢恰诺进行检查后所作的诊断结论

1942年的一天，使卢恰诺极为惊诧的是，他从丹内莫拉监狱被转移到了科姆斯托克监狱。这里一向以管理相当松而著称。在科姆斯托克坐牢的基本上只是一些罪行轻微的罪犯和一些患病的囚号。卢恰诺一直在苦思冥想，他能享受这一优待，应归功于谁和为了什么。

在转到这座新监狱之后又过了三天，他被带进了接见室。这是一个陈设极为简单的房子，中间从上到下被铁丝网隔开。平常接见日，囚犯和亲人在这里面对面紧紧坐在铁丝网的两边，可今天，这个地方空无一人，只有个卫兵站在门旁。

卢恰诺只好等了几分钟。一会儿，门一下子被推开，这时……惊呆了的卢恰诺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原来走进接见室

的是他的委托律师莫杰斯·波拉科夫，跟在后面的是“六家大型联合体”中的老朋友、赫赫有名的匪徒迈耶·兰斯基。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伙计！”卢恰诺好不容易才说出了这句话。

他们要干什么？不管怎么离奇，他们需要卢恰诺帮忙！而且老实说，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美国军方！正是为此，他们对监狱的拜访才能成行；也正是为此，卢恰诺才从丹内莫拉被转移到了科姆斯托克，远远避开了匪徒们贼亮的双眼，因为这些人会从这类会见中做出错误结论……

卢恰诺只好洗耳恭听长长的来龙去脉了。原来是这么回事：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突袭了位于夏威夷群岛的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消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同一天，日本人又在美国的南亚殖民地——菲律宾登陆。接着，12月11日，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也向美国宣战。

这一来，美军便面临着一个完全料想不到的问题：具有本国一些最大港口的长长的美国东海岸处于暴露地位，并无法防御在大西洋航行的希特勒潜艇的攻击。除此之外，在美国长期居住着数万名德国人，其中很多人参加了“美德联合会”。这个组织同民族社会党的国外部保持着紧密合作关系。这个联合会的一些成员可以组成亲法西斯的怠工集团，他们都活动在联结着东海岸港口和欧洲战区的交通生命线上。这些法西斯喽罗积极卖命的证据相当充分。当1942年2月，在纽约曼哈顿码头，改装为军用运输舰的法国轮船“诺曼底号”失火后，负责调查此事的美国海军情报局反间谍处的海军少校查尔斯·雷克利夫·哈芬登当即毫不犹豫地确认，这场大火是破坏活动造成的。

在军事情报局供职的捕捉黑手党的猎手

纽约作为向大不列颠岛和非洲战区调遣军队，供应技术装备和补给弹药粮食的中心，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使其不可能不成为敌方情报机关活动的适宜地区。当然，美国各种不同反间谍机构也都在纽约的摩天大楼里建立观察哨，从早到晚注视着海面，极力要发现敌人的潜艇。

然而美国不仅仅是同法西斯德国处于战争状态，另外还有意大利。而要在那里装卸军事技术设备和人员的纽约港，多年来一直被“我们的事业”联盟所把持。人所共知，领导这个组织的全是意大利人。

美国反间谍机构面临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的严峻任务。解决这一似乎是简单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要在服务行业安排任何一个职位，都必然参加相应的工会。可是怎么样打入这些几乎全由黑手党秘密控制的工会组织中去呢？

海军第三军区参谋部很快搬进离码头不远的教堂大街九十号“乌尔沃特”百货公司的摩天大厦里，随之而来的还有美国海军情报局。这一来，东海岸反间谍机关所有各条线都汇集到了这里。同反间谍人员在此一起工作的，还有一批不久前才应征入伍的原律师事务所、警察局和检察机关的公务人员。其中有杰姆斯·欧马利中尉和安托尼·马斯洛乌少校。他俩战前在纽约区检察官弗兰克·霍根办事处工作。这位检察官被认为是著名的黑手党事务专家。不过，这一行工作的特点是，凡在纽约从事调查“我们的事业”罪行的人，迟早都要走到一个尽头，到此所有踪迹犹如消失在无法通行的矮小稠密

的灌木丛中。这个尽头就是《噤口律条》。

1942年3月，刚刚提升为海军情报军官的欧马利和马斯洛乌同自己的前上司霍根一起，坐在讹诈研究专家米欧里·加芬的办事处里，后者于1936年曾为了让卢恰诺坐牢费过不少气力。欧马利和马斯洛乌详细介绍了他们工作中碰到的困难，谈到不能有效地控制纽约港口等问题。当时参加这次会见的，还有上述两名军官的顶头上司罗斯科·马克福。在大家对各方面的困难讨论之后，立即开诚布公地说：“老实说，咱们的处境极其困难。可是时间又很紧迫，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要达到目的，就不要顾及手段了。”

检察官霍根当即明白了马克福话中暗含的意思，于是说道：“我们将把我们所掌握的，有关您感兴趣那件事务的一切情况，比如情报，涉及黑社会的关系网等，立即转交给您。”

“我毫不反对从黑社会的代表手里得到情报。不过这样做明智吗？能不能相信这些人呢？”马克福颇有疑虑地说，“而且他们是否会同意帮助我们呢？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人已经给我们找了不少麻烦。可这些昔日的酒类走私分子会不会利用他们的丰富经验，当然为了很高的报酬，建立起海上联系呢？”

霍根为了让他放心便说道：“我深信在这些意大利裔的敲诈分子中间，有很多人是忠诚的美国公民。根据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这些人一点也不尊重墨索里尼。”接着这位区检察官详细谈起在墨索里尼攫取政权并建立法西斯制度之后，西西里所发生的事情。

墨索里尼向黑手党进军

早在20年代初，贝尼托·墨索里尼手下的一群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头目，就在地中海这个长满橙子树的小岛扎下老营。当时黑手党的公爵老爷们对法西斯分子怀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黑手党人赞同法西斯分子对为争取社会进步而斗争的那些西西里人采取的肆无忌惮地恐怖手段；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意同墨索里尼的支持者分享岛上的权利，当然更谈不上让出大权。起初，黑手党人对法西斯分子还颇为尊重，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冲突，相反，还尽可能地帮助他们。

还早在墨索里尼执政之前，法西斯分子曾请求维拉尔巴城的黑手党头子卡洛杰罗·维茨尼，把他们的一个同志藏在他家里。当时这位已被西西里黑手党领袖维托·卡肖·费罗先生定为继承人的“皇太子”维茨尼，很乐意地答应了这一请求。他所藏的那个法西斯分子犯了在黑手党里被认为是无所谓的罪行：杀死了自己的政敌。而且这个法西斯分子也没有忘记维茨尼对他的效劳。

此外，黑手党还颇有远见地捐献一笔钱，赞助墨索里尼及其信徒于1922年10月28日组织的“向罗马进军”活动。“进军”方案经过了周密思考。思想反动的军官团、意大利大资产阶级教会中的老爷和王室都支持黑衫党①人的这次行动。所以无论军队和警察都阻止不了这个未来的法西斯独裁者。12

① 意大利法西斯党徒。

月31日意大利国王维克托·埃马努依三世任命墨索里尼为政府首脑。同法西斯专政的建立结伴而来的是一股恐怖浪潮，它不仅迫害工人阶级和意大利共产党，而且也对农民施以暴虐。法西斯分子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仅1923年纪录在案的，就有369起之多。

法西斯政府一上台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就表明了墨索里尼独裁政府是个什么货色：取消5月1日公假日，降低国营企业工人和职员薪金，废除奢侈品税，保障银行储蓄和工业企业股票的秘密，撤销可以占有荒地的法令，提高小麦进口税并宣布全面废除和土地承租人签订的一切合同等。

最初，罗马新上台的统治者很少想到西西里的黑手党。在西西里象以往一样，如传言所说：“在西西里有三个政府：罗马政府、地方政府和黑手党。但必须无条件服从黑手党，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只要法西斯分子敢于侵入黑手党的世袭领地，黑手党徒就干掉他们。可与此同时，黑手党人又随时准备完成法西斯分子委托的任何犯罪活动。比如，1924年6月，遵照墨索里尼的指令，黑手党徒阿梅里科·杜米尼杀死了社会党人领袖加科莫·马泰奥蒂。因为后者在议会发言揭露了法西斯分子的罪行，他谈到了1924年4月大选时，法西斯分子策划的那场前所未闻的恐怖活动，致使37%的选民未参加投票；此外，尚有25%的选民投票反对法西斯党。可是尽管如此，墨索里尼仍一口咬定他是代表全民进行统治。

然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个法西斯独裁者从未想到在西西里要同黑手党分享自己的权利，正如同，黑手党也绝不打算屈从于墨索里尼那样。冲突酿成了。1924年墨索里尼准备访问西西里。在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墨索里尼的支持者

要为这个法西斯独裁者举行一次热闹非凡的欢迎仪式。当时，安全保卫部门的人员只考虑一件事，就是别让黑手党搞出什么不愉快的事。后来，他们的担心很快就中止了，因为墨索里尼突然心血来潮，要去访问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城希腊平原镇。这位元首在一本旅游指南上看到，这里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古希腊教堂，而且这里至今仍保留着古阿拉伯的民俗。15世纪阿拉伯人的先祖在这里逃避了土耳其人的统治。

在这个被上帝遗忘了的小城里，专横的市长奇丘·库恰执掌着一切，当地居民都尊称他为奇丘先生。

虽然奇丘担任着公职，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他还领导着当地黑手党组织。关于这位虚荣心不亚于墨索里尼的奇丘先生，人们象传诵神话似地谈到，在法西斯元首到来的前一年，即1923年所发生的一件事。这一年，意大利国王维克托·埃马努依三世曾在这个小地方停留过几小时。在国王全家参观教堂时，奇丘就在国王的身旁。当时陛下还没来得及扭脸，有人已经把一个新生婴儿塞在了他的手里。于是当国王离开教堂时，他已经成了希腊平原镇黑手党首领奇丘先生儿子的教父。而奇丘先生除了有幸享受了有关宫廷礼仪的荣誉之外，还从王室获得一枚意大利的最高勋章——骑士十字勋章。

希腊平原镇是对自己悲惨命运十分不满的西西里农民奋起斗争的中心，1893年在这里曾发生过一起西西里最大的农民起义。这一切使法西斯安全保卫部门十分不安。

墨索里尼访问希腊平原镇时，使用了市长的小汽车，奇丘先生就坐在独裁者的旁边。

当汽车两侧排开摩托护送队时，奇丘先生以挑战的口吻

对墨索里尼及其随从大声说道：“怎么回事？为什么两边有这么
多警察？跟我坐在一起，你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在这儿
我是主人！”

这种放肆无礼使元首刹那间丧失了自己能言善辩的才能。待镇静后，他愠怒地命令保卫部门的护送队仍然照样护送他们前进。

这一来，奇丘先生感到自己蒙受了极大侮辱，认为这打击了自己的威信，于是他便以自己的方式回敬了这位意大利法西斯头子。为此，元首当然不会对他宽恕。事情是这样的：当墨索里尼登上装饰华丽的讲台，要向全城居民发表事先写好，而且经过排练的演说时，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在广场上仅有几十个他的支持者，其他居民都抵制来听独裁者的演说。不言而喻，这是奇丘先生关照过的。

在猜想这一切都是“荣誉社”干的之后，墨索里尼的愤怒简直不可名状。他不再向城市父老发表事先准备好的庄严的演讲，而是气得浑身打颤，扬言一定要完全、彻底地消灭黑手党。这一来，发生在希腊平原镇的这件事，就成了“荣誉社”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公开战争的起点。

奇怪的暗杀统计数字

返回罗马，墨索里尼召见了以特别残忍和野蛮闻名的警察首脑切萨列·莫里，命令他把黑手党一网打尽，斩尽杀绝。与此同时，墨索里尼没有忘记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救星。他说：“访问西西里期间，在隆重的集会上，面对庞大的热烈欢迎我的人群，我发誓一定要让善良的西西里人民摆脱

黑手党的罪恶阴谋。”

意大利北方人切萨列·莫里开始动手让他管辖的警察机关全力投入工作。作为一个顽固的法西斯分子，他是恐怖、拷打和杀戮这样一些经过验证的手段的拥护者。他下达的第一道命令，就是逮捕敢于对元首放肆无礼的奇丘先生。为此，莫里耍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花招。他给那位希腊平原镇的镇长和黑手党首领寄去一份请柬，邀请他参加鸡尾酒会。这一来，身穿高级节日盛装的奇丘便进了西西里臭名远扬的乌恰尔多内监狱。

其实，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的警察头子，在后来同黑手党的斗争中所使用的手法，并非什么特别的花样和奇招。根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一谚语，莫里不仅在自己的活动中广泛使用了黑手党的犯罪手段，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又将其进一步发展，超越了原来的范围。他明目张胆地多次下令把一些西西里人（有罪也好，无罪也罢）送交法西斯司法机关处理。昔日西西里在其控制下蒙受那么多苦难的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又在这个海岛上复活了。用鞭子沾上盐水抽打脊背，拔手指甲，如今又加上了现代化刑具——电休克器。被“揭露”为黑手党的西西里人，或者被判处死刑，或者惨遭监禁，或者戴上镣铐被驱逐到地中海上的乌吉克岛和利帕里群岛，这里是法西斯的大型集中营。

除了实行大规模的恐怖手段之外（顺便说一下，为此受难的无辜西西里人比真正的黑手党分子还要多），当局还采取了简直是可笑的行动。比如，切萨列·莫里下令把西西里居民院子的围墙一律都降低到90公分。他把此决定的理由解释为，“荣誉社”的凶手经常躲在墙后边等待自己的牺牲品。

1929年意大利警方的这个首脑胜利宣告，法西斯分子终于全面战胜了黑手党。他们似乎是干了一件历届政府都没能干成的大事。而且这个胜利宣告是有极具说服力的统计数字做后盾的：1922年在西西里发生223起暗杀事件；1923年为224起；1924年为278起；1925年为268起；1926年为77起；1927年为37起；1928年为25起。而1929年仅有一起。

后来所做的调查确认了所有西西里居民都知道的另一种情况：切萨列·莫里的统计数字是杜撰的，这些数字大概是为了给法西斯分子的血腥屠杀作辩解。

后来意大利统计局(根据不完全的数字资料)确认，1925年黑手党至少制造了823起杀人事件。即使在黑手党显然要谨慎从事的1929年，黑手党搞的杀人事件也不少于124起。可是，有关黑手党罪行的这一统计数字显然不合独裁者墨索里尼的心意。因为这证明了政府在同黑手党的斗争中十分无能。这个意大利法西斯头子颇为自负地把这场“反黑手党”行动形容为“靠手术刀的决断动作进行的一次大胆的外科手术”。这是一篇满溢动听言词的讲话。法西斯分子广泛策动的血腥行动事实上的惨败，全被这些言词所美化遮盖。在这篇讲话里，墨索里尼大谈什么对黑手党的“彻底胜利”。然而，即使使用恐怖手段，法西斯政权也未能砍断“杂草”的根。相反，反黑手党行动与其说打击了有罪者，不如说打击了无辜之人。因为凡是家里有大刀和长剪子，都成了法西斯分子将其拥有者判处长期徒刑的充分证据。在这种气氛下，趁机和自己仇人算帐的告密行为便泛滥起来了。

很多有影响的黑手党人都通过一种很简便的方法逃脱了莫里的打击；这就是参加法西斯党。还有另外一些“荣誉社”

的领导人开始和法西斯党的上层人物紧密共事合作。当然后者就保护他们不受莫里的追究。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在墨索里尼的行政官员帮助下纷纷逃往北非和美国，当然没有一个是法西斯制度的拥护者。

被人尊称为卡洛先生的卡洛杰罗·维茨尼根本没有被警方触动。以前因杀死政敌曾在他家躲避警方缉捕的那个年轻的法西斯分子，此时已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他以恩报恩保护了这个西西里未来的黑手党领袖。所以卡洛先生刚一被捕马上就恢复了自由。

维托先生离开王位

在“反黑手党”行动时期，几乎所有的黑手党头头都逃脱了警方的打击，但只有一人例外，这就是西西里黑手党的无冕王维托·卡肖·费罗。在逮捕他时，其本人罪行除了1909年打死美国警察局中尉乔·彼得罗西诺之外，还有大约二十条人命。这个长了一脸又宽又密苍白胡子的维托先生，走起路来总是尽量显得矜矜庄重，俨然一副尊贵老爷的模样，就连服饰也同这种矫揉造作的举止颇为相衬：头戴宽边礼帽，身穿雅致的常礼服，里面露出细褶的衬衫，领口再扎上一个蝴蝶结；每逢打猎，他总要穿上当时最时髦的马裤。除此一切，这个海岛的匪首还是一个热心的天主教徒，每逢礼拜日总模范地准时出现在本教区的教堂里。

公爵和男爵，议员和实业家，都把应邀到这位黑手党首领的巴勒莫古老宅第去赴宴，视为荣耀。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看起来象一个十足贵族的怙恶不悛的罪犯，实际上

斗大的字不识一升，只能勉强在纸上写下令人费解的签名。不过老实说，这并不影响维托先生掌握有一座地下印刷所，在那里能以非凡的技艺印刷任何文件。

1929年墨索里尼下令组织法庭审判西西里黑手党头子维托先生。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未进行公开审判，大概是这位独裁者想通过对“荣誉社”的领袖维托先生的定罪，向尚未消灭的黑手党挑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大概就无须谈什么会影响作出儆戒性判决的“证据不足”问题。至于对其公务人员已习惯于违背良心行事的法西斯审判机关来说，要执行类似的指令是不费很大力气的。但实际上已经搜集到的，对这个怙恶不悛的匪徒不利的证据，只够指控他犯有轻微的违法行为。可是正如美国司法当局昔日仅以逃避所得税指控了阿尔·卡帕内一样，法西斯意大利的忒弥斯^①也指控维托先生犯了走私罪。可能这是他累累罪行中最轻微的一项罪行了。

对所发生的一切态度漠然的这位“荣誉社”的首领，耐心倾听着起诉人的发言，偶尔向他们投去一瞥极度藐视的目光。而当检察官要求对被告处以长期徒刑时，维托先生在审判过程中第一次打破沉默。在大厅死一般的寂静中，他说道：“先生们！既然你们不能证明我犯有严重的违法行为，那么你们就是根据我从未犯过的罪行来对我进行判决！”

继上演了剥夺维托先生四分之一世纪所高踞的“荣誉社”王位的这出戏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把他囚到了以凄惨著名的巴勒莫乌恰尔内多监狱。不久，这位黑手党领袖因心脏病而

^① 忒弥斯(Themis)，希腊神话中掌管法律和正义的女神，季节女神与命运之母。

死于狱中。

但是，这个有影响的黑手党人的权势和不容置疑的威望，仍在一米厚的狱墙后面发挥着作用。囚犯们都毫不推诿地为这个“荣誉社”的领袖打扫囚室，收拾床铺，对他的要求唯命是从。至于那些起初对这位已判了刑的先生不够尊重的看守们，在这位先生对典狱长打了招呼之后，也都立即改变了态度或者干脆被调走。

法西斯政权反黑手党斗争的一切行动都失败了，尽管墨索里尼1934年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吹牛说：“黑手党已不复存在，它终于被消灭。我们已经把它从地球上清除掉了。”

西西里的黑手党人暂时隐蔽起来并在美国“我们的事业”的朋友们的帮助下，在一个“新世界”积蓄力量，以便尽快在古老的宗主国恢复自己的政权和威望。

同索克斯会晤

1942年3月的一天，以查尔斯·雷克利夫·哈芬登海军少校和欧马利中尉为代表的美国海军情报局，同以检察官弗兰克·霍根为代表的司法机关的合作开始了。霍根向情报局提供的第一份情报，是警方掌握的，活动在港口地区几乎是所有匪徒的名单。下一步要做的是，从这些匪徒中弄清楚谁是头头。因为问题很明显，只有在得到“我们的事业”联盟的首领们批准的情况下，才能指望同匪徒合作。

哈芬登最关心的是渔民。因为他们有可能乘坐自己的小船，偷偷地给航行在美国海岸的法西斯潜艇传送战略情报、给养，甚至燃料。为此，首先必须防范这种随意发生联系的

可能性。但是所有渔船和快艇象一条线似的，都直接归拢于曼哈顿的富尔特诺夫鱼类市场，更准确地说，都归属于一个人，是他控制这个市场几乎已有十年之久。此人是“荣誉社”的一个族长，名叫约瑟夫·兰茨，也叫索克斯·兰茨或乔·索科斯。这个富尔特诺夫鱼类市场是美国最大的鱼类市场，年交易额为数亿美元。一些渔业公司从这里把货一直运到印第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

兰茨依仗组织完善的敲诈体系，控制着这个市场。渔业商人不仅向他缴纳“保护税”，而且对他的一切要求绝对从命。兰茨还是鱼类批发商联合会的会长，他手下的人在市场保卫人员联合会和渔业工会中都是头头。总之，凡是同鱼有关的人都要听命于兰茨，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早自30年代初，他手下的匪徒就向这个市场发起进攻：殴打鱼贩和顾客，砸坏卡车和柜台，还往货物上扔化学弹。

研究敲诈的专家加芬建议哈芬登先同兰茨的律师约瑟夫·丘林谈谈。这位律师仔细听完哈芬登的来意之后说：“我相信，我的委托人一定会帮您的忙。”会见结束时，哈芬登让丘林放心并强调说明，兰茨对办此事所做的一切，将不承担任何后果。他所提供的必要帮助，完全是出自爱国主义感情。

几天之后，丘林律师通知说，兰茨同意会面。当然，无论如何不能在区检察官事务所。他对此的解释是“如果我手下的某个人一下子发现我在这个事务所，他的脑子里立即会产生一种想法，这一想法会导致违背我心意的后果”。

就这样于一天夜里，在百老汇和一百零一大街拐角处停了一辆出租汽车，有两个人等到了一位乘客，然后一起沿着赫德森河朝下游驶去。这三个人是加芬、丘林和兰茨。加芬说

明了情报局的打算，并激励这个匪徒的爱国之心，最后还强调指出当时他们所处的困境。对此，兰茨保证说：“我尽力帮忙，力求做到我所能做的一切。”

几天之后，在旧式的“阿克脱”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海军少校查尔斯·哈芬登和匪徒约瑟夫·兰茨一起商讨了共同合作的细节。兰茨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这位海军反间谍处的军官，以便随时商讨一切必要事宜。可是，参加这次会见的人当中，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此时纽约检察机关已安排开始审理控告兰茨的刑事案。与此相关，警方也获准监听打给这个黑手党分子的一切电话内容。而当窃听到兰茨同海军反间谍处之间隐约露出的、听不懂的暗语和代号的谈话时，警察们起初简直都目瞪口呆了。

哈芬登一直对同渔类市场上的这个有影响的黑手党人达成的协议极为满意。在兰茨的保护下，每条渔船上都安排了反间谍处的人员。这些携带着无线电发报机的间谍，很快就将所发现的任何一艘敌方舰只报告给反间谍处。这一招很快就显示出后果，同敌人潜艇的斗争变得更富成效，带有护航舰的船队通行起来更有信心而且损失甚微。

眼前摆在海军反间谍部门面前的任务是，采取措施，加强对纽约船坞的保卫。于是哈芬登又一次去求助于约瑟夫·兰茨。可是这一回，这个讹诈分子却迟迟不作回答。渔业这一行是他的领地，可是船坞则非他的权力所能及。这是阿尔贝特·阿纳斯塔吉亚的势力范围。不过，兰茨和阿纳斯塔吉亚是好朋友，这个问题可以很快安排。可是自从美国参战起，这位“暗杀团”的首领阿纳斯塔吉亚就从纽约消失了。他作为志愿兵参加了美国军队，应该说，在那里找到了施展自

己才能的机会。当地方警察机关由于“里尔斯案件”正在缉查阿纳斯塔吉亚的时候，他却已安然无事地成了军事警察机关的一名中士了。

知道阿纳斯塔吉亚暂时“被迫”消失这件事底细的那个黑手党人，兰茨不认识。所以他通过自己的律师对哈芬登说：“我只干鱼类买卖。一切不属于我这一行的事情，我都管不了。不过，有一个拥有无限权威的人，只要他说一句话，事情就一定能成功。”

查理说：“OK”

律师把兰茨的话准确地转达给了哈芬登，同时又补充说：“要帮助你们，我的委托人必须要查理说声‘OK’！”

“查理？”哈芬登不知说的是谁。不过，反间谍处的工作人员给他作了解释，就是说必须得到查尔斯·卢恰诺的允许。

起初哈芬登认为这只不过是小事一桩，但很快他就深信事情要复杂得多。卢恰诺如今正在因管教特严而使匪徒不寒而栗的丹内莫拉监狱服刑，在监狱图书馆劳动。由于他有钱有势，犯人中甚至有人为他效劳出力。反间谍处人员突如其来的拜访可能引起卢恰诺同狱伙伴的怀疑，所以必须另找一条途径。

应哈芬登的请求，加芬拜访了卢恰诺的律师、罗马尼亚移民莫塞斯·波拉科夫，并很快就同此人找到了共同语言。而更为有利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波拉科夫也曾在海军服役。不过老实说，波拉科夫对海军反间谍处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所以他说：“我同卢恰诺并不十分熟，只不过是在案件

审理过程中为他作辩护。不过，我知道有个人在这方面可以帮忙。这个年轻人早就认识卢恰诺，而且是他的好朋友。他可以就卢恰诺是否愿意参加你们这场戏，给你们作出一个切合实际的建议。”

于是在纽约一家豪华的大饭店举行了会见。波拉科夫指着同自己一起来的那个满头黑发、身材矮壮的男人介绍说：“加芬先生，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一下，这是迈耶·兰斯基先生。”

这一切对区检察官加芬犹如晴天霹雳。在这家豪华饭店他将要同个臭名昭著并极其险恶的匪徒秘密对话。而且这个匪徒之所以至今逍遥法外，是由于审判机关虽竭尽全力却拿不住他犯罪的证据。可是加芬有什么办法呢？眼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呀！

兰斯基对此事持乐观态度。他说：“既然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把查理同古老的家乡联系在一起，他肯定会帮忙的。如今，他已经没有任何亲人留在西西里，全家都在美国。”兰斯基也认为丹内莫拉监狱不是一个同卢恰诺会谈的合适地点。那么眼下，其余一切事宜的准备工作就靠海军情报局安排了。

哈芬登给纽约州监狱负责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鉴于要进行一次秘密行动，海军当局请求协助把在丹内莫拉的克林顿监狱服刑的查尔斯·卢恰诺转移到科姆斯托克监狱。为了要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由海军反间谍处的特种人员对其进行审讯，将其转移是必要的。阅后请把此信立即焚毁。”不言而喻，如此秘密的信件是不能通过邮局寄送的，所以由两名通讯军官直接送交给了收信人。此人一读完信，当即就销

毁了。

上述一切就是突然把卢恰诺转移到另一个监狱以及波拉科夫和迈耶·兰斯基更为出人意料地来这里拜访的来龙去脉。当卢恰诺从惊诧中清醒过来之后，两个拜访者对他说明了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种种事件，兰茨如何帮助了反间谍处以及后来工作中又遇到了那些困难等。“我们希望你帮助一下海军。”兰斯基说。

幸运人点头说：“OK！我同意帮忙。”稍加沉思之后，他又补充说：“从丹内莫拉把我转移到这儿的那一天，我听到流言，说要把我驱逐到意大利去。如今谁也不知道这场战争的结果如何。假设有朝一日真的还把我驱逐到意大利，万一那儿都知道，战争期间我曾帮助过美国海军，那我可就不会有好果子吃。所以，对我所做的一切必须严格保密，任何人都不得知道这件事。”

“当然啦！”波拉科夫向他担保说，“凡是参与这件事情的人都绝对要守口如瓶。情报局的人都善于缄口默言。”

“这样的话，我同意。”卢恰诺最后说，“让乔·索克斯来我这儿一趟，我告诉他，需要同谁联系、商量以及如何行事。”

三周之后，卢恰诺再次被带到会见室。这一回除了波拉科夫和迈耶·兰斯基之外，还有索克斯，即约瑟夫·兰茨。兰茨再次向卢恰诺详谈了眼前的局势：“情报局要求我做一件我办不到的事，因为我同必要的有关人员不认识。不过只要你愿意，事情准能办成。”

“OK！”卢恰诺应声回答，“告诉他们我同意。就我来说，关心的是让他们从其他渠道知道这件事。”

兰茨决计吸收控制着布鲁克林码头的卡马尔多兄弟参与此事。埃米里奥·卡马尔多在黑手党的影响下被选为国际码头工人工会的副主席。从此在这个组织里，“我们的事业”靠集权恐怖统治着一切。要让反间谍处能对布鲁克林港进行监视，必须要得到卡马尔多的允许。

“你去找乔·阿多尼斯和弗兰克·科斯泰洛”，卢恰诺吩咐说，“告诉他们，就说我不反对这样做，阿多尼斯会告诉你卡马尔多需要什么。”

从这天起，对科姆斯托克的这种秘密访问每两周都要进行一次。非常奇特的探视者总是突然来到这里，而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从何处而来，然后又到何处而去。这是卢恰诺提出的主要条件。他提出，在黑手党同反间谍机关共同合作的过程中，决不许警方以任何方式了解“我们的事业”联盟支系庞杂，遍及各地的组织网的情况。知道参与此事的黑手党人名字的只有波拉科夫，但此人是权力无限的卢恰诺的律师，而且善于保守秘密。此外，每次拜访都少不了迈耶·兰斯基，而他知道的东西比波拉科夫还要多。可是，兰斯基是卢恰诺的直接联络人，他负责把卢恰诺的指令传达给需要传达的人。要知道，也正是由于他同这位权势极大的卢恰诺的友谊和在“六家大型联合体”的合作共事，他才在黑手党的圈子里获得无限的信任。平时，只要他向谁说一声，幸运人请您如何如何，人们便都对他无条件服从。

玻璃纸下的西西里

无论黑手党，也无论海军反间谍处，双方各自都采取了

严密的防范措施。每个匪徒或黑手党成员都得到了一个代号，以此严严实实地掩盖了犯罪分子的名姓，避开警方耳目。此外，为了万无一失，黑手党徒和自己先生之间的谈话一律都改用西西里方言。这一来，每当谈话时，不会说这种方言的波拉科夫律师便坐在角落里看报。

在哈芬登少校看来，同卢恰诺的合作是一件很有远景的事情，尽管他远远不想，那怕是粗略地了解一下美国黑手党的规模及其影响的范围，但是他毕竟发现，对这个组织来说，不存在什么办不到的事情，极为复杂的间谍事务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有了头绪，而且不仅是在东海岸，而是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的事业”的手伸得远而又远，甚至越过了大西洋。

1942年夏天，海军情报局接到华盛顿的命令：年底前准备把美国军队调往北非，以便支援在利比亚作战的、蒙哥马利统率的英国军队，接着计划美军在意大利登陆。

到了年底，又下达了一条命令，要求搜集美国总参谋部所需的一切有关西西里的情报。为此，在海军情报局里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国外情报处，并任命哈芬登少校为该部门的领导人。不言而喻，哈芬登心里很清楚，他手下来自黑社会的不少联系人和暗探都出生在西西里并在那里有亲戚。一般说来，他们都对墨索里尼没有好感。

情报局对地形资料和有关港口、桥梁、河流、山脉、水源、交通和村落方位等情报都感兴趣。此外，还必须找到一些愿意对美军登陆给予支持协助的西西里人，为此，还需要去请教卢恰诺。

情报局面临的第一项任务很快就顺利完成了。一幅挂在

哈芬登的“国外部”的西西里岛的大地图上，罩上了一张玻璃纸。制图员把黑手党人提供的一切情报都标在了玻璃纸上。

可是要完成第二项任务，却要费时颇多。卢恰诺下令把这件事转告给乔·阿多尼斯。这个黑手党分子为了掩护自己的犯罪活动，开了一家买卖兴隆的意大利饭馆，在这里黑手党分子们可以吃上他们喜欢的本民族菜肴。就是这个阿多尼斯给卢恰诺出了个主意，让温琴佐·曼加诺参与此事。

温琴佐·曼加诺是“我们的事业”联盟最高理事会成员，一个黑手党家族的族长。为了掩护自己的主要活动，他在纽约开了一家进出口事务所。他同西西里保持着组织得非常出色的联系，所以在接到卢恰诺的请求之后，他就同西西里至高无上的黑手党领袖卡洛杰罗·维茨尼挂上了钩。至于在二次大战期间，他是通过什么渠道实现了这一点，至今仍无人知道。

至于维托·杰诺维塞先生在这件事情上起过什么作用，时至今日仍是个谜。1939年在逃往意大利之前，杰诺维塞把领导权交给了自己家族的弗兰克·科斯泰洛。很明显，这同科斯泰洛应卢恰诺请求开始同哈芬登密切合作有关。虽然墨索里尼开展了“反黑手党”运动，但杰诺维塞仍平安无事地在罗马定居。

根据警方所掌握的情况，维托·杰诺维塞先生在二次大战期间一直同美国保持有可靠的联系渠道。如果确有这一联系，那就可能是双方的。那么是不是就是通过这一渠道，卢恰诺把那件事转达给了西西里“荣誉社”的那个首脑了呢？

“母牛”和“马车”

这是历史上真正的闪电战！

摘自美国将军乔治·巴顿关于1943年夏天美军第七集团军进驻西西里的谈话

1943年7月14日早晨，一架美国海军侦察机朝西西里的维拉尔巴城飞去。这架飞机在紧靠山坡的一块空地上空盘旋了五分钟，然后机身下打开一个小降落伞。可是气流把降落伞远远冲到一边，落在了维拉尔巴城外，被一名意大利士兵捡到。降落伞上吊着一个尼龙袋，里面装的是一个黄色绸方巾，上面画着一个黑色大写字母“L”。字母后伴之以花哨的签字字尾。

毫无任何疑心的士兵把他捡到的这一奇怪物品交给了上级，而后者也不知道，这令人费解的方巾是怎么回事。不过他明白，敌机扔下的这个包肯定不是为了给他们两个人。

侦察机驾驶员朝西西里南海岸转了一圈后，发现降落伞飘进了山谷。第二天，即7月15日，美机再次冒险飞行。这一回，侦察机飞得很低，掠过维拉尔巴市平平的屋顶。第二次用降落伞投下的小包落在离教堂不远的地方。当侦察机在山后消失时，一个一直在注视着这架飞机的黑手党徒从降落伞上解下小包，飞快地跑到克利斯比大街，去找自己的首领

卡洛杰罗·维茨尼，或者象人们尊称的那样，——卡洛先生。在维托·卡肖·费洛死后，这个维拉尔巴城的黑手党头子登上了“荣誉社”官阶的最高层，此时西西里黑手党的首府就在这个宁静的小山城。

卡洛先生和他的前任维托先生一样，也是文盲。但他却毫不费劲地认出了大写字母“L”。这是无所不能为的美国犯罪分子康采恩“我们的事业”联盟的盟主、幸运人卢恰诺大名的第一个字母。也真是奇怪的巧合，卢恰诺的出生地莱卡尔·弗里吉就在连接维拉尔巴和巴勒莫的一条主要公路的一侧。

卡洛先生也有自己的代号标记，不过，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使用，而且这个代号对其持有人，其威力相当于咒语：“芝麻，芝麻，开开门！”他的代号标记也是一个黄色绸方巾，上面用黑笔写着一个字体不漂亮的大写“C”（Calo）。

关于交换这种标记暗号，社会公众最早是在1922年知道的，当时一个叫洛罗的维拉尔巴黑手党徒，不顾风险杀了人。作案后，他没打算用什么方法来掩盖罪迹，而且更糟糕的是，他这样做违反了“荣誉社”的规定。可尽管如此，卡洛杰罗·维茨尼还是保护了这个凶手，而且这样做，首先是因为不愿丧失一个维拉尔巴最有影响人物的威信。他吩咐手下人宣称这个不听话的黑手党分子是个精神病患者，然后把他送进疯人院，而那里的大夫全是黑手党人。不久，他们就给了此人一个“正式死亡”的机会，并按规矩向其亲属证实此人已死，然后“死者”被安放在一个钻有透气孔的棺材里。可是，灵车并没有去墓地，而是径直朝巴勒莫港口驶去。在那里“死者”即那个凶手，跳出了棺材，拿到假护照和一个带有大写字母“C”的黄色绸方巾。凭这块黄方巾，就可以打开“我们

的事业”联盟中那个“大人物”的大门。

20年之后，1943年7月15日，卢恰诺反过来也使用了黑手党的秘密暗记。在它的帮助下，他向自己的西西里“兄弟们”提出请求，让他们协助美军进驻西西里。就这样，卡洛先生在7月15日，也就是在英国——美国——加拿大联军在西西里南部海岸登陆的前五天，收到了自己的朋友和同伙卢恰诺的预定暗记。

“爱斯基摩人”行动

进军西西里的问题，是西方同盟国于1943年元月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决定的。在此之前，地中海前线对二次大战进程的影响仅居于次要地位。对此，美国和英国政府是一清二楚的。

1943年夏天，意大利法西斯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可是希特勒此时也已经无力给自己罗马的仆从实际的帮助。当时，在最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区，即苏德前线，正展开争夺库尔斯克的激战。德国法西斯自己也非常需要各方面后备力量的支援。

此外，西方大国对意大利北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深感不安，焦急万分。因为他们担心——尽管这种情绪是反常的——已经在前线惨败的法西斯政权会在人民解放运动的冲击下倒台。当时，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抵抗阵线日益壮大。在其领导下，1943年3月，在意大利的一些工业城市掀起了强大的罢工浪潮。墨索里尼专政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而法西斯意大利垮台之后，什么力量将主宰这个

国家命运这一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伦敦和华盛顿的政客们。

1943年8月5日，当西西里这个西方大国登上欧洲大陆的独特跳板，被完全占领之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了一封极为有名的信，其中写道：“意大利一夜之间变成了红色，国王及聚集其周围的一群掌握政权的爱国者，无力抗拒在他们国内日益强大的布尔什维克。”

所有上述看法成了西方大国策划“爱斯基摩人”行动的基因，而其最终目的是要占领这个地中海小岛。与此同时军方还颇有远见地事先求得了“我们的事业”联盟的协助。他们的口号是：意大利——当然也包括西西里——无论如何都不应被“赤化”。

1943年7月10日，乔治·巴顿将军统率的第七集团军在杰尔和利卡特登陆；而蒙哥马利元帅指挥的第八集团军，则在西拉古扎和帕金诺踏上海岛。他们以一倍半的兵力，四倍的坦克和七倍的飞机之优势压倒了意德联军，还不算海军的强大优势兵力。

但尽管在兵力和技术装备上占有极大优势，可是盟军仍遭到出人意料的，在制定行动计划时未曾虑及的种种困难。比如，空降兵运输机把伞兵投到了离海岸甚远的地方，结果其中很多人淹死在大海之中。

英国和加拿大军队在登陆后应当首先占领西西里东海岸，然后向海岛的北部推进，直取墨西拿海湾。可是1943年7月30日，他们的进攻在卡塔尼亚地区被德军坦克师所阻止，于是英军指挥部决定从北非调运一个空降旅来加强盟军的力量。但是，当这一群运输机飞临姆·洛吉波科角时，落入

了密集的阻击炮火之中。原来这是英国的高射炮连由于误会朝飞机开了火。为此，十一架飞机被击毁，剩下的那一部分由于通不过炮火封锁线而返航。

在蒙哥马利元帅领导下，英国和加拿大军队向西西里的进军拖了五个星期，只是在经过数千人丧生的浴血奋战，才终于战胜了法西斯分子的顽抗。

与此同时，美国巴顿将军率领着自己的军队，沿着很难通过的地区向前推进，根据盟军的意见，他还要完成更艰巨的任务。他的军队应当占领岛上多山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包括巴勒莫。而在美军前进道路中，特别难以通过的地区是离维拉尔巴和穆索梅利不远的卡马拉塔山口要塞。

可是，令人大为吃惊的是，美军竟然在七天之内能抵达巴勒莫，中途没有发生任何大的战斗，也没有遭受重大损失，尽管7月15日他们实际上还在原来的出发地。

当人们要求艾森豪威尔将军评述一下这次闪电行动时，他借口军事秘密，只是含意模糊地敷衍几句，说什么似乎是“总参谋部掌握了战略情报”。至于真实情况，还是在多年之后，世人才知其内幕。

骑马的信使

在收到带有黑体大写字母“L”的黄色绸方巾之后，卡洛先生下令把自己当神甫的哥哥找来。这位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的西西里黑手党头子口授了一封致朱塞佩·真科·鲁索的信。在黑社会，一提真科·鲁索，几乎尽人皆知。他是离维拉尔巴不远的穆索梅利镇的黑手党头头，当时，根据其权

势和影响，被视为西西里黑手党的第二号人物和卡洛先生的接班人。

在这封信中写道，7月20日“母牛”（即美军士兵）和“马车”（即坦克）将要抵达维拉尔巴和穆索梅利。必须把这个消息安全无误和迅速地转告给真科·鲁索。

他们决定派一名骑手带着这封密信去穆索梅利。卡洛先生向送急件的信使下达了死命令，一旦他落入敌人之手，要把信吃掉。不过，一切担心都白费了。被选中的这个外号人称“面包脑袋”的黑手党骑士，一路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亲自把信交给了真科·鲁索。此时，关于英、美、加同盟军要在西西里登陆的消息早就象闪电一样传遍全岛。鲁索在接到“荣誉社”首领的来信之后，便开始焦急地等待，什么时候从维拉尔巴送来约定的行动信号。

使鲁索特别焦虑的是卡马塔达山口要塞。早在罗马帝国时代，起义的奴隶们就曾利用过它难以攻克的地理条件。后来，在各个不同时代，这个要塞成了各类杀人越货的匪帮可靠的藏身之地。如今，已经占领了西西里西部的美国军队，要向北方推进，必须经过这个咽喉要道。而配备有德国坦克、防空和反坦克武器的要塞驻军，完全有能力长时间阻止美军前进，并使其在人力和物力上蒙受明显巨大的损失。卡马拉塔山口要塞有重兵把守，其指挥官是萨莱米上校。据鲁索·真科手下人的调查这是一个着了迷的法西斯分子，每天都试图用爱国主义言词，来提高对战争感到厌倦的官兵们的战斗士气。他每次讲话总是以“宁死也不投降！”作结束语。

但是，这个德国法西斯狂热的信徒萨莱米上校为争取“彻底胜利”而奋斗的计划，是在穆索梅利黑手党首领真科·

鲁索未参与的情况下，酝酿制定的。所以，7月20日早晨，他突然发现，他手下驻军的三分之二士兵一夜之间全都溜之大吉，因为黑手党人用威胁和利诱使这些士兵同意开小差，并且还为开小差的士兵提供便服。

怒不可遏的萨莱米上校驱车直奔设在穆索梅利的参谋部。可是鲁索及其手下人早已埋伏在中途，等着这位卡马拉塔山口要塞的指挥官。他们都拿着刚从开小差士兵手里搞到的步枪和手枪，截住了这位上校乘坐的汽车，解除了所有人的武装并要他们同自己一起返回要塞。

黑手党人以打死萨莱米上校为要挟，命令剩余的驻军要在要塞里集合。真科·鲁索对官兵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马上放下武器！美国人到达穆索梅利时，我不想听到一声枪响。谁要是不服从命令，他就是钻到地底下，我们也要把他拉出来，让他粉身碎骨，就连他的家属也是一样！”

人们开始慢吞吞、接着越来越快地都把武器扔到石板地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黑手党分子把解除了武装的要塞驻军士兵都遣散回家，而把他们的上校指挥官萨莱米带到穆索梅利镇，关押在市政厅里，以防万一。

真科·鲁索对自己的工作可以感到满意了。巴顿将军的军队通往巴勒莫的道路已经打通，夺取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卡马拉塔山口要塞的战斗，已经由黑手党不放一枪而获胜。

在穆索梅利镇外，鲁索手执白旗在等待尊敬的卡洛先生对他所说的那些“母牛”和“马车”。当美军终于到达时，为了表示祝贺，黑手党下令敲响教堂的钟声。在这个小地方，这是一次空前隆重的欢迎“解放者”的入城式，美军士兵们满脸洋

溢出胜利的光彩，步伐整齐地行进在小城狭窄的街道上。而居民们都高声欢呼，纵情雀跃迎接他们，因为这是真科·鲁索的命令。当穆索梅利镇的公民们目睹这位黑手党先生同美军军官一起庄严地步入市政厅时，他们才明白了，如今谁是他们这个城市的真正主人。从此，鲁索已不再需要中间人，他已经亲自把整个权利全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

就在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的夜里，在街头，时而此，时而彼，不断听到零星的枪声。这是黑手党在向以前，即墨索里尼统治时期，不能清算的人算总账。如今，已经不需要同任何人分享政权，它已经完全彻底地属于黑手党了。

黑手党将军

1943年7月20日，即占领军在西西里登陆后的第十天，第七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到达维拉尔巴。当从第一辆坦克里爬出一名美军军官时，在这座城市的主要广场上出现了卡洛先生肥胖的身躯。他身穿家常便服，上身是一件普通的衬衫，袖子马马虎虎地卷着；下身是一条代宽背带而皱巴巴的裤子。他左摇右晃地慢步向那个军官迎去。而同这位手里拿着上面带有黑体大写字母“L”黄色绸方巾的黑手党之王并肩而行的，是他的侄子达米亚诺·鲁米亚。此人在二次大战前不久，才从美国返回故乡。不过，并不需要让他帮忙翻译，那个美国军官讲一口流利的西西里语。

美国情报部门实现了，要让尽可能多的西西里土著和美裔西西里人，加入占领军的打算。后来，根据文献档案，历史学家确认，在每一百个第七集团军的军职人员中，就有十

五个西西里人。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根据官方资料，1943年在美国居住着大约两百万西西里人。而当时西西里的人口总共才有450万，这也就是说，岛上几乎每一个居民，在遥远的美洲都有亲属或熟人。

在自己家里同那位美军军官短暂交谈之后，卡洛先生气息喘喘地爬进了那辆坦克，亲自送美军向虽然从官方说是法西斯统治的，而实际上是他管辖的这片领土的首府——巴勒莫进发。

有“荣誉社”的首领在长长的进军行列之中，比整个坦克大军的作用还大，每到一处，对美军都敞门让路，不用放一枪一炮。

美国军官都把卡洛先生称为“黑手党将军”，这种称呼虽是讽刺性的，但其中也确有几分敬意。他们不止一次有幸耳闻目睹，卡洛先生的命令的确具有强大威力。在他的帮助下，仅用了一个星期，美军几乎毫无损失地到达了巴勒莫。实际上，美国以闪电战取胜敌人就是这样得来的。而与此同时，英国和加拿大军队在西西里东海岸都蒙受了巨大损失，经过千辛万苦才为自己打开了通往墨西拿的道路。

卡洛先生成了市长

在离西西里首府不远的地方，从美军的队列中开出一辆吉普车，把卡洛先生送回了他的故城维拉尔巴。不言而喻，这位西西里岛黑手党的领袖充分利用这次盟军的进军机会，巡视了自己的王国。各地黑手党头目也很快便知道了，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卡洛先生获得了昔日的权威，把统治“荣誉

社”的权柄全牢牢地抓在了自己手里。

7月28日，美国军官们在维拉尔巴军营，为祝贺卡洛先生，举行了颇似登极西西里黑手党王位的庆祝会。借庆祝会之机，这个“荣誉社”的领袖不顾令人窒息的酷暑，甚至费劲地穿上了满是皱褶的礼服。同大批无足轻重的黑手党人（其中有一些刚从监狱里出来）一起到场的，还有真科·鲁索这一级“受尊敬的人”。

比尔少校致祝词。此人系军事行政机关民政部的人。该部的任务是，在占领区物色和任命新的地方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当然不会着眼于共产党和社会党人。此外，上级的指示很明确：“要彻底清除法西斯分子的影响！”而法西斯政权在岛上垮台之后，比尔少校不可能找到比“荣誉社”更好的盟友了。

在自己的祝词中，比尔把这个黑手党头子极力颂扬为坚定的、无所畏惧的反法西斯斗士，而且不惜美言，大肆渲染他在解放西西里事业中的功绩。为了感谢卡洛对美军的帮助，比尔少校代表上峰任命卡洛先生为维拉尔巴市及四郊的市长以及美军名誉上校。

对黑手党人来说，“艰难和克己”的日子已经结束了，继之而来的是迅速陶醉于自由和权利。一度沉默和谨慎的黑手党人再三举杯祝贺对他们首领功绩的崇高评价和赞誉，并高呼“卡洛先生万岁！”“美军万岁！”“黑手党万岁！”

这天晚上比尔少校非常客气和慷慨。他之所以如此，是有其原因的，因为美国人今后还需要黑手党效劳。由于这次“功绩”，卡洛先生还收到了一份厚礼：美国人没收旧政权的两辆卡车和一台拖拉机，另外还从美军油库中提取几百桶汽

油。这份礼可不能算不贵重了！事后，拖拉机立即开到了卡洛先生的一个庄园，而卡车则安排了其他用场：黑手党徒们用它们往黑市运送商品。自法西斯制度在这个岛上垮台之后，这个黑手党的首领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征服黑市。而且只用了几个礼拜，西西里就成了地中海地区黑市贸易中心，连美国人也广泛参与了这项活动。而黑市上最畅销的商品就是美国军用物资。

卡洛先生对一切可图之财具有非凡的敏感性。他的打算很简单：把从黑市买卖赚来的巨额收入，由他本人和自己颇有影响的美国朋友比尔少校共同分享，而把穆索梅利镇通心粉厂的存货，一古脑儿送给自己的心腹真科·鲁索。此外卡洛先生还经常向美国军官们暗示，目前尚存在有法西斯分子卷土重来的危险，但他本人及手下人，根据目前拥有的武器，根本不可能对其进行镇压。美军司令部仔细研究了这一问题，最后从自己的武器库中拿出来一批冲锋枪和其他武器以及弹药供新政府使用。军事政权还慷慨地允许这些“可靠的反法西斯战士”（黑手党分子也这样厚颜无耻地称呼自己）可以随身携带枪支。

没有多久，这一作法就显示出了后果：维拉尔巴宪兵队军官彼特罗·普比很快就死在美制冲锋枪的弹火之下，而不是死于传统的“鲁巴拉”。顺便要提及的是，正是这个普比签字批准这些“反法西斯战士”有权携带武器。

应美国人的请求，目不识丁的卡洛先生拟定了一个担任西西里西部各个城市市长一职的候选人名单。当然，这是在卡洛的哥哥乔万尼的帮助下。这个建议名单经美国占领军当局审查，其中至少在一半西西里西部城镇，任命了同黑手党有

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担任了行政官职。

在西西里成立了“占领区盟军军政府”之后，卡洛先生的手也伸进了这个管理机构。这位岛上的黑手党之王的侄子就在这里工作。他公开的身分是翻译，实际上负责保持巴勒莫同黑手党堡垒维拉尔巴之间的联络。在“占领区盟军军政府”大厦还设置了美军情报局的查尔斯·波列吉上校的办事处。此人早在登陆前半年，就到了西西里来执行特别任务。查尔斯·波列吉经常坐着自己的“巴卡迪”在岛上四处乱跑，会见西西里政界要人，有时也在维拉尔巴的克利斯比大街短暂停留，以便同权力无限的卡洛先生会晤。

波列吉上校身边有个顾问叫温琴蒂·科鲁拉，此人是美国匪首乔·普洛法齐手下的一个族长，领导着黑手党在纽约的一个家族，手下有一群由“我们的事业”中匪徒组成的御林军。这些人都是从美国被派到西西里来负责保持意大利和美国黑手党之间联系。

此时，黑手党已不象维托先生在世时那样，以“黑手党首府”巴勒莫为中心统治西西里，中心已转到维拉尔巴。这个小城有四十三条狭窄、弯曲、到处堆满垃圾的街道。沿街全是破旧的小房的茅舍。只有一座教堂高高耸立在一切之上，而尊敬的卡洛先生开办的银行就在离教堂不远的地方。

飞黄腾达

这个出生时，世俗名字叫卡洛杰罗·维茨尼的卡洛身世如何？他那令人惊诧的飞黄腾达是从荣誉阶梯上的那一级开

始的？

卡洛杰罗·维茨尼的父亲贝尼亚米诺·维茨尼出生在维拉尔巴，是个雇农。他经历了波旁统治时期。那时黑手党还被认为是一贫如洗之人的避难所。他很早同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图丽达·斯卡拉塔结了婚。在维拉尔巴极度贫困的农民中，斯卡拉塔一家以富家闻名，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们还算有自己的，尽管是很小的一块土地。而图丽达的哥哥穆洛·鲁卡诺主教迅速的升迁更加提高了这一家的威望。后来，卡洛杰罗·维茨尼的堂兄也成了诺托教区主教，而且是“玛利亚·桑地希玛·卡尔麦罗”圣徒勋章的创始人。

由于亲戚的关照，卡洛杰罗的两个哥哥，乔万尼和萨尔瓦托雷，很快也穿上了僧侣长袍。可是1877年7月24日出生的卡洛杰罗却始终热衷于世俗的功名，他远没有让自己承担过重的学习负担，只是到了17岁才进了学校，而且正是在此期间，第一次同法律打了交道。

卡洛杰罗把一批少年纠集在自己的周围，很快以天不怕，地不怕打架斗殴而出名。有一天晚上，他带领自己的一帮人闯进了当地富翁索拉佐家里，当着惊恐万状的全家人的面，这群流氓扑向他家的一位客人，把此人拉到漆黑的院子里痛打一顿。这个受害者是索拉佐女儿的未婚夫，而卡洛杰罗当时也“看中”了这个姑娘。

年轻的嫉妒者公开搞了这场突然袭击，根本没有顾及后果，所以索拉佐轻而易举地就促使立即逮捕了卡洛杰罗。不过这个流氓在维拉尔巴城的牢房里只蹲了一昼夜，他那颇有影响的、深为人敬的舅舅穆洛·鲁卡诺主教把他从“黑屋”里解救了出来。

不过，年轻的卡洛杰罗后来干起了“正经事”，而且得心应手，技艺巧妙，显示出非凡的才智、灵敏和厚颜无耻。这个“正经事”就是每当维拉尔巴的农民，把自己的粮食运往位于离城约八十公里远的地中海海岸的磨坊时，卡洛杰罗向他们出卖“安全保护”。当时只此一家的石磨在转动，而且是黑手党独家占有经营。与此同时，它还时刻满怀妒意地注视着，看谁敢来同自己竞争。

那时，满载粮食的车队也非常需要有人保护以免受土匪劫掠，因为当地的那些土匪搞得使运输任何东西都失去了安全保障。

后来，卡洛杰罗加入了隐藏在难进难出的卡马拉塔山口要塞的，臭名远扬的保罗·瓦索罗纳匪帮。依照惯例，瓦索罗纳总是在当地农民中招募人员加入自己的集团，而匪帮的成员，一般不同自己的首领生活在山中，而是，听到信号，召之即来。每当瓦索罗纳考虑好要搞一次袭击行动时，他就把所有成员召集到指定地点。袭击之后，匪徒们都又换上自己平时的衣服。也正是由于这一手，他们才很容易地从警方的眼皮底下溜了过去。

据文献所记载，当地对其有很多传说的瓦索罗纳匪帮，于1902年被消灭。卡洛杰罗·维茨尼同其他匪徒一起坐上了被告席。这已经是他一生中第三次同法律打交道。在此之前，法官们都曾试图裁决他犯有杀人罪，可都枉费了心机。这一回，他们的努力又徒劳了。“由于证据不足，宣告无罪”的声音再一次回荡在审判大厅里。

这是一场独特的技艺考试。卡洛杰罗·维茨尼得了满分，并以此证实，他的技艺的熟练程度已足够成为“荣誉社”

的一员。在“荣誉社”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接纳一名一般犯罪分子加入自己队列的先例。而卡洛杰罗·维茨尼却令人折服地证实了，自己在刑事犯罪方面颇有天赋。并且黑手党中令人尊敬的长者父辈，对他的才能也给予了应有的评价，所以在案子了结之后不久，卡洛杰罗·维茨尼便依照应遵循的全套礼仪被接纳加入了“荣誉社”。后来，也的确没有辜负“可尊敬的人们”的期望。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这个不讲良心，善于钻营的家伙，在黑社会地位已经青云直上，成了卡尔达尼塞特省的黑手党首领。

战争为肮脏的买卖开拓了新的可能性。卡洛先生同军方签订了供应马匹的合同。这一来，意大利变成了最大的收买赃物者。而当这一勾当败露并围绕它爆发了一场巨大丑闻后，军务部长下令立即进行调查，结果卡洛杰罗·维茨尼作为大骗局的策划人被送交了法庭。而军事法庭的裁决也毫不例外，仍是“因证据不足，宣告无罪。”可是，无能证明大名鼎鼎的犯罪分子有罪的法官们，却把法律之剑刺向九名证人，因为在法庭上他们突然都得了健忘症，什么都记不清了。而对此，法官们手中却握有十分明确的条款：“故意拒绝作证和作伪证。”起先，在调查委员会上，上述证人都自愿并滔滔不绝地作了黑手党分子卡洛杰罗·维茨尼有罪的证词，但是在下面黑手党毫不含糊地对他们做了暗示，于是证人们对因破坏《噤口律条》要受惩处的畏惧便更甚于蹲监狱，于是便又哑口无言。这一来，这场诉讼反而更加提高了卡洛先生的威信，证实了在法律面前他是不受伤害的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位维拉尔巴的黑手党之王又一次扩大了自己的财富。过去曾是封建主义卫道士的“荣誉

社”其本身就是最大的地主。如果说先前“荣誉社”只是保护荒地不受极力要占有它的无地农民去开垦，那么如今“荣誉社”自己已经是地主老爷中的一员。以前在巴勒莫豪华宅第过着悠闲生活的贵族，后来开始不断拍卖自己的土地，把它卖给肯出大价钱的人。但是当拍卖位于维拉尔巴附近，面积为五百公顷的“修女”庄园时，买主就只有一个，他给的价钱没有一个人超过。这个人就是“尊敬”的卡洛先生。实际上这片土地是以非常便宜的价格转到他手中的，因为他早就关照过，让任何人都不敢提高价格。后来，他的全西西里黑手党的弟兄们都以卡洛先生为榜样，纷纷效尤。

这个黑手党头子并不局限于单一的，尽管是得心应手的手段。他这个老奸巨滑的骗子，比自己的同伙要看得远。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建议在一次大战前线复员回家的战士中间分配荒地，并把此建议提交给地方政府审议。为达此“良好”目的，他创建了一个“合作社”，让自己的哥哥萨尔瓦托雷·维茨尼神父当经理，并用国家的钱买了荒地和农具。可昔日的战士中从来没有一个人能享有这一切。后来，在不是卡洛赞许下，维拉尔巴郊区又出现了三家这样的组织，结果很快都破了产。因为黑手党的“比丘托”们^①把所有的牲畜都赶到这些合作社的田里，毁坏了它们的庄稼。然后维拉尔巴的这个黑手党头目用廉价买下这些已无支付能力的债户的财产。直到1943年夏天美国人到来时，卡洛先生还在对维拉尔巴郊区的一些合作社经营的土地进行侵吞掠夺，用欺骗和暴力把这些土地化为已有，并在自己美国朋友的支持下，终于完成了

^① 小伙子的意思。在西西里也用来指“杀人者”“黑手党的手下人”。

这件事。

许多西西里的佃户和雇农都真诚相信，在美、英军队西西里登陆后，或更晚一些，在南意大利必将出现一个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好的年代。他们希望，要有自己的土地这一多少世纪以来的梦想，最终一定会实现，并且看来国家发生的种种事件也在证实这些预见。

在法西斯制度危机和盟军在西西里登陆的影响下，先前促使墨索里尼上台的那些意大利的统治集团，在国事方面，来了一个大转弯。1943年7月25日，国王下令逮捕墨索里尼并于次日任命巴多尔诺将军为政府首脑，而且政府成员里没有一个法西斯党人。巴多尔诺政府被迫满足了人民的一系列要求。九月初新政府签订了停战协定，并于1943年10月13日向法西斯德国宣战。

法西斯制度崩溃后，意大利人民为争取祖国民主复兴的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就：若干工业部门实现了民族化，其比重达到30%；1946年意大利宣布改为共和国；同年意大利共产党在选举中跃居第二位。

不言而喻，事态的这一发展并不合美国人及其国内同盟者的口味。无论美国政府，也无论黑手党，同样都不愿意让同其他民主力量结为联盟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人，分享意大利的权利。“荣誉社”梦想彻底消灭民族工业和土地分配制度。

芒杰列普雷之王

他是个可爱的小伙子，但是他有一个缺点：他太喜欢杀人了。

摘自美军上尉和记者迈克·斯特恩对
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的评论

1943年9月2日，在圣朱塞佩—亚托和芒杰列普雷之间，一个人烟稀少的山间小路上，一个头发乌黑、肩膀宽阔的小伙子，骑着骡子向北而行。这个很有耐力的四条腿动物，背上除了骑手外，还驮着两口袋粮食。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后，不仅卡洛先生学会了新的生财之道——黑市交易，而“荣誉社”各地的头头们尽管规模很小，同样干着赚钱的勾当。按照芒杰列普雷黑手党头头交待的任务，年轻的农民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就是这个骑着骡子的人）在搞粮食走私。盟军有令，禁止当地农民将食品运过省界，占领军当局企图用这道命令阻止粮食倒卖和投机捣把活动。

朱利亚诺没料到在一处悬崖的后边，会有两名宪兵和两名地方警察埋伏着。他们以枪相逼，令其站住。通常，走私者并不担心这种遭遇；因为可以毫不费劲地收买这些法律的维护者。但是由于这位年轻的黑手党运货员对用赎金可以买

回走私运输权利之事不大在乎，两位宪兵就从骡子背上掀下粮食口袋，将其依法没收。随后他们索走了朱利亚诺的身份证，除此之外，还要求年轻的黑手党分子供出主人的名字。

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绝口不谈：他害怕因破坏噤口律条而受到惩治。这时，小径上出现了另一个赶骡子的人，他的骡子同样驮着粮食口袋。朱利亚诺身旁只剩一个荷枪的宪兵，其余的巡逻兵统统去对付新来的人了。

瞅准时机，这个20岁的黑手党徒以闪电般的动作从看守他的宪兵手里夺下了冲锋枪，又朝他肚子上猛踢一脚，随即躲到附近的灌木丛中了。这时巡逻兵赶紧过来帮助自己的同伙，他们向逃跑者追射了几发子弹，以为朱利亚诺已经走远，也就没去追踪。可是这个粗心大意使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朱利亚诺就藏在附近，他躲在暗处，突然用藏在身上的左轮手枪打死了宪兵安东尼奥·曼奇诺，并使另一个巡逻兵也受了重伤。于是，在这个九月一天的中午，在芒杰列普雷带刺的灌木丛中，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杀人生涯。此后整整七年，都以此把西西里人吓得失魂落魄。

朱利亚诺和巡逻兵对射时大腿受了伤；他勉强挪动到最近的一个村庄，在这里他得到了最初的帮助。他已经不能回到芒杰列普雷了，因为他的身份证留在巡逻兵手里。通过联络员，他把自己这里发生的事情报告给芒杰列普雷黑手党的头目。不久得到答复：朱利亚诺暂时不应在故乡小镇露面，须躲藏到芒杰列普雷附近山岭中一个叫卡尔切尔拉姆的山洞里。年轻的黑手党人顺从地执行了命令。

这个双手现已沾满别人鲜血的年轻人，是玛丽亚·隆巴尔多和老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的第四个孩子，生于1922年

11月16日，在此前不久，全家才从美国回到祖国。父亲用在美国干了18年搬运砖头的重活积攒下的微薄的存款，在芒杰列普雷租下了一块土地。少年时期的萨尔瓦托雷帮助父亲在田里干活，所以也就没有时间到小城唯一的学校去读书了。

现在，图里达——他的妈妈和密友都这样亲切地称呼他——做为杀人犯被到处搜捕。但是关于投案自首，他连想都没想过，要知道，由于所犯的罪行他至少也要被判处20年徒刑。因此朱利亚诺决心等候到人们把这件事忘却……

西西里是美国的第49个州吗？

美军在岛上登陆后，在西西里一些房子的墙壁上经常出现一条标语：“西西里是西西里人民的！”赞成把这个地中海小岛从意大利分离出去的分立主义运动，找到了为数不少的支持者，他们由于各种各样原因，决定参加到这一运动中去。

1943年末，美国占领当局支持分立主义者组织起来与北意大利的抵抗运动对着干的意愿。在西方盟国的赞同下，分立主义者确立了自己的“国歌”——这是从凡尔第①的歌剧《西西里的黄昏》中选出的一个曲子。在美国人帮助下，组织出版了报纸《独立的西西里》，建立并装备了“为独立的西西里而战斗的志愿军”。独立运动的领导者是昔日墨索里尼政府国务秘书的助理菲诺基亚罗·阿普里莱、前卡特尼市长的儿子孔切托·加洛，以及吉卡尔卡奇公爵和斯特凡诺·亚美塔男爵。但是站在他们及另一些冒险家后边的是一些有权势的政治要

① 凡尔第·朱塞普(1813—1901年)伟大的意大利作曲家。

人，只是现在还躲在幕后。

这些先生们都是大地主和身居高位的国家官员，他们的座右铭是战斗的反共主义，从一开始就为反对社会的任何进步迹象，为在岛上保持封建秩序而斗争。争取独立的号召，对于他们只不过是个幌子。事实上，分立主义者的领袖们，竭力要建立一个受自己的美国靠山保护的国家。在他们的纲领中，没有一条对西西里黑手党的利益构成威胁。所以，无怪乎老牌情报员，美国国家劳动部的工作人员、美军上校查尔斯·波莱蒂，再三建议在分立主义者和黑手党之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西西里的黑手党首脑卡洛先生，赞许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并邀请分立主义者首领菲诺基亚罗·阿普里莱，到自己的维拉尔巴来作客。

1944年11月2日，阿普里莱来到维拉尔巴，并在这个“黑手党首府”的最大的马德里切广场发表演说。卡洛先生和他的做神父的兄弟乔万尼，坐在离讲台不远的地方，听得津津有味。善于辞令的阿普里莱激动得声音都变了，他向西西里的穷苦人许下诺言：要不了多久，你们的贫穷日子和苦役般的劳动就要结束！黑手党中的反法西斯战士为你们播种的田地，丰收在望，同这些“抵抗运动”的英雄们在一起，你们就有权期待得到，不愧称之为我们的解放者的人们的嘉奖。那些安坐罗马，既不了解你们，也不了解你们的西西里岛的人，在岛上主宰一切，横行霸道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志愿加入强大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吧！你们将尝到西西里有史以来最宏伟的胜利果实。你们将得到新的、舒适的住所，你们也一定能把骡子换成拖拉机……

马德里切广场的群众大会，以卡洛先生独出心裁想出来

的仪式而宣告结束：旗杆上庄严地升起了上面有49个星星的美国国旗。反动势力的最隐秘的愿望是，希望把西西里岛视为美国的第49个州。

在阿普里莱和他在黑手党内的志同道合者们的演说之后两星期，一辆叮当作响的卡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小径，艰难地登上了维拉尔巴。西西里工人的有声望的领袖，共产党员吉罗拉莫·利卡乌奇和几个自己的同志，从卡尔塔尼塞塔乘车来到这个“荣誉社”的堡垒。曾被囚于法西斯监狱的利卡乌奇，是接受了分立主义者和黑手党的挑战而来。当一群共产党员到达马德里切广场时，广场上空无一人。只是在一个角落里，站着卡洛先生。他两只手深深插在衣袋里，周围是一群保镖。

尽管如此，吉罗拉莫·利卡乌奇还是登上了马马虎虎装配起来的主席台。“我知道，”他开始说，“你们现在正站在关闭着的百叶窗旁听我讲话。恐惧使你们留在家里。这是对黑手党的恐惧。可是总有一天，这种恐惧是会消失的……”这时麦克风突然关掉了，但这没能阻止住利卡乌奇，他不用麦克风继续自己的指控。广场上回荡着他清晰的声音，响亮的回声从附近房屋的墙壁上折了回来。

这时，卡洛先生命令自己人开火。利卡乌奇和他的17位同志受了重伤。似乎是一种嘲弄，这位岛上黑手党头头的兄弟，神父乔万尼·比基尼下令，屠杀开始时，敲响所有教堂的钟。科津察市法院为处理这一血腥暴行受害者的集体控诉，竟用了五年时间。诉讼程序又拖延了七年。当受理上诉的法院终于审理了此案时，法官只认定几名黑手党徒有罪，仅判处他们短期监禁。而维拉尔巴屠杀事件的罪魁祸首卡洛

先生，对司法机关来说，已经是不可企及的人物，因为这个杀人犯和诸多杀人勾当的策划者，此时已经安然长眠了。

“上校”朱利亚诺

分立运动的领袖们在为自己的秘密战斗队物色司令官。黑手党向他们举荐了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此人并不以非凡的“谦逊”而出众，他自封为“芒杰列普雷之王”。但朱利亚诺消灭自己的对手时的冷静，和把自己的一伙人组织得井井有条的能力，是促使将这个土匪提拔到这个岗位上的主要因素。

和分立派首领孔切托·加洛会见在里加诺河一个农民的屋子里举行。房主人是朱利亚诺的亲信杰诺维塞兄弟。他们的房子离宪兵队的营房“别洛兰波”只有几百步之遥。加洛建议朱利亚诺的军衔为上校级，即“为独立的西西里而战斗的志愿军”军队的上校，这一建议得到朱利亚诺的赞同。

第二次会面，加洛是在卡尔恰公爵、斯特凡诺·拉莫塔男爵和菲诺基亚罗·阿普里莱陪同下前来的。分立派领袖们隆重地祝贺这位杀人凶手被授予“为独立的西西里而战斗的志愿军”上校军衔。为实现预定的行动，这位新提拔的上校得到了100万里拉，还有武器和制服一红黄色的短袖外衣。

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说，给他的钱有点儿少，甚至光给士兵们都不够，于是，这些后来多方面利用朱利亚诺匪帮的阴谋家们，就公开向“司令官”献计：用抢劫和绑架来增加自己的军饷，不过，还指出在于这些事时，“上校”朱利亚诺绝不应忘记自己的主要任务：责无旁贷地为“高贵的主义”完

成肮脏的工作——为分立派和黑手党的秘密部队招募新兵，杀害共产主义者、社会党人、工会领导人和袭击宪兵队。此外，“上校”还应随时准备行动，其信号是分立派们发动的政变。

可是反革命分子们的冒险事业，在这些阴谋家们本来可以着手实现之前，就崩溃了。

1945年4月，在抵抗运动的有力打击下，北意大利的法西斯制度的最后堡垒陷落了。德军被迫部分地向英美联军投降。新政府迅即成立，七位共产党员作为部长和国务秘书进入政府。

被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教权主义党的领袖们，先急急忙忙求得美国人的保护，然后在军事当局的积极支持下，妄图分裂意大利的民主阵线。意大利的民族团结处于危难之中。

西西里的反革命分子们和他们的美国保护者，不得不随机应变，遮掩自己的行动。他们担心，准备就绪的叛乱可能会受到全体人民的抵抗，而且这种抵抗，也必将使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存在受到威胁。

不久，分立主义者们感到了政治气候的变化。美国人对他们的冒险企图越来越失去兴趣，而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天主教民主党的右翼领袖们身上。似乎，只有他们才有力量阻挡意大利民主制度的恢复，并使国家追随美国的政策。

由于这一缘故，孔切托·加洛在西西里领导的“为独立的西西里而战斗的志愿军”于1945年9月遭到了惨败。菲诺基亚罗·阿普里莱被逮捕，分立主义者的党被取缔。他们的另一个首领加洛跑了。残留的分立主义者们，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朱利亚诺身上。到处都把他说成是“为西西里独立而

斗争的英雄”，尽管，这位英雄从来没有和政府军公开战斗过。

朱利亚诺匪帮的成员主要是他的亲属和芒杰列普雷及其周围地区的居民。22岁的加斯帕雷·比索塔是匪帮首领的副手和律师，他是朱利亚诺的姨母罗萨利·隆巴尔多的大儿子。

在非诺基亚罗·阿普里莱、孔切托·加洛和其他的分立派领袖被捕，又被放逐到蓬齐安小岛后，朱利亚诺于1945年12月28日进行了自己的首次军事行动。他率领大约由80人组成的装备良好的匪团，出其不意地攻打了“别洛兰波”兵营。宪兵们猝不及防，未加任何抵抗。匪团从兵营中拿走一切可以带走的东西，破坏了部分房屋，然后就到山上去躲起来了。

这次袭击后不久，阿普里莱和加洛在西西里的分立运动中，只不过是个傀儡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了。这一运动的真正的首脑继续着幕后的把戏，引导着朱利亚诺匪帮的活动。现在，匪帮的袭击已不是偶而为之了。宪兵们只有坐在坦克里，才敢在地面动一动。

1946年2月18日，巴勒莫的宪兵队队长布兰卡将军，呈给意大利政府一份关于那个时期发生的事件的幕后方面的详尽总结。总结中提到：必须强调指出，目前分立运动和黑手党致力于同一个目标，因此应首先在黑手党的头目中寻找岛上的“为独立的西西里而战斗的志愿军”的领导人。接着对岛上的政治局势进行了十分明晰的阐述：分立运动的领袖们，不久前向武装力量总指挥贝拉尔迪将军公开表明，是他们动员组织了“为独立的西西里而战的志愿军”，为避免无谓的流血，

坚决请他目前不要对“部队”采取任何措施，该部队的遣散工作，由他们自己来做。同时，他们又向贝拉尔迪将军提出建议，要求通过对参加了“为独立的西西里而战斗的志愿军”的青年实行全面大赦的方法，缓和西西里的紧张局势，并建议齐心协力对付象朱利亚诺及诸如此类对社会有害的犯罪分子。此外，分立派的首领们答应赋予自己的运动以君主政体的色彩。显然，贝拉尔迪将军同意了这些建议，并向分立主义分子们保证，不做任何反对他们的武装力量的事情。

布兰卡将军编造告密上司的材料，大概有着自己个人的目的，但是不久，他寄的东西却完全得到了证实。“为独立的西西里而战斗的志愿军”解散了，分立组织的追随者得到大赦。许多分立主义分子转而加入了意大利国家保皇党，该党为适应时代的精神命名为“大众党”，并替“温和的”分立主义辩护。

1946年4月4日，菲诺基亚罗·阿普里莱先生离开了流放地。在为此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为独立的西西里而战斗的志愿军”昔日的头头宣称：“分立运动的目的和任务，遭到他的敌人的污蔑。它的参加者是意大利人，而且希望永远是意大利人”。阿普里莱只不过是受到了一点点惊动。现在，这位老奸巨滑的政客和他的众多追随者一样，投靠了天主教民主党。在美国的赞许下，该党赞成西西里自治，并和天主教界人士联合一致，鼓吹坚定不移的反共方针。

大赦没有扩大到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身上，尽管他双手沾满别人鲜血的程度和另一个“为独立的西西里而战斗的志愿军”的军事头头，对8名宪兵之死负有罪责的孔切托·加洛不相上下。而加洛却不仅逃脱了惩治，甚至还当上了西西

里议员！1946年2月15日，悬赏缉拿朱利亚诺。意大利内务部长罗米塔许诺：谁抓住朱利亚诺，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都给300万里拉。在芒杰列普雷，这个匪徒下令撕掉有关搜查和逮捕他的布告，或者用下面一段文字糊住：“这是罗米塔的照片。有谁把他活着送来，给200万里拉，送来尸体，给500万里拉。 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

芒杰列普雷山区唯一的理发师叫弗里泽拉。有一天，他从顾客那里得知，这个正被搜捕的匪首，现歇宿在双亲家里。他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宪兵，宪兵们急速赶去，可是他们扑了空，朱利亚诺确实探望过双亲，但他及时地得到了要来抓他的警告。

三天以后，一位铸钟匠敲响了理发师的大门。朱利亚诺和他的三位助手举着冲锋枪站在面前。弗里泽拉的妻子绝望中企图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丈夫。当着弗里泽拉吓呆了的女儿、儿子和顾主的面，匪帮头子冷酷地放了一排枪，这一对夫妇的身上顿时弹痕累累。凶手们在理发师的门上贴了一张便条：“这将是一切告密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者的下场。”

男爵们和其他的反动分子，即“高级”匪帮黑手党，并不急于把朱利亚诺交给当局。这个匪徒之“王”指挥的“军队”，对他们还可以有用处，因为战争结束后，西西里的农民开始比以往更坚决地向封建地主要土地。他们的斗争得到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工会积极分子们的指引和支持。

朱利亚诺和“高级”匪帮黑手党之间有一条协议，根据协议，需要钱支付自己匪帮粮饷的朱利亚诺，可以以个人

的名义写讹诈信或者去绑架人。而“荣誉社”的中间人分赏给他所需的数目，而绝大部分留给了自己。此外，黑手党定期向朱利亚诺提供情报，使他可以放肆地抢劫，还能从众多宪兵和警察布下的天罗地网中平安逃离。对此的回报是，只需要朱利亚诺允许黑手党支配他那为数众多的匪帮。

中央政府对西西里岛的事件置之不顾。当时的意大利总理，天主教民主党人，持亲美观点的德·加斯佩里，正忙于同反法西斯战线作对。1947年5月，他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从政府组成人员中清除了所有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而黑手党的恐怖手段，首先指向的恰恰是反动的天主教民主党领袖和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员所反对的那些力量。

波尔切拉—杰列—吉涅斯特雷的大屠杀

1947年4月，人民联盟—共产党和社会党、工会和其他民主组织的联合组织—号召西西里的雇农和小佃农们进行反对大地主的斗争。人民联盟向穷人解释说，尽管政府经常许诺要进行土地改革，但他们对公正分配土地的期待，不会有什么结果。这件事应当自己亲自动手。

于是，雇农们开始自行占有并耕种没有种上庄稼的土地。这一来他们与“荣誉社”发生了冲突，因为该组织的一些有威望的成员，自己也打算把这些土地据为己有。于是黑手党使用了有效的武器——恐怖和暗杀。受害者多得已无法列举。死于“枪手”子弹下的有合作社、工会的领导人 and 普通的

积极分子。匪徒朱利亚诺^①也参加了这次流血的征战。1947年5月1日，一如既往，各家穷人举着红旗奔向波尔切拉—杰列—吉涅斯特雷。他们有的骑着驴或骡子，有的步行，从圣朱塞佩—亚托、皮亚纳—杰—格列奇和圣奇波列洛赶来这里纪念五一节。

大约10点钟时，来自圣朱塞佩—亚托的人民联盟书记贾科莫·斯基罗，登上了临时搭成的讲坛，开始了演说：“同志们！我们来到这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斯基罗的讲话骤然中止了。

……从耸立在波尔切拉—杰列—吉涅斯特雷山谷上的皮丘塔山的山坡上，响起了机枪和冲锋枪声，火力对准游行的人们。突然的袭击把农民们吓呆了。在人们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之前，其实已有几十位妇女、儿童和男人已经躺在了血泊之中。那些幸免于难的人，为了寻找生路，纷纷跑向山谷。母亲抱起孩子就跑，又被尸体绊了一交，倒下了。疯狂地东奔西跑的人群更加剧了惊恐不安的气氛。

屠杀持续了10分钟。但是，对被打死的人来说，它是无限期的了。当机关枪和冲锋枪停息后，“芒杰列普雷之王”的战绩又添上了一笔：击毙50人，打伤80人。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甚至未试图否认自己参加了这次的不愉快事件。他公

^① 1947年春天，在蓬捷—季—萨拉纳的一个小地方，“高级”匪帮黑手党的教父们齐集一堂，为首的是已届耄耋之年的黑手党“国王”卡洛杰罗·维茨尼和“二号”王—蒙雷阿列城的黑手党头头伊格纳齐奥·米切利。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在蒙雷阿列、芒杰列普雷和帕尔季尼克三个地区，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计划。为实现这一巨大行动，朱利亚诺要求给他1000万里拉。

开道歉，说总共只打了几枪，还矢口是为了驱散示威的人群，并完全否认这是一场有预谋的群众性大屠杀的看法。

正如调查表明，这次血腥大屠杀是有计划的，极精细地安排好了的。那个不幸日子的清晨，一支由12个匪徒组成的队伍，戴着面具，由朱利亚诺率领，从住地往芒杰列普雷山区进发。除了冲锋枪和手枪，匪徒还随身携带了三挺机关枪。他们从300米之外开火。当后来宪兵们搜山时，作为罪证，发现了大约800个子弹壳。但过了没多久，这批败坏名声的东西，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这场罪行就这样一直未被揭露。

意大利人还没来得及从波尔切拉—杰列—吉涅斯特雷的暴行中清醒过来，朱利亚诺的暴徒们就用手榴弹炸毁并纵火焚烧了蒙雷阿列、帕尔季尼克、博尔杰托、奇尼济、圣朱泽佩、亚托等地的工会、共产党和社会党支部的住地。

共产党提出抗议，向舆论界揭露了朱利亚诺匪帮全部罪行的真正挑动者。但是，出生于西西里，后来与黑手党和朱利亚诺有联系的新的内务部长马里奥·谢尔巴，在国会中对在野党的要求未予接受。要知道，他认为“寻找波尔切拉—杰列—吉涅斯特雷事件的政治动机是可笑的”。

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封信

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一直沉溺于分立幻想，对此，他的朋友和主人已经连听都不想听了。这些人早已改变方向，转到天主教—民主党方面去了，该党和他们一起进行反对一切左派力量的斗争。但朱利亚诺一如既往最喜欢的念头仍然是，把西西里合并到合众国里去。他甚至开展了“西西里加入

美利坚合众国的运动”。但是，它得不到支持。由于过分天真，朱利亚诺不愿承认他的计划完全不符合美国新的政策，也不认为，他的计划顶多不过是引起宽容的微笑。

当美军上尉迈克·斯特恩通过中间人请求“芒杰列普雷之王”接见时，他立刻就得到同意。这位35岁的美国人，善于把军事情报人员的职业和报纸记者的职务结合起来，偶尔从罗马为纽约报纸和新闻社发来最重要的消息。

在巴勒莫城，斯特恩会见了朱利亚诺的父亲。他把斯特恩带到芒杰列普雷山中的秘密接头处，然后把这个美国人交给了加斯帕雷·比肖塔，后者把客人带到一间破旧的农舍里，朱利亚诺就在这里等候着他们。斯特恩达到了任何一个警察或宪兵，在他之前或之后，都无法达到的目的：他亲自与危险的杀人犯打了交道。引人注目的是，这次会见安排在波尔切拉—杰列—吉涅斯特雷大屠杀之后的第八天！

斯特恩轰动一时的文章登在纽约各报上，西方各报刊也加以转载。

斯特恩在文章中描绘了新型“英雄”的外貌。他把朱利亚诺说成是20世纪的“罗宾汉”。讲述自己的英雄时，他动情地流下了泪水：“见到朱利亚诺，我首先想到的是，他大概臂力过人。绒布裤子紧紧裹住他粗壮的大腿。他的面孔很招人喜欢，晒得黑黑的，眼睛是棕色的，头发又黑又卷曲……他有一副开朗的面容，可以使人不加思索地把自己的小孩托给他照料。”在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为波尔切拉—杰列—吉涅斯特雷的杀人凶手恢复名誉的愿望。

访问之后，斯特恩先生和朱利亚诺合了影。背景是一面墙，上边工整地写着：“共产党员们必死！西西里的解放者朱

利亚诺万岁！”

据迈克·斯特恩说：“分别时，匪徒头子请他转交一封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这封信在某种程度上阐明了装备精良的宪兵队，无论如何也对付不了的这帮匪徒的目的和任务。信的文体暴露出了热情的记者迈克·斯特恩的手笔：

最尊敬的杜鲁门总统先生：

如果我没有给您添麻烦，而我的使者也没有被您拒绝的话，就请您听一听，一个远居于贵国之外的，一个年轻的，尽管不是默默无闻之人的，一个小小的请求。这位年轻人请求您帮助，实现他迄今为止总也未能实现的理想。请允许我介绍自己：我叫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报社的记者们把我变成了一个传奇式的英雄和十恶不赦的罪犯。大概，您也不可能对我有个准确的认识。如允许，我简单地，按时间先后，向您讲述一下我的历史。当我满21岁时——准确地说，是在1943年9月——在一次冲突后，我杀害了一名企图打死我的意大利警察。从而第一次引起了舆论界的注意。在这次事件之后，除了对自己的西西里故乡崇高的诚挚的爱，为她的自由而奋斗之外，我再也没有别的慰藉了。我从童年起，就是西西里加入美利坚合众国的拥护者，但在法西斯专政年代，不能公开表示自己的感情。尽管我还算是个勇敢的人，但是我发现，西西里的政治自由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人，因而，现在，在新的形势下，我想把思虑已久的宿愿付诸实现。为把这一理想变成现实，我决定立即投身到争取西西里独立的运动中去。我们向往西西里脱离意大利而独立，以便以后并入美利坚合众国。

1944年，西西里大多数城市房屋的墙壁上，包括它的首

府巴勒莫，都覆盖上了宣传画。在这些画上，把我描绘成一个砸碎——，把西西里捆在意大利身上的链条的人，同时还被画成是另一个身在美国，握住连接西西里和美国的链条末端的人。这个形象是我把西西里并入到美利坚合众国的希望的象征……

我们最需要的是您在道义上的支持……我们已建立了军事化的组织和反共的政党，为了铲除共产主义，他们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最尊敬的总统先生，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最真挚的敬意。我永远是您谦卑的、忠诚的奴仆。

朱利亚诺

西西里的杀人凶手给杜鲁门的这封信没有回音。看来，与其说它是给美国总统的，不如说是给千千万万读者的。记者们把朱利亚诺描绘成一位有献身精神，满怀“西方的自由”的伟大理想的英雄。

斯特恩，如我们所知，不仅是一位记者，还是美国情报机关的上尉。他答应给匪徒头子武器和弹药。而且果真，不久，中间人就把大批的机关枪、冲锋枪、手榴弹和黄色炸药送上了芒杰列普雷的山岭。

死亡判决书

警察们自始至终与朱利亚诺保持着联系。我们对一切事情都了如指掌，预先知道宪兵们的每一次行动步骤。如果给警察局评功摆好的话，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他们使宪兵们走上必定死亡的道路。

节录加斯帕雷·比肖塔1951年5月14日的供词

不久，朱利亚诺的家乡聚集了大量宪兵。地方警备队也一再补充兵援，但是看不到什么成效。看来，黑势力插手了。

挨家挨户的搜捕也未产生预想的结果。芒杰列普雷总共6000居民中，就有数百名，因被怀疑与朱利亚诺有联系，而直接在大街上遭逮捕。他们受到交相审问，对有罪者来说，等待着他们的是监狱，无罪者——“因拒不交待”也未能幸免。

有一天，警察们得到报告说，在某一处房子里发现了加斯帕雷·比肖塔。宪兵们全部人马突然出现在该地……可是，“芒杰列普雷之王”的这位副官，却早已不翼而飞。凶狠的宪兵们暴跳如雷。他们把拒绝提供任何情况的女房东赶到大街上，朝她的头顶上方，打了几梭子冲锋枪子弹。并且宪兵军

官还大声叫嚷着说：“我们要让你开口！你把匪徒藏到哪里去了？！”可是他们仍一无所获，只好离去，临走时，扔了一枚催泪瓦斯弹。

这一肆虐行为，使许多与此事毫不相干的人吃了苦头。结果宪兵们只达到了一个目的，即人们更加寡言少语，更加深居简出。

该地区实行了宵禁。每天，从夜幕降临直到第二天拂晓，任何人不准在街上露面。对此，地方当局似乎还嫌不够，他们甚至禁止居民一般情况下离开家门。有时这一决定一连数日不变。宪兵们往往由于无足轻重的小事，就大动干戈，开枪杀人。

政府报纸通栏报道，当局如何异常积极地同盗匪集团展开斗争的消息。它竭力在愤怒的社会舆论面前，为负有责任的人开脱罪责。

但是，瑞典女记者玛丽亚·西丽阿库斯找到了朱利亚诺的藏身之处，并且在匪徒头子的山洞中，度过了三天。后来，就在“我的可爱的匪徒”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采访报道。

那时，就连芒杰列普雷的孩子们都知道，“可爱的匪徒们”大部分时间并不是在那个神话般的山洞中度过，而是在某一幢房子里。可是令人奇怪，迄今为止，这幢房子从未被宪兵占领。正如后来所知，朱利亚诺挖了一条由屋子到荒野的地下通道。当警察和宪兵们在西西里灼热的阳光下，汗流浹背地在山上寻找他的时候，他就常常使用这个出口。

宪兵队常常受挫，能说这只是个偶然的不幸事件吗？况且新上任的内务部长马里奥·谢尔巴，就是宪兵队的顶头上

司。这个谢尔巴是西西里人，稍后才搞清楚，他是来自卡尔塔尼隆纳的一个黑手党人的儿子。无怪乎一再传说，“荣誉社”无论如何要竭力把通往罗马和上层社会的一切障碍清除掉。

1947年6月26日，宪兵队在贾隆巴尔多大尉的指挥下，与朱利亚诺的队伍交火。在这次不大的武装冲突中，4名匪徒被打死，2名受伤。当宪兵步步逼近匪徒时，匪徒中的一个人喊叫了起来：“别朝我开枪，我是督察员梅萨纳手下的人！”埃托雷·梅萨纳是贾隆巴尔多大尉的上司，那时正指挥着西西里的宪兵，被认为是谢尔巴的密友，是一个富有政治经验的人。过去，分立派总把他当做“独立的西西里国”内务部长一职的最合适的人选。那时他支持分立运动，可是为运动效力的还有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

自称是梅萨纳间谍的那个人叫萨尔瓦托雷·费列里，在朱利亚诺的匪徒中间，他的绰号叫魔鬼兄弟。他受命把警察引入歧途。可是这位魔鬼兄弟未来得及做更多的事。按官方的说法，一名受伤的匪徒，似乎朝贾隆巴尔多大尉猛扑过去，因而被枪杀了。

另一名受伤者叫乔万尼，他是朱利亚诺曾在他们的家里会见过分立派领导人的杰诺维塞兄弟。他承认，他的头目确实领导了在波尔切拉—杰列—捷涅斯特雷的血腥大屠杀。但据他说，命令来自于男爵们。

这一些事件均未能被掩盖，报纸的综述使内务部长的名誉受到损害。谢尔巴迫不得已正式提出与自己的朋友梅萨纳断绝往来，并解除他正在担任的职务。共产党和社会党议员在议会里，要求内务部长辞职，因他庇护匪徒，但却极为残

酷地对待罢工的工人。但是，天主教民主党拥有大多数席位，正因此，首相德·加斯佩里才敢于如此狂妄行事：在议会讨论谢尔巴问题时，他急匆匆地起来向他迎去，示威似地拥抱了他，以表示对他的支持。

梅萨纳的继任者是一个叫卡利多里的人。墨索里尼当政时，他曾是警察局头子切扎雷·莫里的红人。这个莫里曾夸口一定要消灭黑手党。追随他的还有督察员莫吉卡和斯巴诺。这两个人，也是在莫里手下开始官运亨通的，他们消灭朱利亚诺的企图，也同样遭到了失败。

下面是1947年官方的统计数字：西西里西部有46名宪兵被打死，734名受伤，而且每一次都弄不清，他们究竟是谁手下的牺牲品，是朱利亚诺匪帮，还是黑手党。警察局和司法机关不自找麻烦，几乎把全部罪行都统统算到朱利亚诺人的帐上。自然，黑手党对此不表示反对。

埃托雷·梅萨纳在自己的前程骤然黯然无光之前，把金质和银质勇敢奖章，甚至连“十字勋章”，都随意分发给了宪兵们。可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战斗行动屡次失利，已开始牢骚满腹了。

然而，朱利亚诺给自己下了死刑判决并非由于他杀了很多人，而只是因为死者之中，有一个是帕尔基尼卡小城的黑手党头子坎塔·弗莱雷斯。

争吵，在这次杀人之前就产生了。“高级”匪帮黑手党日益反对朱利亚诺匪帮肆无忌惮的恐怖活动，因为它必然迫使政府采取对策，这就可能使“荣誉社”的利益也受到损害。朱利亚诺与弗莱雷斯会谈时失去了理智，杀死了这个头目和他的四个同伙，从而使这场纠纷以杀人而告终。为了自身的利

益，他轻慢了“高级”匪帮黑手党的劝告和命令。而对任何人的这种行为，黑手党是都不会宽恕的。

黑手党不慌不忙地，但却实实在在地跟踪着朱利亚诺匪帮，并把朱利亚诺的同伙坎杰卢·巴达拉门蒂和利卡里，一个接一个地出卖给了宪兵。朱利亚诺匪帮的力量开始减弱，逼得“芒杰列普雷之王”就象被追赶得精疲力尽的野兽一样，再次干起抢掠和种种残酷勾当。朱利亚诺给巴勒莫的一家报纸寄去一信，向全体宪兵发出警告：如果他们打算进入他的“王国领地”芒杰列普雷山区，必须佩戴白臂章，否则有性命之虞。

1949年4月，在托雷塔和蒙雷阿列附近，他诱使宪兵队中了埋伏。在武装冲突中，宪兵死了2名，有11人受伤。朱利亚诺还绑架了一些议员。但是他却对昔日同他密切合作过的公爵和男爵更感兴趣。比如，他从弗兰切斯科·帕佩公爵处得到5000万里拉的赎金，此外还把公爵从不离身、世代相传的大钻石据为己有。

同年5月2日晚上，一个年轻的宪兵上尉，走进了终于安插了宪兵岗哨的朱利亚诺的房子里。士兵们十分恭敬地向首长敬礼，满怀期待地望着他。上尉先是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房间，看着，看着，他突然猛地一个转身，掏出手枪，对着吓呆了的士兵们就是一排子弹。一位宪兵当场死亡，另一个受伤后死在医院里。这勇猛过人的强盗，不是别人，正是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本人。他穿了军服，这是在一次与宪兵交战中缴获的战利品。

在此之前，已经有大约2000名宪兵驻扎在芒杰列普雷以及它附近的地方。朱利亚诺的几乎全部亲属和朋友，均已身陷

囚圈。他的母亲，以藏匿罪和恫吓罪，被判刑五年；父亲则被放逐到乌基卡岛去了。留下来的越来越少的匪徒们，感到心惊胆战，与其说他们害怕的是当局，勿宁说是黑手党，因为后者可以出卖他们。而且尽管匪帮有秘密同盟者一对宪兵仇视多于合作的当地警察，但亦难释然。不过，这一点却是以后才知道的。

朱利亚诺始终未停止自己的活动。他相信自己手中还握有一张王牌。他散布谣言，说他准备了一份同分立主义者合作的备忘录，附有极重要的文件。他冷笑着说，内务部长马里奥·谢尔巴想必会兴致勃勃地把这些手稿读完的。

在此之前，这个匪徒派遣了保皇党议员杰洛赛·库苏马诺为自己的特使去见谢尔巴。该议员从前属于分立主义者阵营。朱利亚诺在信中郑重声明，若能对他和他的伙伴们实行特赦，他一定停止反宪兵的斗争。可是这一次谢尔巴的回答是坚决的：“我决不与匪徒谈判！”

毫无疑问，在西西里岛有着广泛而可靠联系的内务部长，已经得悉了“高级匪帮”黑手党和朱利亚诺之间的不和。

意大利的劳伦斯

1949年8月26日，内务部长发布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声明：与岛上匪患斗争的任务，责成隶属于谢尔巴的专门部队——剿匪队完成。这一声明使舆论界颇为震惊。然而，受制戕的仅仅是离开了“黑手党”羽翼的匪徒。在匪帮对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使用恐怖手段时，罗马的天主教民主党政府对一切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如今他在黑手党和朱利亚诺的纠纷

中，已经看到了对自己的严重威胁。有损谢尔巴战友们名誉的材料，可以产生对执政党非常不良的后果。

指挥剿匪队的任务责成武加·卢卡负责。矮个子卢卡具有在意大利反间谍机关工作的丰富经验。从1920年~1922年底，卢卡在小亚细亚从事情报工作，为意大利帝国的利益，在那里进行了反对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和土耳其革命的破坏活动。后来由于在情报生涯上卓有成效，他得到了“意大利的劳伦斯”^①的美名。在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当政时期，卢卡做为情报人员继续飞黄腾达。这个对上司奴颜婢膝、谄媚逢迎的家伙，在仕途的阶梯上信心十足地步步升高，不久他就成了意大利军队反间谍机关的领导人之一。战争年代，他同苏联和德国的反间谍机关密切合作过。

卢卡任命了身高体肥的安东尼奥·比肖塔为自己的副手。此人40岁左右，留着小胡子，已经谢顶了。以后卢卡的这个副手还要起特殊作用。

但是，消灭朱利亚诺的军事行动，对于卢卡上校来说，还未来得及开始就几乎结束了。朱利亚诺匪帮对宪兵队的一切活动，一如既往地了如指掌，他们袭击了卢卡指挥的政府军护送队。载有18名宪兵的卡车，碰上了地雷，被炸得飞上了天。4名宪兵简直炸得血肉横飞。3名受伤的，后来也死在医院里。而卢卡幸免于难纯属偶然。他没有象通常那样，乘坐第二辆车，而是坐在第一辆车上。而匪徒们发现车辆行驶次序改变时，已为时过晚。尽管已经晚了，还是把手榴弹

^① 劳伦斯，英国情报人员，一生在很多国家地区从事间谍工作。

一古脑儿扔向卢卡的车上了，但没击中。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卢卡上校把宪兵数目增加到3000人，归他调遣的还有空降兵，一些飞机和坦克。接着，他禁止西西里岛的报纸刊载朱利亚诺的任何信件，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匪徒有了一个给报纸编辑部寄东西的习惯。这些编辑部乐意发表他的抨击性文章和耸人听闻的信件，在这些文章和信件中，他对宪兵们极尽威胁挖苦之能事。

卢卡命令编写并公布朱利亚诺的罪行：37次杀人、29次企图杀人，10次恫吓罪、40次抢劫罪；而其他匪徒酿成的流血事件大约为73名宪兵、22名警察和50名普通老百姓丧生。

捉拿朱利亚诺的悬赏，从300万里拉增加到500万。黑手党有步骤地提供了名字、地点、秘密接头暗号。大逮捕一个接一个地接踵而至。

10月14日，卢卡上校大本营的电话铃声骤然响了起来。时值午夜。值班的宪兵懒洋洋地拿起听筒。一个不肯说出自己姓名的男人，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杰诺维塞匪帮中的朱塞佩·库奇内拉，此时正在巴勒莫城外某先生处。

人们即刻把消息报知卢卡。卢卡立刻发出集合令，因为类似的匿名报告并非总是假的。

宪兵们包围了楼房，又占据了邻近房屋的房顶，在上边架设了轻机枪。就在他们试着潜入房里时，有人向他们开了火。他们只好隐蔽起来。此时，在黑黢黢的街道上，一辆关了前灯的卡车，风驰电掣般地急驶着。满布在通向被包围的那座房子的各条街道上的宪兵们，都急忙躲闪，以免葬身车底，当卡车减慢了速度，来到被宪兵们包围着的房子旁时，库奇内拉持枪从二楼窗户跳了出来。可是他没跳好，没能跳

到卡车上，而是跳到马路的石头上了。库奇内拉折断了肋骨、手和脚，落到了卢卡上校的手里。上校亲自领导了这次围剿。

某个人把朱利亚诺的匪徒出卖给了宪兵队。

然而，卢卡想用来抓获朱利亚诺的天罗地网，是暗地里设置的。在这种事情上，这位情报人员是有特殊经验的。他明白，是黑手党向他出卖了朱利亚诺匪帮，也就是说，通往朱利亚诺的道路是经过“荣誉社”的。

“我打死了朱利亚诺！”

从1950年春天起，一种反常的寂静突然降临到朱利亚诺及其所剩无几的匪帮周围。一些自相矛盾的谣言在岛上传播。谣言之一说，朱利亚诺得到政府默许，逃到北非去了，在那里加入了法国外籍军团，还准备攻击卢卡上校的宪兵。

1950年7月5日，一条新闻：朱利亚诺死了！如同炸弹爆炸一样，打破了这片沉寂。

在官方圈子里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晨六时，意大利警察局局长丹托尼将军给自己的上司，内务部长谢尔巴打电话说：“部长先生，今天拂晓，在卡斯特尔韦特腊诺地区同政府剿匪军队的战斗中，朱利亚诺被击毙。”

对这盼望已久的消息的回答却是部长平静的声音：“很好，我们一会儿见，我等着你的报告。”尽心尽职的丹托尼惶惑失望地放下了听筒。内务部长居然把他的报告当作了一桩平常的事情。

关于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死亡的消息，在报界、并且

首先在驻罗马的外国记者中，象急发的炮弹一样，四散开了。自然，他们不仅仅满足于这一事实，他们渴望知道细节，希望知道著名的匪徒死亡的全部详情。记者们挤满了内务部长的接待室，直到部长同意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为止。

但是，从谢尔巴的通报中，得不到什么东西。并且，内务部长看上去也不象一个取得了巨大胜利的人。他对主要的执行者卢卡上校大加赞扬，并向报界声明，与西西里岛匪徒的斗争业已结束，鉴于此，岛上的剿匪军将解散。朱利亚诺的罪行已到此为止。他希望报界结束此事。

最大的一家官方报纸《晚邮报》，在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出版时，用了下列标题：《四名宪兵午夜擒拿朱利亚诺。半小时激战，击毙匪徒！》、《德·加斯佩里和谢尔巴向警察局祝贺！》、《卢卡上校晋升为将军》。但是许多新闻记者不满足于谢尔巴的声明，他们急忙赶到出事地点，以便更为详细地了解“欧洲最后一个匪徒头子”的戏剧性结局。

在卡斯特尔韦特腊诺，卢卡上校的副官，宪兵上尉佩伦钦绘声绘色、添枝加叶地向记者们描述了干掉朱利亚诺之前发生的事情。这位宪兵上尉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对记者说：“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死前十天，我的上级，卢卡上校得悉匪徒准备离开西西里岛。他们选择了卡斯特尔韦特腊诺做为出逃地。这是个小城，对于逃跑来说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了：它濒临海滨，此外还有一个不大的飞机场。朱利亚诺也许想要利用它。我们估计到了这一点，因而下令加强了警戒，同时吩咐了要在附近街道上仔细巡逻。

“今天凌晨3点15分，宪兵大队在卡吉尼大街碰上了一群携带武器的人。宪兵试图阻止他们，双方开始了射击。就

在这时，我看到一个男人把上衣一扔就跑了。我开始追踪他。该人向座落在谢拉费诺·马诺涅大街上的一幢房子奔去。他拐来拐去的跑着，发现有动静，就发疯般地射击着。在德·马里奥律师住宅的内院，我追上了他，用一梭子冲锋枪子弹将他当场击毙。他中了七发子弹，扑通一声栽倒在地，10分钟以后就断气了。就这样，在凌晨4点10分，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死了。”

这一来，英雄当然不是别人，而是佩伦钦上尉。请注意，一个冷静沉着的杀人犯和优秀的射手朱利亚诺，如今竟然惊慌失措，象个兔子样东窜西跳，躲避英勇的上尉，对此，一些记者颇感怀疑。他们希望面见卢卡，但发现当时他正在谢列尼乌斯旅馆大摆庆功宴席，顾不上记者们。顺便说一下，在这盛大的宴会上就座的，还有市检察官和法医加比奥教授。自然，这纯属偶然。于是，记者们只有冒着风险，开始亲自去做调查了。

“他们出卖了他！”

好寻根究底的记者们，向小城的居民们一再追问，真是互相射击了45分钟吗？居民们仅以摇头作答。卡斯特尔韦特腊诺的居民们一致声称，他们总共只听到了几下零星的枪声和两梭子冲锋枪子弹的声音。这样，就与佩伦钦上尉的断言相反，根本没有什么持续45分钟的对射。

一辆停在房子旁边的“菲亚特”汽车，使充满好奇心的人们不能看清楚谢拉费诺·马诺涅大街被宪兵包围着的54号房子里发生的事情。而在那儿，在小院深处，萨尔瓦托雷·朱

利亚诺完全同他已往的受害者一样，也是脸朝下地趴在地上。他穿了一条斜纹布的裤子和无袖足球衫。靠近头部的地方，在一片血污中，有一把左轮手枪，右手旁边是“别列塔”冲锋枪。在这位死去的匪徒的白色针织衬衫上渗出一大片血迹。

7月5日下午，朱利亚诺的尸体运到了卡斯特尔韦特腊诺的公墓，放到大理石板上。为巴勒莫罪行调查学陈列馆之需，从死者脸上印取了石膏面膜。随后，法医加比奥教授安排了尸体解剖的准备工作。当从死者身上脱下衬衫时，在场的罪行调查学家们惊讶得脸都变形了：在衬衫上的大片血迹下面，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伤口。全部枪伤均在右侧和腋窝处。根据尸体的姿势，血却是往上流，而不是向下流，这违反了物理学的定律。

尸体检查，大概使这些认真的检查人员发现了新的意外情况。在朱利亚诺的身上有16处以上的弹痕，且全部是冲锋枪子弹，只有两颗来自左轮手枪。

法医在朱利亚诺的大腿上发现了早年疤痕。那是1943年9月2日与宪兵队交火留下的。当时由于两口袋粮食，一个宪兵被打死，另一人受了重伤。

尽管从一开始就毫不怀疑，落在警察局手里的，正是朱利亚诺的尸体，但还是从离卡斯特尔韦特腊诺80公里的芒杰列普雷抓来了匪徒的母亲。她听到儿子已死的消息后，立即全身抽搐，歇斯底里大发作：“我不信！这不是真的，这是圈套！你们永远也抓不到他，听着，永远！”而进入停尸房时，她倒显得极为平静。人们把她带到尸体旁，她低声地说：“是的！这是我的儿子，我27年前生的儿子。”

离开死者后，她向人群和聚集在墓地等待特大新闻的记

者们喊叫起来：“他们出卖了他！他们出卖了他！”随后，朱利亚诺的母亲好象失去了理智，瘫到地上，在尘土中滚来滚去，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说：“我的宝贝，我的宝贝，他们把你出卖了！”

这单单是一个痛不欲生的母亲绝望心情的发作吗？矛盾如此之多，并且其数量，后来竟增加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以致在西西里岛和整个意大利，没有一个人再相信官方的这一说法：朱利亚诺死于佩伦钦上尉之手。

据警察局宣布，7月初，朱利亚诺匪帮中尚有7人逍遥法外，他们是：马尼诺、巴达拉门蒂、马多尼亚、吉托、维达莱、帕萨杰姆帕和朱利亚诺的表兄弟，他的“第一个副官”加斯帕雷·比肖塔。

使舆论界颇感意外的是，新近提升为将军的卢卡却声称，朱利亚诺匪帮，除了比肖塔以外，从6月27日起，也就是他们的首领毙命前，已经全部入狱。卢卡希冀以此来驳倒越来越多的下述猜测：不是走运的佩伦钦杀死朱利亚诺，而是同伙杀死了“芒杰列普雷之王”。但加斯帕雷·比肖塔是朱利亚诺亲密的朋友和有血缘关系的亲属，难道谁会怀疑他呢？但不管怎么说，卢卡希望人们都这样看。

使一再要求记者们就此结束朱利亚诺案件的内务部长谢尔巴感到痛心的是，流言继续在传播。这迫使警察局于1950年12月向报界提供了一条新的轰动一时的消息：加斯帕雷·比肖塔已被捕并被押解到意大利的维泰博。对朱利亚诺匪帮30多名成员的案子就要在这里进行审理。

在狱中，还在诉讼开始之前，比肖塔即来了个耸人听闻的声明：“我，加斯帕雷·比肖塔，打死了萨尔瓦托雷·朱利

亚诺。趁他睡觉的时候干的。我是根据我个人与内务部长谢尔巴先生的协议而干的这件事。”

朱利亚诺的这位副官在公开认罪之后终日惶恐不安。他说他将只吃自己母亲做的饭。几周以后，监狱长禁止对比肖塔先生每日的探望。比肖塔知道后，又恨又怕，他一字一顿地嚎叫着说：“我确信，现在他们大概要在狱中杀死我了。”监狱看守注意到，在猫没有尝一尝食物之前，他是丝毫不沾口的。这猫是允许他养在单人囚室里的。

诉讼开始后，证实了比肖塔的担心不是毫无根据的。在去法庭的路上，有两名囚犯，即1945年朱利亚诺在他们的小屋里，同分立主义分子会面的杰诺维塞兄弟，向比肖塔猛扑过来，企图打死这个叛徒。

诉 讼

1951年春天，出席庭审的听众们屏息而坐。被告象野兽一样囚在一个大铁笼里。

似乎终于要使1950年7月5日事件和在此之前的幕后斗争之谜真象大白了。这次是否将会把累累罪行的真正教唆者揭露出来呢？听众首先感兴趣的是，究竟是谁迫使比肖塔承认，正是他打死了自己的表兄弟朱利亚诺？

面色苍白，穿着崭新衣服的加斯帕雷·比肖塔向法庭供述自己是如何成了叛徒的。他说：“朱利亚诺查明，蒙特利尔黑手党族长伊尼亚佐·米切利把我们的两个兄弟马尼诺和马多尼亚，出卖给警察局了。他给了米切利10天期限，让他将兄弟俩从警察局手里弄出来。米切利为自己的生命担心，竭

力做到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他和卢卡上校的关系极好，但即便如此，米切利也没能履行诺言。这时，朱利亚诺便命令我前往蒙特利尔去打死米切利。我去了，但决心不执行命令。必须结束这种互相残杀的局面。我和米切利族长谈了话；他问我想不想参与除掉朱利亚诺。我回答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同意参加。”

主审法官：在什么条件下？

比肖塔：我希望能不追究我给朱利亚诺干事时所犯下的罪行。我是作为报酬来要求这一点的。我也要求卢卡上校弄到内务部长马里奥·谢尔巴先生的亲笔签名的书面保证。

比肖塔提到的这份书面保证已呈交法庭。但是，新晋升的卢卡将军为了维护自己上司的利益，赌咒发誓地证明，是自己为了把匪徒诱入陷阱，伪造了内务部长的签名。对此，比肖塔声明，这件事不是这样，因为他看见过谢尔巴1948年4月写给朱利亚诺的信上的亲笔签名。“信里，”匪徒讲述道，“谢尔巴先生请求朱利亚诺支持天主教—民主党的竞选。如果该党在大选时获胜，他保证全面赦免朱利亚诺的罪过。”

官方报纸暴跳如雷，怎么能相信某个疯疯颠颠的匪徒，况且他至今也未能提供一个证明人啊！

律师格雷戈里奥·德·马里奥（就是在他家的院子里发现了朱利亚诺的尸体）在法庭上发了言。他详细地描绘了杀人经过，以及在此之前发生的诸多事件：“1949年12月16日深夜，22点左右，有人敲响了我家大门。我问：是谁？是我，朱塞佩·马罗塔，开门吧，格雷戈里奥！朱塞佩·马罗塔是我童年的朋友。马罗塔进了屋子，可他后边还有两个穿得邋邋遢遢的男人，在黑暗中，我没看清是什么样。其中一人对

我宣称，他们是马罗塔的朋友，并且请求在我这儿躲藏两三天。这两个不速之客就是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和加斯帕雷·比肖塔。他们需要一个靠得住的、不会引起怀疑的隐匿处。这次被迫接待客人达6个月之久，即从那个12月的夜晚到1950年7月5日为止。

“2月时节，比肖塔突然携带着全部行李到什么地方去了。从那时起，我再没看到他……直到那个凶杀的晚上。后来，3月中旬时，朱利亚诺也离开了住房。但我并未摆脱掉这位不速之客。大约两星期后，他重又回来，在我这待到五月中旬，可后来又消声匿迹了，直到6月25日再次出现。这一次他显得惊慌失措、意志消沉。

“1950年7月5日这天终于到来了。那个晚上，上半夜，我们都已睡着了，突然响起扣门声。我起来，开亮了小院里的灯，向街上瞅了一眼，看见比肖塔站在门旁。我随即把朱利亚诺唤醒，又去打开了门。第一眼就看出比肖塔穿一身崭新的衣服。我告诉他朱利亚诺在楼上。他上楼到朱利亚诺的房间去了，我就又回到自己的住室，不久就进入了梦乡。

“大约在凌晨3点，一阵枪声猛然将我惊醒。我从床上跳了起来，打开了门，立即看见手电筒的光束在匪徒们住的屋子里掠来掠去。我怕极了，以为是警察来了。两条腿吓得抖个不停，软瘫在床上。

“当比肖塔闯进我的房间时，我吓得竟突然喊叫了一声。他用西西里方言，又激动又快速地对我说：‘律师，我开枪杀人了，我开枪杀人了！’我万分震惊，匆忙进入朱利亚诺的房间，看到他四肢摊开，象睡着了一样躺在床上。但他死了。我就象虚脱了一样，摇摇晃晃地走下楼来，想把入口的门关

上，比肖塔就是从这个门出去的，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

“突然，宪兵上尉安东尼奥·佩伦钦来了。他首先证实我就是律师德·马里奥，然后就请我带他到杀人的房间去。当上尉看到死去的朱利亚诺时，对我说：‘这里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必须把血迹收拾干净以防万一。’我执行了他的命令。后来，我和佩伦钦上尉一起把朱利亚诺的尸体抬到院子里。然后我就回屋去了，接着就听到冲锋枪哒哒哒的射击声。”

就这样，德·马里奥律师证实了比肖塔的供词。

卢卡仅仅部分地支持了佩伦钦上尉的说法。他强调说，黑手党的头头米切利与比肖塔进行过谈判。为换取伪造的谢尔巴信件，比肖塔背叛了自己的表兄弟朱利亚诺。据他说，那个晚上，在匪徒首领和他的副手之间发生了争执。在这种情况下，比肖塔杀害自己的首领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最后结束朱利亚诺生命的，是当时站在院子里的佩伦钦上尉。

德·马里奥和卢卡都详尽地，尽管是自相矛盾地描述了这个杀人之夜。可是只有比肖塔对那晚的事件守口如瓶。共产党书记吉罗拉莫·利·卡沃西在巴勒莫的一次会议上，坚决要求比肖塔打破沉默。他试图说服他，劝他说：“全盘端出来吧！比肖塔，反正他们总归要处死你的！”

许多人提出问题，为什么不趁朱利亚诺睡觉时将其抓获，把一个活人交到司法机关手里呢？就象要回答这个问题似的，比肖塔在一次审理中对主审法官说：“我杀死朱利亚诺，是因为我奉命行事，有人害怕他活着。”

主审法官：为什么害怕？

比肖塔：因为朱利亚诺对黑手党与一些上层人物之间的

关系方面知道得太多了。他手里握有能用来证明存在这种关系，从而使之名誉扫地的文件。

法庭花了不少时间分析与该文件有关的事实经过。律师德·马里奥最终承认了这些文件曾在朱利亚诺手中，但是在杀人的晚上，它们又失踪了。虽进行过极为仔细的搜寻，亦毫无结果。

第一个进入律师德·马里奥家的佩伦钦大尉，向法庭声明：“我是严格遵照卢卡上校的命令行事的。这些文件可能在他那里，但我对此毫无所知。”

有损声誉的材料丢失得无影无踪。法庭调查持续越久，引出的自相矛盾的供词就越多，而且，这些口供，往往是有意识编造的。判决于1952年5月4日作出：根据加斯帕里·比肖塔所犯的大量罪行，不包括杀害朱利亚诺在内，判处他和其他8名匪徒为终身监禁。佩伦钦打死朱利亚诺一事得到承认。内务部长谢尔巴保护了卢卡和佩伦钦。他曾说过：“比肖塔永远不可能有勇气杀死自己最好的朋友。他的手会发抖的。”

对于在幕后掌握着诉讼的全部线索的黑手党，竟连一句话也未涉及。对于法庭来说，这个一系列事件的重要祸首，似乎并不存在。显而易见，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因为他们中的一个领导人也卷入了这一事件，故而对继续追查下去也不感兴趣。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议会上提出的，要更详尽地审理案件的建议，多次遭到拒绝。从1951年11月起，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简直没有涉及一个见证人。

朱利亚诺的案子就这样到此结束了。宣判之后，加斯帕里·比肖塔被送到巴勒莫城的臭名昭著的乌恰尔多内监狱。

在那儿他从事丝织刺绣，听说还写回忆录。

这场戏的最后一幕

案件结束之后，朱利亚诺的匪帮中只有萨尔瓦托雷·帕萨杰姆波一个人尚逍遥法外。1952年8月的一天，一群雇农在特腊帕尼市附近发现了他的尸体。帕萨杰姆波的身上有数处被子弹打穿。

这伙兄弟中的最后一个，名叫皮亚内利的，也遭到了与帕萨杰姆波同样的命运。他因查无罪证而未被起诉。1953年夏天，在芒杰列普雷市郊的一条街道上，发现了皮亚内利的尸体，同样被子弹打穿了好几个洞。

大概得到了朱利亚诺的那些有损声誉文件的鲁道夫·吉洛律师，于1953年末，在西西里岛的卡里尼村被勒死。当年受朱利亚诺委托，安排同谢尔巴在罗马谈判的议员杰罗斯·库朱曼诺，有一天也发现死于非命了。

1953年年底，有消息说，对朱利亚诺匪帮一案大概要重新复审，因为获得了新的、确凿的证据。这些证据首先反对了宪兵上尉佩伦钦的说法。他被指控犯了赌咒发誓提供伪证的罪行。到处都传说，加斯帕雷·比肖塔将重新出庭。这一次的罪名是杀害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

1954年2月9日，加斯帕雷·比肖塔和他那被判30年徒刑并和他同一牢房的继父萨尔瓦托雷，照例得到了一杯早餐的咖啡。患有肺结核的比肖塔，通常都是就着咖啡服药。可是这回他还没放下杯子，就开始抽搐，接着“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板上，非常可怕的疼痛使他全身痉挛。这时他连续不断

地喊叫着：“他们给我下毒药了！我要死了！”

他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被送到监狱医院。到早晨8点钟就死了。后来，解剖尸体时，监狱医生查明，比肖塔和药一起吞下了20毫克的土的宁。^①

大概比肖塔不知道，他在法庭上指控与朱利亚诺有勾结的内务部长马里奥·谢尔巴，在此前一天，达到了他的仕途的顶峰：1954年2月8日被任命为意大利总理。

3月2日，监狱官因合谋杀害比肖塔而被逮捕，可是3月4日又有一个朱利亚诺手下的人安杰洛·卢索，被毒死在狱中。而对于另外七名囚犯来说，土的宁的药量大概是过于小了。

西西里岛上人们早就知道，黑手党的手臂甚至伸到监狱大墙之内。但只是在乌恰尔多内的监狱长退休之后，社会各界才开始知道，在他服务的1946至1957年这段时间，曾有480多名囚犯——许多人受了重伤——住过监狱医院。至于监狱内纯属被杀害致死的人数，他没有具体说。

“芒杰列普雷之王”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黑手党把他和他的匪帮，当做一个驯服的工具来利用，可是一旦不再需要他们，黑手党不仅甩掉他们，而且还要从肉体上把他们消灭。

^① 土的宁：一种烈性毒药。

蜘蛛网中的美国

在美国，犯罪分子辛迪加分支广泛地活动着……权柄掌握在职业罪犯、卖身投靠的政客、手脚不干净的生意人以及各种各样的国家机关，直至税务局和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手中。

他们所有的人都装得象个正派的人。

摘自参议员托比领导的犯罪调查委员会的总结
报告

美国陆军总指挥部的战报中，日益频繁地提到那不勒斯和罗马，蒙特卡西诺和博洛尼亚，都灵和米兰。战报激起了纽约刑事警察局工作人员赫夫林对1934年的回忆。这些往事与维托·杰诺维塞先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杰诺维塞1897年11月21日出生在意大利，1913年5月移居美国。杰诺维塞先生比较喜欢离群索居，远离公共场合的喧嚣，安安静静地工作。他不喜欢象卡帕内，或者托里奥、卢恰诺，或者科斯泰洛那样经常抛头露面。杰诺维塞未必参加过庞大的酒类生意。但他领导的“家族”做着赚钱的买卖——经营毒品。而且维托先生对这个生意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心。

1917年，杰诺维塞因非法保存武器罪而首次被捕；以后的几年，他因贩卖毒品、武器走私、抢劫和勒索，被起诉16

次，但是他常常把自己打扮成一条“小鱼儿”的模样，以致都逃避了惩罚。他千方百计拉关系，努力在社会上谋取高位。维托先生似乎改邪归正了。1925年在纽约汤姆森大街，他创办了“杰诺维塞贸易公司。”在他的商店里可以买到上等的靴油、橡胶鞋掌、细绳和刷子，也可以买到干酪和意大利面条，但只有知道内情的人，才能在杰诺维塞的商店里买到毒品。

1933年维托先生去了西西里岛几个星期。可能他要利用去欧洲的机会，就地熟悉一下穿过大西洋源源不断而来的毒品的发源地。维托先生回来后即命令，清除自己一向信任的博恰。也没有求助于对于此类差事很内行的“暗杀团”，而是将其委托给自己“家族”中一个叫加洛的兄弟，此人毫无声息地完成了任务。过了一段时间，警察发现了博恰的尸体，但是杀人事件始终没有被揭露。

尽管如此，杰诺维塞仍命令另一个黑手党徒埃内斯托·卢波洛也去杀人，不过这一回要杀死的已经是加洛了。也许是因为加洛体壮如牛，也许是卢波洛干得不彻底，总之，这个杀害博恰的凶手活下来了，甚至还指控杰诺维塞为两起杀人未遂案的策划者。

维托·杰诺维塞认为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把管理“家族”的任务转交给弗兰克·科斯泰洛就到欧洲去了。当时意大利正在进行一场黑手党与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之间的战争。然而维托·杰诺维塞先生仍然和元首找到了共同语言，甚至还在罗马开了一家银行。

当杰诺维塞离开美国，到国外时，赫夫林终于控制掌握了上述杀人事件的主要见证人，此人叫皮特·拉滕帕。他是个小强盗，但却能向法庭提供充分有力的证据，证明杀人命

令是杰诺维塞下达的。拉滕帕知道这位势力强大的黑手党的先生如今远在意大利，所以大概是为了换取更为宽容的监禁条件，未加特别仔细考虑，就把事件的经过详细叙述出来了。

此时，许多年已过去了，英美军队正踩着“意大利靴子”，向意大利北部挺进，而杰诺维塞究竟藏在何方呢？

赫夫林致函陆军部，内中历数杰诺维塞在美国犯下的刑事罪行。在函件末尾，他请求下令在意大利紧急搜捕这个危险的刑事犯。陆军部未接受赫夫林的请求。大概是向意大利最高盟军委员会的联络官们查问了有关情况，而我们早已熟悉的陆军准将威廉·奥戴尔就在该委员会里。

但是赫夫林不是那种轻易放弃初衷的人。杰诺维塞是墨索里尼的朋友，大银行家和巨商，曾被授予数枚最高级的法西斯勋章。这种人不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杰诺维塞也真的被找到了，是在离那不勒斯不远的诺拉找到的。杰诺维塞正式地担任了美国陆军参谋部的翻译。他和查尔斯·波莱蒂上校保持着密切而友好的关系，后者也通过杰诺维塞同西西里岛的黑手党进行接触。在杰诺维塞的皮夹子里，有一份军事行政机关民政部门的一位上校霍姆格伦签名的证明信，注明日期为1943年11月。下面就是逐字逐句的本文：“持此信者维托·杰诺维塞系美国公民。我作为民政部的军官一到诺拉，杰诺维塞即向我提出不要任何报酬地担任翻译之职。此外，他还用私人钱财抵补公务开支。杰诺维塞日日夜夜、不惜余力地工作，以自己顽强的劳动给予盟军总司令部以特别宝贵的帮助。”

在同一皮夹子里还有一份美国军事警察局丹恩上尉签名的信，内容如下：“谨请确信，维托·杰诺维塞在我处担任

私人翻译之职。在这一岗位上他给了我无比珍贵的帮助。杰诺维塞在盟军警察局工作的这段时间内，帮助破获了几起美军文职人员在黑市上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事件。杰诺维塞头脑极为清醒，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意大利人，并且无限忠于自己的祖国——美利坚合众国。”

死于增进胆汁分泌的药粉

总之，从这些信函中可见，杰诺维塞在诺拉靠一个老一代的、经验丰富的黑手党人的巧妙本领而行事。他向占领当局出卖那些小的投机倒把分子，这些人在美国军人那里盗窃了一些小东西，影响了黑手党先生对黑市的垄断。那时，美军的物资成吨成吨地从仓库里丢失，卡车成队成队地被偷走，汽油库被盗窃得只剩下最后一小桶，致使供应上的不足有时妨碍了美国军队的军事行动。维托先生的职责不只是个翻译，在诺拉，美国占领当局还委派他负责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工作。此外，他还为美国军官组织了一批召之即来的妓女，即所谓的“应招女郎”。对于美国人说来，他简直成了一个无法代替的人，使得扬格上校在早已发出了的证明信上又补充了以下溢美之词：

致所有感兴趣的人士：

在我作为民政部军官在诺拉任职期间，维托·杰诺维塞是我的私人翻译。此外，在很多场合中他是我的全权代表。对于为美国当局的服务，他不要求任何奖励。我认为杰诺维塞是个非常值得信任的人。对他可以完全信赖。我再次强调，对我，以及对美国，杰诺维塞都给予了非常宝贵的帮助。

当扬格正在这些文字上签字时，陆军部关于逮捕维托·杰诺维塞的命令已经在路上了。它是由美军刑侦处的吉基送达的。1944年元月8日吉基得到命令，而元月12日就收到了匿名信，信中说他不应该打扰杰诺维塞，因为他似乎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任何的损害。作为对此的补偿，向这位美国职员愿意奉送25万美元。当然，吉基拒绝了。但是在诺拉，他遭到了美国占领军当局百般抵制、逮捕象杰诺维塞这样的专家，似乎会给美国军队招致重大的麻烦。

那时皮特·拉滕帕正在布鲁克林监狱等着被驱逐出境。不久拟重审杀害博恰一案。他要作为主要证人出庭作证。

皮特·拉滕帕患有胆囊炎。每天晚上他都要服用一份增进胆汁分泌的药粉。1944年1月16日晚上，他服用了定时通过监狱工作人员送来的通常剂量的药粉。几小时以后，他这个指控维托·杰诺维塞的主要证人，全身抽搐，失去知觉，不久就死去了。法医在鉴定中说，拉滕帕服用的毒药足够“致八匹马于死地”。是谁杀害了皮特·拉滕帕，警察始终也没弄清。

而此时，仍然受到美国占领军军官们敬重的维托·杰诺维塞正在自由自在地到处游荡。但是，性格执拗的吉基毫不让步。1944年8月27日，吉基终于逮捕了维托·杰诺维塞。搜查其住宅时，吉基发现了大堆的美军物资和文件，这些文件证明了杰诺维塞和在罗马盟军参谋部奥戴尔准将手下供职的查尔斯·波莱蒂上校之间的密切合作。

直到1945年5月维托·杰诺维塞才来到等着对他进行庭审调查的美国。但是，这已经不会使黑手党先生感到惶恐不安了。原告方面的主要证人都已经死了。最后，终于“因证

据不足”当局不得不将杰诺维塞释放。

“我们的事业”在维托·杰诺维塞的身上重新找到了有威力的领袖，他有能力领导他们在美国广设分店的生意。

幸运人回家了

卢恰诺与海军情报机关密切而又卓有成效的合作，使沃尔夫律师有理由在1943年2月于纽约州最高法庭上进行辩护，要求将卢恰诺提前释放。沃尔夫的这一辩护，突出暗示了“卢恰诺与社会地位很高的军界人士的密切合作。”但是，当时卢恰诺参与军事活动一事是最高级的国家机密，因此参与此一秘密的人当中，未必会有谁愿意做有利于一个有影响的黑手党分子所必需的证词。

1945年，卢恰诺的律师们提出了新的辩护词。曾于1936年起诉过卢恰诺的前检察官，现任纽约州州长的托马斯·久依支持这个辩护。关于这一点，后来卢恰诺解释说：“久依的支持是我花了5.7万美元换来的。这笔钱我交给了共和党做基金。大概，这是我得以释放的决定性因素。”那时久依州长提名自己代表共和党(用了卢恰诺的钱!)同民主党的候选人加里·杜鲁门竞选美国总统。

1945年末，受理上诉的法院裁决，将卢恰诺提前40年释放并将他驱逐到意大利。

威廉·比奥夫开电影院

卢恰诺走后留下了一个组织得很好的犯罪分子的王国。

这时黑手党的活动早已超出了自己的传统范围。大概已经找不到他的手没有伸进去的生意界了。

比如，1932年，芝加哥“家族”的匪徒们曾向阿尔·卡帕内提出创立工会讹诈的想法。在当局长期监禁卡帕内以后，弗兰克·尼蒂继承了芝加哥黑手党“家族”的先生宝座。尼蒂把卡帕内过去的保镖威廉·比奥夫打发去“自由觅食”了。就在1932这一年，比奥夫结识了一个叫乔治·布劳恩的人。此人是音乐剧院工作者国际联合会（音剧联）第二个有影响的地方组织的领导人。这个联合会不仅联合了舞台工作人员，而且还团结了电影放映员。当时这个组织已加入了美国最有势力的工会——美国劳动者联合会（美国劳联）。

乔治·布劳恩是个出卖灵魂的工会工作者，他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怎样能从自己的职务中榨取更多的金钱。而威廉·比奥夫则是个诡计多端的青年，并正如布劳恩认为的那样，他有着天赋的组织能力，可以成为其得心应手的工具。只是后来布劳恩才明白，不是比奥夫成为他的工具，而是他成了比奥夫手中的工具。

开始时一切都和布劳恩预计的一样。比奥夫成了他的助手和代理人。而且仅仅过了几天，这个诡计多端的匪徒就发现，在芝加哥音剧联里并不是一切都顺利。400名工会会员中有250人失业。比奥夫向布劳恩献计，先放弃高额的固定工资，用这笔经费做一些对工会会员有益的事。用这种欺骗手段就可能会得到工人们的信任，同时也巩固了个人的地位。比奥夫把自己和黑手党的一切关系都利用起来，组织一系列的慈善义演，其收入则用来帮助失业的音剧联会员。按预定计划，比奥夫和布劳恩还会见了“巴拉班和凯茨”公司的领导人

巴尼·巴拉班，此人控制着遍布全市的影剧院和剧场网络，要求巴拉班重新实施1929年前所实行的工资标准。因为这原有的工资标准，在经济危机期间工资普遍降低的情况下也随之降低了。同时并以威胁来强化这一要求。但是巴拉班不把这些要求当回事。于是这两位“工会积极分子”作了让步。他们先求巴拉班保证为失业的音剧联成员组织一个食堂。对于一个大型的影剧院公司老板来说，这是小事一桩，因此他向比奥夫提供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定金，以求后者“说服”工会会员，一定要维持新的工资标准。

工会的敲诈勒索就这样开始了。比奥夫把从各剧院一游艺场所业主那里得到的钱，揣进个人腰包里。可是，工会会员们却在敲诈勒索企业主方面起了一个压力的作用，而且被迫满足于免费的稀汤和其它的小恩小惠。

这时，黑手党所有的芝加哥“家族”，又开始从事这种新型的讹诈勾当。很快就几乎不再需要布劳恩了。尼克·奇尔切拉，即尼克·金，还有弗兰克·里奥来找布劳恩，直截了当地摊牌说：“从今天开始，我们期望从你那里得到各项收入的50%，明白吗？”

布劳恩倒是明白了，可是芝加哥黑手党觉得，只操纵音剧联的地方分部不过瘾，它想把整个工会都抓到自己手里。路易斯·坎帕尼亚、波尔·德卢卡、弗兰克·里奥和阿尔·卢帕内的继任者弗兰切斯卡(弗兰克)·尼蒂等众匪徒当面同布劳恩和比奥夫举行会谈。会上决定让布劳恩出任工会主席。尼蒂提醒大家说，1932年布劳恩曾竞选音剧联主席，没有拿到必须的票数。乔治·布劳恩列举了他的选票不足的地方，纽约、新泽西州、克利夫兰市、圣路易市。众所周知，选举

对于黑手党来说，向来不成为什么问题。合众国的每个地方都有“我们的事业”的“家族”。比如，音剧联纽约地方分会，就掌握在莱普克·巴克特尔手中。于是弗兰克·尼蒂只需要给势力强大的黑手党老板卢恰诺写封信说：“第306地方分会(纽约电影放映师工会—作者注)应该选举布劳恩”就行了。

工会的“选举运动”完全按照尼蒂的计划进行。一些著名的匪徒，亲自出席了工会代表大会，并采取了一切措施，使反对派免开尊口。这次布劳恩当选了。

布劳恩一坐上音剧联主席的交椅，就立即任命了威廉·比奥夫为第一副主席。许多代表猜想到，这种安排意味着比奥夫是工会中大权在握的主人。一些不愿苟同的人退出了音剧联。由于支系庞杂的敲诈勒索，黑手党们把很多的剧院老板控制在自己手中，从而利用自己的全部影响，使工会的反对派成员丢掉了饭碗，而且无法再找到其他工作。

比奥夫和布劳恩把音剧联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并很快地使“反对派们”服服贴贴。弗兰克·尼蒂对各工会头子的各种指示、安排，通过尼克·奇尔切拉贯彻执行。不久，尼蒂和在纽约当家作主的科斯泰洛商定，黑手党的其他“家族”亦应承认并支持音剧联的敲诈勒索。

黑手党在好莱坞

自此，向影剧院的业主进行敲诈勒索成了匪徒们的主要活动。比奥夫以工会的名义，建议增加电影放映员人数。为使比奥夫放弃这个念头，影剧院的老板们不得不拿出很多钱。“巴拉班和凯茨”公司把6万美元摆到桌上，“CC”影剧院股

份公司拿出10万美元，“华纳兄弟”公司拿出3万美元。

这样一来，所有电影发行公司都被置于芝加哥黑手党的敲诈勒索的罗网之中。1936年，弗兰克·尼蒂决定，是黑手党该征服好莱坞的时候了。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面临着不少困难。因为，为了给电影界老板施加必要的压力，加利福尼亚必须有一个音剧联的强大、可靠的工会组织。黑手党转弯抹角地通过全国各州的影剧院，强迫好莱坞电影制片厂的工人和职员加入音剧联，否则，各公司将拒绝聘用他们。

1936年，威廉·比奥夫与“洛夫”电影制片公司的经理尼古拉斯·克申见面，该制片公司同时代表了美国的电影工业，其中包括租片公司。“我发现您的事业很兴旺啊！”比奥夫开门见山地开始说，“我推荐布劳恩做你们工会的主席，因而打算对电影工业提点要求。这样吧，我希望您每年拿出200万美元。”

后来申克声称：他的要求使我震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了。但是比奥夫又补充说：“您可能还没预见到您拒绝的后果。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关闭国内任何一家影剧院。您是斗不过我们的。和我们斗，您必须付出高于几百万美元的代价。对这些问题请好好想想吧！”好莱坞一些最大的电影公司——“二十世纪福克斯”、“雷电华”、“派拉蒙”一经过三思，都付了钱。电影制片公司和匪徒们缔结了秘密协定：大型的电影制片公司一年各交付5万美元，小型的一2.5万美元。

黑手党定期收到支付的现款，多数情况下为当面交清。在一家幽静旅馆的一个房间里，电影制片公司的代表申克代表自己的一些委托人付款。由于这些钱没有列入会计账簿里，因而对于财政机关来说，申克的收入突然大幅度减少了。反

逃避交纳所得税部门认为这个利润数目的变化是一种欺骗行为，于是指控申克犯有藏匿财产逃避纳税之罪。在审判过程中，这位电影康采恩的负责人一直缄口不言，直到判处他3年徒刑时，才说出比奥夫的名字。

1941年对比奥夫和布劳恩进行了庭审调查。从中暴露出来一些惊人的事实。尽管黑手党们也掠夺了各电影康采恩，但是这些厂家并没因此而吃亏。每当好莱坞的罢工威胁已形成不可避免之势时，电影康采恩塞给比奥夫15万美元，于是事态就平息了。影剧联的权力大得使工会可以干扰生产和销售任何一部影片，只要这些影片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不能取悦于敲诈勒索者和他们的保护人。

影剧联在美国的电影工业中仍长期保持着巨大的权力。在上述的事件过去多少年后，该工会的头头们，还向以参议员麦卡锡为首的臭名昭著的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告发过几位进步的电影演员和电影工作者。除此之外，他们还千方百计阻止象“国家中坚”这样一些进步电影在美国影剧院上演。

法庭认定比奥夫犯有讹诈罪，判处他10年有期徒刑。布劳恩判了8年。在法庭上，比奥夫一时疏忽，说出了自己同伙的名字：切尔切雷、里奥、坎帕尼亚、乔耶和尼蒂。14年后，他为破坏黑手党的首要戒律一噤口律条，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1951年比奥夫获释，并定居在亚利桑那州的弗尼克斯小镇上。在那里他认识了共和党人参议员巴里—戈尔杜切尔。不久，比奥夫和戈尔杜切尔成了密友，并经常地乘坐参议员的私人飞机共同出游。后来，1961年戈尔杜切尔曾回忆说：“比奥夫是个非常好的人，他不只外表，就连举止也不象个

匪徒。在我们的小城中，他是个受尊敬的人。他有一所很幽雅的小房子，还有一批相当不错的藏画。”

一天，这位原共和党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一位密友维斯特布鲁克·佩格勒，在一群知己中间讲述了，是什么把黑手党人比奥夫和狂热的反共主义者戈尔杜切尔连在了一起。威廉使巴里学会了一切有利于了解有关工会头子们使用的恐怖，有时甚至是刑事犯罪的强制手段的策略。在这里他所指的那些“工会头子们”，毫无疑问就是那些在“我们的事业”供职的人。

由于破坏了黑手党的噤口律条，就连同极右的共和党参议员的友谊也未能救了他的命。1955年，比奥夫的汽车被一枚塑料炸弹炸成了碎片，当这个“叛徒”踏上启动器时，炸弹就发挥了自己的威力。

受刑之后被割下带发的头皮

1941年，根据比奥夫的供词，当局逮捕了大批芝加哥黑手党分子。1943年3月8日这天，他们坐在纽约市法院被告席上，听着“叛徒”威廉·比奥夫的供词，把牙咬得咯吱直响。他们中有芝加哥黑手党头子弗兰克·尼蒂和音剧联工会的敲诈勒索头子尼克·奇尔切拉。他们每人都有一份长长的罪行录。

在对其种种指控的压力下，看来尼克·奇尔切拉直打冷战。在开庭前不久，他关心地询问过审判员，如果他说出自己某些朋友的名字，会不会给他减刑。但是从2月3日起，奇尔切拉突然拒绝招供，并把一切都否认了。对他情绪上的这一变化，审查员是在仔细阅读了2月3日的报纸以后才猜

出了原因。那一天报纸以大字标题报道说，昨天夜里，在芝加哥的一幢住宅里，发现了已极度变形的，34岁的埃斯特·凯莉的尸体。死者双脚有可怕的烧伤，大概用殴打所致全身瘀血；喉管亦被割断。更有甚者，埃斯特·凯莉被揭掉了头皮。杀人凶手离去时企图把住宅烧掉，正因为如此，罪行的受害者才能被及时发现。

如侦查表明，凯莉只被偷走了两件皮大衣。这一事实使刑警局可以据以推测，杀害这个年轻妇女全然不是为了抢劫，而是出于什么其他动机。

埃斯特·凯莉的记事本成了进一步调查的出发点。记事本上载有几十个男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他们中有十分受尊敬的芝加哥商人。她从在某一小饭店当侍者开始，最后被吸收为游艇俱乐部的编内人员。该俱乐部设有豪华的地下赌厅，其业主是一个叫尼克·金的人，他就是尼克·奇尔切拉。警方确认，埃斯特·凯莉是尼克的情妇。1941年她曾从芝加哥消失过一段时间，把自己蓬松华美的浅色秀发染成了深颜色，同在比奥夫“变调”之后，躲避警察的奇尔切拉形影不离，到处游荡。警察们同样有一切根据认为，奇尔切拉入狱之前曾把20万美元一电影讹诈公司的最后一笔现金转交给埃斯特·凯莉。

总之，在法庭上黑手党们一直顽固地闭紧嘴巴。尽管如此，根据威廉·比奥夫的供词，所有被告均长期身陷囹圄。尼克·奇尔切拉出狱时已是1955年了，并随即被驱逐到意大利。芝加哥黑手党先生阿尔·卡帕内的继承人弗兰克·尼蒂判决后，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个新人出任芝加哥黑手党的领导人，他是安托尼·阿卡尔多。

阿尔·卡帕内昔日的保镖和心腹阿卡尔多，被好友们送了个绰号叫执拗的托尼，对此他完全当之无愧。为解救因好莱坞诈骗行为而被判罪的朋友们，他开动了一切机器。阿卡尔多不只一次同芝加哥黑手党信任的律师尤金·别尔斯泰因商量对策。别尔斯泰因从前在反逃避交纳所得税部门工作，法律训练班毕业后，他成了阿尔·卡帕内的税务问题顾问，还是芝加哥第24区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

个子不高，一头黑发，在从事职业卖淫、敲诈方面深受阿尔·卡帕内信任的路易斯·坎帕尼亚；阿尔·卡帕内的保镖，斯卡费斯最信任的菲利浦·丹多里亚；外号叫“樱桃鼻子”的查尔斯·乔耶和绰号叫堂倌的波尔、里卡一所有这些好莱坞欺诈勾当的参加者，都坐进了亚特兰大监狱。别尔斯泰因建议阿卡尔多，设法把他们转移到利文沃尔特监狱去。因为“良好的操行”是提前释放的主要条件。在制度不十分严格的利文沃尔特监狱里，做到这点比较容易。然后应当交纳犯有偷税漏税罪的被告所拖的欠款，因为鉴于其它更有说服力的罪证不足，他们只能以隐瞒财产，逃避从讹诈电影院“收入”中应缴纳的税款问题被判罪。

是谁支付了欠交的税金？

别尔斯泰因在短短时间内，就将一笔很可观的款额，17万美元交到了税务部门的收款处了。

这以后，别尔斯泰因申请将犯人转到利文沃尔特监狱。同时他又向自己的党内战友，圣路易斯的律师波尔·吉隆寻求帮助。吉隆交结广泛，又是当时已成了白宫主人的哈里·

杜鲁门的老朋友。1945年5月21日，吉隆开始在华盛顿与所需要的人士洽谈，不久即获成功。大概不言而喻，用一万美元这个可观数目来确定这一成功的意义显然是不够的。

在利文沃尔特监狱，坎帕尼亚、里卡、丹多里亚和乔耶享有的优待比其他犯人多得多，甚至允许他们会见律师。有一天，别尔斯泰因来到了利文沃尔特监狱。陪同律师的是一位助手——只有他有权参加这种交谈——一位来自芝加哥，名叫约瑟夫·因布罗吉奥·巴尔杰尔的人。当巴尔杰尔先生向他们做自我介绍时，黑手党徒们友好地笑了起来。原来这不是别人，正是……安托尼·阿卡尔多。他决计凭着虚构的名字来看望自己狱中的朋友。会见时他们商量好了下一步的行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亲密朋友吉隆也尽其所能施加了自己的影响，于1947年8月6日，在上诉法院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辩护词，从而“说服了”法官们。六天以后，黑手党徒们自由了……

报界为赌场老板服务

在芝加哥，阿卡尔多的买卖做得很大，钱就象流水，源源不断地流进他的腰包。阿卡尔多是一家经营啤酒和酒精饮料公司的老板，而且生意非常兴隆。至于这种豪富顺遂的原因，只是在—位芝加哥饭店的主人招供之后才得以真象大白。他说：“如果我们当中的哪一家，有一天来了一个外号人称维利·多拉尔，象撒旦那样的可怕的人说，他是经营啤酒的，希望能把饭店的主人视为自己的主顾，还有什么办法呢？”

除了从合法生意中赚钱外，登记比赛赌注亦是一个十分有利可图的财源。这个特殊的生意部门的交易额是很大的。

在足球季节，比赛赌博的成交额每周可有6000万美元！在全球季节的极盛时期也是这么多。赛马场上的打赌每周是2500万美元。篮球比赛中的打赌1500万美元。从登记赌注中可获得不少利润。但是新一代的黑手党人，认为从事这种“粗活”不体面；他们力图象大的垄断组织那样，在不论什么样的商业部门中，都占据关键地位，从国民经济命脉的角度上使所有的人服从于自己的权力。

在登记赌注中，这些关键阵地在电讯社。它经常向每个登记赌注的人报告比赛结果。最大的电讯处是1939年建立的“大陆新闻社”其1949年收入达到了一个庞大的数字—2.36亿美元。电讯社仅为租用“西方联合电报公司”的线路，就要付100万美元。

40年代中期，芝加哥黑手党向“大陆新闻社”发起了进攻。一天，一个叫塞里泰拉的人出现在电讯社老板杰姆斯·里甘的办公室里。他首先转达了阿卡尔多的“问候”，然后建议把自己的一些朋友算做公司的股东。而里甘则应成为公司的合伙人，且由此而得的收入也相当不错。

然而里甘拒绝了 this 建议。他出生于芝加哥，所以懂得匪徒们的建议意味着什么。于是他事不宜迟地把这件事通知了联邦调查局和检察机关，并雇用了一批武装保镖保护自己。但是，无论是联邦调查局，还是检察机关，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带来阿卡尔多口信的塞里泰拉是个受尊敬的人，在伊利诺州的参议院参加会议已经有12年了。况且他还是里甘的朋友。

起初，里甘与其说应该为自己的生命提心吊胆，倒不如说需要为自己干的事业而担惊受怕；他有了一个十分危险的竞争者—新组建的登记赌注信息电讯社—“横贯美国”。

很快这家电讯社开始威胁里甘公司的垄断地位。这时有位叫塞蒙·帕特尼的人，在堪萨斯城打着“哈尔莫尼出版发行公司”的幌子，开办了登记赌注的事务所。这一来，向这家公司提供信息的里甘的收入才有所增长。但是黑手党徒比纳日奥和加尔托塔与帕特尼的一次“严肃的谈话”就足以使“哈尔莫尼出版发行公司”的事务所开始与“横贯美国”电讯社合作了。

“大陆新闻社”的这位领导人，为自己的生存进行了绝望的斗争。这两个公司间，以资本主义奉行的竞争精神，进行着残酷的角逐。如果说里甘在经济上还能勉强支撑住，可是在对付枪弹上，他可就无能为力了。1946年6月24日，斗争结束了。黑手党的凶手，在芝加哥一条街上，向里甘射出一排自动步枪子弹。第二天他死在医院里。当地警方把杀害里甘案归到“未被破获”那类里了。

里甘死后，一个拥有不大股份的，名叫米基·马克布里兹的人，获得了“大陆新闻社”的股票控制额。他主动提出，用10年分期付款的方式给里甘的继任人37万美元。于是，从这一刻起，发布信息的“大陆新闻电讯社”就转到了黑手党的手中，而马克布里兹则是个冒名顶替的人，真正的主人叫安东尼·阿卡尔多。

和佛罗里达的结合

阿卡尔多夺取“大陆新闻电讯社”的行动，是在纽约的一个黑手党先生弗兰克·科斯泰洛的帮助下进行的。科斯泰洛在掠夺了路易斯安那州之后，又开始打佛罗里达州的主意

了。在那里，在众多的夜总会和赌场中，有个莫名其妙地称为“站和走”的赛马赌博事务所。1944年，科斯泰洛开始覬覦这个联合了200多佛罗里达登记赌注人的事务所。而向这个事务所提供信息服务的是“大陆新闻电讯社”。因此，科斯泰洛轻而易举地就控制了那个登记赌注事务所。

接着，科斯泰洛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设立在美国亚热带半岛东部沿海一带疗养城市的赌场上。这个有影响的黑手党徒，在这里拥有一座带有赌厅的“殖民地旅馆”，仅1948年一年，就获纯利约380万美元。继他之后，另外一些黑手党人，也在阳光灿烂的南方，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了各种旅馆。“沃弗尔特”旅馆的老板，就是阿尔·卡帕内过去的律师外号人称矮子奥吉·皮扎诺的安托尼·卡尔法诺。他的继父杰米凯利是黑手党的代理人、民主党的领导人阿尔伯特·马里涅利的继任人；迈阿密的“山茨旅馆”由来自克里夫兰黑手党“家族”的阿尔弗雷德·波利齐出资经营。

运用休·朗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和阿乌莱里奥在纽约的工作经验，科斯泰洛决定也把佛罗里达州的权柄抓在自己手里。1948年，富勒·沃伦参加州长竞选。但是，他没有钱去支付昂贵的竞选活动费。

大柑桔种植园主格里芬，捐赠给他15.4万美元。在芝加哥和迈阿密拥有跑马马厩的威廉·琼森，又给他10万美元。但这都不是出自本人的腰包。这笔巨款，他是通过波尔·里卡从芝加哥黑手党那里得到的。

巴格西和他的伯爵夫人

匪徒们不只向美国南部伸展，而且还向西部，向加利福尼亚州，沿着开发北美大陆的拓荒者大蓬车的轨迹，扩展自己的势力。

卢恰诺在1936年被捕前不久，委托自己的老朋友本杰明·吉格尔，把黑手党的资本投到西部各州的生意上。吉格尔怀着对这位黑手党先生衷心的感谢，带着装有25件衬衫的皮箱与妻子以及两个女儿上路了。他们平安到达了洛杉矶，在那儿租下了一套有35间房子的住宅。

起初，本杰明·吉格尔（“我的朋友们称我为本”，——他说，“不熟悉的人称我为吉格尔先生，而叫我无法忍受的是伙计们叫我疯子”。只限于组织经由美国—墨西哥边境的毒品走私。正如后来所证明的那样，这是很有远见的一步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欧洲到美国的走私途径均已封锁时，墨西哥实际上成了毒品的唯一来源地。

不久，金钱从这一新的源泉中，象大河一样滚滚流来。吉格尔不但富有，而且时间也充裕。他开始好莱坞的电影明星圈子中周旋，并结识了不少电影工业界的老板。他最经常出现在吉·弗拉索伯爵夫人的社交圈子中。此女人在和意大利伯爵结婚前，有一个朴素的名字多拉蒂·泰洛尔。简言之，匪徒开始扮演一个纸醉金迷、生活放荡的角色了。

吉格尔和吉·弗拉索伯爵夫人一起在意大利漫游，在那里结识了法西斯上层人物，甚至受到墨索里尼和他的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的接见，这一切都多亏了伯爵夫人的爵位和万

贯家财。墨索里尼同与黑手党有关的匪徒会见这件事，对于了解法西斯头子同黑手党进行的那场斗争的特点是十分合适的。

可是两年以后，由于参与杀害匪徒加里格林·贝尔格，吉格尔出庭受审。在纽约，我们早已熟悉的艾利·坦南鲍姆和艾普·里斯曾供认，他们听到了吉格尔如何发誓要“照顾格林贝尔格”。

本·吉格尔服刑的那个监狱的规章制度，对他来说不是十分难以忍受的负担。在法庭所定的一年监禁期中，吉格尔18次离开监狱的高墙，每次达数日之久，为料理业务和医治疾病。有一次甚至看见他在好莱坞的一家饭店中，与电影演员们在一起。吉格尔还得到允许，随时可与外界通电话，穿着为他特制的合体的囚服……

与此同时，吉格尔的买卖，在他的两名副手的监督下，仍然兴旺发达。副手之一的杰克·德拉戈纳，1891年出生在西西里岛，1915年首次在美国法院出庭受审，德拉戈纳在加利福尼亚经营的商业范围极广：赌场、登记比赛赌注、贩卖毒品、经营葡萄园和海上运输香蕉等等。那时，德拉戈纳已经把加利福尼亚的赛场赌博事务所“环球新闻社”控制在自己手里，在该所的协助下，他协助阿卡尔多夺取了“大陆新闻电讯社”。

第二个副手麦克·考恩，代表吉格尔的政治利益。他以和阿尔杜尔·史密斯牢固的友谊，而成为对吉格尔有用的人。阿尔杜尔·史密斯后来成了加利福尼亚州议会中，吉格尔的有影响的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

史密斯说：“您和自己的州长一同前进吧！我是这些人民

代表的主人!”——他的话与吉格尔最喜爱的想法“我们不背上职位的包袱，我们把政治家掌握在手中!”简直是相互呼应。

担着风险去内华达州

临近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吉格尔重新获得自由。由于他认为，在做有利可图的军需供应买卖方面，匪徒一点也不比别人差，于是他就弄到了一个工厂。

战争结束时，吉格尔为黑手党开辟了内华达州，这是一块大部份都是贫瘠土地的领土。1859年，这里发现了新的金矿脉。可是，这一回不是在大地下面，而是在州的法律里。内华达州不同于美国其他大多数州。它的法律允许各种类型的赌博。这促使新一代的冒险家萌生了在拉斯韦加斯开设赌场的念头。

吉格尔觉得，他在这里或许会大大地走运。他是第一批来到这里的人之一。他计划建一个附设赌厅的豪华旅馆，而且要在美国同类赌场中，出类拔粹，规模最宏伟。他打算给这个豪华旅馆命名为“红鹤”。吉格尔决定用个人的资金建成它，并且自个儿经营。一个人，不要黑手党！他从自己的口袋中可以拿出约100万美元。但是，建筑人员提出的初步预算，已超过了吉格尔能力的半倍，在建设进程中，开支更为增加，达到了一个庞大的数字。

吉格尔在美国到处奔波，狂热地寻求贷款，他甚至找一些黑手党分子求援，想以自己的难以实现的宏图打动他们的心。他们贷给他300万美元，只是条件特别苛刻。

1946年12月26日，“红鹤”旅馆隆重开业。但是，预期的热火朝天的赌赛，并未随之到来。两星期之后，吉格尔不得不关闭了旅馆，继续建设工程。1947年3月27日，旅馆重新开业，但是这一次也没有任何收益。本杰明·吉格尔的债务已增加到650万美元。

经营幻觉

据纽约市卫生局宣布，纽约市每年出生的几百万新生儿，已经遭受了嗜毒的危害。按专家的意见，嗜毒母亲的孩子在胎内就已中毒，出生后，一旦缺乏业已习惯了的一定量的麻醉剂，就感到痛苦。如果不对他们采取相应的医疗措施，他们中的许多人，用不了多久，就会死去。

美国《合众国际社》

1966年3月14日

1947年2月，古巴报纸《古巴时代报》的第一版上，登出了一条简讯：卢恰诺现住在哈瓦那。这一消息在纽约引起的反响不亚于爆炸了一枚炸弹。当时正在古巴度假的斯克里普斯报业康采恩的新闻栏编辑罗伯茨·柳亚克，立即用电报给自己的报纸发了一篇文章，报道说，这位著名匪徒一如往昔住在古巴首都，保镖与他寸步不离。卢恰诺经常接待从美国来的客人，其中有阿尔·卡帕内的弟弟拉尔夫·卡帕内和著名的小型文艺歌唱演员弗兰克·希纳特拉。

美国当局对这个报道的反应非同一般，极为重视。美国大使坦利·诺韦布向古巴外交部递交一份照会，威胁说，如果不把卢恰诺驱逐出境，将对岛上实行禁运。古巴政府迫不得已，只好照办。内政部长阿尔弗雷多·佩库艾内奥，就此

事与秘密警察头子别尼托·格列拉进行了协商。几天之后，卢恰诺搭乘一艘土耳其船去了意大利。他的护照上有驻罗马的古巴领事签发的正式签证。据说，多亏一位“有威望的古巴人士”的协助，匪徒才弄到了这个签证。

这个时期的哈瓦那，是美国社会上流人士最喜爱的休憩之地。他们认为到古巴去，顶着灼热的苍穹，在夜总会里寻欢作乐，是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每逢周末，专门包租的一些飞机，把醉心于消遣的人群送到岛上。1947年初，一个相当奇特的旅游团体来到古巴。它的成员中，有从纽约来的，警方非常熟悉的弗兰克·科斯泰洛；有来自新泽西州、专搞冒险赌博的行家威廉·莫雷蒂；还有来自芝加哥的乔·阿多尼斯和费舍蒂兄弟。哈瓦那已成了自大西洋城（1929年）会议之后，匪徒们召开大型的和最重要的碰头会的地方。

匪帮会议的日程表上，正如所知道的那样，有两项议题：组织经营毒品；黑手党昔日的同伙，匪徒本杰明·吉格尔的行为问题。有关吉格尔的议题，迅速得到了解决，要求他尽快使一切就绪，然后移交给黑手党。

当吉格尔接到最后通牒时，企图为自己辩解。他首先同纽约的弗兰克·科斯泰洛通了电话，后来又打电话给芝加哥的查理·费舍蒂。失去一切希望后，他决心孤注一掷——打电话给卢恰诺，还威胁说要把这一切报告给警察局！尽管吉格尔不是黑手党徒，但是，他同样应该执行噤口律条。1947年7月20日是本杰明·吉格尔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下午，他从拉斯韦加斯飞到洛杉矶，因为在那里他为自己的情妇维尔吉尼·希尔租了一套有16个房间的别墅。

当时，这位“黑手党的玫瑰”没在家：她在巴黎休憩。吉格尔用专为自己制造的又厚又重的金钥匙打开了入口的大门，更衣后就去会见自己的律师，然后，和几位朋友一起用了午餐。当时针指到22点15分时，吉格尔和自己的朋友艾伦·斯迈里，回到了维尔吉尼·希尔的别墅里。

正值22点45分时，这两个朋友所在房间窗户上的玻璃，随着轰的一声巨响，顿时成为碎块，散落一地。斯迈里当即扑到地板上。而两枚卡宾枪子弹准确地落到了本杰明·吉格尔的头上。

警察在别墅前的玫瑰花丛中，找到了凶手使用的卡宾枪。没发现指痕，也没发现任何可证明有人的物证，谁也没看见开枪的人……

就在这天晚上，在拉斯韦加斯，四个男人坐在红鹤旅馆的休息大厅里，默默地抽着烟。22点45分时，他们站了起来，走到自己的上司面前。其中一个叫莫塞杜埃的说道：“好了。现在这家店铺是我们的了！”

走向梦幻的世界

罂粟——植物学家这样称呼一种罂粟科植物，它的白色浆液从成熟了的罂粟的硕果的切口处流出，干透时，就变成了栗色的糊状物——鸦片。①

鸦片包含25种不同的生物碱，其中之一的吗啡，是19世

① 对催眠的罂粟的评论在大约纪元前4000年时已在苏美尔铭文中见到。

世纪初第一次从鸦片中提炼出来，在医学上用作镇痛药。后来，服用吗啡者逐渐取代了吸食鸦片者。为了医治吸食吗啡者的这种致命的嗜好，1908年，一位德国化学家用把鸦片蒸馏的方法获得了一种新药——吉采米莫芬后来称作海洛因，当人们得知海洛因是在鸦片基础上获得的更加危险的麻醉剂时，已经是后来很长时间的事了。

海洛因并不是唯一广泛使用的、能在人们身上产生极乐世界般幻觉的药剂。例如：印度大麻经适当加工也可提炼出称为大麻膏或者印度大麻的麻醉剂，而从产于南美的古柯的灌木植物中，则可提取出可卡因。

所有这些起源不同的天然毒品，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使意识发昏，产生恍惚的感觉和平静的幻想。可是机体很快就习惯了麻醉剂。于是染上了吸毒嗜好的人，不得不经常增加剂量，以求得能舒服地沉浸到梦幻的世界里。慢慢地，但却不可避免地，在人的机体中产生破坏作用，最终导致死亡。

近来，嗜毒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已达到了非常可怕的程度。医生和警察局为制止嗜毒所做的努力，至今没有什么明显成效。对于将来会有什么改变亦不抱任何希望。社会上，一方面，许多人只有在服用毒品中才能看到自己可怜的生活出路；同时，另一方面，经营毒品会带来非同寻常的利润。于是，在这样的社会里嗜毒便成了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在人类历史上，嗜毒从未象现在这样，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如此的群众性。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这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嗜毒的人数居世界首位。

对与毒品走私入境和非法销售进行斗争的措施的研究，

犹如乌龟爬行①。

1909年在上海召开的国际会议决定把鸦片的买卖置于监督之下。1912年在海牙签订了关于鸦片的生产和销售的第一条国际公约。1924年和1925年缔结了对鸦片贸易进行监督的一系列国际协定。1931年对麻醉品罂粟的栽培作了严格规定，并确定了生产国的具体定额。1948年联合国(组织)下属成立了反毒品委员会，1961年签署了共同对麻醉品合法买卖的监督 and 禁止非法买卖的协定。

尽管国际协定和国家法律使麻醉剂生产具有一定的困难，但还不能使它灭绝，因为对某些国家来说，培植这种获得麻醉剂的原材料的植物，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来源。

结果是伸张正义的法律之剑主要指向了吸毒者、小的非法销售者和转手倒卖人；而对从事毒品生意的大豺狼们，照例是触及不到的；他们凭借自己的财富，很容易从法律的罗网中溜掉。

黑手党人早就决定要经营毒品了：鸦片在中东，主要在黎巴嫩和土耳其合法及非法种植，然后在法国和意大利把它制成海洛因。只有在此之后，海洛因才运到美国或什么其他国家。

除了黑手党，还有谁能对付得了这么复杂的非法的国际业务？因此，有着走私和非法买卖酒类丰富经验的黑手党人，决定把美国的毒品运送和批发销售的工作抓到自己手里。若能成立垄断组织，操纵市场价格，这种一本万利的生意将带

① 从1912年到1953年签订了九项国际协定和议定书，建立了对毒品制剂的生产和销售的监督，并规定了消除致使嗜毒者发展的原因和制止毒品非法买卖的一切措施。

来更高额的利润。1947年，黑手党自认为已十分强盛有力，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了。

就这样，在伊斯坦布尔，黑手党人用700美元买下10公斤鸦片，在贝鲁特将这些“原料”制成吗啡；从10公斤鸦片中提炼出1公斤吗啡，而价值已是5000美元了；在意大利1公斤吗啡再加工成1公斤海洛因，其价值便增长到7000美元。而在纽约，这一数量的毒品的售价是1.6万美元，然后再通过往海洛因掺进乳糖的方法，1公斤海洛因又可制成7万份，每份5美元。这一来从每10公斤鸦片中倒卖者的“油水”就高达33.6万美元！

为了从中得到最大限度利润，必须关心扩大销售市场，寻求扩大嗜毒者队伍的方法。按传统，黑手党已不干“粗活”了，所以把这项任务推到“零售商”的身上。这些零售商处在长长的毒品销售链条上的最末端。据美国杂志《每周新闻》估计，50年代初有2000个零售商向纽约的3万名吸毒者供应这类商品。另一个杂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确认：“青年中出现嗜毒乃是我们时代的特征”。

给孩子的“热注射”

在扩大毒品销售市场方面，零售商的基本对象是抵抗力最小的少年。艾伯特·坎在自己的《死亡游戏》一书中谈到，“为了增加主顾，许多商人在孩子们还没‘上钩’时，无偿地送给他们麻醉剂，一旦他们到了绝对需要这种毒品的时候，为了满足自己强烈的渴求，为商品付出多少钱，他们都心甘情愿。”

对美国儿童犯罪急剧增加的分析表明，大多数少年犯罪

均为了弄钱购买毒品。1951年7月11日,《生活》杂志写到:“危险的症状证明了严重的社会性疾病的发展。美国最大的一些戒毒诊疗所的患者平均年龄,突然下降到10岁。芝加哥的居民震惊的获悉,他们城市被捕的每五个吸毒者中,就有一人是未成年的孩子,甚至有一些才12岁。据纽约警方估计,该城至少有5000名嗜毒者年龄不足20岁。”

纽约社会拯救委员会的一位技术顾问,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说:“毒品贩子倚着学校的大墙、守候着去上课的孩子,而这些孩子顺路走过时就手递手地得到了‘商品’。”50年代警方在调查中揭露出一些十分吓人的事实。一旦零售商对哪个买过他毒品的小孩萌生怀疑之心,担心小孩会出卖他,他就给小孩进行所谓“热注射”,也就是给他一份会导致这个孩子死亡的毒品量。

纽约医务界要求当局采取坚决措施,制止把毒品卖给儿童的罪恶行径,还委托自己的委员会就毒品问题向纽约州长送交了抗议书。《新闻周刊》在报道该委员会这次活动的结果时写到:“他们就象愚蠢的小学生,同严厉的教师会面之后那样,各回各家去了。”假若期待着另一种结果那就奇怪了,要知道,以不甚体面的方式对待这个公众委员会的代表们的纽约州长就是……威廉·奥戴尔。这个黑手党人的老朋友,当时成了美国最大的和最富有的城市的首脑!金钱——资本主义社会万事万物的尺度——使犯罪界和寡头政治联合一起了。

这就无怪乎财政部的反毒品局领导人亨利·安斯林格曾抱怨说:“我们局里总共有180名职员。他们为堵住与毒品有关的这股犯罪洪流的努力,可以被比之为,妄想借助一叠吸

墨纸吸干大海。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在同走私贩子、匪徒、批发商、零售商和嗜毒者作斗争。我们耐心地捕捉他们，但是我们不能使他们同社会长久隔绝。作为惩罚，给他们规定的最大惩罚期限约为16个月。我们把一个匪徒集团送入铁窗，就要马上着手收拾另一个。当我们终于抓住了另一个，可是第一个——已经重获自由，又再次重操旧业。就是这样在恶性循环。”

卢恰诺的教授们

可是卢恰诺坐在意大利，却使这恶性循环越循越快。在土耳其的《巴吉尔》号船把他从古巴运回后，开初，他回到了自己的西西里故乡。但使其惊诧的是，在巴勒莫他竟陷入狱中。不久他被放了出来，接着就被放逐到大陆，并附有一条在任何情况下不准上岛的严厉命令。

卢恰诺在罗马的“土耳其”旅馆没居住多久，就在一幢超现代化的，按美国风格建筑和布置的别墅里住了下来。人们常在赛马时看到他。“他生活得象个国王，可是他却 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警察对他毫无办法，只能唉声怨叹。

卢恰诺经常接待许多人，特别是从美国来的客人。这些人不仅仅有象麦克·拉斯卡里或者麦克·斯皮内拉这样的美籍意大利人。卢恰诺的常客还有他的老朋友迈耶·兰斯基。这位来访者是美国当局最感兴趣的人。但是，什么也不能使迈耶·兰斯基陷入困境：“您是知道的，旅游局总是把什么给弄错，这就是为什么连我也感到意外地来到了《意大利》号这条船上。您自己也明白，在大洋中我是没法下来的。请想象

一下，当这条船停靠在意大利岸边时，我是多么吃惊。电话铃响了，您猜，是谁打的电话？我的老朋友和生意上的同行，幸运人！您想想看我是多么惊奇吧！我问他：“真了不得，你从哪儿知道我在这？”他回答说：“当然，是从报纸上了！”

至于说卢恰诺的收入来源，只有反毒品局可以提供其中的一些详情。该局在1950年确认：“目前意大利是通过走私运进美国的全部海洛因的主要供应地。”

这个声明是根据当年被捕的2482名毒品贩的供词而发表的。经查实，恰好是卢恰诺回到意大利三个月后，第一大批价值25万美元的走私海洛因运进了美国。

1950年，意大利警察局终于狠狠打击了卢恰诺的“毒品走私托拉斯”。这年夏天，在的里雅斯特逮捕了一名叫马泰奥·卡尔皮内蒂的人，当时他正在把一包海洛因交给一名外国海员。刑事警察局顺藤摸瓜，才开始弄清楚卡尔皮内蒂的关系网。化验调查表明，没收的海洛因是由一家大型制药厂制造的。这家工厂经国家批准，可以生产海洛因供医疗上使用，但对该项产品的产量必须向当局进行如实报告。但是，卡尔皮内蒂不是在这家大型制药厂，而是在另一家著名的“斯吉亚帕莱利”商行购买的这批海洛因。这一来，战后意大利最大的丑闻爆发了。卢恰诺在一些合法的商行里搞到走私的海洛因！一些意大利社会的上层人士也卷进了丑闻之中。

埃吉季奥·卡拉希别塔是著名的“萨其”商业公司财运亨通的老板，而且享有良好的声誉。该公司经营药物制剂，同时向纽约一个集团供应海洛因。

朱里耶尔莫·巴诺尼教授是米兰大学医学系教研室主任，米兰“赛包姆”公司的经理。他共计出售给热那亚的阿尔

曼多·罗季900磅海洛因。后者是卢恰诺走私毒品运输问题方面的助手。是巴诺尼教授使这个黑手党人和卡拉希别塔相识的。

都灵大学的卡洛·米里亚尔基教授是意大利最大一家生产海洛因的“斯吉亚帕莱利”公司的营业和技术经理。他把巴尼诺介绍给了卢恰诺。米里亚尔基向黑手党供应的不仅仅是自己公司的海洛因。自1948年起，他晚上在地下试验室共制成770磅海洛因，在美国零售，给他带来1.28亿美元的纯利润。

经过侦查，意大利警察局对卢恰诺通过非法途径把毒品运送到美国的同伙们有了全面的了解。他们中居首位的是尼科洛·金吉列，此人是美国“我们的事业”的首领之一。他1937年被捕，但当时警察局没能提出足够的可以对其判罪的证据。1940年，因贩卖毒品金吉列总算是被判处罚金1.5万美元。1945年，这个黑手党徒跑到意大利去了。和他一起的还有加盖塔诺·吉奥福洛，他就是布鲁克林区来的匪徒查利·扬格，负责卢恰诺在的里雅斯特区的匪徒“康采恩”的业务工作。

但是意大利警方没有触动黑手党徒们，因而深受尊重的教授和经理先生们仍然逍遥法外。对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指控。只在1953年元月，斯吉亚帕莱利制药厂关闭了。可是一个月后它重又开工。一位司法机关的代表说：“社会终究不可能因某位教授行为不得体而对其治罪。”

法院在这件丑闻中的无所作为，使人们就意大利政府对该问题的态度做出某些结论。公开进行审理，大概会对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家们是个打击，同时也会暴露出不合心意的关系。老实说，在战后的意大利不乏类似丑闻。但是这一

次会从根本上危及统治阶级的地位，引起一场爆炸，要想扑灭它极不容易。与此相关还必须考虑到，当时意大利各阶层人民，不仅城市无产阶级，还有农村居民，都在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在波河的河谷，农业工人在罢工，而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农民开始夺取地主的大片地产。

贾尼尼“变调了”

经营毒品能带来神话般的利润，但也蕴蓄着一定的危险。隶属纽约107街黑手党“家族”的弗兰克·卡拉切，以个人身家性命理解了这一真谛。黑手党责成他前往直意大利，再从那儿带回来一批毒品。弗兰克动身去了西西里岛，在那里遇见了自己的伯父弗兰切斯卡。接着他又去了米兰。在这里与一个叫乔·皮奇的人相会。这个皮奇，在匹兹堡俄亥俄州作为毒品商人和卖淫业讹诈勒索者，开始了自己黑手党人的生涯。战后，美国当局把他驱逐到意大利，于是他成了卢恰诺的合伙人。皮奇在米兰交给弗兰克·卡拉切3公斤纯海洛因。

但是，弗兰克·卡拉切在罗马机场被警方逮捕了；在巴勒莫等着侄儿的他的伯父，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至于缉捕皮奇却不大顺手，尽管他的名字被列在通缉名单之上，一些报纸也登载了搜捕他的公告，然而皮奇却仍堂而皇之地举办喜事。只是三个月后，警方收到了一个关于他的居住地点的匿名报告，于是行动小组一拥而出，突袭米兰郊外的一座别墅。警察的骤然出现并没有使皮奇惊慌失措，他继续安详地进早餐……

法院判处皮奇18个月徒刑。可是规定的坐牢期限他连一

天也未“坐”，普遍大赦使皮奇免受了惩处。不久，弗兰克·卡拉切也获得自由。

很显然，这次逮捕不是一次偶然之举。警方对黑手党的活动已了如指掌，这说明在黑手党的队伍中出了奸细！

这个奸细就是埃乌格尼奥·贾尼尼，绰号叫杰涅。贾尼尼1910年出生于西西里。幼年时期和双亲一起移居美国，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庄长大。18岁时参加了一场武装袭击，因此被监禁了5年。1938年因抢劫再次受审。30年代末他已被公认为卢恰诺“家族”中最有威望的黑手党徒之一，被任命为卢恰诺委托其领导毒品经营的安东尼·斯特罗洛的副手。贾尼尼很快积攒了一笔可观的财产，成了“依格尔西方公司”的股东。这家公司对饭店供应工作衣、餐具和其它必需品。在贾尼尼加入“依格尔西方公司”后，该公司的生意一下子兴隆起来；因为这个匪徒利用讹诈这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把所有的竞争者都握在自己的掌心里。然而，毒品生意仍是他的主要经济来源。1942年他被捕了，关了15个月。战后贾尼尼成了一位最为精明能干的毒品贩子。他建立了一条他们运送毒品的新渠道——从罗马经巴黎到纽约。在这件事情上，法国人约瑟夫·奥尔西尼起了重要作用。此人在美国已居住多年，战争爆发后，被派到法国与法西斯代理人搞合作。在米兰和罗马，贾尼尼的人与卢恰诺的一些心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51年4月，贾尼尼再次来到意大利。在这里他遇见了自己的朋友和搭档多米尼科·别特列里。但是不久幸福和这对伙伴断绝了来往。他们被捕了。搜查时发现了4公斤海洛因。就在第一次审问时，贾尼尼厚颜无耻地向意大利警察局的工作人员声称，他是美国反毒品局的特工人员。他敢于如此讹

诈,原则上说不无根据,因为的确有不少反毒品局的人员在意大利活动,而且还有美国联邦局的特工人员。然而,在同美国反毒品走私局的代理机关的间谍头子查尔斯·西拉古萨会见后,贾尼尼的谎言便被拆穿了。

而且顺便还又弄清楚了,尽管贾尼尼本人并不知道,实际上早在一年前,他已经给该局效过劳,而且其价值是无法估计的。

假 侄 儿

事情是这样的:1950年,贾尼尼找到了狱中结识的一个老熟人,叫乔·安德森,希望他去意大利取一批毒品。过了一段时间,安德森答应参加这件工作,条件是由他的侄儿代替他前去。杰涅毫不怀疑自己的朋友在耍阴谋鬼计,可是后者在长久的思索之后已到警察局自首了。他举荐给贾尼尼的“侄儿”实际上叫安东尼·齐里利,是反毒品局的工作人员。贾尼尼交给假侄儿四个扁平的塑料背壶装海洛因,这些壶借助于有胶的带子很容易藏到衣服下面。另外还有一封密码信,以及半张美钞。临别时他对“侄儿”说:“你去那不勒斯,在南郊找一个我们的人。在他没有把那半边美钞拿出来时,不要向他亮底。”

齐里利要用半张美元与其挂钩的人,叫朱塞佩·佩拉格里诺,他是贾尼尼的妹夫。当齐里利和佩拉格里诺在萨莱诺的一个饭店里,同皮包里装着4公斤海洛因的杰纳罗·里齐奥见面时,警察猝然到来。

西拉古萨使这个匪徒看清了他们是怎样用“侄儿”欺骗了

他。而且这似乎足以使贾尼尼开口了。他开始供认说：“我打算去西西里的巴勒莫，同卢恰诺和战后从美国驱逐出来的一个老朋友相会。有一天，幸运人对我说，他准备和比奇一起搞毒品生意……”

审问结束时贾尼尼供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真情：在卢恰诺被驱逐出美国后，一个在犯罪界有着广泛联系的人，成了美国黑手党头头。这个人是由美国毒品贸易的最高协调者——幸运人亲自任命的。

总之，正是从贾尼尼口中，警方第一次知道了黑手党和“我们的事业”的领导易人之事。但供词中没有指出这个王中王的具体名字。有可能贾尼尼指的是维托·杰诺维塞先生。当然，总的领导大权依旧握在卢恰诺的手里。

1952年2月，美国对贾尼尼的搭档奥尔西尼提出公诉。反毒品局的暗探朱利安纳做了证词，向陪审团讲述了毒品走私的渠道和奥尔西尼的领导作用，并讲出了所有同伙的名字。而奥尔西尼的辩护人则追问证人，是从谁那里得知了如此这般的详情？他要求不能把该暗探人的证词看做他的当事人的罪证，原因是这些材料很明显的只不过是基于“传闻”。在这种情形下，朱利安纳才迫不得已在宣誓后讲出了贾尼尼的名字。

在排水井中死亡

整个这段时间贾尼尼都被关在罗马狱中。最后美国当局把他引渡回美国，以一万美元的保证金将他释放了。出狱后，贾尼尼只祈求上帝一件事：“千万可别让幸运人知道这一

切，否则，我可就没命了！”他根本没料到，在奥尔西尼的案件中已经亮出他的名字。

……1952年，一个美好的九月的早晨，卖蔬菜的商贩安东尼·桑多拉，和往常一样打开了自己位于纽约107街的铺门。他把遮窗板升了起来，把装着新鲜水果的箱子摆在门前，仔细地审视了一下擦得明光锃亮的橱窗玻璃。由于这么早顾客不会光临，他决定沿街散会儿步。突然，他发现路旁的水井中有一对呆滞无神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桑多拉一下子呆住了，接着就奔向了电话。他还未来得及向警方详细汇报，就听到街上警车的警笛声了。

几分钟之前，位于126街区的警察局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我听到了某种类似射击的声音，大概是在110和111街区第二条林荫大道上的某个地方。”没等值班警察细问，那边的电话就挂上了。

警察们把身穿浅色西服的尸体弄走了。这件罪行不象是抢劫杀人；因为死者口袋里还放着140美元和一个驾驶证，上面的名字是杰涅·泰拉格里诺，另外还有一块金表。开枪距离很近，几乎就在跟前。验尸时没发现任何搏斗的痕迹。凶杀事件当然不是发生在这儿，即第107大街，而是在匿名电话所指的那个地区。他们可以把尸体装上汽车，运到5个街区之远的地方。

在对死者暗兜进行仔细搜查时，发现了一张附有通讯处的名片，上面写着：“杰涅·贾尼尼·金斯捷尔，石油燃料公司”。毋庸置疑，这就是那个贾尼尼。他用做毒品生意赚的钱在金斯捷尔买下一家生产液体燃料的公司。他还成了黑手党队伍中的警察局的情报员，一个敢于破坏噤口律条的疯子！

同样的命运也落到了多米尼科·别特列里的头上。1953年他回到美国，就在纽约隐蔽起来，千方百计避免同任何人会面。尽管他谁也没出卖，什么也没说，但他有理由害怕黑手党的报复，因为他是贾尼尼最亲密的朋友和伙伴，所以，黑手党徒们也会怀疑他与警察局有联系。

1953年12月9日凌晨4时15分，别特列里坐在已经空无一人的酒吧间的长桌后边。这时，三位衣着考究的年轻人走进了大厅；他们全都戴着墨镜，双手深插在衣袋里，径直朝别特列里走来。后者一下子跳了起来，想逃跑，可是对他后脑勺短促而猛烈的一击，使他倒在了地上，接着七发手枪子弹使他永远也无法再站起来了。

对贾尼尼和别特列里的杀害驳斥了参议员埃思特斯·凯弗沃说的大话，似乎他一劳永逸地结束了美国有组织的犯罪活动。1950年5月——当时这位参议员进入了民主党的领导班子——他创立了同美国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斗争委员会。一年内委员会成员在公开的会议上对警方人员和匪徒，鉴定人和证人进行了质询。这使人想起了参议员考普林德的委员会的活动情况，他在30年代时也曾对匪徒发动过类似的进攻，但一事无成。

有一次，在凯弗沃委员会主持开会的参议院大厦，出现了科斯泰洛、阿道尼斯、奥戴尔、长斯泰尔、莫雷蒂和其他的黑手党人，跟在他们后边的是一群报界、电台和电视台的代表。给期待揭露出严重事实的社会各界提供的消息不是他们所期望的东西，而是某种社交界风格的报道：“弗兰克·科斯泰洛的皮鞋擦得锃亮，穿着发亮的带细条纹的浅蓝色的西装，系着领带，他的这身打扮参加外交葬礼也是当之无愧的。”

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凯弗沃所写的总结报告也是这种风格，报告中写道：“维尔吉尼亚·希尔小姐（匪徒本杰明·吉格尔的情妇）歇斯底里大发作地闯入了会议厅。她穿了一件天蓝色泛银光的连衣裙，黑色帽子拉得遮上了眼睛。她尖声喊叫着说，如果这些该死的摄影师不停止对她拍照，她就碰上什么，扔什么”。

维利·莫雷蒂是怎样沉默的

美国著名的社会政治杂志《新闻周刊》，就参议院组织的犯罪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发表了一篇综述，用的标题是《凯弗沃的杂技》。文章谈到：“匪徒——这已经不单单是肌肉发达、身强力壮的家伙了。他们早已不充斥于夜总会，不再引起那些老奸巨滑的杀人犯和涂脂抹粉的金发女郎中圣徒的注意了。如今，他们通常都是一些有地位和令人敬重的人，喜欢天伦之乐，对伴侣忠贞不渝。夜晚能玩上几局牌，喝上几杯啤酒，他们就感到足够了。他们离群索居，当然要十分舒适，但不显眼，住在幽静的近郊。他们对穿着十分讲究，他们的裁缝师傅要绞尽脑汁想办法，怎么样才能使缝制的西装让人看不见带短枪的皮套。他们同任何一家郊区住户一样害怕暴力，竭力躲避警察和记者。他们认为在当今时代‘有成就的绅士’不应当借助自动武器来解决纠纷。他们称自己为商人，锁在保险柜中的资产清单向来完整，并存放有某些有名气的大公司的股票。他们拥有地产、饭店、商业公司、汽车租赁代办处、制酒厂和成衣商店、石油股票和旅馆。自然，他们的某些利益有些同法律相抵触，但是要知道，为此他们手

下有律师，而且是顶呱呱的律师，只要花钱就可以请到他们。”

令人奇怪的是，这次调查竟然有所收获。归根结底是政府需要凯弗沃委员会，来证实自己洁身自好毫无牵连，并平息一下愤怒居民的情绪。事实上，该委员会根本没能进行一次稍微认真些的反匪徒行动。关于这点，报刊披露的一些引人注目的事实可以证实。

当时参议员凯弗沃满怀希望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竞选总统。而要达此目的，他需要钱。爱追根究底的记者们查明，匪徒辛迪加为在1952年秋季选举时收买官员，而建立的基金已达一亿美元，除了调查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凯弗沃外，又有谁应该知道这笔基金的存在呢？

言辞激烈地、抨击匪徒横行无忌的共和党人托比，早在实行《禁酒法》时期就当上了参议员。在凯弗沃委员会成立前不久，在酒类走私贩，其中包括维利·莫雷蒂的支持下，他再次被选进参议院。委员会的法律顾问霍尔得到这个职务全靠掌管着纽约民主党的黑手党先生弗兰克·科斯塔洛的疏通。事情很明显，如此“清廉”的国务活动家怎么能认真地消灭或限制有组织犯罪活动呢？！

这一来，在该委员会上进行质询时，黑手党人感觉十分放心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有哪个参议员提出的问题使黑手党陷入困境，则马上就援引美国宪法的第五修正案的条款：“……任何人都不能被迫在犯罪事件中，以证人身份讲出不利于自己本人的供词……”

就这样，参议院委员会的空泛的质询拖延了许多天。于是需要维利·莫雷蒂出席作证，以便参议员们在对他的质询中得到某些有价值的东西。

还在十年前，科斯泰洛、阿多尼斯和杰诺维塞坚持让著名敲诈犯艾伯内尔·茨维尔曼的同伙和卢恰诺的朋友莫雷蒂，在一段时间内，在加利福尼亚“亮亮自己的本事”，并最终学会咬紧牙关，不吐一字。可是现在，当莫雷蒂在参议院委员会面前供述后，“我们的事业”的头子们便不由得激动不安起来。起初，似乎还觉得一切都正常。不用说，莫雷蒂在生活中从未听到过“黑手党”这个词。在回答他是如何认识科斯泰洛、卢恰诺和阿尔·卡波内这一问题时，他回答说：“这些人性格爽朗，和他们认识不需要任何介绍，他们对这种事很随便，不拘礼节。”

下一周，莫雷蒂再次收到了传票。于是，在“我们的事业”的圈子里便传言，似乎莫雷蒂“变调”了。而他也确实多少知道一些，比如说，关于艾达·里斯的事情，还有布鲁克林市的贪污受贿的真情，黑手党人收买了这里的整个警察局。

1951年10月14日，莫雷蒂从家里出来去会见朋友，并到赛马场去开开心……而当莫雷蒂的尸体四肢张开地躺在纽约乔易斯饭店的瓷砖地上时，侍者对警方叙述说：“他们热烈地挥动着两只手，还用意大利语开着玩笑。几分钟后听到了两声枪响。我跑进大厅时，他面朝上躺着，满头满脸都是血，开枪人躲起来了。”

事后，黑手党人约瑟夫·瓦拉奇证实说，射击是奉黑手党先生们的命令，由约翰·罗比洛托执行的，瓦拉奇对莫雷蒂被杀一事的解释是：我们认为莫雷蒂有精神病。

真的，一个如此冒失地想破坏噤口律条的人大概就是精神失常了。

莫雷蒂永远沉默了，然而另一个证人威廉·奥戴尔，这

个黑手党人的朋友，陆军准将，战后时期的纽约州长和杜鲁门总统时期的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在回答参议员们提出的有关奥雷利奥一案的问题时，却思绪紊乱、前言不搭后语。

奥戴尔离开州长职位后，科斯泰洛安排让一个叫查尔斯·西尔韦的人为其继任人。而民主党的一位叫查尔斯·利普斯基的领导人，从自己方面考虑，提出消防队长弗兰克·克尤艾拉为这一职位的候选人。于是利普斯基不得不到位于桑特一波因捷的科斯泰洛的别墅去劝说他改变初衷，促使他支持另一个候选人。

在回答参议院委员会提出的：“您认为在选举候选人时，要事先得到科斯泰洛的支持是必要的吗？”这一问题时，这位民主党领导人利普斯基说：“当然，正因如此，我才到他那儿去！”总之，科斯泰洛始终是纽约的主人。

为掩盖民主党领导人和黑手党之间的合作关系，该党领导人员不断纠缠、干扰凯弗沃委员会的工作。然而纽约并不是存在着这种明显合作的唯一城市，在其他的州，包括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加里·杜鲁门出生的地方，都不乏这类有趣的事例暴露于世。

总统的朋友们

还在1943年警方就对堪萨斯城的黑手党加以注意了。人们早就知道，20世纪初，阿尔·卡帕内在这里建立了分支机构，后来它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家族”。就在1943年，一个毒品销售网被揭露出来，由此引出一条线，通向了堪萨斯城。

在堪萨斯城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反毒品局的工作人员安

装了窃听装置，偷听了黑手党人安东尼·洛皮帕罗和朱塞佩·安蒂诺里的谈话。这一行动使警方有机会抓获了一些小匪徒。而堪萨斯城的“我们的事业”仍大权在握。该城的公民们对1934年3月27日的“流血选举”记忆犹新，当时匪徒们乘坐着黑色汽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无情地扫射着自己的政敌们。

堪萨斯城当时受外号人称大汤姆的汤姆·彭德格斯特控制，此人既当过酒类走私贩，也是个商人，但这并没妨碍他还是民主党人城市俱乐部的主席。1908年他接纳了《堪萨斯城明星报》一个年轻的编辑加入自己的俱乐部，并帮助他步步高升。而这个被彭德格斯特提拔、很快就飞黄腾达的人就是加里·杜鲁门。

彭德格斯特消息灵通，知道“我们的事业”的后盾是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因此他和黑手党建立了联盟。从芝加哥来的黑手党先生焦尼尼·拉齐亚成了彭德格斯特的副手和堪萨斯州第一选区的民主党首脑。

焦尼尼·拉齐亚在黑手党换代时期，同一些有“胡子的”一起退出了舞台。他在民主党内的官职由黑手党的先生卡罗洛继任。在1934年3月27日当地选举中，即那次难忘的流血选举，凭借黑手党久经考验的手段，卡罗洛令人信服的战胜了彭德格斯特的所有竞争对手。同年11月，靠彭德格斯特起家的加里·杜鲁门，以绝对的优势被选进美国议会。这是黑手党人给他清扫了道路。

然而，即使这位新上任的参议员也没能使卡罗洛逃脱忒弥斯的法网——1939年他被关进了铁窗。就在这一年，彭德格斯特逝世了，杜鲁门参加了自己保护人豪华的葬礼。

彭德格斯特的继任人是他的侄儿吉姆，而卡罗洛的位置则由查尔斯·比纳乔占据。他们的联盟持续到1946年。后来比纳乔认为自己已十分强大，足以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了；于是大选时要同吉姆·彭德格斯特竞争。尽管满怀必胜的信心，而且业已接受了祝贺，可是选举结果有假的真相暴露了。71人因伪造罪而受审。当然，被没收的选票和票箱很快就从堪萨斯州的审判大庭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比纳乔的小伙子们在操着此事的心。

1948年的新的选举日期来临了。此次是选举密苏里州的州长。觊觎这个岗位的有两位民主党人：斯密特——比纳乔提名的候选人和一个叫马卡拉克的人。后来，在参议院的凯弗沃调查委员会上，凯弗沃宣读了在马卡拉克和比纳乔之间曾经大吵大闹过一番的一次记录：

比纳乔：你应退出竞选，东圣路易斯的人不支持你。

马卡拉克：如果你这样决定，那我，毫无办法，因为只有你支持的人才能在社会上有地位。

比纳乔：你可以成为密苏里州的总检察长。

马卡拉克：为什么你想让我成为总检察长呢？

比纳乔：我们不相信斯密特是个相当强有力的人，可是如果你成为总检查察长，则能迫使他行动更有力些。

为选举斯密特，“我们的事业”花了10万美元。比纳乔时常随便到这位新州长家里坐一会儿。欠债是要还的。州长和总检察长在自己的羽翼下保护着黑手党人的违法生意。当堪萨斯的民主党人隆重设宴招待党的主席威廉·包依尔时，而黑手党分子查尔斯·比纳乔同最尊贵的客人——美国总统加里·杜鲁门坐在一起。

比纳乔之死

但是，当吉姆·彭德格斯特企图从总统那里为自己的“家族”获得新的让步时，上述田园诗般的联盟就瓦解了。比纳乔这颗明星开始殒落。于是他去华盛顿以求得白宫主人的支持，然而杜鲁门没勇气公开接待黑手党徒。总统助手威廉·包依尔建议比纳乔与吉姆·彭德格斯特讲和。

不久，身居堪萨斯州黑手党先生宝座的比纳乔的前任卡罗洛出狱了。比纳乔拒绝让位给他。这时卡罗洛与吉姆·彭德格斯特商定了共同行动……

1950年4月10日下午4时左右，一个出租车司机从车里走出后，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声，这是从堪萨斯城第一选区的民主党俱乐部大楼传出来的。他以为是不远的地方的自来水出了问题，就叫来了警察。

俱乐部的门没有上锁。当他们进到里边时，猛地被一个人体绊了一下。这是比纳乔的朋友和伙伴查尔斯·加尔科特的尸体。而在房间里边，在加里·杜鲁门总统的肖像下边的椅子上，躺着比纳乔本人。确实有水从天花板上滴落，原来射向比纳乔的四颗子弹中，有一颗打中了自来水管。

晚上，“最后的运气”饭店的主人，向希望知道这些黑手党徒死前在他这里的详细情况的记者们叙述道：“我们的城市是洁净的。我们喜欢家庭的舒适，尊重艺术，为我们的纳尔逊美术馆感到骄傲。可是尽管如此，每当我去纽约或者别的什么城市时，我羞于承认自己是从堪萨斯城来的。每当人们知道我来自何地以后，都鄙夷地躲开我说：‘这简直不是个城

市，而是个匪窟！”

自然，在参议院委员会的会议上，凯弗沃没有向任何人提出汤姆·彭德格斯特和杜鲁门总统昔日的朋友比纳乔的问题。当民主党和共和党与匪徒关系密切这一事实，越来越难于掩盖时，两党一致通过了决议，停止参议院委员会进一步开展调查。这毫不足奇，因为有组织犯罪、资本主义垄断和国家机构紧密纠缠在一起，要根除匪患，而又不触及到统治阶级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的。

凯弗沃参议员其实和他的前任一样，也支持下述臆想，即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是从外部输入美国的，而首先是从西西里岛，因而美国当局对它的存在，似乎不承担责任。此外，关于有组织犯罪具有由外部输入特性这一论题成了限制“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的入境和居留，以及主要是针对进步人士的一系列反动法律得以通过的理由。

当时由卡罗洛和彭德格斯特领导的黑手党仍继续在堪萨斯城主宰一切。1953年黑手党与市警察机关的一些人员达成一项协议：黑手党徒们可以自由地经营赌场和妓院。每当警方值勤人员出发去搜捕时，最大的赌场“丹敦桥牌俱乐部”能及时接到从警察局打来的电话。

这种风气不单单在堪萨斯城或者诸如芝加哥、纽约、洛杉矶等一些“我们的事业”的堡垒区盛行，而且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每个城市几乎也都如此。

争权斗争

现已查明，昔日福特汽车康采恩的主管劳动的副经理加里·班内特，为了同争取自己权利的工人进行斗争，掌管了一支由怙恶不悛的刑事犯组成的真正的私人军队。侦查时，汽车康采恩警卫队的一个工作人员宣称，老奸巨滑的匪徒皮特·科瓦科里，为福特公司招募了30名亡命之徒，当然，后来他又否认了自己的供词。这个科瓦科里的过去十分不光彩：警察局逮捕了他28次，并且3次有杀人之嫌，不过只有两次法院认定他有罪，从而被关在监狱里。而如今，他回到位于亚利桑那州自己的富饶的大牧场里，过着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生活。

匪徒：坦斯·冯·金蒂克

海港工人国际联合会(港工联)主席约瑟夫·赖安愤怒地大吼着：“他们不听我的话！这件麻烦事大概是共产党人干出来的！”

1951年10月15日，纽约港口工人决定拒绝承认工会头子赖安与船主们的各公司签订的有关新的工资合同。

大约有两万工人参加了罢工。波士顿和费城举行了联合罢工。

最早提及外号人称老K的乔·赖安的名字是在1948年

11月。当时码头工人一反自己这位工会主席的意志，宣布举行罢工。而当时赖安却很快就对罢工者让步了，尽管为时已晚，但他承认，他们的要求是正义的，并和业主就工资问题签订了一项新的妥协合同。然而1951年这一次，一切都复杂化了。赖安声称，罢工是非法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干预了这场冲突，他引用了塔虎脱—哈特莱法^①，从而禁止罢工。看来，黑手党先生们要认真思考一番了，他们对港口的统治已近尾声了。

工会讹诈体系在纽约各港口已经持续逞强几十年了。膀大腰圆，面呈病容的66岁的赖安，还在30年代，就与阿纳斯塔吉亚兄弟建立了联盟。他们达到了使赖安当选为港工联常任主席的目的。在他执政时期，他们进行敲诈勒索，靠工人发了财，并以残忍的恐怖手段，压制自己“王国”范围内的一切言论自由。抵制黑手党的专政，抗拒出卖灵魂的头头们的工会积极分子们，遭到了残酷的杀害。前面曾提到过的皮特·潘托，就是港口黑手党众多的被害人之一。

当时，港工联划分成所谓的“限区”——地方工会组织，每个组织联合了大约500—1000人。每一个这样地方组织控制着将近9个海港码头。每个码头上均有一名监工，他每天都对工人进行编组派活，谁得到工作，而谁将一文不挣被打发回家，全都取决于他个人的恩怨。派活，即“编组”，据观察是这样的：“大约150名日工聚集在码头监工或者他的助手

^① 塔虎脱—哈特莱法(1947年调整劳动关系的法案)美国反动的反劳工法案，它以它的主要起草人、参议员塔虎脱，众议员哈特莱的名字而得名。

的周围。他们把得到当天工作的工人编成工作队。这一古老的雇工制度使黑手党可以非常容易地驾驭劳力。经常采用的一个勒索方法是所谓的‘补偿’——从日工资中扣除2—3美元给码头监工。这样才能有权在第二天早晨重新被吸收入工作队。除此之外，码头工人每天要‘自愿’‘为孩子’交出一定数目的钱。”

码头上的匪徒们也有自己的“借贷鲨鱼”或者叫高利贷者，这些人恬不知耻地抽取10—15%的工资，说是为了陷于贫困境地的码头工人。不言而喻，不管是港口监工，还是“借贷鲨鱼”，都是“我们的事业”的人，或者是为获得掠夺码头工人的权柄而向这个组织纳贡的匪徒。

“暗杀团”首领阿尔伯特·阿纳斯塔吉亚，是名义上以赖安为首的码头工人工会的真正统治者。他甚至把自己的兄弟安东尼和格雷拉尔多也派到纽约港的码头上当监工。于是1951年10月，港口工人再次起来反对这种恐怖和勒索制度。

纽约港口工作人员的罢工持续了25天，最后以取得部分胜利而结束。但是约瑟夫·赖安和阿尔伯特·阿纳斯塔吉亚在当局的帮助下，却在本次把统治港口的权利抓到自己手中。

警方在1952年进行的调查确认，1947年至1952年，黑手党人从港口的船主手里——“为表示善意”——得到50万美元。但是更大的数目是靠偷盗商品。每年纽约港的码头都要有价值1.4亿美元的货物下落不明。当然，这是它们没在“我们的事业”所经营的保险公司里保险的结果。

1953年9月，已接纳了赖安的“工会”的美国劳联决定把海港工人国际联合会(港工联)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出去。新

的港工工会建立起来了。但是，由于阿纳斯塔吉亚兄弟之故，港工联在全港口重新选举时，获得多数选票。而与此同时，港工的新工会却一次也没得到被授权与船主谈判工资问题所必须的票数。

“想想自己的孩子吧！”

正直的美国人，读到报纸上登载的，有关统治着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码头上的这一套东西时，从心里感到愤懑。这一切是港口黑手党人所不希望发生的。因此他们决定暂时放松对纽约港的控制。但是在哈得逊河上这座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工会敲诈活动，却在许多另外的领域盛行并得到了发展，特别在缝纫工业中更是广泛推行。这一情况的根源在于犹太人匪帮的首领莱普克·布哈特和最后一位“有胡子”的先生萨尔瓦托雷·马兰扎诺。但是新一代的工会讹诈的头头中有个叫乔万尼·焦加尔基，外号人称吉奥的人。他走过的道路是一个黑手党人的典型经历：从少年匪团的普通成员到“暗杀团”中有影响和威望的干将。1937年身陷囹圄，关入辛格—辛格监狱后，吉奥认识了莱普克·布哈特，此人传授给他一套最高级的讹诈技艺。出狱后，吉奥效法威廉·比奥夫和阿尔伯特·阿纳斯塔吉亚，钻进了汽车制造业职工工会。很快焦加尔基就领导了第102地方工会组织。从这时起，黑手党在这工会中，如同癌肿一样增生起来，一些意大利人都在这里迅速发迹。绰号叫托尼·达克思的安东尼·科拉洛进入了工会的管理机构，多尼·达利亚成了财务主任，后来他从工会的钱柜中偷走1.6万美元，并攫取了一辆崭新的公务车。而安

杰拉·尤其佐控制了芝加哥的汽车制造工人工会。

谁控制了交通运输工具(吉奥能做到这点),谁就能够对一切依赖于交通运输业的部门进行讹诈。久依州长任命的调查委员会得悉,有一天,焦加尔基派遣了自己的代理人马克思·切斯特去见工厂主波尔·克洛特,切斯特对克洛特说,他代表“店员工会”要求公司销售部的工作人员加入他的“工会”。不言而喻,这开辟了一条通向讹诈的阳关大道。切斯特声言,“你给我2000美元,我给你一个契约,有了它,你才能生存”。

“当我拒绝后,”克洛特后来在调查委员会里说,“切斯特把话题引到孩子身上。每说第二个句子都是,‘你的小孩子过得怎样?他们在做些什么?’他还谈起自己的孩子,说他们在街上嬉戏,而这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很容易被什么汽车轧死。接下来仍谈起我的孩子,使我很为我的孩子们的生命担心”。最后,这位工厂主交付了所要求的钱数。

调查委员会也询问了焦加尔基。这个黑手党徒洋洋得意地微笑着,耐着性子在证人席上坐了两个钟头。他引用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第140次拒绝了提供证词。然而不久,焦加尔基就为自己的自由而忧心忡忡了。

年轻的记者维克托·里泽尔对焦加尔基创办的所谓“工会问题咨询学会”所控制的各家工会,颇感兴趣。维克托·里泽尔的父亲是位工会积极分子,30年代进行过反讹诈斗争。1942年,“陌生的人们”把他搞成了残废。他的儿子,进步记者维克托的名字,在围绕港工联问题辩论时期,已尽人皆知的了。维克托揭发匪徒们在纽约施暴的文章,曾在192家美国报纸上刊载。

1956年初，里泽尔搞到一条关于长岛第138机械师地方工会的情报。两个讹诈者，德·科尼吉父子控制着这个组织。里泽尔配合检察部门调查这一案件。警方对告发黑手党分子的第138区工会组织的成员、港口工人威廉·威肯斯和皮特·巴塔里亚斯采取了保护措施。

维克托·里泽尔请求两位证人把自己的供词录成磁带，准备予以播放。1956年4月4日深夜至5日凌晨，威肯斯和巴塔里亚斯的供词在广播电台播出了。里泽尔用以下的话结束了播音：“公开发言对于这两个人来说是非同小可的。他们把自己的生命赌上了……”

……大约在夜里3点钟，百老汇大街上林济饭店顾客开始散去。里泽尔、威肯斯、巴塔里亚斯和里泽尔的女秘书贝蒂·内文斯在广播之后还一直坐在这里喝咖啡，交谈感想。后来他们离开了饭店，各奔东西。维克托·里泽尔和贝蒂·内文斯朝停着女秘书汽车的51街走去。突然，从一幢房子的黑黝黝的台阶上冒出来一个男人，他满脸笑容地向他们走来，里泽尔向他转过身去，可是刹那间有什么东西泼到这位记者的脸上……

几个钟头之后，圣克拉拉医院的大夫通知记者说，他们无力恢复他的视力。硫酸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里泽尔永远失明了。

贡多尔福·米兰蒂惊恐万状

纽约警察局对此案件的侦查线索指向了……焦加尔基。事情是这么回事：1956年3月，他和自己的好朋友查尔斯·

图扎一起常到纽约东部的一个不大的糖果点心店去。这两位来客是向这家点心店的37岁老板，黑手党人贡多尔福·米兰蒂询问一下，他能否选一个“使用硫酸的小伙子”。

米兰蒂收到1000美元后，委托多米尼卡·班多干这件事，而后者又交给自己的朋友约瑟夫·卡利诺办理。他的朋友又用500元雇用了所需的人。剩下的500元由米兰蒂和卡利诺平分了。成了犯罪工具的22岁的阿布拉哈姆·泰尔维被告知是为了一件关于爱情，忌妒和“应得的报应”的一般化的纠葛，去干这件事。

4月5日凌晨，米兰蒂、班多和泰尔维驱车来到广播电台大楼。在里泽尔和自己的朋友们尚未出来之前，一直等在汽车里。突然米兰蒂指着里泽尔说：“看那个人——就是你要找的人！”

泰尔维在饭店附近窥伺着自己的猎物，泼了硫酸后，他冲向50和51街区间的车站。米兰蒂和班多在这里等他。可是这时他撞上了警察巡逻队。对于自己慌忙的奔跑的解释是有两人袭击他。他说：“我好不容易摆脱了他们，那就是他们！”于是警察急忙奔向十字路口，在那里的柏油马路上，维克托·里泽尔正疼得全身抽搐，难以忍受。

在警察问明原委的时候，黑手党徒们已经把泰尔维送到他的女朋友奥尔格·杰拉·克鲁茨处，他将在这里呆一段时间。卡利诺拜访了泰尔维。但他发现，硫酸没有全泼到里泽尔身上；它溅出的液点也在泰尔维的脸上留下了痕迹。而“有记号的人”是会轻而易举地被警察抓获的。

只是通过广播，泰尔维才知道，是谁在那个夜晚被他夺去了视力。是这样一个人，而他们为他才付给自己500美元！

泰尔维认为自己上当了。由于不熟悉黑手党的习俗，他打发奥尔格去米兰蒂的糖果点心店，要求黑手党人再付……5万美元。

他们请他等一等。可是不久一个陌生人来到奥尔格·杰拉·克鲁茨的住宅，转告泰尔维说：“头头派我来接你，你必须悄悄离开这里，搬到佛罗里达去，警方在搜捕你。准备一下就走吧！”

当汽车不是往机场的方向，而是走另一条路时，泰尔维突然神经紧张起来。他记起了不只一次发生于匪帮中间的种种不幸事件。他借口必须下去招呼自己的情人，请求司机停车。

泰尔维从停车附近的铺子里，经由后门跑了出来。起先躲藏在俄亥俄州的一些朋友家里。七月时节，他又大胆地潜回纽约。

1956年7月20日，在马尔别里大街路旁的排水沟里，发现了一名年轻男人的尸体，头上中了三颗子弹。死者脸上有小坑坑——硫酸的痕迹。这人就是阿布拉哈姆·泰尔维。

8月17日，警方在奥尔加·杰拉·克鲁茨的帮助下查清了案件。卡利诺、米兰蒂、班多和焦加尔基兄弟均被逮捕。

黑手党徒们十分顽固、闭紧嘴巴，一字不露。刑警人员允许米兰蒂的妻子来监狱探望他。他们以为这也许会触动匪徒，使他开口。在接下来的一次审问中米兰蒂忍不住说：“如果我说出来，他们会打死我！他们会打死我的！”审问人员试图安慰他：“别怕，我们保护你！”米兰蒂摇了摇头：“不，如果我说了什么，他们一定会干掉我，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监狱里、监狱外、还是天涯海角，他们都能干掉我！”

1957年5月开始了庭审。贡多尔福·米兰蒂固执地沉默着。“若是您不回答法庭的问题”。法官威胁地说，“那么我将以藐视法庭罪判处你五年徒刑。”米兰蒂毫不犹豫地选定了这个判决。多米尼卡·班多同样回答说：“我拒绝说出任何供词。”

检察长波尔·威廉怒不可遏地对新闻界代表说，“他们的行为是对美国的挑战。他们用威胁恐吓证人。”但是他大发雷霆也是枉然。噤口律条比他想象的要厉害得多。乔万尼·焦加尔基这回又溜过了法网。

还是在这一年的秋天，总算对他做了判决……以“逃避交纳所得税”这个对“我们的事业”的人的典型判决理由而监禁两年。只是在1958年一桩敲诈勒索案中，焦加尔基才被合并判处15年徒刑。

伪造的出生证

50年代中期，“我们的事业”又一次经受了危机。如同在30年代初一样，失败一个跟着一个接踵而至。甚至万能的黑手党先生们也无法回避。

对乔·阿多尼斯的打击是第一个失败。长期以来，难以擢发难数的刑事犯罪行为都出自他之手。可是当1953年他决定短时期去一次古巴时，由于护照上的一个小差错，使警方终于抓获了这个最大的黑手党徒。

根据证件，阿多尼斯为美国出生的公民。身份证上详细地写着他的出生地：新泽西州帕谢市，斯切特大街26号。但在发放出国护照时，意外地发现，在阿多尼斯出生的1901

年，在身份证上所写的这个城市里，当时还没有这个斯切特大街。这样一来，出生证明是伪造的，而阿多尼斯本人大概是从意大利非法入境的了。

此时，乔·阿多尼斯正处于权势的巅峰，他是新泽西州“奥德莫奇夫推销公司”的老板。1953年他建立了这个大公司。这家公司包揽了把艾特朱奥切尔的福特汽车工厂——最大的康采恩企业——出产的汽车，运往美国东部沿海地区销售地的专营权。经常有100辆装载着汽车的大型拖车走在路上。

当专门委员会调查，为什么福特厂把运输自己的汽车的专营权，交给的恰恰是这个黑手党人兼匪徒时，这家康采恩回答说：“除了和阿多尼斯合作外，自己没有别的选择”。“奥德莫奇夫推销公司”也是“联邦州际贸易委员会”批准从艾特朱奥切尔运输汽车的唯一公司。该委员会辩白说：“企业主中再也没有谁提出申请，除了把执照给阿多尼斯外，没有别的选择。”

进一步的调查确认，福特康采恩曾亲自为阿多尼斯得到执照而奔走。在侦查过程中，陷入尴尬境地的康采恩领导突然宣告说，另一个新建的“新凯里斯公司”也在谋求发给运输许可证。看来，阿多尼斯的垄断要结束了。1952年4月9日，联邦委员会讨论了新公司的申请，但是最后的决议拖到5月10号才做出。

阿多尼斯利用了提供给他这一拖延期，于是新建立的那家“新凯里斯公司”很快放弃了他们的请求。黑手党先生阿多尼斯的公司仍保持住了垄断地位。这一来，福特康采恩也就没有中断同著名黑手党徒领导的公司的老的业务关系。而阿多尼斯则把赚来的钱投入他和科斯泰洛及迈耶·兰斯基合

建的电视广播公司。

最后，终于查明证实，乔·阿多尼斯其实有个真正的名字，叫朱塞佩·多托，他出生于西西里，后来非法移居美国，然而，他从未正式取得美国国籍。阿多尼斯在被驱逐出美国之前，还有时间使自己的朋友、黑手党人卡洛·切里，也就是查理·奇里成为奥德莫奇夫推销公司的经理，并使乔·帕南诺成为自己黑手党“家族”的先生。然后，正如1956年报纸所载，他乘坐“比亚卡—马诺伯爵号”游船回到了意大利。

促使“我们的事业”的这个头目心事重重的，不仅是警方的打击，更坏的是在他们自己的队伍中，就象在大西洋城匪徒会议之前那样，眼看着就要爆发一场新的夺权斗争。

1956—1957年中，“我们的事业”的上层首领中，有三人被害，一人被杀未遂。第一个牺牲者是杰克·德拉格纳——这个“洛杉矶的阿尔·卡帕内”，加利福尼亚黑手党“家族”的先生。吉格尔被杀后，是他把西部沿海地区匪徒的领导权抓在了手中。

如果说德拉格纳被杀几乎未被人注意，那是因为他一向不抛头露面；但对另一个黑手党先生的杀害未遂，却久久成为纽约报界注意的中心。

是谁向科斯泰洛开枪？

1957年5月2日晚，在曼哈顿的中央公园西区旁边的115号楼房前，停了一辆黑色的“卡吉拉克”轿车。坐在方向盘后边的人不时地朝街对面张望。

午夜前，一辆出租车驶到房子前。弗朗切斯卡·科斯泰洛从车子里走了出来。科斯泰洛66岁，中等个头，肩膀很宽。他住在这幢带有屋顶花园的宏伟楼房的豪华公寓里。人们认为他是位可敬的商人。他的大多数熟人甚至从未怀疑过他是匪徒。在此之前的几年中，他也赶时髦，象美国广泛流行的那样，向精神病学家求教。医生给了他以下的忠告：“避开自己圈子中的人，去结识那些待人比较温和的人们。”科斯泰洛遵照这一建议行事。钱他有的是。据查明，他控制的商业，年周转金额为20亿美元。

5月2日的那天晚上，科斯泰洛同自己的朋友和商业上的同行菲利浦·肯尼迪在一家上等饭店用了晚餐。他在自己住的大楼旁与他分手后就不慌不忙地经过前厅向电梯走去。

突然，一个拿着手枪的男人迎着 he 走了出来。“是你啊！弗兰克”。陌生人说了这句话就开了枪。科斯泰洛猛地冲向旁边，第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帽子，第二颗伤及了头部。科斯泰洛流着血躺在安乐椅上，凶手以为科斯泰洛已死，就悄悄溜掉了。

尚未走远的菲利浦·肯尼迪听到了枪声，就折了回来，看到了满身鲜血的科斯泰洛。但是他还活着。肯尼迪急忙把他送到鲁茨韦尔特医院。第一个询问科斯泰洛的警察，从他那儿只能听到：“我没认出是谁，我连想也想不出谁能干这种事。没有，我没有敌人。”

警方人员给他看了一张便条：“这是您的？”

科斯泰洛颤抖了一下：“您这是从那儿弄到的？”

“从您的上衣里。”对方回答说。

便条上科斯泰洛用歪歪斜斜的笔迹写着：

“1957年4月27日，赌场的毛收入为651284美元。扣除债券后赌场收入为434695美元，自动赌博机的利润为62695美元，赌者的债券为153745美元。迈克每周150美元，盖克每周100美元，L—30000美元，N—9000美元”。

警方到底没有搞清楚，“迈克”，“盖克”，“L”“N”，究竟是什么人。但却查明，4月27日的651284美元，是仅仅在4月3日才在拉斯韦加斯开业的“特罗皮卡诺”赌场的收入。由于科斯泰洛没有向官方公开自己的这笔收入，因此这个条子可能成为起诉他犯有藏匿财产，逃避交纳所得税之罪的理由。

但是警方必须首先调查清楚这次神秘袭击的情况。

只有发生杀害科斯泰洛未遂案的那幢楼房的看门人，看见过罪犯，也能够认出他。在警察局里，一本厚厚的，贴有最著名的黑手党人照片的像册摆在他的面前。看门人指出了30岁的宾塞特·吉甘切，他是讹诈勒索的巨匪安东尼奥·斯特罗洛的伙伴。

杀人未遂案的策动者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科斯泰洛脱离了黑手党的商业活动。他被迫交纳了偷税漏税的罚金，随之而来的是关于他的国籍问题的一系列诉讼程序。最后，于1964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了这位黑手党先生的案件，认定，驱逐科斯泰洛出境的理由不够充分。这位73岁的前黑手党头头向新闻界代表发表声明说：“在我一生中，这是最好的最高法院，这种法院过去曾有过。”

奇乔先生犯了错误

在美国报纸以大字标题报道了对黑手党先生弗兰克·科斯泰洛被枪杀未死的消息之后，总共才过了一个月，关于“我们的事业”的又一个有势力的头子之一被杀害的消息震惊了纽约。

绰号叫奇乔先生的弗兰切斯卡·斯卡里奇先生领导了纽约布隆克斯街区的一个强大的黑手党“家族”。斯卡里奇同乔·普罗法奇、弗兰克·科斯泰洛、维托·杰诺维塞和阿尔贝特·阿纳斯塔吉亚众先生们都交情很深。

“我们的事业”的这位55岁的头子的公开身分是“马里奥和德包诺造型材料公司”的副经理。只有了解内情的人才知道，发生在布隆克斯的敲诈勒索案件没有一件不是奇乔先生决定并参与的。他佯装爱好旅游，不时地去意大利，在那里和卢恰诺以及不久前被驱逐出境的乔·阿多尼斯会面。

但是，命运给斯卡里奇一个致命的打击。事情从警方成功地抓获了一批毒品贩子开始。当时美国出现了缺乏海洛因的苗头。斯卡里奇决定采取特别措施，在主要的黑手党人中间集资，并同卢恰诺签订了合同，开始准备把20公斤海洛因运进美国。

在拿不勒斯，走私品被装上“艾克斯康比昂号”船。但是警方已经注意到，该船已经是三次来往于美国和意大利之间，大概每次都会有一批走私毒品。

因此，斯卡里奇从纽约下达指示：将海洛因转移到随便那条英国或法国船上。傍晚，在靠近马赛的地方，“艾克斯康

比昂号”船上的船长发现，一个什么口袋被从船上扔入大海。他命令停船，把口袋打捞到船上来，因为根据国际海洋法，一切物品都必须记入轮船的报单。船长察看了口袋中的东西，发现了海洛因。在巴塞罗那，他把这个“邮寄包裹”交给了西班牙当局。

“我们的事业”有个惯例，谁负责运送毒品，谁就对货物负有经济责任。20公斤海洛因的价值为36万美元。斯卡里奇急忙使合伙人确信，他将立即赔偿损失。但是对此承诺不得不过分久等了。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事业”的最高委员会判处斯卡里奇死刑了呢？

1957年6月17日早晨，斯卡里奇沿着布隆克斯的阿杜尔大街散步。在2380号的楼房前，他在沉思中停下脚步。他的同胞马扎罗在这里开了一个菜店。此时站在商店入口处的马扎罗，象农奴对自己的男爵那样，向斯卡里奇深深地鞠了一躬。他没有跟在斯卡里奇后边进入商店，因为他知道，这位黑手党头头不喜欢有人来干扰他挑选商品。

可是马扎罗可曾发现，有两个年轻人闪电般地钻进他的店铺里！

不超过五秒钟就把人干掉了。两颗子弹击中了颈项、第三颗打穿了左面颊，而第四颗打着右肩。第五颗子弹没射中。事毕，两个年轻人从目瞪口呆的马扎罗身旁跑过，坐上一辆黑色高级轿车扬长而去。

马扎罗绝望地打着手势，发誓地向警方担保：“我什么也没看见。我不认识那两个小伙子。他们跳上一辆旧的黑色汽车，就沿着阿杜尔大街跑了。这是我所知道的全部情况。一切发生得那样迅猛，我甚至既无法描绘他们本身，也无法形

容他们的汽车。总之，没什么可说的。”

不久，斯卡里奇的两个兄弟来到了警察局。他们是在相邻的街上开糖果点心店的贾科马和朱塞佩。贾科马大声呼喊着：“打死凶手！”而朱塞佩威胁着说：“我们会找到他们的！”

密 码 信

在警察局第一次进行情况调查询问后几小时，这兄弟俩才清醒过来，因为噤口律条发挥了威力。“哪儿还有什么敌人呢？”他们以惊讶的神色耸耸肩膀，而且齐声强调地说着一句话：“弗兰切斯卡没有敌人。大家都爱他。这是一种荒诞行为！”

警方在侦破这件凶杀案时，行动很迅速。在接到斯卡里奇被害一事之后，刑警小分队立即出发到他长岛的寓所去。尽管没有特别指望找到什么对调查说来非常重要的东西，侦破人员还是决定对被打死的黑手党先生的住宅进行仔细搜查。

弗兰切斯卡·斯卡里奇的写字台是个真正的宝库。侦破人员找到了一些信件和照片。一本记了约400个地址的记事簿上，对美国的“我们的事业”的业务活动提供了一个明晰的概念。在这个小记事簿里，找到了芝加哥和波士顿、拉斯韦加斯和堪萨斯的著名的敲诈勒索者的名单，以及在巴黎、拿不勒斯、罗马和巴勒莫的一些人的地址。这里还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照片，上边是斯卡里奇和卢恰诺及一个叫伊德拉·利塞奥尼的，在拿不勒斯“艾克谢尔希奥”旅馆的阳台上的合影。在这儿还找到了黑手党分子在布隆科斯和巴勒莫之间的来往信件。对于局外人来说，这些信件完全是无害的。比如，

1956年9月10日斯卡里奇写道：“亲爱的尼诺！大概不久我有可能与你本人见面，以证明我的兄弟般的敬意，因为我很崇敬你。我把给我们的朋友，巴拉维琴诺的工厂厂长尼科列蒂先生的信的抄本寄给你。我不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但我对你的深深的怀念迫使我要把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你，以便你和我象亲兄弟般爱着的你的那些朋友们，能够对此考虑出自己的意见。希望你能原谅我这封信给你添了许多麻烦。我保证，一旦你有所需要的话，我将永远站在你这一边。所有亲朋好友在此向你转致问候并拥抱你”。

从表面上看，这封温情脉脉的信是用西西里方言写成，并包含了有着各种不同释义的成语套句。甚至西西里出生的、纽约反毒品局的约翰·阿玛托，在他识破斯卡里奇致巴勒莫黑手党人尼诺·托雷斯的这封信的真正含义之前，也不得不数次地求教于亲朋。这封信的真正含意是：“亲爱的尼诺！必须安排好黑手党的几件重要事情。我认为与你本人讨论这些问题要更好一些，但是，目前去巴勒莫或者请你到这里来都是危险的，因为我正处于反毒品局的密探的监视之下。我把我写给尼科列蒂先生关于我所等待的海洛因货物的信的抄本寄给你。我知道，他是巴拉维琴诺黑手党“家族”的领袖，因此我必须对他表示尊敬，但是，我并不十分信任他。最好要密切注意着他。由于海洛因的价格目前波动很大，所以眼下我不能提出长期合同。但是，只要我和我的同事们谈妥，我就通知你和巴拉维琴诺的那些黑手党族长。那时你就安排把所需数量的海洛因从尼科列蒂先生的仓库运到拿不勒斯，然后在征得萨尔瓦托雷·卢恰诺先生的同意后，把货物装到开往纽约的轮船上。你要亲自采取措施，以保证毒品

从巴勒莫安全运抵拿不勒斯。你若需要经济上的帮助，请通知我。我的朋友们和我都相信这一牢固的兄弟般的合作，并相信这个问题将顺利地得到解决。”

在“病人”乔·巴尔巴拉床边

阿巴拉琴会议使人深感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中央机构，
来不断监视有组织犯罪和敲诈活动。

1957年底，参议院有组织犯罪调查委员会建议

斯卡里奇被杀已过去了五个月，而黑手党也策划好了一场新的打击行动。1957年10月25日，阿尔伯特·阿纳斯塔吉亚，象已往每天早晨一样，走进了纽约豪华的纳克·萨拉顿大旅馆的理发厅。助理理发师包契诺给这位“暗杀团”首领围好雪白的理发围巾，拿起了电动刮脸刀；阿纳斯塔吉亚仰卧在坐椅上，微闭双目。表针指到了10点20分。理发厅的老板格拉西看见两个男子汉走进了大厅。这两个陌生人中等个儿，下半截脸被围巾捂着，戴着墨镜，手里拿着短枪。这时，格拉西当即一声不响地举起了双臂。

这两个匪徒迳直朝第四把椅子走去。在那里，阿纳斯塔吉亚正安然自在地闭着双目，享受着刮脸的怡然情趣。一个匪徒把那个助理理发师推向一边，接着连开数枪，阿纳斯塔吉亚身子向上一掀，旋即跌在地上。事后，警方在尸体上发现了十个弹孔。

凶手不慌不忙地离开了理发厅，没有任何人试图拦阻他

们。走出门口，他们摘下了围巾，藏好了枪，没走几步就消失在地铁之中。

旅馆大厅卖花柜台的主人第一个清醒过来。他冲进理发厅，弯下身体看看尸体，随即大喊：“他们把阿尔贝特·阿纳斯塔吉亚打死了！”

纽约刑事警察局的侦探长在对见证人进行调查询问时，又碰上了在类似情况下，通常要遇到的情景：无论是格拉西，也无论是包契诺，都说什么也没看见，其他见证人也是如此。只有美容师维吉尼亚还记得情景。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那两个是意大利人。这一点，从他们的穿着上可以看得出来。其中一个稍微高一点的那个人，大约有40开外，苍白的面孔，穿一件灰上衣，头戴一顶深灰色宽边帽；另一个年轻的，看上去不超过30岁。”

接着，依照传统，被害人三个弟弟之中的安托尼，这个在布鲁克林码头令人生畏的人物来到了出事现场理发厅（其第二个弟弟乔，一年前在港口被人打死，而第三个弟弟鲁吉教区的神甫萨尔瓦托雷大概不适宜在匪徒被杀现场出现）。安托尼跪在尸体前同哥哥告别，嘴里不住地叫着阿尔贝特·阿纳斯塔吉亚的真名：“永别了，翁贝托，永别了！”

几小时之后，收尸所的工人把那个大量人被杀都同其有关的人的尸体运走了。同警察并排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美国黑人。对他来说，运送死尸早已是家常便饭，日常工作。他开玩笑地说：“对一个这样灌了铅的人来说，他算是相当轻的了！”

在黑手党队伍里搞竞争等于送死

警方首先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暗杀事件。肯定是阿尔伯特·阿纳斯塔吉亚有什么失策之处，越了权，跨过了“我们的事业”所允许的界限，或者是没有听从黑手党的警告。

这一切都以古巴为开端。1952年，原来是上士，后来成了上校的弗里汉希约·巴蒂斯塔攫取了政权，在岛上建立了血腥的军事专政。这个政权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无限的行动自由。而独裁者除了仰仗军队和教会之外，还依靠无业游民和刑事犯罪分子，把他们吸收到秘密和刑事警察机构任职。而这些人就对古巴人民滥施恐怖。巴蒂斯塔政权只有在唯一的一种情况下才严惩这些人，这就是他们犯下伤及富有的美国旅游者的罪行，因为这些游客的旅行乃是这个国家外汇进项极为重要的来源。至于在其他方面，法律对犯罪分子则是仁慈的，而对法律的解释那就更仁慈了。1955年巴蒂斯塔制定了一项法律，准许资产总额不少于100万美元的任何旅馆都可以附设赌场。这样，哈瓦那就象美国的拉斯韦加斯一样，成了在古巴社会的上层圈子里结交广泛的高级匪徒们的麀集之地。卢恰诺的老朋友和伙伴，黑手党经营商业的第二把手迈耶·兰斯基就曾访问过古巴并同独裁者巴蒂斯塔谈过话。他指出，“我们的事业”可以投资6亿美元用来建设新的和改造旧的旅馆并保证独裁者每年从外国旅游者和赌税上收入1亿美元。当时，巴蒂斯塔急需这些钱作为镇压解放运动的行动经费。至于黑手党从中将赚多少钱，当然，迈耶·兰斯基谦

虚地保持了沉默。

不久，在古巴开始建造旅馆。从美国派去了“技术人员”——安装自动赌博机的顾问。黑手党还把古巴劳动部长的弟弟举荐为一家最大赌场的老板。

可是，有一次黑手党分子们发现，阿尔伯特·阿纳斯塔吉亚未同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商量，偷偷地来到古巴，着手安排在属于黑手党的旅馆服务业里，组织工会敲诈！他打算让自己“荣誉社”的，多年一直颇有成效地搞敲诈的朋友们屈尊接受敲诈。

这一来，这位“暗杀团”的首领就亲手为自己签署了死刑判决。

就在阿纳斯塔吉亚在纽约被杀前不久，迈耶·兰斯基同古巴工作过的黑手党分子约瑟夫·萨列吉和路易斯·桑托斯曾一起到过纽约。这几个匪徒的纽约之行同准备“清账”是否有关呢？

而在阿纳斯塔吉亚被杀之后几个星期，在新泽西州的哈森——海斯特小城，一个小男孩发现了一辆丢弃的小汽车，里面有两具男尸。警方砸开了汽车车门，拖出了尸体。很快死者被辨认出来：一个是43岁的黑手党徒巴斯科里阿·马丁内蒂，此人曾不止一次被送上法庭；另一个是马利诺·波米托，23岁。两人都是黑手党港工联的成员。对杀死阿纳斯塔吉亚两名凶手的描述，同他俩的特征很相似。原来他们已成了令人不安的“活口”。

发生在阿巴拉琴的不愉快事件

克劳斯威尔中士在纽约州警察局供职。宾厄姆顿城和阿巴拉琴小镇都在他的管辖区内。小镇上有一座价值一万美元的别墅。克劳斯威尔早就注视着这座位于镇外的楼房及其主人约瑟夫(乔)·巴尔巴拉。中士知道,这位一家令人生疑的企业的可敬的主人,已经数次因刑事犯罪而被指控过。

1957年11月13日,中士同一个名叫瓦吉科的警察顺便来到离阿巴拉琴不远的“帕凯”汽车旅游旅馆时,发现约瑟夫·巴尔巴拉的儿子的“凯迪拉克”牌汽车驶进了这家旅馆。小巴尔巴拉预定了三套双人房间。旅馆的女主人问:“登记什么名字?”“具体叫什么,还不知道。”小巴尔巴拉回答说。不过他解释说,他父亲要和生产和销售柠檬汽水的一些有关人员洽谈业务,所以叫他为这些人预定房间。

克劳斯威尔中士向警察瓦吉科示意说:“这里面有名堂。恐怕要注意。”

小巴尔巴拉说的有一部分是实话。老巴尔巴拉的确在经营柠檬汽水,不过,老实说,并非一直干这一行……他1905年出生于西西里的卡斯泰朗马普城,16岁移居美国,1927年才得到美国国籍。当时,他是一个赫赫有名的酒类走私犯,外号人称乔·布拉多布里。1931年,由于参与暗杀另一个酒类走私分子卡洛加波而被捕,但因证据不足被释放。过了一年,他又进了监狱,又一次因杀人罪被起诉。不过,证人及时清醒过来(大概不会没有黑手党的帮助),否认了先前对巴尔巴拉不利的证词,对质时,他说:“不,这不是那个年轻人,

这个人我从来没见过。上次是我一时糊涂搞错了。”

从这次法庭调查开始，又过了不到一年，巴尔巴拉看来终于对沉重不安的杀人生涯感到了厌倦，于是他用在《禁酒法》时期赚来的钱，买下一家小型柠檬汽水厂并同生产苏打水的康采恩“加拿大无糖饮料公司”签订了进出口合同。不过，在这笔买卖上，令人不解的是，巴尔巴拉却向这家公司订购了大批白糖，其数量大大超过了自己小型柠檬汽水厂生产的需要量。这样，当局怀疑这些糖用来偷偷制造威士忌，便并非毫无根据了。可是，谁也没能抓住这昔日酒类走私贩搞非法贸易的把柄。

四公升酒精的税是10.5美元，而制造这么多的威士忌一般只需成本1.5美元。这样在地下酿酒贩子每5美元的交易额中，就有3.5美元作为纯利润落进自己的腰包。而且由于使用了现代纯化手段，他们制造的威士忌同厂家的毫无二致，尤其是装进贴有厂家商标的瓶子里，更是以假乱真，难以分辨。

克劳斯威尔后来更加重了疑心，因为那家旅游汽车旅馆的老板告诉他，小巴尔巴拉为其预定房间的那几位客人，都拒绝填写警方发放的来客住宿登记表，其理由是，老巴尔巴拉好象已经同警方说好了。这一来，克劳斯威尔中士决定从第二天早晨起，开始监视那座别墅。

1957年11月14日来到了。克劳斯威尔把军用望远镜对准了柠檬汽水制造者的宅园并对停放着那么多豪华时髦的汽车大为吃惊。他当即决定，请求增派人力，下令封锁所有通往巴尔巴拉住宅的街道路口。

在豪华别墅里的巴尔巴拉和“我们的事业”的先生们根本

没料到有这一手，仍坐在一起讨论自己的事务。他们谈到了在古巴和拉斯韦加斯的工作情况和毒品贸易，赞扬支持乔·帕南诺代表身在遥远的意大利的卢恰诺所提出的想法：鉴于警方监督的加强，暂时限制毒品贸易。

一片惊恐中的黑手党先生们

突然，黑手党徒巴尔托洛·古恰不顾级别大小，闯进了先生们正在开会的客厅。他报告说，通向巴尔巴拉公馆的所有街道都已经被警察封锁。刚才，当他乘坐自己的带篷卡车想通过相邻的一条街道时，刑警让他停下来并检查了汽车。

“我们的事业”的“大人物”们立即陷入一片惊恐之中。他们从房中飞奔而出，坐上汽车，四散而去，结果全一下子落到了警察手中。有几个人试图穿过一片空地偷偷溜掉。克劳斯威尔中士在望远镜里监视着这种慌乱情景，并对警察瓦吉科说：“他们在逃跑，他们之中不知谁今天会倒霉的。”

几小时之后，黑手党的先生们都坐在了宾厄姆顿市警察局里。他们一共是58人，其中十九个是来自纽约州的代表；三十三个来自纽约市和新泽西州，还有八个来自美国中部，即密苏里和芝加哥；三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两个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和佛罗里达，另外还有两个来自古巴，一个来自意大利。这些人中间有九个是贩毒者，十个赌场老板，十六个涉嫌非法生产假威士忌，还有五个人是搞敲诈的。

然而对扣留人员的讯问并未取得任何成果。黑手党分子们已经从最初的惊恐中恢复了镇定，先前的那种自信又复归到了他们的身上。

奇莫内·斯科扎里把意大利护照放到桌子上。他是个外国人，来自巴勒莫，桌子上还放着从他身上搜出来的钱1602美元的现金和8445美元的支票。

“您的职业？”

这个西西里黑手党的代表回答说：

“已经好几年不工作了。”

“您到巴尔巴拉来干什么？”

“我听说可怜的乔病了，于是就想最好还是来一趟，看望看望他。”

“从西西里出来后，您一路上都想的是这件事吗？”中士嘲讽地问道。

“不，只是在加利福尼亚之后。我刚从那儿来。”

“为什么这么多人同时都聚会在巴尔巴拉家里？”

“大概是我们大家完全出于偶然，同时都想到了同一件事。”

所有被扣留的人员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他们都只是来看望有病的巴尔巴拉。这些人谦恭地坐在克劳斯威尔中士的面前，身穿意大利丝绸服，里面是雪白的衬衫，皮鞋擦得锃亮，而且一个个都装得那么老实憨厚。

在这些面对中士而坐的人当中，就有维托·杰诺维塞。战后杰诺维塞一直经商，当然并非全是合法的买卖，但却是一本万利。1950年，通过中间人，他在莱吉纳区，维苏威火山脚下未发掘的古希腊赫尔库勒斯废墟开辟了一个旧货市场。这个市场长达12公里。从莱吉纳到布良诺，沿街两侧，柜台上摆得有一米高全是稍带污垢或者有点儿破损的衣服、被单、鞋子和皮衣等。总之，凡是美国有钱人扔到垃圾堆里

的，而对意大利穷人却是很宝贵的东西，在这里应有尽有。杰诺维塞在美国组织了一个招牌是“为了穷苦的意大利人”的救济委员会。这个组织把捐赠来的旧衣服接收下来，然后运往意大利，大批货物都在内西波利港口卸船。这家企业唯一的破费是运输费。赚来的钱归杰诺维塞和黑手党所有。

克劳斯威尔中士询问了经营植物油和乳酪的富商朱塞佩·普洛法齐。此人1962年前一直是纽约布鲁克林区黑手党“家族”的首领。这次一齐被警方拘捕的还有乔·帕南诺和外号人称麦克的米凯里·米兰达，后者是一家经营旧汽车公司的老板。此外，被询问的还有啤酒批发商朱塞佩·马里奥齐，此人是在位的黑手党先生普洛法齐未来的接班人；被拘留的人当中还有从被驱逐出境的乔·阿多尼斯手中接过黑手党非法生意的卡洛·杰利。另外还有大约翰——奥尔托曼。此人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受审履历，此时他正领导着107大街上一个臭名昭著的匪徒集团。他是乔·普洛法齐的女儿同底特律的一个黑手党徒婚礼的证婚人。警方曾查明，应邀参加这一婚礼的56名客人中，总共曾被捕275人次，被判刑100人次。

用手指比码

克劳斯威尔中士对阿巴拉琴会议的一名参加者颇为熟悉。一年前，即1956年10月，他曾同此人打过交道。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交通警在一条公路干线上，因超速行驶截住了一辆汽车，并向司机索要驾驶执照。司机在口袋里翻来翻去，拿出了一张证件，上面的名字是约瑟夫·迪巴勒尔莫，

来自新泽西州。可是上面的照片和签字都不是这个司机的。
于是警察说：

“这不是您的执照。”

“啊，对不起，”坐在驾驶员位置上的那个人说，“我因为慌慌张张，拿的不是我的外套。”然后他又在其他口袋里翻寻，“很抱歉，我的执照没拿，大概是忘在家里了。不过，请谅解，我要急着赶路。我们大概可以达成协议吧？”

可这个警察是个很难说通的人，他一定要司机从车子里出来，跟他走一趟。这个破坏了交通规则的人原来是黑手党的先生，贩毒者卡尔米内·加伦蒂，就是1943年受杰诺维塞的指派，杀死反法西斯战士卡洛·特列斯古的那个人。在警察分局，克劳斯威尔中士搜查了怒气冲冲的加伦蒂，在他身上发现了小票额的美金1815元。通过警察总部对加伦蒂身份的查询证明，此人曾被捕十五次，总刑期是十二年半。克劳斯威尔当时查明，加伦蒂曾在乔·巴尔巴拉家里逗留并在那里会见了黑手党人弗兰科·加拉弗拉和约翰·博温特。但是他知道，除了超速行驶之外，他不可能抓住此人的任何把柄。不过，他还是决定不放过这个机会。

但是后来一切发展都出乎意料。起初来的是一些有名望的律师，要求对自己的委托人从轻发落。接着下午，来自新泽西州西纽约市的两名警察格莱特曼上尉和比特·波里卡斯特罗上士也来到了这个警察分局。开头他们谈了一般的话题，后来那个上尉警官说：“加伦蒂真的又犯了什么案了？要知道，这个人是我们市的。其实，他满不错的。”对此，克劳斯威尔只是耸耸肩膀。

接着上尉又开展了新的攻势：“请您注意，我是我们的上

司莫达雷利派来的。一般说来，我不应当说出他的名字。不过，这样更好，因为您认识他。卡尔米内·加伦蒂是阿布科销售公司的人，而且是我们上司的好朋友。我们想同加伦蒂谈谈。因为事情并不那么严重。我们准备支付一大笔罚金。眼下，我们能不能把他带走？”这时，上尉微笑着伸出一个大拇指。

克劳斯威尔开始对此产生兴趣，问道：“您是想说1000美元？”

“对，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话，瞧，钱就在这儿。”警官边说边从口袋里抽出一卷用橡皮筋捆好的纸币。当他看到克劳斯威尔凝视的目光后，便迟疑地问：“怎么？这不够，如果这样的话，我需要打个电话。”

这时，这位少有的，收买不动的警察克劳斯威尔可真是怒不可遏，大发脾气了。

“别犯傻了！”上尉边说边后退，“我们警察不应当放过送上门来的机会……”

克劳斯威尔把两个说情人推出了门外，加伦蒂被判处150美元罚款和监禁三十天。

西纽约市市长本人竟然保护加伦蒂！

眼下，加伦蒂又再次坐在了克劳斯威尔中士的面前。中士心里很清楚，在阿巴拉琴抓住这批匪徒的行动照例是放空炮。用这种行动未必能认真打击“我们的事业”联盟。

但不管怎样，1957年12月12日法庭总算对阿巴拉琴匪徒会议的参加者进行了审理。约翰·奥尔蒙托、拉塞尔·布法林诺、朱塞佩·普洛法齐和马加迪诺都异口同声援引《第五

修正法》拒绝向法庭供述。尼亚加拉瀑布城的商人，22年前从西西里移居美国的马加迪诺，在法官向他提出第一个问题时，就一个劲儿地摇头，大概他不懂英语。可是在翻译到场后，还是没能从他嘴里搞到任何东西。对每一个问题他都是刻板地回答：“《第五修正案》”。

卢恰诺仍然是“清白”的

西西里出生，来自美国布法罗城的约翰·斯蒙坦纳似乎有点例外。这个满头苍发的64岁老人穿着做工精致的双排扣蓝上衣。他是一家出租汽车停车场的老板，属于他所在城市里有影响的人物。对于自己是犯罪辛迪加的人这一点，他隐蔽得相当巧妙，致使市民们都认为他是个慈善家。每逢感恩节和圣诞节他都照例向穷人施舍数百只火鸡。要是举办什么慈善活动，斯蒙坦纳总随时准备向组织者提供自己的汽车。除了“客货出租汽车公司”之外，他还经营了一家制造甜性烈酒的工厂“甜烈酒开发有限公司”和一个赛马场“蒙大拿赛马俱乐部”。

有一次，布法罗的市民甚至把他选为“年度男子汉”。1955年意大利内务部长马里奥·谢尔巴访问纽约时，斯蒙坦纳这位黑手党的先生应邀出席了加里曼州长为欢迎贵宾而举行的宴会。1956年竞选时，他担任了欢迎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来布法罗进行访问的委员会主席。

眼下，在法庭进行调查时，他和其他人一样，也在大谈乔·巴尔巴拉身受心脏病之苦的童话。

调查结束后，合议庭就阿巴拉琴会议一事作了总结。这

样，在美国公众看来，这个案件就算了结了。该总结堪称是一篇法学杰作，其最后结论是：

1. 1957年11月14日阿巴拉琴聚会表明存在着一个犯罪分子的联合体或组织，并正在积极开展活动，而且其活动范围不局限于美国。

2. 阿巴拉琴聚会的发现乃是纽约州警察局爱德加·克劳斯威尔中士杰出工作的直接结果。如果不是他目光敏锐、办事干练和意识到自己的职责，这次聚会就很可能不被揭露而悄悄溜过去。充其量会引起犯罪界的注意。

3. 尽管如此，所发生的事件仍表明，负责维护法律的国家机关工作上存在着缺陷。阿巴拉琴聚会使国家面临建立一个持续监视有组织犯罪和敲诈活动的国家中心机构的必要性。

克劳斯威尔大胆而果断的行动在这份总结里受到了高度赞扬，而当局也就以此份总结算是了结了这阿巴拉琴事件。中士的一切努力最终都付之东流；克劳斯威尔没有看出，和“我们的事业”串通一气的不仅是格莱特曼上尉及同其相类似的人。他没有估计到现代匪徒都是生意人，他们的公司同大型垄断财团牢固地联为一体。在经济集中过程已达到资本主义国家最高水平的美国，早已经不存在独立的企业家了。对同有组织犯罪有这样或那样联系的公司打击，就意味着打击了主要垄断财团。即使在美国没有一个能被收买的警察和法官，象克劳斯威尔中士这样少见的忠于职守的警察的作为，恐怕也不会有任何成效。

虽然庭审调查揭露出某些相当令人感兴趣的细节，阿巴拉琴会议一案最终仍然是一出闹剧。卢恰诺就此丑闻在拿不

勒斯对记者说：“眼下我在报上还没有看到所有这一切流言。我从来都没听说过什么阿巴拉琴。真的，我根本不知道它在哪儿。不过，这对我无所谓。我真按时缴纳所得税，绝不介入这种事情。”

阿巴拉琴匪徒会议之后没过几天，警方窃听到尼亚加拉瀑布城黑手党的先生安托尼·马加迪诺同外号人称塞姆或莫莫的萨尔瓦托雷·甘卡纳的电话谈话。

甘卡纳：现在我想，你可满意了。警察局跟踪逮捕了我们58个优秀人物。

马加迪诺：应当承认你当时是对的。塞姆，要是在你的城市里恐怕就出不了这件事。

甘卡纳：是啊！我那儿不会出这种事。芝加哥对聚会来说是世上最保险的地方。我们可以分别住在我的旅馆里。我可以向伙计们提供我的出租汽车公司的汽车，到各处走走，而且散会前，在我的那家最大的饭店里举行一次宴会。在这个地方警察就没有胆子敢往里闯，除了芝加哥之外，只有三个城市，在那儿，警察局长是在我们的兜里装着呐。

是啊，芝加哥依然是“我们的事业”的可靠的藏身之地。1965年美国司法部的一位高级人士就曾抱怨说：“芝加哥是个被犯罪分子控制的城市。在这个意义上，它比美国任何一个城市都糟糕。在这里，犯罪分子辛迪加扎根如此之牢，生长如此之快，要消灭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它几乎渗进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

阿尔·卡帕内的遗产

此时，芝加哥黑手党家族的首脑就是这个萨尔瓦托雷（塞姆）·甘卡纳。1957年，在阿巴拉琴会议前不久，甘卡纳的前任安托尼·阿卡尔多去享受“应得”的休息了。他同先前的琼尼·托里奥的做法一样，没等“发信号”就自愿离开了芝加哥“家族”的领导岗位。据专家估计，“我们的事业”的这一分支的年交易额为20亿美元。其首领应得的那一份，使阿卡尔多在芝加哥西郊的贵族区“河滨森林区”，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别墅，二十二个房间，一个用黑玛瑙石镶砌的游泳池和六个用黄金和玛瑙装饰的澡盆，美化了阿卡尔多的晚年生活。

但是阿卡尔多的一生实际上并不轻松：警方一共逮捕他二十四次，当然每次都很快就恢复了自由，只有1960年这个黑手党人曾被起诉，罪名是隐瞒财产逃避所得税！因为他向当局谎报了作为一家啤酒厂的共有者，自己所获的那部分收入。他被判处6年徒刑，不过，很快这位黑手党先生就被取保释放，到1962年复审时又被宣告无罪。

当阿卡尔多的儿子同腰缠万贯的肉畜业老板的女儿，前美女皇后詹纳特·梅丽·霍特结婚时，阿卡尔多的大名又一次出现在报刊上。1964年7月11日合众国际社报道说：“芝加哥犯罪界登上了社会承认的顶峰。”在河滨森林区的大教堂举行了婚配仪式之后，新婚夫妇在阿卡尔多的别墅里接待了1200位客人。当时刑警分布在围墙外面，随身携带着特制的摄影机和望远镜。而与此同时，别墅里面，二十名侍者往摆满豪

华餐具的桌子上端来极为精致的菜肴和葡萄酒。在来客中，警方发现有黑手党徒波尔·里卡。此人曾是维尔扬姆·比奥弗的好莱坞投机活动的参加者之一，后来他在政界显要人物的帮助下，使阿卡尔多离开监狱重获自由（1965年美国法院裁定将里卡驱逐出美国）。同时出席宴会的还有阿卡尔多的继承人——塞姆·甘卡纳。

萨尔瓦托雷（即塞姆）·甘卡纳1901年出生于西西里，20岁时因涉嫌杀人曾度过铁窗生活。1943年因撬锁行窃和制造酒精饮料被判刑，服刑期满后，应征入伍，但不久一个军医打发他回了家并给这个阿尔·卡帕内昔日的保镖开了一个诊断书，证明他“生性精神变态并具有全身性精神缺陷和妨害社会利益的性格特征。”

可就是这个“精神变态者”却在河滨森林区的一座别墅里掌管着一份庞大的家业。他手里有一批企业的股票控制额，这些企业是：三家洗衣联合公司，四个汽车公司，十二家旅馆，三家屠宰场，几家出租汽车公司，汽车库，八家银行和小钱庄，两家经营自动音乐装置的公司和多家饭店、夜总会等。

甘卡纳继承了一个组织得井井有条的“帝国”。而且在“我们的事业”的芝加哥家族的队伍里，不存在象纽约出现的那种争吵。芝加哥的黑手党徒都对自己的先生唯命是从，任其支配。

甘卡纳手下的司库和从事赌博业的专家是弗兰克·弗拉拉；而负责赌窑和妓院这一部门的领导人是一个非黑手党分子凯斯·阿列克斯。对外，此人是生产音乐自动装置公司的经理。至于敲诈系统，甘卡纳则委任外号人称“密尔沃基的

菲尔”的非立克斯·阿尔代利西奥负责。

同大多数其他黑手党人一样，甘卡纳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大批社会名流：如电影明星、著名的舞台歌手等。他的情妇是举世闻名的“马吉尔姐妹”三重唱中最年轻的独唱歌手。每当他俩驱车外出时，警察们寸步不离地在后面盯梢。1963年，这种作法给了甘卡纳以口实，他以干涉私人生活为由对警方提出指控。不言而喻，这个黑手党分子胜诉了，警方被迫缩减了跟踪小组，把汽车由五辆减少到一辆。

甘卡纳的手也伸进了伊利诺依斯州的政界，他的侄子托福占据着州参议员的交椅；他的妹夫吉希是国会议员罗朗达·维利博纳蒂的办公室主任。这个维利博纳蒂曾给阿尔·卡帕内当过律师。

不言而喻，芝加哥警察局一如既往仍是“我们的事业”那种“口袋”里的警察局。1962年联邦刑事警察署特别机要处的人员一直紧紧盯着黑手党人塞姆·巴达利亚和波科·萨尔瓦托雷的汽车，最后逼得他俩走投无路。两个匪徒奋力拒捕，开枪射击，直到芝加哥警方值勤人员赶到现场才算停息，并“自愿”向值勤人员缴械投降。可是警方发现他们抓住的并不是那两个犯罪分子，而是刑警署的两名便衣。

甘卡纳的朋友中还有歌唱家和演员弗朗西斯·阿尔贝特·希纳特拉。起初人们认为，这一结识只不过是这位匪首出于虚荣心，极力要用一批名流围着自己。但警方很快就查明，甘卡纳同这个歌手总是在内华达州的“拉克——达霍”夜总会相聚。本来法院已裁定禁止甘卡纳进任何赌场，而这个夜总会里就附有赌场，于是调查开始了。

“有金手的人”

歌唱家希纳特拉1951年出生于纽约，并在这座城市中不受人青睐的地方长大成人。他的父亲是个职业拳击手，祖籍意大利。弗兰克·纳希特拉的青年时期，几乎完全是依照黑手党的正统规范而度过的，同卢恰诺和卡帕内一样，也领导过青少年犯罪团伙。不过，他同时还在郊外的一家小饭店里卖唱，表面上以歌手为“公开”身份。后来他在娱乐行业开始神奇般飞黄腾达，这使他进入了好莱坞。不过，希纳特拉仍始终忠实于自己青年时代所度过的那个世界，象黑手党中的先生们一样，簇拥着他的那些保镖也一直都是意大利人。他很快就腰缠万贯，并由于参加拍摄电影“有金手的人”，好莱坞授予他“奥斯卡奖”，这是对一个电影演员最高的褒奖。希纳特拉扮演了一个好象是专门描写黑手党分子的角色——一个饱受吸毒之苦的赌徒。而更有趣的是，希纳特拉把拍摄这部电影的酬金又投资于赌博业，主要是拉斯韦加斯赌场，当然这是有利可图的。

自从匪徒吉格尔在拉斯韦加斯建立了最早的一个赌场以及黑手党控制了“弗朗明科”旅馆以来，在内华达州荒凉之地的这座城市便逐渐繁荣起来。赌场的庄家日夜三班。白昼的光线从来射不进这家赌场大厅。在这里没有时间概念，什么都不应当使赌徒们失去狂热的赌欲，拉斯韦加斯成了什么都居第一位的城市。

首先，犯罪率在美国位居第一。一年中，在这个6.5万个居民的城市里，发生1.3万起罪行。

外来人的数量位居第一。1962年有2600万旅游者到这个城市来，把自己的钱留在了赌场里。

利润位居第一。仅沙滩旅馆一家赌场，1959年最初几个月，收入就达110万美元。

按人口平均教堂的数量位居第一。在全城84个教堂中的任何一个教堂里，无需走乏味的过场就可以举行结婚仪式；解除婚约的证明也可以在短期内拿到，而且短得创纪录。

表演行业之大位居第一。所有赌场都附设有“小型歌舞剧场”。西方一些赫赫有名的舞台明星都来这里献技，以拿取惊人的酬金。广告把拉斯韦加斯剧场表演的脱衣舞大加称赞为比在巴黎还“脱得光”。

最后，赌场数目位居第一。全城一共有赌场288个，而第289个则设在监狱里——为的是让囚犯们开开心。

美国最穷的内华达州征收了赌场收入的一半，几乎占全州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一。州政府还设置了一个“赌博业监督委员会”，其使命是“保障私人开赌并使赌博合法化”。这个委员会的职员有一次炫耀说：“匪徒们打入拉斯韦加斯总比共产党钻进肯尼迪角强。”^①不过匪徒们用不着“打入”这个城市，因为他们早就在这里定居，弗兰克·科斯泰洛和乔·阿多尼斯在这儿榨取利润就已经有好多年了。不过，在这里最早捷足先登的是芝加哥的黑手党。弗兰克·希纳特拉投资350万美元作为拉斯韦加斯城的“拉克——达霍”赌场和“沙滩”旅馆的股金。在甘卡纳的“拉克——达霍”赌场之行之后，警方终于弄清楚，在拉斯韦加斯城，什么是属于谁的，查明带有脱衣舞

^① 肯尼迪角是美国宇宙火箭试验中心。

表演的赌场的老板是甘卡纳，而“弗拉明科”旅馆的真正主人是科斯泰洛、阿多尼斯和迈耶·兰斯基，尽管在巴克西，即吉格尔死后，名义上接替他管理这家旅馆的是莫·塞代。警方还获悉，希纳特拉的百万钱财就等于是甘卡纳的百万钱财，而且希纳特拉同阿尔·卡帕内从前的伙伴乔·菲舍蒂关系密切。1946年这位歌手曾受菲舍蒂的委托去古巴会见自己的朋友拉吉——幸运人卢恰诺。

当局尽量不把事态闹大、搞成丑闻，仅限于让希纳特拉明白，应同甘卡纳一刀两断。可是希纳特拉执拗不听。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好通过法律程序迫使他卖掉自己在赌场的那份股额。不言而喻，买主是黑手党派出的假冒人员。

接着，在税务部门的协助下，司法机关也抓住机会对甘卡纳提出公诉。法庭开始了审理。按照“我们的事业”的老传统，甘卡纳试图利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逃避审判。可是这一回法院破天荒地不按老办法行事，决定对这一修改法案作如下解释：如果这位黑手党先生供出芝加哥黑手党的其他罪行，那么他就免于起诉。

然而，甘卡纳对“荣誉社”的戒律是十分清楚的。他保持了沉默，这样一来便于1956年6月1日以藐视法庭罪被判处监禁。联邦法官乌里扬姆·坎贝尔在总结发言中说：“打开您牢房的钥匙，就掌握在您自己的手中！”

甘卡纳对此建议置之不理，这把钥匙诱惑不了他。

在首领被监禁的情况下，“我们的事业”仍继续在芝加哥统治着一切；黑手党的活动由阿卡尔多、巴达利亚和其他几个有影响的黑手党人领导着。搞敲诈的仍一如既往地讹诈商人；那些“不听命的人”和叛徒仍一如既往地除掉；警方

和司法机关也一如既往地未采取有力措施来制裁犯罪分子。有一次芝加哥市长阿图尔·比列克失望地说：“有时我想起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人。当时有人对他们说，在他们的国家的中心有一个布汉瓦尔德死亡集中营。可他们不相信会有这种事，而且认为这一切似乎是敌对宣传。”

一个法院的官员这样说：“对这个城市（芝加哥）的居民来说，这一切就宛如一场足球赛。交战双方是警察对匪徒。而他们自己只是扮演了看台上观众的角色并时而为这一方，时而为那一方着急，甚至在比赛激烈时，自己也不自觉地被卷进这场危险的球赛之中。”

对肩负维护法律之责的人来说，把由于警方和司法当局的不力而造成的全部罪责，推给匪徒恐怖行动的受害者（理由是有组织犯罪正是从这些人手里搞到钱从而才壮大兴旺的）当然要省事的多。但是市长对有组织犯罪乃是掠夺劳动人民的一种手段，乃是资本主义形形色色剥削方式之一这一点，却只字未提。要知道，匪徒使企业主所蒙受的损失和日益庞大的警察机构的开支，最终都一齐落在了劳动者的肩上。

死亡之吻

1963年9月27日，一个满头白发梳理整齐的，膀大腰圆的男子走进了华盛顿美国参议院会议大厅。这是一位主要作证人！过去已经有数次，这是又一次企图搞清楚美国犯罪界的活动情况。这次是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领导调查！新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承诺要比库普林德和凯弗沃那时主持的调查委员会更为积极活跃。罗伯特·肯尼迪终于举荐出一个同

意做任何供述的真正的黑手党人作为主要证人。

几周来，在会议大厅里电视广播公司的聚光灯耀眼眩目，注意的中心是约瑟夫(乔)·瓦拉奇。

这个意大利穷苦移民的儿子，此时已年过花甲。正如他所供述，在自己的一生中他一共才诚实地工作了一年。瓦拉奇16岁开始犯罪生涯。在隆重地加入了“我们的事业”联盟之后，专门从事非法的赌博和贩毒活动。他属于维托·杰诺维塞“家族”。1959年，维托先生被捕并最后因贩毒而判刑，与此同时，瓦拉奇也身陷囹圄。

在瓦拉奇被判15年徒刑的这场官司之后，黑手党分子们就怀疑他可能要“变调”。瓦拉奇向委员会谈了在阿特兰塔监狱里发生的事，当时他同维托同居于一个囚室。他供述说：“有一天晚上，牢房的灯已经关了，维托突然提起开始耍坏的苹果，接着走到我跟前，拉住我的手吻了一下我的面颊。对同牢房的伙伴来说，这就是要杀死我的标志。”

从那天起，瓦拉奇开始为自己的生命担忧，而且忧心如焚。他知道，即使在监狱里，黑手党也有办法对付叛徒，于是他请求监狱当局把他转到了一个单人号房。1962年5月22日瓦拉奇象往常一样在监狱院子里散步，突然一个囚犯朝他扑来。当时他误认为此人是匪徒乔·贝克。为了自卫，瓦拉奇用在院子里捡到的一支铅管砸死了攻击他的人。这一来，因杀人罪而用电椅处死便威胁着瓦拉奇。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希望得到宽恕并向有关当局声称将供出一切。

最初，联邦调查局人员对他进行了详细讯问，接着他被送到位于新泽西州的蒙默思堡军事基地。在那里设置有研究电子系统的试验室。瓦拉奇认为，在这个配备有极为复杂的

信号系统的堡垒里，他可以万无一失地躲开“我们的事业”的报复。

眼下，这个黑手党徒就坐在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的面前，下意识地用手揉搓着手绢。同证人席并排站着六名保卫人员，而且每个出席会议的人身后都有一个便衣侦探。瓦拉奇在做供述。他所说出的一件事都使美国公众感到哗然和震惊。但事后警方发言人却宣称，瓦拉奇所说的一切，当局早就知道了。

瓦拉奇谈了乔·马塞利亚和萨尔瓦托雷·马扎兰诺是如何被杀的；埃巴·里尔斯是怎样被除掉的；维利·莫莱蒂是如何死的……在讯问中，最经常出现的名字是维托·杰诺维塞。瓦拉奇说，此人从监狱遥控指挥着“我们的事业”。对他的证词实在没有任何理由表示怀疑。

三指布劳恩光荣的一生

瓦拉奇供述之后，参议员们开始对警方和司法人员进行质询。参议员贾维茨问警方代表：“瓦拉奇给我们揭露出的那个真名叫托马斯·留凯吉、外号人称三指布劳恩的著名匪徒自1953年以来连一次都没捕过，这是真的吗？还有，他在纽约以令人尊敬的缝纫厂主而闻名，这是不是事实？”

在得到警方代表的首肯之后，参议员贾维茨大喊道：“这是一个极为令人震惊的揭露！”

的确，黑手党的先生们中，难道还有谁能比托马斯·留凯吉隐瞒真名实姓隐瞒得如此之好呢？留凯吉1899年在西西里出生，1911年就同父母移居到了美国。年轻时在工厂做工

失去了两个手指。当他1922年首次被捕时，一个警察想起大名鼎鼎的芝加哥杀人凶手莫吉凯·布劳恩，并开玩笑地说：“瞧啊！三指布劳恩！”留凯吉的本行是贩毒和登赌注。当他从辛克——辛克监狱出来时已经26岁。三指布劳恩属于107大街的那个团伙，同卢恰诺关系甚笃，在卢恰诺判刑之后，他在对纽约缝纫业进行敲诈方面是这位权力无限的黑手党人的利益的代理人。为了给自己的敲诈行当找个好的掩护体，他偶然碰上了一家生意兴隆的服装加工公司“布劳恩有限股份公司”。留凯吉对公司老板进行恐吓，后来便便宜地买下了这家公司。

这时他变成了令人敬重的托马斯·留凯吉，成了朗埃伦迪贵族区受尊敬的居民。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享有特权的西点军校上学；为了同自己的身份相适应，他在上层社会广泛结交，其中有两个美国最高法院的人士和一名联邦检察官。

1952年弗兰克·科斯泰洛把自己的家族的“权柄”转交给了三指布劳恩。

谁要是以为在参议员贾维茨发言之后，就立即逮捕了托马斯·留凯吉，那他可就大错特错了。

瓦拉奇最后是这样结束自己的供词的：“我用自己的供词亲自为自己下了判决。我破坏了缄口默言法规。等待我的是死亡，因为我没有权利说出一切。”

事后，这个黑手党分子又重新消失在监狱铁窗的后面。1965年12月社会公众才获悉，美国司法部破例批准瓦拉奇公布自己的回忆录。这份标题为《真情》的手稿，篇幅是1180页。可是，1966年2月，十二名意大利裔的美国上层人士，其中包括四名国会议员，终于使公布手稿一事搁置了起来，

因为这件事似乎给来自意大利的移民脸上抹了黑。这场抗议运动的倡议者蛊惑人心地宣称，对“我们的事业”联盟中黑手党分子所犯罪行的描述，势必会掀起歧视定居在美国的意大利人的浪潮。尽管凯弗沃参议员调查委员会确认，在有组织犯罪活动中，意大利和西西里人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意大利移民应对美国刑事犯罪急剧增长负有罪责这一看法，在美国却相当普遍。（这一点在罗伯特·肯尼迪领导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就有反映。）

1966年4月初，美国报刊报道说，在密执安州的麦朗监狱，瓦拉奇曾企图自杀未遂。

纽约布鲁克林区的战事

维托·科莱奥内是个目光远大的人。美国所有大城市都由于存在犯罪分子间的自相残杀的战斗而四分五裂，格维里亚^①式的战争如火如荼——这位虚荣心很强的匪徒也企图建立自己的王国。但是这位先生明白，任何一场械斗，都会给新闻界和当局以口实，要求实施更加严格的法律，要求警方采取更加断然的措施。……于是，他决心先同纽约城内的所有敌对集团修好，然后在所有其他地区建立自己的王国。

马里奥·皮乌佐《教父》

电影康采恩派拉蒙制片公司的代表被请到纽约参加记者招待会。该公司着手拍摄一部耗资巨大的宽银幕电影，投资约数百万美元，当然，希望赚回的，比这更多。马尔隆·布朗多扮演主角。这是一笔可靠的买卖，因为派拉蒙制片公司要把长期位居畅销书榜首的一部书，即意大利裔美国人马里奥·皮乌佐的长篇小说《教父》搬上银幕。

皮乌佐描述了一部力求产生外部效果的故事，叙述了一个虚构的、名叫维托·科莱奥内的“我们的事业”联盟的

① 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对游击战的称呼。

先生的生和死，以及他在美国黑手党中争夺权力的斗争。

记者招待会选择了一个相当奇怪的地点：设立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保卫美籍意大利人公民权利同盟”的总部。同电影《教父》的制片人埃尔·拉迪并排而坐的是上述联盟的代表，名叫安托尼·科隆博。当埃尔·拉迪声明，在即将拍成的电影里将只字不提“黑手党”一词时，科隆博先生满意地点了点头。而当拉迪说到，这个决定是在“未受来自某方面的威胁和恐吓的情况下”而采取的这句话时，科隆博先生忍不住插嘴说：“拉迪先生说得对，没有受任何威胁和恐吓！”

1971年3月举行的这次招待会是“保卫美籍意大利人公民权利同盟”的第二次胜利，看来，象1966年出现的那种可以公开辱骂黑手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时，在美国众议院，联邦调查局的首脑爱德加·胡佛公开宣称，“我们的事业”是一个“出生于意大利或意大利裔人组成的刑事犯罪集团”。而1970年7月美国司法部长米切尔却下令，以后在公开的印刷品和公众讲话中，不准使用“黑手党”和“我们的事业”这两个词，因为美籍意大利人会将其理解为对自己民族的歧视和侮辱。所以，自1970年7月起，每逢谈到同历史上最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的问题时，人们顶多说一个“黑”字。正因此，“没受任何威胁和恐吓的”“派拉蒙制片公司”在电影里才干脆连“黑”字也不提。拉迪先生象马里奥·皮乌佐在自己的小说里一样，想把黑手党的先生们描绘成真诚可敬的人物。从小说《教父》里读者大概会看到，杀人只不过是黑手党特有职业的必然结果，而在其他方面，黑手党分子同“我”和“你”是一样的人，都有自己要办的琐事或大事。正因为这一点，

“派拉蒙电影制片公司”才能深信，“保卫美籍意大利人公民权利同盟”肯定会支持这部影片。

在这次声震遐迩的记者招待会之后一年，美国杂志《新闻周刊》就《教父》首映写道：“这部技巧高超、色彩绚丽、内容凄惨的电影，有一点不足之处，这就是赞美了匪徒生活，把暴力的牺牲品推到了次要地位，把注意力集中到黑手党宗教式的礼仪和半开化的习俗上，甚至不惜描绘其恬不知耻的作为。”小说作者，电影剧本改编者之一的皮乌佐说：“当然，这是一部浪漫主义故事……当然，黑手党也具有某些浪漫色彩……但是，不要指望从电影里探索严肃的社会学和现实主义。”至于精心巧制的广告使电影《教父》获得巨大成功，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数以百万计的观众最终把“我们的事业”联盟看成有人性的东西，这应该归功于黑手党的重要先生之一的约瑟夫（乔）·科隆博。在那次值得记忆的记者招待会上，同制片人埃尔·拉迪并排而坐的安托尼·科隆博，就是这位先生的后裔。

乔·科隆博创建同盟

那时，美国报刊能报道的只是“乔·科隆博是布鲁克林区的土地经纪人。”而这种说法只有一点点是真的。科隆博出生于1923年，在朱塞佩·普洛法齐的纽约黑手党家族里开始的犯罪生涯，后来慢慢地、但却很有把握地为自己铺设了荣升的道路，终于在1962年成了布鲁克林“家族”的领袖。他曾因缴了一大笔保证金而免受拘押。后来，由于上诉法院工作拖拉，他不得不以作伪证罪而服刑。与此同时，还有一桩因盗窃贵重财物和隐瞒财产逃避所得税的审判在等待着他。检察

官说：“该被告人从头到脚被无尽无休的匪徒关系网所缠绕，其一端始于30年代末他父亲同黑社会的交往。”检察官说，科隆博在布鲁克林区专门从事放高利贷和赌博业，“侦查人员确认，科隆博同布鲁克林区的某俱乐部后院房子里的刑讯室有直接关系。而且在这个俱乐部里，他使用我们尚不清楚的方式，处理自己的事务。”

乔·科隆博不动声色地接受了上述全部指控。可是当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他另一个儿子时，科隆博怒发冲冠了。这位黑手党先生对其寄予厚望的继承人是被当场拿获，人赃俱在。当时，他正把银帛炼成银锭，然后把这种贵重金属高价出售牟取暴利。可这在美国是要受法律制裁的。

科隆博先生从自己在美国的经验中汲取了一些教训。他清楚地知道，基于某一部分人共同利益而建立的同盟组织，具有何等巨大的力量。这些组织可以争得很多东西。于是在本家族的帮助下，他没费很大力气就把一些美籍意大利人带到纽约街头。每天夜里，示威人群围住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的大楼，要求释放小科隆博。“保卫美籍意大利人公民权利同盟”也就此而诞生了。后来，其成员急剧上升到数万之众，该同盟的公开纲领是“保卫美籍意大利人（仅纽约就有85.9万人）免遭种族歧视”。按理说，这是正当的意向，因为在美国到处可以看到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但是，这个组织在“我们的事业”手里就成了同司法机关和警方斗争的理想武器。而乔·科隆博的儿子安托尼被任命为该组织的副主席。

1970年6月，这个同盟又在纽约街头组织一次大约有10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经过伟大的热那亚人赫利斯托夫·科普姆勃的纪念碑。“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因为我们有个

意大利名字而歧视我们的现象！”当然，游行队伍中的大多数人是怀着良好愿望和正义信念而来。这一天，被尊之为人民英雄的乔·科隆博大得人心。在成千上万人狂呼“乔！乔！”的声浪中，他登上讲台向人群讲话说：“我要对诸位如实地说，目前存在着一个反对我本人和美籍意大利人的阴谋。可是今天，上帝的圣目在望着你们和乔·科隆博。所有那些挡着我们去路的人，都必将受到上帝圣手的惩罚！”

这些人也真的尝了圣手惩罚的味道。司法部长米切尔就认为必须禁止使用“黑手党”一词。“福特汽车公司”在自己资助拍摄的一部根据犯罪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里，便建议作者从脚本中删掉任何提及“我们的事业”之处。而严肃的《纽约时报》，在科隆博的这个同盟的一些年轻人，破坏了一期报纸的出版之后，自此就一直避免刊登有关黑手党的罪行及其成员的报道。在该同盟的义演音乐会上，黑手党人的朋友和伙伴希纳特拉参加了演出；而来自布隆克斯的路易斯·吉汉特神父在同盟的庆祝午宴上，则向所有的与会人员表示祝福。他说：“我为今天的晚宴祝福，为乔·科隆博和他的一切善行祝福，阿门！”

猎捕乔疯子

这种得意的生活持续了大约一年。1971年6月29日科鲁姆勃纪念碑前又举行了庆祝意大利统一日的纪念活动。在激动人心的暴风雨掌声的欢迎下，乔·科隆博再次登上主席台。

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向自己的支持者开口讲话，一个站在新闻摄影师和记者人群中的黑人突然朝他连开数枪。两颗

子弹击中了黑手党先生的头部，科隆博的保镖也迅速开火还击。

就在那个刺客——26岁的杰罗姆·琼森被打死的同时，科隆博先生匆忙被送往医院。但此时科隆博手下的两个“尉官”跳进汽车，扬长而去。在集会现场的刑警人员发现这两个匪徒很快逃走，便认为他俩是暗杀的参与者，于是迅速追踪，最后在位于大西洋街和乌吉卡大道的拐角处的、一家当时空无一人的酒吧间门口断了线。但警方有充分根据怀疑科隆博手下的这两个人就是往这里来了，而这个酒吧是乔·加洛的大本营。

这次事件对新闻界是一个难得的好新闻。最近一次是1957年有人朝弗兰克·科斯泰洛这位黑手党先生打过黑枪。那么这次是不是步其后尘呢？纽约警方鉴定专家说：“有组织犯罪变得更加隐蔽了。一旦真的需要除掉谁，一般都在凌晨4点，在某个码头上行事。这样就使谁都发现不了。不过，只有一个人是如此的轻率，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数千人的面搞暗杀。这个人就是乔疯子。”

那么乔疯子是不是有自己的理由呢？乔·加洛所以有乔疯子这个外号，应归功于一个法院的精神病医生。此人有一次证实乔·加洛“无能力意识到自己的罪过，因为眼下他总有病症。”这个乔·加洛同他的两个哥哥一样，从60年代初期起就在纽约警察局挂上了号。他的两个哥哥在维托·杰诺维塞手下当职业杀手。在维托离开本家族的宝座之后，他俩曾试图成为“独立人”。但要做到这一点，在纽约只有侵害另一个家族的势力范围才行。这一来他们就同普洛法齐家族发生了冲突。在加洛兄弟绑架了普洛法齐的妹夫，外号人称乔胖子

的马里奥巧的情况下，布鲁克林家族的先生普洛法齐被迫签订了停战和约。但是这两个“独立”匪徒仍向布鲁克林家族宣战。这场内讧之战以98个匪徒的生命为代价并最后以乔·加洛被捕和判刑而告终。但是即使在监狱里乔疯子仍不放弃要把普洛法齐家族挤出布鲁克林统治区的计划。正如后来人们所知，他结识了一些“有色”囚犯。由于忠实于利用非意大利人干“粗活”的黑手党传统，出狱后，他组织了一个不小的黑人匪帮。看来，警方是对的，因为就谋杀科隆博一事，曾允诺给琼森20万美元并答应使其逃避追究。此外，警方还怀疑，别尔希科会不会以答应他成为科隆博的接替人作交换条件也参与了这一阴谋呢？那位“王中王”，73岁的冈比诺在这件事里扮演了什么角色呢？科隆博名望的日益提高，是不是的确使幸运人卢恰诺的继承人冈比诺精神紧张并有所警觉呢？对黑手党的所有家族拥有不可争议的统治权的冈比诺，会不会故意唆使先生们混战一场，以利更加强自己的统治呢？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科鲁姆勃纪念碑前的枪战，如同芝加哥昔日那种大好年代一样，在匪徒之间挑起了一场新的战争。后来，按照马里奥·皮乌佐在《教父》里的说法，事态的发展就如同在“被窝里”一样。乔疯子在南布鲁克林区总统大街自己的总部修筑了工事，但这并没有保住他免遭科隆博家族的报复。

1972年4月8日加洛隆重庆祝了自己43岁生日。晚上，他和朋友们去了卡巴莱酒吧，看完表演之后，他和情妇及情妇10岁的女儿，还有加洛的姐姐和保镖们一起，驱车到离曼哈顿警察局大楼不远的“拉科温·翁贝托”饭店去吃饭。

他们刚订好饭菜，一个中等身材大约40岁上下的男人走

进了饭店。他身穿浅色花呢子大衣，手里拿着一把张着机头的，38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此人一言未发直奔乔·加洛走去并当即开枪射击。保镖比特·加比乌拉斯中了弹，而乔疯子勉强站了起来，一摇一晃地穿过大厅，最后在离门口十五步远的地方一下子倒了下去。这个地方距一年前，在“派拉蒙影片公司”耀眼的探照灯下，维托·科莱奥内，即扮演者马尔隆·布朗多，成为类似牺牲品所倒下的那个地方大约仅有百米之遥。

乔·加洛被装殓在一口价值5000美元的铜制棺材里安葬了。拒绝向警方做任何供述的那个受伤的保镖，以非法持枪罪被判了刑。

黑手党战争激烈进行着。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报道关于黑手党之间层出不穷的自相残杀的新闻。

设立在停车场的指挥据点

匪徒之间的自相残杀使社会公众感到极大的不安。纽约市市长林赛声言：“我们一定要把匪徒从我们这个城市赶出去。不过，我们首先打算让他们失去物质保障。”

于是又象已往多次那样，再次做出彻底消灭有组织犯罪这老一套的承诺。不过，这一回警方似乎要动真的了。

一切都是从下面这件事开始的：有一次，四个化了装的便衣警探，在黑手党分子喜欢光顾的一家位于布鲁克林区的酒吧门口，卖圣诞节枞树。从酒吧里传出的阵阵谈话声中，警探听出来了一个匪巢所在地。就这样，警方在布鲁克林区的一家停车场上发现了一辆住人的大篷车。一个伪装巧妙并

装有隔音设备的“我们的事业”的指挥据点，就设立在摆得整整齐齐的旧汽车残体中间，四周围着带刺的铁丝网，而且有警犬守卫。尽管防范甚严，警察们仍然在这个大篷车顶上安装了窃听装置，从车厢的电话线上又引出一条线并在对面的学校里设立了一个配备有摄影机的监视哨。每一个对布鲁克林停车场上的大篷车的来访者都被拍摄下来。

数月之后（此时匪徒之争正处于酣战，市长林赛刚刚发出了警告）警方已拍摄了几十万米的胶片，录了好几公里长的磁带，上面记载了有关敲诈、杀人、绑架和欺骗保险金的种种谈话。

1972年10月，警方采取了决定性打击行动，下令逮捕了667个黑手党徒。这些人有的曾去过布鲁克林的大篷车里，有的是通过电话谈话查出来的。除此之外，还逮捕了数百名靠“我们的事业”养活的警方人员！在去过大篷车的被捕人员中，只有几十个纽约商人未受惩处，检察官就此声称，此案涉及了被黑手党控制的二百多家纽约公司的代表。

纽约各家报纸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事业”的日子是不是已经屈指可数了呢？其实，被警方逮捕的黑手党分子远没有都被揭露，尤其是未被判罪。此外，还不应忘记，就是那些被判了罪的黑手党先生们，从监狱里仍然可以毫不受阻地指挥着自己的“家族”。谁都没有足够的把握说，1972年10月发出的逮捕令，曾对“我们的事业”的活动产生了影响（顺便说明一下，纽约警方并没有说清楚，实际上发出了多少个逮捕令，而且至今未对被指控人员中的任何一个人进行审判），而取代这一点所出现的情况，倒是如马里奥·皮乌佐在小说《教父》中所写的，在所有敌对派别之间签订了和约。

一位黑手党先生自首认罪

对以乔·科隆博被杀而起始的纽约黑手党之战的最后一个反响，是1973年元月24日的一则报道。该报道说，1972年6月被绑架的埃曼努埃尔·冈比诺的尸体被找到了。这一来就有两个黑手党的头面人物决定破坏噤口律条。1973年初，约瑟夫·鲁巴列里担心被杀，便来到警察局自首。鲁巴列里“变了调”，其中谈到1972年4月8日科隆博家族的一个成员卡尔米内·比亚吉，在“拉科温·翁贝托”饭店，发现了乔疯子，即加洛，接着科隆博的继任人约瑟夫·亚科维利便下令打死了加洛。

而第二个到警方自首的就是这个亚科维利。在鲁巴列里供述之后，亚科维利便觉得自己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于是1974年2月28日，他来到联邦调查局自首。在那里当即以“阻碍揭露罪行”罪将其拘捕，而且还要在谋杀加洛一案中作主要证人。这位“我们的事业”的先生难道是自愿到联邦调查局认罪的吗？来自纽约的一份报告对此解释说：“他突然向警方自首是同科隆博‘家族’想任命一个新首领有关。”如果是这样的话，亚科维利的自首只不过是为了逃脱在他的家族里可能出现的大清算。

1972年3月美国《生活》杂志断言，“重要的不是起止的准确的日期，而是意大利式的有组织犯罪在这个国家（美国）已经结束。”

这家杂志怎么会做出如此大胆的结论？人们曾做过计算，到1971年底，监狱里关押有3200个黑手党分子，其中甚至有

象莱蒙德·巴特里亚克（新英格兰家族首领）、卡洛斯·马尔切洛（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族长）和西蒙·迪卡尔瓦坎蒂（新泽西州的一个族长）等这样一些“先生”辈的人物；另外还有一个事实，大概也可以作为“我们的事业”已经完蛋的佐证，这就是一些“先生”辈的人物转而求助于社会舆论，比如乔·科隆博就曾在科鲁姆勃纪念碑前发表讲演，而萨尔瓦托雷·帕南诺也决定为作家休·塔列吉创作《你父亲的美名》一书，向该作家讲述自己的经验和感受。

每当老一代的先生退出舞台，让位给有“现代思想”的年轻人时，总是有人要预言美国黑手党已山穷水尽了，对此《生活》却避而未谈。对这一倾向可以通过纽约的五大黑手党家族的发展史来进行仔细研讨。

1899年依格纳齐奥·萨伊塔黑手党在纽约问世，后来他被判处30年徒刑，纽约黑手党解体，于是人们便觉得它完蛋了。可是1920年乔·马塞利亚又打起黑手党大旗，当时走私酒类变得比杀人和抢劫更重要。

1931年乔·马塞利亚和他的继任人萨尔瓦托雷·马兰扎诺被杀，看来有组织犯罪又到了尽头。但是一反人愿，接着一下子出现了五个黑手党家族，其领导人都是生机勃勃的年轻一代的先生，而且用赌博，最后用走私毒品取代了酒类走私活动。

当被认为是“王中之王”的幸运人1946年被驱逐到意大利之后，弗兰切斯科·斯卡里奇接下了他的家族。1957年斯卡里奇被打死，从那时起直到1976年领导这个黑手党家族的是卡洛·冈比诺，此人还声称要登上“王中之王”的宝座。

从1931年起，纽约出现的第二个黑手党家族的首领是弗

兰克·科斯泰洛。1957年此人曾遭暗杀，但幸免一死，后因心肌梗塞于1973年2月自然死亡。他的继任人是托马斯·留凯吉，外号人称三指布劳恩，此人也自然死亡。这一来出现了谁作为新的强有力人物的问题。新上任的先生斯杰法诺·拉卡列已经太老了，而其潜在的接班人卡拉内米·特拉蒙蒂是在布鲁克林区那个著名的大篷车里受警方监视的人员之一。

第三个纽约黑手党家族，从1931年起由乔·普洛法齐领导。1963年他死后，乔·科隆博接替了他的族长之位。科隆博被杀和亚科维利向警方自首之后，这个家族内部爆发了激烈的夺权斗争。最后空缺理所当然的候选人被认为是约瑟夫·马里奥丘，而且他已经暂时领导着这个“家族”。

乔·帕南诺的失踪

纽约黑手党的第四号家族从1931年起是在乔·阿多尼斯手里。1956年他被驱逐到意大利并于1971年9月死在那里，而接替他的是乔·帕南诺。

在照例要预言“我们的事业”要完蛋的时刻，乔·帕南诺让警方费了不少事。

1964年10月21日夜半，在纽约贵族区公园大街停下一辆出租汽车，从里面出来律师威廉·梅劳尼和59岁的乔·帕南诺。他俩迳直朝梅劳尼所住的豪华别墅走去。突然从大门暗处走出两个人，身穿风雨衣、头戴宽边帽而且帽沿压得很低。这两个陌生人上去抓住了乔·帕南诺的手，其中一个低声说道：“走，乔！我们的头儿想同你聊聊！”

帕南诺当时甚至没试图反抗，相反梅劳尼却开始提出抗议说：“你们真该死，什么事？这个人是我的当事人。”可是身穿风雨衣的小伙子不想在这么晚的时刻同这个律师争论，其中一个陌生人对他喊了一句：“滚一边去！”同时两个匪徒又用枪声强化了自己的这一要求。律师当即机警地躲进门洞里，弯下身子避开枪弹。两个陌生人架走了帕南诺，梅劳尼紧贴着楼房的墙壁，远远地注视着他们离去。他从拐角处仔细观察，发现帕南诺被推进了一辆高级小轿车里。

几分钟之后，威廉·梅劳尼把所发生的事情报告给了警方。电传打字机马上开始工作，新泽西州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赶紧播出“乔·帕南诺被绑架”的消息，在几家大报编辑部的档案里，人们非常兴奋地在翻寻被绑架者的有关资料。

可是档案里的资料说法极不一致，仅他的姓名就有好多种说法：约瑟夫·帕南诺、约瑟夫·帕诺诺、乔·巴南尼、乔·巴纳纳斯等，不过总算清楚了其他一些情况。

朱塞佩·帕南诺1906年出生于西西里，1924年移居美国。1930年在为阿尔·卡帕内匪帮从纽约往芝加哥运送武器时首次被捕。1938年帕南诺曾短期离开美国，但很快又经过加拿大返回并取得美国国籍。乔·帕南诺曾在好多不同行业做过买卖，开过殡仪馆、洗衣房和缝纫厂，还经营过几家橄榄油和干酪的进口公司，1957年因参加阿巴拉琴匪徒会议再次被拘捕过。

眼下，就是这个人被绑架了！一个犯罪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当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和揣测。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报道说：“警方非常担心乔·帕南诺成为在公园大街绑架他的那伙武装匪徒策划的一场谋杀的牺牲者。”

司法部的一名官员说：“如果有人问我，我会回答说‘乔·帕南诺如今正躺在河底下的某个地方。’”

高级视察员沃特·弗·亨宁认为，“恐怕我们未必能看到他生还。”

而纽约的一位犯罪侦察学家说：“我们正在找他，我们希望同他谈一谈。”

乔·帕南诺是在对他即将开庭审讯时失踪的。本来第二天他应当出席法庭供述自己集团的刑事犯罪活动。毫无疑问，这位受人尊敬的实业家干过贩毒和敲诈勾当。那么会不会是，同其竞争的团伙把他除掉了呢？也可能是本集团的人，担心帕南诺在法庭上做出对自己同伙不利的供述？或者是乔·帕南诺自己组织了这场绑架以逃避审讯？不过，这一点似乎不大可能。那么他会不会已经死了呢？

1964年12月18日威廉·梅劳尼使纽约报界得到了一条轰动一时的消息：他的当事人还活着，而且很健康，自我感觉良好，他们两人约定每隔三天见一次面。可是有一回乔·帕南诺既没在预定时间，也没在晚一些时候出现在梅劳尼事务所。原来，当时审判委员会正在详细审查乔·帕南诺及其黑手党家族的活动，并在询问了三十五名证人之后确认，这个家族大约由六十名匪徒组成，他们活动在美国西部和东海岸——从纽约到加拿大边境。

又过了几乎半年多，突然于1966年5月17日传出消息说，约瑟夫·帕南诺曾到过纽约总检察官摩根索的办事处，而帕南诺也断然拒绝说出，这么长时间他一直在什么地方。他的“家族”早已由一个外号叫小加帕斯的加帕斯·迪格莱戈里奥领导着。

谁要是认为乔·帕南诺很快将在法庭上出现，谁可就大错特错了。总检察官以15万美元的巨额保证金放了帕南诺。

1966年12月31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条消息说，根据美国政府的资料表明，约瑟夫·帕南诺乃是中美洲岛国海地共和国数家赌场的老板，并说帕南诺的“尉官”维托·迪菲利波于1965年9月，开始同海地独裁者杜瓦利埃进行紧密联系，用相当可观的贿赂，从独裁者手里，得到了对设立在海地首都太子港市中心的“国际”赌场的租让权。

今天已经弄清楚，原来早在1964年帕南诺就曾企图抓住对纽约五个家族的统治权。在他未能达到此目的情况下，他就导演了这场绑架自己的闹剧，然后隐身加拿大，一直呆到事态已经平息，各家族的先生都消了气为止。在此时期，在亚加桑州的图森市，帕南诺建立了一个有广泛联系的小型匪徒王国。而小卡斯帕因“年老”已把帕南诺前家族的领导权交给了纳塔尔·埃沃拉。但他被警方在布鲁克林区停车场住人的大篷车里“当场拿获”了。

被收买的警方

最后剩下的是第五个家族，其领导人就是1969年因心脏病发作死于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监狱中的维托·杰诺维塞先生。杰诺维塞1959年被捕之后，斯特罗洛成了该家族首领并一直领导到一天夜里突然无影无踪地消失为止。此后有两个人争夺这一领导权：一个是杰拉尔多·卡迪纳(后因拒绝作证很快被判刑)，另一个是托马斯·埃博利。

就这样，五个家族中有四个重新出现了换代。老一代首

领在为自己积累了一大批钱财之后都下了台。而当时的收入是巨大的，黑手党简直从一切方面赚取钱财。

“我们的事业”所获的最高利润都来自贩毒(1969年此项收入估计有3.5亿元)高利贷，非法聚赌，行业工会敲诈(对公司进行讹诈和建立伪工会)，当然还有经营淫秽书刊。印制淫秽书刊的纽约各公司都由托马斯·留凯吉的朋友约瑟夫·布洛金尼操纵控制。1970年，黑手党这方面的收入达50万美元。然而这个数目仅是“我们的事业”总收入中的一小部分。美国司法部宣称，似乎是掌握了什么文件，从中得出结论是，在各类不同的企业和公司里有廿多万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归属于“我们的事业”或同其有牵连。

那么最终应该由谁来结束这种局面呢？由警方吗？

显然，大部分美国警方和政府官员都已经被“我们的事业”收买了！比如，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雷丁城，“我们的事业”就控制了包括市长在内的所有政府部门和警察机关。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遵照“我们的事业”的头子们的指示，当地警方居然逮捕了三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因为他们在进行一项秘密行动，调查黑手党在这个城市的有组织犯罪活动。当然，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很快就被释放，而八名警察则因每人接受“我们的事业”8000美元的贿赂而被判了刑，但这个案子也就到此为止了。

1969年9月人们获悉，在新奥尔良，马尔切洛家族的匪徒同警察协同行动搞了抢劫。在现场，法律的维护者竟然动用警方巡逻直升飞机进行监视，以免匪徒出什么乱子。在布鲁克林曾逮捕了八名警察，他们由于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从而在黑手党分子赌场老板维拉手里拿了5万多美

元。这件事后来被传扬了出去，因为当时维拉的竞争对手被打得住了院，为了报复，此人又把自己的对手维拉置于险地。

“我们的事业”在向政府机构渗透方面是多么精力充沛啊！

诱惑野鸭用的母鸭

……1967年圣诞节前夕，纽约市政厅向自己的市民赠送了一件“礼品”。这就是，在大选时以“我们将把纽约变成一个洁净的城市”这一口号而获胜的共和党人市长约翰·维·林赛，被卷进了自他那因不幸而闻名的前任威廉·奥戴尔执政以来最大的一件丑闻之中。这件丑闻是围绕着林赛的密友——“前途无量”的杰姆斯·马库斯而爆发的。此人在林赛的竞选运动中起了重大作用，为把这位共和党人最终推上纽约的最高宝座立了汗马功劳。作为对此的酬劳，林赛把马库斯拉进了市政厅，起初做自己的“私人顾问”，后来任命他为负责水、煤气、电力供应的专员。

这个马库斯不仅会变着法子花钱，而且是个生意精。他通过签订一项私人借贷契约，组织了一个“援助发展”公司于交易所里的投机买卖。但不幸的是，除了总额为三万美元的债款之外，这个买卖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东西。为了找人借款，马库斯掉进了“我们的事业”的“借贷鲨鱼”的魔掌。他们替他偿还了债务，进而也就把他搞到了手中。

有一次，以外号托尼·达克斯(或托尼·乌特卡)而著称的安托尼·科拉罗来找马库斯。前者是个先前因贩毒而被审

判过的黑手党人，还曾把自己业务上的兴趣扩展到建筑业。科拉罗找马库斯让他注意一件事，这就是纽约市政府打算投资一大笔钱，清理和改造布隆克斯公园里的大游泳池，承包总投资为八十万美元。这一来，马库斯一反惯例，没有对这个投资进行公开招标，而直接交给了“我们的事业”控制的一家公司。为此“礼貌之举”，他得了1.6万美元的酬谢。

马库斯的这类勾当并非独一无二。正如所查明的那样，多年来，“我们的事业”一直控制着纽约机场的全部空中货运。黑手党分子们建立了一个全联邦的企业联合会，在罗兰佐领导下搞货运。各家公司都被迫加入这个联合会，并要拿出5000美元“开业税”，每年还要缴纳大笔会费。凡是拒绝这些条件的老板，很快就会碰上难题，比如，属于他的那些卡车突然被偷走，而货物全部被毁。

芝加哥同纽约一样，尽管“我们的事业”的前首领甘卡纳已移居墨西哥，但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犯罪支柱的名声。1967年公布了芝加哥214个最危险的犯罪分子名单，其中就有安托尼，阿卡尔多和包利·利吉的大名。与此同时，还指出有42家从饭店、旅馆到设计院，是属于“荣誉社”的实业。

“黑手党”康采恩

以前一个因组织赛马赌博而被判刑的黑手党的无名小卒弗朗西斯·维泰洛拒绝向律师付钱。事情是这样的：维泰洛在瑞士银行立了一个户头。这种户头是属于银行根本不问钱的来源和用项的那种名声不好的户头。而且一切手续全靠号码办理。这种银行存款的保密性既牢牢保护着剥削者，也牢

牢保护着犯罪分子。

有一次，从维泰洛的帐号上，人不知鬼不觉地少了70.2万美元，而且不幸的是，这笔钱不是维泰洛私人的，而是“我们的事业”的一个头头博斯顿·莱蒙德·巴特里西克的。“我们的事业”就此进行了详细调查，最后查明，几个来自美国的狡猾骗子，用欺骗手段把这些钱转到了自己的名下。在把钱搞回来的行动过程中，“我们的事业”尽量力求避免张扬，并在律师的帮助下，骗子和匪徒达成了妥协。后来，要不是维泰洛拒绝给律师报酬，这件事本来也就隐秘了结了。结果律师把这个黑手党分子告到了法院。这一来美国社会公众就知道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情：“我们的事业”把自己的数百万钱财都藏在了瑞士的银行里。而且又是那么巧地发现，费城的一个“我们的事业”的头头安杰洛·布鲁诺，同时也是一家电子乐器进出口公司的老板，也把5000万美元存进了瑞士银行以备不时之需！

不过，除此之外就再也未能了解到更多的东西。因为，银行为户主保密是资本主义最神圣的东西！

美国黑手党之所以能捞取这样巨额收入，完全是因为它在国家的经济领域内扎下了又深又牢的根。1964年《合众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对此评论说：

“过去的几个月发现，一些有多次前科的匪徒钻进了有数百万交易额的企业，其中有银行、沃尔大街的经纪商行、房地产办事处以及其他一些为社会谋福利的、令人敬仰的实业等。犯罪分子已大规模地渗进了现有工业的各个部门这一明显事实是确定无疑的。”

接下去该杂志列举了黑手党所打入的各个部门，但远非

全部的名称。不过，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没有提任何一个企业的名字：

“地产业。区检察官罗伯特·摩根泰认为，仅在纽约城区内，犯罪界对经营房地产的投资‘就达数亿美元’。黑手党成员是一家康采恩的主要股东。有两幢里面设立着各类机构的著名的摩天大厦，就属于这家康采恩。摩根泰先生说：‘这是一家交易额为三亿多美元的实业……’此外，匪徒们还控制着曼哈顿一幢人人皆知的摩天大厦的大部分股票。再者，纽约一家很有名气的旅馆也主要归犯罪分子所有。根据政府官员声称，在迈阿密、迈阿密滩、拉斯韦加斯、底特律、芝加哥以及其他许多城市，黑手党都拥有旅馆和汽车旅游旅舍。

“银行业。侦查部门的人士认为，敲诈分子和诈骗犯往往通过买下大银行的股票，把这些大银行控制在自己手里。作为股东，他们力求运用自己的地位获取特殊优惠，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如愿以偿。据华盛顿的一位官员说，在底特律，所有中等规模的银行都转到了这些恶棍手里。该人士声称：这种银行以‘黑行’著称。我们有充分根据认为，这些银行向黑手党头目提出贷款，而且无需取保。他们用伪造的名字或冒名顶替的办法，给黑手党头目们开了大量户头，而且任何疑问都不提。在迈阿密的一家银行里，情况似乎毫无二致；在纽约，一些赫赫有名的匪徒就在争夺两家银行……芝加哥警方人士说，‘过去两年内，匪徒对金融业而且主要是小型信贷公司和银行，显示出特别高的积极性。’

“缝纫工业。人们早就知道，集中在纽约的服装加工工业全被敲诈分子所控制，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成了百万富翁。专家们对此的解释是，大多数讹诈分子都不容许在自己企业里

有任何工会组织。这就使他们减少了生产开支。按照专家的话说，讹诈分子雇用黑手党的刑事犯和昔日的杀人犯作为‘工人问题顾问’。

“其他工业部门。底特律黑手党的一个著名头目就同该市的一家锅炉制造厂联系紧密，如今他又在向汽车加油站和汽车服务业投资。警方首脑乔治·爱德华说：‘仅在底特律一个地方，黑手党成员就向工业投资达5000万美元之多’。他还列举了黑手党控制的98个企业的名字。”

《合众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的文章最后结尾，是一份黑手党分子牢牢控制的一些工业部门长长的清单(有好几页之多)。黑手党已渗透到各个角落：从银行、旅馆到建筑业，从纺织工业到汽车制造业，从买卖古董到经营食品。“我们的事业”的全部周转资金(请注意，仅指合法买卖)，据专家的谨慎估计，每年就有220亿美元。根据这个数字判断，“我们的事业”可以被视为是一家“美国最大的康采恩”，比“电力大王”、“汽车大王”或这类巨人的实力还要雄厚的多！

这篇文章发表至今已过去了好多年。尽管此文在一定程度上不大全面，但它却可以使人们对“我们的事业”的经济活动的广度和规模有一定的估计。有组织犯罪已经成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只有在这个制度崩溃的情况下，有组织犯罪才会消失。

“借贷鲨鱼”在活动

黑手党认为，被人恰当地称之为“借贷鲨鱼”的这个方法，是打入工商界最有效的手段。这一通过借贷攫取重利的

手段，其实并不是什么新招，在一定程度上早在纽约的行家中被认可。如今，黑手党则大力推广了这一行当。通过这一手段，黑手党分子千方百计地煽起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有一些公司感到手头拮据，加之由于激烈竞争，通往一般借贷成规的路子已被堵死，导致其处境更加恶化。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公司就经常把同黑手党的“借贷鲨鱼”达成协议视为唯一出路。毋庸置疑，“鲨鱼”对自己给予的帮忙，则要求惊人的高利率。

比如，纽约一家运输公司的老板曾说，有一次他被迫去求助于黑手党的“鲨鱼”借款一万美元。后来当他未能如期支付利息时，匪徒们在电话上就威胁说：“您如果不马上付钱，您将会遭到和您的卡车同样的下场。”当天夜里，他的一辆卡车就被黑手党分子炸了。

“我们的事业”并非总是使用一定要把某公司攫为己有的这一策略。有时则搞假破产以消除某个合法企业的竞争力。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1961年的“姆莱派克公司”事件。

这家公司在纽约从事肉类批发，其主要客户之一是“普莱·豪斯肉类和家禽贸易公司”。“姆莱派克公司”的三个老板约瑟夫·万伯格，他的儿子斯坦利以及戴维·休曼都没料到“普莱贸易公司”的董事长比特·卡斯泰兰纳是个黑手党分子，而且是权力无限的加洛·冈比诺先生的表弟及其黑手党“家族”成员。卡斯泰兰纳拥有好几家超级市场，还和一位黑手党的先生隆包尔多茨共同开办了“乔——莱恩贸易公司”。

1960年12月“姆莱派克公司”经济上遇到困难，这时“借贷鲨鱼”便立即出场。有个人来找万伯格父子和休曼，自称可以保证可以搞到所需款项，这家公司的三个老板都不认识此人，

不过，他们在他们的一个客户公司工作，名叫约瑟夫·帕加诺。但是这三个商人却不知道帕加诺是黑手党，而且是维托·杰诺维塞家族的人。

在约定时间，帕加诺给万伯格送来了钱，这是一张“乔兰贸易公司”开出的，由卡尔米内·隆巴尔多茨签发的8500美元的支票。这笔贷款的利率很高，周息百分之一，即每周85美元。在此后数周内，“莱姆派克公司”按规定准时缴纳了利息，可是8500美元的这笔债并未因此而减少，于是这家公司继续感到手头拮据。

1961年元月，黑手党分子迫使万伯格把三分之一的股票卖给了帕加诺的公司，当然也就是卖给了“我们的事业”。为了保住黑手党这笔资金，“我们的事业”最后终于达到了任命帕加诺为“莱姆派克公司”董事长的目的。这一来，该公司的支票，从此只要帕加诺签发才能有效。

公司领导的更迭，起初似乎对公司大有好处：营业额急剧增长。如果说以前属于黑手党的“普莱贸易公司”，每周大约买1000美元的货，那么1961年元月便一下子上升到24.1万美元，二月份竟达29.8万美元，而三月份就已经是92.2万美元了。但这是达耐人的礼物^①。卡斯泰兰纳的“普莱贸易公司”是用低价买走了货物。黑手党已经把“莱姆派克公司”牢牢控制在手中，其原来的三个老板都无力阻止他们的货物以比自身价值低得多的价钱被很快卖净。

这一切作法的目的何在？毫无疑问，这是黑手党力图把

^① 达耐人系古希腊的一个部族，据传他们围攻特洛伊城时把兵士藏于木马之中。特洛伊不知是计，把马拉进城，从而中计陷城。后人即以此比喻心怀叵测的馈赠。

“姆莱派克公司”搞破产，从而挤掉竞争对手，并进而夺走无力还钱的借债者的财产。

在三月份的最后一周，“普莱贸易公司”应当付给“姆莱派克公司”75万美元买货钱，为此比特·卡斯泰兰纳向“美国卡麦什银行”借贷15万美元。与此同时，“姆莱派克公司”也就把自己的分户账转到了这家银行。

整个行动的最后一步是卡斯泰兰纳把黑手党分子甘多弗·普德拉拉了进来。此人也从事肉类经营。他从卡斯泰兰纳手里得到一张“普莱贸易公司”的支票，然后派人把这张凭票即付来人的支票交给“姆莱派克公司”新的领导人帕加诺。后者通过银行支付了这笔钱，同时则又向“姆莱派克公司”开出同样的支票，数目同上面完全相等，并要求立即支付，于是钱又回到黑手党分子手中。这一来，从账面上看，“普莱贸易公司”的帐都已支付给清，而实际上，“姆莱派克公司”提供了货物却没收到分文。就这样在一天之内，帕加诺就从他所领导的这家公司偷走一大笔钱。

几周之后，“姆莱派克公司”宣告破产，万伯格父子、休曼和帕加诺被提交给了法庭。万伯格父子和休曼因恶意破产罪被判处长期徒刑并罚一大笔钱。帕加诺没有破坏噤口律条，在法庭上对自己的同谋只字未提。所以法庭不能证明他有罪。其罪名还是对黑手党分子的那老一套格式：“藐视法庭”。最后帕加诺被判处监禁十九个月。

“白领阶层”的犯罪分子

搞垮“姆莱派克公司”的欺诈行为介于一般匪徒活动和所

谓的“白领阶层”犯罪二者之间。白领阶层犯罪这一提法，暗喻着属于上层社会的犯罪分子的社会地位。数年前，一个西德的社会学家对这一犯罪形式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白领阶层犯罪分子是现代资产社会的，享有普遍承认的成员。这种人在经历某种‘弯路’之后，重新被社会张开双臂所接受。”社会公众知道的只是其形形色色犯罪活动的某几点，至于这种丑事来龙去脉尚未露端倪。主要犯罪分子仅偶尔被追究责任。只有“小小的枪架子”才被送交法庭：如那些想通过这条路发财致富的，被有关公司收买的职员、议员和军人等。而那些大垄断集团则利用其强大的权力杠杆，总是在法律里找到足以脱逃制裁的空子。所以，同涉及提供武器，金钱或者说数以亿计的国家拨款一类的投机活动相比，“我们的事业”的黑勾当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信用卡付诸实施，又在有组织犯罪分子的强大辛迪加面前展现出个聚敛钱财的新路子。

由于几乎每天美国报刊都报道经常出现支票舞弊的消息，致使任何一个商人都不敢让用支票买自己的货。最早尝到这一状况的苦头的是那些小银行和钱庄，因为往他们那里存钱的数目大大减少，而有声望的资金雄厚的大银行则用下述办法保护自己的利益：要在他们那里开户头，必需第一次就存入相当大一笔钱，其数目小骗子根本无力存入。这类银行的支票使用起来有极大信誉。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银行为为了不损害自己的威望，甚至连未清偿的支票也照样支付。

这一来，一些钱庄和小银行便打算建立信贷俱乐部。该俱乐部成员在所有同其有关的公司、饭店、旅馆里，凭信用卡购买商品或享受服务，而不必缴纳现金，到一定时候信贷

机构便抵偿了他的开支。

尽管信贷机构建立了一整套防止欺骗的办法，然而犯罪分子仍然有机可乘。实施信用卡体系的信贷机构，由于受种种花招的欺骗，其损失估计有一亿美元。虽然那些单个的骗子相当经常地被当场抓获，但这对犯罪分子辛迪加毫无威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活动要比监察系统干练精明得多。

卡洛先生心满意足了

把靠有组织犯罪搞来的巨额收入投资于美国各经济部门和建立黑手党康采恩，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事业”的“工作条件”。而且这一点也不能不在“领导方式”上有所反映。于是作为“我们的事业”的一名“先生”应具备什么样的品质，这一问题便又重新提了出来。黑手党不承认任何根据其而进行权力移交的“继承顺序”。也正是因此，才反复出现长达30—40年的血腥夺权斗争。

如今，老一辈的先生中只剩下一个人了。这就是1921年从巴勒莫移居美国的卡洛·冈比诺。此人腰缠万贯，在布鲁克林亚的海洋公园大街拥有一所豪华的宅第，在科尼岛的贵族区还有一座价值连城的别墅。

冈比诺一直耐心坚毅地不介入心血来潮的勾当和要统治别的家族的斗争。在警方就阿巴拉琴会议一事，对“我们的事业”的活动进行调查时，他始终安然无恙。他的家族一向是从别的家族的互斗中坐收渔人之利。所以完全有可能是冈比诺在幕后挑起了科隆博和加洛之间的明争暗斗，借以巩固

自己的实力。1972年7月31日，英国《时代》杂志载文说：对托马斯·埃包利的谋杀，为最老的黑手党先生卡洛·冈比诺扫清了道路，使其有效地控制了杰诺维塞的“家族”，因为杰拉尔多·卡杰纳此时还在服刑，而该家族的另一个头头，78岁的迈克·米兰达由于年迈已经无力发挥领导作用。

而卡洛·冈比诺先生本人其实也早就不是风华正茂了。这一点使他本人也无法保护阿尼耶洛·杰拉克洛切这个58岁，富有经验的黑手党人的利益。这个杰拉克洛切是参与杀害“暗杀团”首领阿尔伯特·阿纳斯塔吉亚枪手之一。

“我们的事业”的日子莫非已经屈指可数了吗？

1973年4月，也就是在纽约警方对在布鲁克林区汽车货场上那个大篷车的来访者，进行大逮捕之后半年，从纽约发出了下述报道：“电影《教父》上映后，卡洛·冈比诺开始享有巨大的声望。不久前在长岛举行的一次婚礼上，新婚夫妇跪在冈比诺面前并吻他手。当主人举杯祝贺冈比诺身体康泰时，全场合唱《教父》的主题歌。当在场的记者问这位‘王中王’，是否喜欢《教父》这部电影时，这个衰老的匪徒微微一笑，喃喃地说‘好，非常好。’”

在科莱奥内发生的凶杀案

除了城外或郊区大群的绵羊外，大部分家禽家畜都养在人们的住房里，就栖息在人们的身旁。据官方统计，这里共有：骡、马、驴 2600 头；绵羊 3193 头；母牛 163 头；山羊和猪 1020 头；还不算不可胜数的鸡、猫、狗。

摘自罗马大学教授西尔维奥·潘比里奥内
《关于西西里西部，拥有两万居民的帕尔马迪·
蒙代克雅洛市的社会调查报告》

被尊称为卡洛先生的卡洛杰罗·维茨尼胸部闷得喘不过气来。他命令司机停车。这位肥胖的黑手党头子气喘嘘嘘地从汽车里爬出来，瘫软在路边。他的额上冒出豆大的汗粒。这不仅是因为六月的骄阳肆虐，主要是这位 77 岁高龄的黑手党先生的心脏病开始发作了。而且近来发作多次。所有黑手党的大头子都有贪吃贪喝的嗜好。过度的暴食暴饮使他的疾病急剧恶化。他的汽车司机对中途被迫停车早已习以为常。可是这次当他看到卡洛先生象个麻袋似地摔倒在地时，便大吃一惊。紧急请到的大夫只能诊断卡洛先生的死亡原因是心肌梗塞。这位黑手党大王于 1954 年 7 月 15 日告别了人世，不过和他的大量受害者不同的是，他是自然死亡，而且十分偶

然，恰巧死在本世纪初他当小强盗时开始发迹的地方。

他的故乡维拉尔巴，这个西西里黑手党的堡垒，沉浸在深切的哀悼之中，天主教民主党当地组织的机关都关门八天以示哀悼。城内行政机关高大的建筑物上悬挂的国旗都下半旗致哀；在为最尊敬的卡洛先生举行安魂仪式的教堂前面，悬挂着巨幅透明标语：“他是一个高尚的人。”

这个彻头彻尾的坏蛋，老奸巨滑的罪犯身后留下了价值几十亿里拉的财产。他的至亲继承了他的财产。但除此之外，这位“荣誉社”的头子还留下一个有很多发财之地的帝国。为了避免竞争，这个帝国必须有一个铁腕人物。

了解内幕的人都知道，这副重担将要落在继承人的肩上。“荣誉社”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的危机时期。黑手党空前孤立。互相倾轧加剧了黑手党内部的矛盾。在50年代，即在意大利的工业高涨年代，当权的垄断集团知道，西西里将为他们的投资提供美好的良机。这个似乎比欧洲任何地区都要停滞不前的落后地区还保留着封建秩序，它之所以对他们具有吸引力，不仅是因为这里有廉价的劳动力，而且还有很高的政府津贴。现代工业步入西西里的城市，但是这并没有解决大量失业这个老问题。因为高度自动化企业只需要少量的工人。工业化并没有解决西西里岛的社会问题，而且与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的预言相反，也没有把黑手党消灭掉。

西西里黑手党的美国分支“我们的事业”的历史表明：在封建土壤上生长出来的犯罪集团能够迅速适应新的资本主义制度。西西里岛上城市工业化和工业的虚假繁荣不仅没有消除黑手党生存的土壤，反而使黑手党变得更加强大，更加豪富。最早在这个封建地区的首府巴勒莫生长起来的“新”黑手

党，不仅很快攫取了权力和财富，而且开始向老黑手党和它的头子们争夺领导权。

甚至在殡葬卡洛先生的问题上也无法掩盖黑手党日益迫近的危机。凡是有眼睛的人当时都看到：在发出信号，送殡行列出发之前，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来自四面八方的“荣誉社”的先生们和族长们集合在一起。

葬礼是按照“荣誉社”的传统礼仪进行的。按照黑手党的惯例，谁手执棺材左侧那个叫灵柩带的绳子，谁就被认为是死者“事业”的继承者，而在卡洛先生的送殡行列里。朱塞佩（真科）·鲁索先生手里握着这个表明权力过渡到继承人手里的象征。

真科·鲁索于1989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黑手党的羽翼下，他很快变成了一个大地主。在进行土地改革期间国家实际上没收了旧的封建主的大量的土地，而且还付给这些土地的前所有者非常高的报酬，然后再把这些土地转交新的地主，但是国家本身并不在农民中间进行土地分配，而是把这个任务委托给象真科·鲁索这样一些人去办。这位黑手党头子的所作所为活象中世纪的男爵。他把这些土地随心所欲地赏给自己的忠实的附庸和宠爱之人。这就使他对这些人在经济上具有影响，并对他们进行控制。有一次鲁索公开说：“我从14岁就和父亲一起从早到晚在田里干活，而今天我却成了富裕的地主。”他曾经多次被控告犯有杀人、抢劫、偷盗牲畜、讹诈和其它刑事犯罪而出庭受审，可是他对他的这段历史却从来只字不提。

而眼下，这位“佩佩大叔”（人们开始这样称呼他，并以此表示对他的极大的尊重。）正在为已故的黑手党首领送葬。他

知道，在1954年7月里的这一天，他们不仅仅是为“荣誉社”头子的遗体送葬，而是在埋葬“旧”的，封建的黑手党。它的影响范围正日益缩小。挑选鲁索当继承候选人是一种妥协。因为已出现在西西里岛各城市的“新”黑手党头子们都不允许他们中间的任何人登上“荣誉社”空缺着的首领宝座。在西西里的各城市里，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刚刚开始。暂时还看不出来，在新一代的黑手党党徒中，谁的威信将高于这位宗法制农村黑手党的代表人物。

在送葬的行列里，来自巴勒莫市的黑手党头子保罗·邦塔和真科·鲁索并排而行这件事决非偶然。邦塔是黑手党新兴力量的代表。他们的方针就是往岛上的经济界渗透。然而“传统”的黑手党的代表却千方百计阻止自己城市里的兄弟们的经济利益的增加，这就经常引起武装冲突，导致了“新”黑手党和“老”黑手党之间，更确切地说，封建的黑手党和资本主义黑手党之间的血战。这种情况大致可以和30年代初在美国黑手党中消灭“长胡子”的情况大致相同。

在这场斗争中，有将近400个意大利裔美国匪徒在舆论上和行动上帮助了新黑手党徒。这些意大利裔美国匪徒在1945年后被美国驱逐出境，来到西西里岛。那些年代在科莱奥内所发生的种种事件，乃是战后年代西西里黑手党内所发生的各种变化的典型表现。

荒废矿坑里的骷髅

事件发生的地点是科莱奥内。这是一座1.5万人的小城镇，距巴勒莫约60公里。这个小城镇的黑手党头子是密切

里·纳瓦拉大夫。他是科莱奥内医院的一位主治大夫。这个人象他的前任一样，在这里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他把权力和职务都集于一身：他既是教权主义党分部的代表，也是农业联合会的代表，又是贷款处的视察员和天主教民主党的工作人员。在科莱奥内，歪歪斜斜、依山而建的简陋小屋举目皆是。而在这个凄凉的小镇里，没有这位犯罪元凶的参与，任何事情也办不成。他敲诈勒索，横征暴敛。

战后，当国家拨出巨款进行土地改革时，纳瓦拉立即成了这笔基金的管理人。他有权决定给谁贷款和不给谁贷款。这位黑手党医生很快成为拥有数千公顷可耕地的地主，并在科莱奥内郊区控制着3.5万个小经租人和农民。

在1954年至1958年间，西西里土地管理局的14名高薪职员在科莱奥内郊区进行了土地改革，他们没收和分配了从前地主的921公顷的土地，而在科莱奥内可耕地的总面积却是1.7485万公顷。

意大利的土地问题专家安东尼奥·洛斯基雅沃博士在科莱奥内调查了土地改革的结果。他在自己的报告中指出：“在2661个要求得到土地的人当中，只有152人得到了所希望的土地。”而且他严厉地断定说：“分给农民的大部分土地(约623公顷)都在科莱奥内的贫瘠地区。”在报告的结束语里，洛斯基雅沃博士指出：“也许土地改革减少了大量拥有土地这一现象本身，但是大量拥有土地所特有的谷类和畜牧业的基本结构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西西里总共有6570名土改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但是，同在西西里的其它许多地方一样，在科莱奥内，土地改革遭到暗中破坏。那些要分配给农民的土地都是乱石荒滩。用管理局的贷款建起来的新的村镇

一直没有住上人，因为忘记‘解决’供水问题。”

但是科莱奥内的居民不愿忍受黑手党和地主的压迫。小城墓场上的墓碑无声地诉说了流血的殊死的斗争。仅仅在战后5年内在科莱奥内黑手党的“杀手”就残酷地杀害了153人。这些罪行给靠近巴勒莫的这个小镇带来了坏名声：科莱奥内是世界上凶杀案百分比最高的地方。

但是又有一些新人在那些勇士们被屠杀的地方站了起来，继续进行倒下的同志们的事业，给予有权势的黑手党以顽强的抵抗。当地劳动组合的书记、社会党人普拉奇多·里佐多首先就是这样的人。他建立一个用贝尔纳吉诺·韦罗萨的名字命名的合作社。贝尔纳吉诺·韦罗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科莱奥内出现的很多农业合作社中的一个合作社的领袖。他也被黑手党杀害。普拉奇多·里佐多想继续韦罗萨的事业。里佐多对无地的农民说：“我不相信，我们将永远象牲畜一样生活。人民觉醒的时刻就要到了。”他争取要把那些由黑手党控制的荒芜的土地转交给无地的农民。里佐多对于朋友们的忠告，当然还有“荣誉社”的威胁都不予重视。因此纳瓦拉大夫和他的同伙就判了里佐多死刑。

1948年5月10日晚上，32岁的普拉奇多·里佐多出去办自己的事情。在马尔卡拉大街有两个年轻人向他走来。一个年轻人抓住了他的一只手，另一个年轻人用手枪顶住了他的头，命令说：“走，不要怕，我不杀你，我只给你说两句话，你就自由了。”

一个名叫朱塞佩·莱蒂齐亚的12岁的小牧童碰巧是这次凶杀案的目击者。当时他正在放羊。人们把吓得神经非常紧张的小牧童送到了科莱奥内的当地医院。在那里他说出了杀

人犯的名字：卢卡诺·利乔。

在医院主治大夫纳瓦拉让人给这个年幼的病人注射了一针。这一针打下去之后，这次犯罪的唯一的证人就死了。纳瓦拉给这个小孩写的医疗结论是：“震颤性谵妄引起的心脏麻痹导致死亡。”这并不是这位黑手党大夫第一次开出的类似结论的死亡证明书。关于这位大夫参与上述两起杀人案的传闻越来越多。后来终于以涉嫌杀人罪对纳瓦拉提出了指控。

但警察局很久没有找到普拉奇多·里佐多的下落。既然没有犯罪的证人，又没有找到尸体就无法以杀人罪对他起诉。大约过了两年后，一个名叫克里梭内的人，也就是杀害普拉奇多·里佐多的两个黑手党徒之一，承认了所犯罪行，供出了被他们杀害的人在什么地方。只是在这以后，消防队员才在罗卡布桑布拉山（这个山在科莱奥内东北20公里）的矿坑里，在60公尺的深处，找到了一副骷髅和一些破烂衣片。除掉自己的对手后，把尸体藏在矿坑里，这是黑手党常用的方法。

1949年12月21日意大利议会共产党议员金卡洛·贝耶塔要求调查这起政治谋杀案件，但是内务部长马里奥·谢尔巴用下面的话停止了对这个案件的一切辩论。他说：“里佐多被杀害是由于争吵引起的，而争吵的原因应当在合作社土地分配问题上去找。所以可以认为，杀人凶手就在里佐多的同志中间。”

最后，杀害里佐多的真正凶手卢卡诺·利乔总算被逮捕了，但是出庭的却是一个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其有罪的罪犯。同黑手党关系密切的迪诺·甘采洛尼律师发表了为利乔辩护的热情洋溢的演说。他声称，他的被辩护人连一个苍蝇也不会得罪。

就这样，这位杀害农民领袖的凶手又一次未受到惩处。

无 面 人

可是在科莱奥内和郊区却继续进行着凶杀。以自己的领袖米切里·纳瓦拉为首的“荣誉社”仍然象以前一样横行无忌。谁妨碍了他们的利益，谁就会被惨遭杀害。杀人的任务常常交给卢卡诺·利乔执行，因为相比之下，他既是一个射击能手，又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杀人犯。黑手党徒都尊称他为“无畏的人”。

在宪兵队呈送给审理利乔一案的法庭的秘密报告中，用下面的话描述了这个匪徒的特征：“卢卡诺·利乔出生于1925年2月3日……他是科莱奥内的弗兰切斯科·保罗的儿子。卢卡诺·利乔是一个天生善于干任何坏事的人。他不知道什么叫良心责备，也没有任何道德原则，违抗他的意志是危险的。近来在科莱奥内发生了很多起凶杀案。所以根据官方材料，人们认为利乔是大多数凶杀案的元凶。这种看法并非毫无根据。”

在这份报告中有一个情节没有谈到，而这件事情对于查清案情至关重要：利乔早在20年代末跟随其父母移居美国。他在美国的“我们的事业”的队伍里接受过杀人训练。温桑特·卡鲁拉是他的帮凶。此人也曾向美国的著名匪徒“求过教”，他曾在乔·普洛法齐和弗兰克·科斯泰洛两个匪帮里呆过。在美国第7集团军在西西里岛登陆后，很多黑手党分子组成的近卫军也跟在第7集团军的后面登陆，卡鲁拉也返回了故乡。

利乔的匪帮是按照美国的敲诈集团的模式组建的。他们

主要是把牲畜运输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谁要是不想向这个匪帮提供的“服务”出钱，他们的牲畜就要被盗。匪帮们的另一些成员就用低价收购这些牲畜，然后就把这些牲畜赶到巴勒莫黑手党的秘密屠宰场去。

这位年轻“狮子”的首领利乔（他的信徒们都称呼他们自己是年轻的狮子），代表了黑手党的年轻的一代。他们与按照先辈们的陈规旧俗办事的、象密切里·纳瓦拉这样的“老头子”们，分庭抗礼。

“年轻的一代”开始嘲笑传统的黑手党的党徒们的陈腐老朽。这些“年轻人”使过时的交际形式现代化，增加和更新了一些行话。他们不再用“比乔多”称呼杀手，而代之以“吉列尔”，并把家族的首领叫“老板”。他们用自动武器换下了鲁巴拉猎枪，并用现代化的讹诈方式代替了旧式的敲诈勒索。黑手党分子摘下了传统的鸭舌帽，穿上了色彩鲜艳的衬衫，打着光彩夺目的领带。他们都喜欢坐阿尔法—罗密欧公司出产的朱利叶达牌小汽车，并喜欢驾驶外形优雅的高速赛车。

纳瓦拉怀着不悦和饮恨注视着黑手党的神圣基础的倒塌。不过在每一个人都还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活动时，他和利乔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一致的东西。

这时，警方根据1945年照的一张相片认出了卢卡诺·利乔。警方怎么会知道这个强盗借助于整容手术改变了自己的面貌呢？因为在“荣誉社”里，在这次尽人皆知的整容手术之后，他获得了一个诨名——无面人。

对于迪诺·甘采洛尼律师在法庭上的帮助，利乔很快就找到了报答的机会。因为甘采洛尼提他自己为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的1958年大选的候选人。

当然，在科莱奥内，人们可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投这个黑手党律师的票。利乔理所当然应当安排处理这件事情。于是他的手下人都闯进了纳瓦拉大夫的医院里，用强制手段索取证明，上面写着：证明的持有者有的是近视眼，有的全然是瞎子，这样一来，选民们在进入投票室时，就应当有个什么人陪同，而这些陪同的人不言而喻都是利乔的手下人。他们密切注视着，在选票上把需要勾掉的名字勾掉。就这样迪诺·甘采洛尼当上了西西里岛地方议会的议员。

报 复

1958年纳瓦拉和利乔之间早已逐渐成熟的冲突变成了公开的斗争。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在科莱奥内市中心，利乔的朋友温桑特·卡鲁拉被鲁巴拉猎枪射出的子弹击中了背部死亡。不需要多费脑汁就可以猜出来，这次凶杀的鼓励者和策划者是纳瓦拉医生。

意大利裔美国匪徒卡鲁拉一命归阴，完全不是因为那位传统的“老”黑手党先生不喜欢利乔的作风。这次行凶犯罪的真实原因是两个家族在经济利益上发生了冲突。密切里·纳瓦拉控制着科莱奥内郊区的所有水源。这给黑手党带来巨大收入。因为在西西里水很缺，自然水也就很珍贵。当为了在科莱奥内地区建立水坝而成立“水利建设银行团”时，纳瓦拉就把他的人派了进去。这些人想方设法暗中破坏这项水利建设。这项估计要耗资450亿里拉的工程将灌溉贝利切河中上游的大片土地。

但是卢卡诺·利乔和他的对手的想法不同。水坝的建设

可以使他靠运输业和供应建筑材料而大发横财。此外建好的水坝必然“需要”保护，以免水坝遭到破坏。当然这不是没有报酬的！在遥远的美国黑手党分子就是用这种方法给自己弄到巨额财富，而战后，巴勒莫“荣誉社”的年轻一代便效法他们的榜样。

只要某一个固执的业主的某一项计划遭到破坏，黑手党就面带真诚的建议为他们效劳并提供“保护”。西西里的年轻的黑手党分子很快就想象到，西西里岛，这个欧洲的后院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会给他们带来巨额利润。因此他们全力支持建立工厂、住宅、堤坝和旅馆。而传统的黑手党人则与新黑手党不同。他们在农业方面仍然按老规矩办事，主要靠封建关系，相当缓慢的聚集财富。

1958年夏天纳瓦拉医生请他的对手到科莱奥内郊区的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去谈判。利乔带了自己匪帮的几个成员到了约会地点，但是当他们在刚刚在这个半倒塌的库房旁边停下来时，子弹象冰雹似地向他们打来。根据“老”黑手党的计划，卢卡诺·利乔也应该象他的朋友卡鲁拉一样一命归阴。但是这次对卢卡诺·利乔的谋杀却没有得手。这位无面人只受了点轻伤，于是他发誓狠狠地报复。而且没有等多久，一个天赐的报复良机到了。

1958年8月12日纳瓦拉大夫和他的同行乔瓦尼·鲁索一起旅行归来。这位科莱奥内的黑手党先生驾驶着他的菲亚特—1100汽车，在离科莱奥内15公里的拐弯处，几乎和停在路上的载重汽车相撞。纳瓦拉急忙紧急刹车。就在他刹车成功松了一口气的刹那间，突然从载重汽车里响起了密集的枪声。这位科莱奥内的黑手党先生和他的同路人当场被打死。在现场

调查时，警方的专家们计算出：从五枝冲锋枪里向汽车和汽车上坐的人共射出171颗子弹。从这次杀人组织情况来看，可以看出美国匪徒的风格。这些匪徒不愧为阿尔伯特·阿纳斯塔吉亚的继承者。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在科莱奥内“老”黑手党的头子死后，卢卡诺·利乔并没有安静下来。他对“荣誉社”的历史太熟悉了。他知道密切里·纳瓦拉的匪帮会象九头蛇一样立即长出一个新头来。

1958年9月6日纳瓦拉匪帮的5个成员被打死。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两个人失踪。他们是尼诺·卡维尔纳特和瓦尼·西诺鲁祖。这两个人是利乔最凶狠的对手。无面人有步骤地一个一个地消灭自己的敌人。有一个叫安杰洛·文塔洛罗的人对利乔匪帮的恐怖活动怕得要死，几年来他都不敢出门，甚至在自己的圣保护人的节日也是足不出户。

有一个著名的意大利记者名叫乔尔乔·博克。意大利的一家杂志《欧洲快报》每年照例派他去一次西西里岛采访。根据黑手党的情况，这位记者当时是这样评论那个时期的血腥事件：“现在科莱奥内知道自己新老爷的名字。”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一血亲复仇的无情规律导致了一系列延续多年的凶杀。1962年天主教民主党党员，科莱奥内市议员温琴佐·利斯蒂失踪。此人是纳瓦拉大夫的朋友。警方搜查了所有的废井和废矿坑，寻遍了所有的高山和狭谷，但是都没有找到踪迹。科莱奥内的居民们首先为自己担心，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尽管警方已经通缉了利乔十多

年，但人们仍不敢提他的名字。

1963年8月23日，天主教民主党的议员，甘采洛尼律师引起了一场轰动。在西西里地方议会进行的关于黑手党问题的热烈辩论时，这位从前并不显眼的议员请求发言。在他发言之后，他的名字立即出现在西西里和意大利报纸的头一版上。这位在1958年得到纳瓦拉医生和利乔帮助下当上了议员的人，很明显做得太过分了。他竟然说：“纳瓦拉不是强盗，而是共产党不幸的牺牲品。”

几个星期之后，在九月初，警方在布查姆卜拉山的山缝里又找到了三具尸体。没有花多大功夫就辨认出这三具被子弹打了很多孔的尸体，他们是：50岁的保罗·弗兰切斯科·斯特雷武，36岁的安东尼奥·莫代利和35岁的布雅戈·波米卢。斯特雷武一向被认为是纳瓦拉的家族的一个首领，而另外两个人是利乔匪帮的人。

只是到了1964年5月15日警方才在科莱奥内的一所房子里逮捕了卢卡诺·利乔。尽管利乔和他的辩护律师千方百计想推迟对这个案子的审理，1969年6月他和其他63个黑手党分子还是被一起递交意大利南部的港口城市巴里的法庭受审。

在审理期间，利乔显得极其自信，而且他的镇静自若不是装出来的。当陪审员们退庭到合议庭时，主席宣读了来自西西里的威胁信。大概这封信对法庭起了作用。于是1969年7月10日利乔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检察官立即提出了上诉。不久又发出了对这位黑手党头子的拘票。限令利乔在6月19日到科莱奥内警察局归案。可是利乔却根本没有想去归案。直到10月份，利乔的律师才最后

通知当局说：他的委托人正在罗马的一家名叫圣·玛格丽特别墅，一家很豪华的疗养院里疗养。警察每天都到医院去，看看他们的监护人是否逃跑了。利乔原定于11月21日出院，但是就在11月19日，这个匪徒在付了约300万里拉的治疗费后，就无影无踪了。别的一些国家也参加了对利乔的缉捕工作。1971年春天甚至也向他在美国的一些亲戚家寻找过他。

与此同时，科莱奥内的检察官又收集到一些使利乔的名声大受影响的新材料。在巴里法院的审理过程中，曾听取了那个强盗杀死3个人的案情。实际上完全有根据怀疑有30起谋杀案是利乔亲自干的，有50起案子是他命令别人干的。

仅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科莱奥内，由于新老黑手党的夺权斗争，将近有200人死于非命。

修道院里的鲁巴拉

是的，在卫生方面，我们有点落后了。但是在我们这里犯罪和贫穷却和国内其它地区一样。至于世风日下，道德败坏在北方就严重得多了。

巴勒莫主教卡尔基纳尔·埃尔纳斯托·卢菲尼

人们常说，在西西里贫穷是客人，但是贫穷的永久之地是马扎里诺。在这个不景气的、拥有1.9万人的小城市的边沿，有一座古老的修道院。这是托钵僧侣的栖身之地。它的半坍塌的建筑物与城里的其它建筑物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大部分居民没有文化，也没有工作。在这个小镇里，每天只能卖80份报纸。

不管人们觉得多么奇怪，尽管修道院在西西里岛上非常普遍，但正是这个修道院使这个没有什么特色的小城镇出了名。象所有别的地方一样，这个修士会的成员也是穿着褐色的粗丝长袍，戴着尖顶风帽，光脚穿着凉鞋。罗马天主教会总共有1.5万个兄弟履行了行乞宣誓，放弃不用自己的世俗名字，使自己注定过严格的禁欲生活。但是马扎里诺行乞的兄弟会干的却完全是世俗的事情，而且还把由此而赚得的大批钱财都用自己的世俗名字存在了银行里。

1956年4个“天主的士兵”卡尔梅洛、维托里奥、阿格里皮诺和韦南齐奥希望发一笔横财。修士会的一个成员也参加了他们这一伙。此人实际上并不是神职人员，而是修道院里的养花工，他的名字叫卡尔梅洛·洛·巴尔托洛。他和黑手党的一个团伙保持着联系。

对他们的修道院院长康斯坦丁诺神父敲诈勒索一事就是“试试力量”。阿格里皮诺神父装出一副真诚的样子来找修道院院长。他说，两个匪徒在街上把他拦住了，并威胁说，如果康斯坦丁诺不从修道院的钱库里拿出20万里拉，他们就要炸毁修道院并杀死这位修道院长。康斯坦丁诺根本没有考虑向警方求助，也不求助于上帝。他付了钱并表示缄默。作为一个真正的西西里人，他了解黑手党并尊重《噤口律条》。

卡尔梅洛神父主持安魂祈祷

这件事情发生后，教堂的神父们没有足够时间从事虔诚的圣事。他们都成了“荣誉社”的信使和会计。1957年11月72岁的大地主安杰洛·卡纳达收到一封信。信中说：“如果你不给我们1000万里拉，我们就不能担保你妻子和你孩子的安全。我们奉劝你不要向警察局告状，否则我们将用一梭子冲锋枪子弹回敬。”

卡纳达没有付钱，也没有作任何反应。人们的看法是：他这个人一向特别吝啬。一星期后卡纳达又收到一封信：“如果在三天内你不给我们1000万里拉，我们就惩罚你。要把钱如数交给卡尔梅洛神父。”

安杰洛·卡纳达对这位受人尊敬的80岁的托钵修士非常

熟悉。卡尔梅洛在他的教区的教堂里布道已经几十年了，他是卡纳达全家人的教父。

在最近的一次在教堂忏悔时，这位地主把匪徒向他提出的这件卑鄙要求告诉了神父。卡尔梅洛劝他拿出要他拿出的钱数，并希望他息事宁人。

这位地主对于“理智的声音”仍然置若罔闻，拒不付钱。卡尔梅洛神父无法，只好拿出他的最后一手，打发该地区博得杰出美名的韦南齐奥神父到他家去，但是即使这位神父也未能说服相信法律力量的卡纳达。

这时黑手党徒和修道院的帮凶们便决定，现在是采取极端措施的时候了。1958年5月28日卡纳达和他的妻子、儿子从城外回来。突然有三个戴着面罩的匪徒拦住了去路。卡纳达企图喊叫。匪徒们当即向他们宣告说，由于他不听黑手党的话，他应当受到惩罚。作为“最后一次警告”，他们用鲁巴拉向他射击，由近距离射出的一发大铝弹炸裂了这位执拗的地主的肉体。当他的妻子和司机跑到他的身边时，他已躺在了血泊里。没有到医院，卡纳达就死去了。

这位倍受尊敬的卡尔梅洛神父为死者的亲属，给死者做了安魂祈祷。他受委托拯救死者的亡灵。安魂弥撒后，卡尔梅洛神父对卡纳达的遗孀说：“现在你应该把要的那笔钱交出来，或者交1000万里拉，或者交出你儿子的生命。”

卡纳达的遗孀担心儿子的生命，开始和这位黑手党教士讨价还价。她让卡尔梅洛看了帐簿，让勒索者相信，总共只能拿出300万里拉。卡尔梅洛分期得到了这笔款子。在6个月内每月交50万里拉。这位白发苍苍的神职人员还再次关心地告诫这个寡妇说：“我建议你不要把钞票的号码记下来，否则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修士们的“甜蜜生活”

黑手党修士们选择的第二个勒索对象是卡纳达的亲戚，利卡塔省的省长安杰洛·萨皮奥。地主卡纳达被杀害，把这位省长吓得不敢不如数付钱。他甚至把钱亲自送到了修道院。卡尔梅洛夸奖他说：“一眼就看出来，您是个聪明人。如果我们从前和您认识，您的那位亲戚就不会死得那么早了。”

阿格里皮诺神父在听取马扎里诺一家药房的主人卡洛扬尼的姐姐忏悔时，通知这个女人说，有一个陌生人要药房拿出300万里拉，而且要他把这笔钱交给阿格里皮诺神父。这个惊恐万状的妇女跑回家去，向他的弟弟讲了全部情况，但是他的弟弟生气地挥了一下手，表示不予理睬。

两个星期后，卡洛扬尼的药房突然失火了。药房主人感到幸运的是，火灾及时被扑灭了。几天以后，阿格里皮诺神父在另一个教士韦南齐奥神父的陪同下来到药房，因为他们没有见到卡洛扬尼本人，便和他姐姐谈了起来：“为什么你的弟弟直到现在还不交钱，难道失火对他一点教育都没有？现在他可能要把脑袋交出来了。”

在这些威胁之后，卡洛扬尼怕了，就把钱交了出来，但是他实在无法控制自己，事后狂喊怒骂：“你们修道院是个强盗窝！”

马扎里诺的居民都知道药房主人在狂怒之下破口大骂的这句话，而且这件事情也传到了当地警察局长迪·斯杰法诺的耳朵里。大地主卡纳达遭到杀害一事总算使警察局振作起

来。然而对这个案子的调查又碰到了一道看不见的沉默大墙。

马扎里诺的警察局长想仔细分析一下这句越传越广的话。过去人们一向认为，托钵修士吃的都是清素的施舍物和修道院菜园里的果子。但很快他就查明，教堂的神父都拥有大笔银行存款和各种公司的股票。他们用各种手段弄到土地，然后转手变卖。此外他们还贩卖牲畜和放高利贷。

在近百年的西西里岛的历史上，修士们亵渎神灵的事不乏其例。修士强盗和真正的拦路抢劫的强盗完全一样，打家劫舍，袭击农民村寨。比如在斯杰法诺管辖的一个小山村里，人们都被迫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反击别涅迪克金修道院修士们强盗般的进攻。到了1923年这种袭击再次成了人们谈话的题目。有一次一个黑手党修道士，把一个既是当地黑手党党魁，又是修道院院长的头砍掉了。1945年“荣誉社”的一个修道士开枪打死了阿格金托教区的主教。

有一次，迪·斯杰法诺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谈到穿道袍的勒索者以及在其修道院内所干的一些不可思议的勾当。信中还谈到，修士们在长袍下面带着武器。古尔叶尔莫神父每天晚上都用手枪向农民的窗户开枪；另一个修道士和修道院长卡尔梅洛吵了嘴，就被赶出了修道院。那位写匿名信的好心人显然是修道院的一个勤杂工。他看见那个失宠的修道士，怎样小心翼翼地往行李里捆了一支自动步枪，然后离开了修道院。

根据教规，修士们都必须严守不淫欲的誓言。但正如迪·斯杰法诺查明的那样，每天夜晚总有很多妇女到修道院来。此外教堂的神父们还大肆贩卖诲淫诲盗作品，而且竟然拥有

大量买主。迪·斯杰法诺逮捕了一个女仆，在她的住宅里警方发现了她大量收集的淫秽照片。报界报道这次逮捕时，尖刻地评论说：“巴勒莫任何一个靠妓女生活的人看到收藏有如此丰富的淫秽照片都会嫉妒得要死。”

这件大丑闻被披露出来。然而在没有掌握他们的有力罪证的情况下，迪·斯杰法诺不敢贸然动手对修道士采取行动。此外他对岛上的情况以及教会和黑手党的力量非常了解。况且任何法庭也不会把匿名信认定为犯罪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他未必能找到一个见证人。迪·斯杰法诺的惟一希望是能够找到一个有利的机会，开始调查这个案件。就这样修道士强盗们仍继续为非作歹。但一年后，这一机会终于来到了马扎里诺警方首脑的身边。

修道院的花匠之死

1959年5月末，有三个黑手党党徒用鲁巴拉猎枪谋杀了一个名叫乔瓦尼·斯图皮亚的警察，幸而此人没有被打死，他说出了向他开枪射击的人。事情原来是这样：这些修道士象通常一样对他进行威胁，要他拿出4万里拉。但是斯图皮亚不仅不出钱，反而把发生的情况向上级作了报告，并自己单独开始调查。迪·斯杰法诺拘留了3个农民。他们是朱塞佩·萨莱米，40岁；阿佐里纳·吉罗拉摩，28岁；尼科莱蒂·菲利波，23岁。后来又获准逮捕4个修道士：卡尔梅洛、维托里奥、阿格里皮诺和韦南齐奥。在对修道院搜查时，发现了一些鲁巴拉枪和一部奥利韦蒂牌打字机。字迹鉴定表明，所有的威胁信都是用这部打字机打的。

第五个罪犯是修道院的花匠洛·巴尔托洛，但他及时逃跑了。修士们把他藏到芳济各会的修道院里。在热那亚，洛·巴尔托洛觉得自己非常安全，所以他就在城里到处闲逛。这一轻率行动使他付出很大代价。他被人认了出来，被送回了西西里岛。洛·巴尔托洛戴着手铐，在全副武装的警备队的押送下被押解到离马扎里诺不远的卡尔塔尼塞塔省监狱。

1959年6月，修道院的花匠洛·巴尔托洛永远沉默了。他把他的秘密永久带到了坟墓里。当时发现他吊死在牢房里。监狱的医生给他写的死亡结论是：“上吊自杀。”但是谁也不相信这个结论。

被拘捕的修道士强盗中的韦南齐奥神父，从监狱里给马扎里诺修道院的修士们写信说：“现在的情况大有好转，对我和其他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危险了。现在可以把一切罪责都推到已死去的修道院的花匠身上。活着的洛·巴尔托洛不宜充当一个令人生畏的十分危险的罪犯角色。”

在墨西拿的审判

上述4个芳济各会修道士坐在墨西拿城司法宫古老大厅的被告席上，其罪名是组织匪帮，参与杀人，谋杀未遂和敲诈勒索。

1962年春天，意大利和外国报纸派了100多名记者，来采访对这4个“天主的士兵”和3个世俗帮凶的审判。甚至对于西西里岛来说这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轰动一时的新闻。

人们可以看到，每逢审判，那些穿起阅兵服的宪兵们总是以阿谀奉承的神情迎接这些僧侣强盗；法官们也总是非常

客气地对待这些穿着教士长袍的罪犯。为这些修道士辩护的都是最著名的律师：一个是天主教民主党党员，卡尔内卢蒂教授，他曾向记者夸口说，为辩护这个案子他对自己付出的劳动，连一个里拉的报酬都不取；另一个是西西里地区的前首脑阿莱希。在休息室里人们谈到这个人时说，仿佛此人从前不止一次虔诚地前往马扎里诺去“朝圣”。审讯过程中，在法庭的走廊里聚集了那么多的托钵修士和教会的权贵。这是以往所罕见的。在大庭里所有出席旁听的人都低声附和赞同辩护人的发言。

天主教会和黑手党共同垄断主宰着西西里的一切。而在意大利的这个“靴子”上，任何法官和国家公职人员，即使他是黑手党的反对者，也要把教会的权利置于最高地位。所以意大利南部的居民指控这几个修道士，实际上也就是指控整个教会僧侣。怎么能接受得了呢？无论如何宗教界和教权主义的天主教民主党，对这件丑闻是不感兴趣的。

修道士们选择了巧妙的策略。他们说畏罪自杀身亡的花匠洛·巴尔托洛才是真正的罪犯。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谁是真正的幕后策划人。是他强迫4个修道士充当送信人和收钱人。至于修道士们则是这个狡猾罪犯的无辜的受害者。

被告人尼科莱蒂、萨莱米和阿佐利纳在法庭上什么也想不起来。他们对法官所提的问题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谁也不认识！”“我忘了！”

《噤口律条》迫使被告们保持沉默。

修道院的仆役尼科莱蒂已经承认了自己所犯罪行，又否认了一部分口供。他承认他杀害了卡纳达和参与了对斯图皮亚的未遂谋杀，但是他拒绝说出其他参与犯罪者的名字，后

来尼科莱蒂请求秘密审判。他说：“我害怕遭到洛·巴尔托洛的下场。我不想象他那样完蛋。”

“你想以此说明，洛·巴尔托洛是被人杀害的吗？”审判长问道。

“不，我不想以此说明任何东西，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惟一担心的是我自己的生命和我一家人的生命。洛·巴尔托洛死了，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

卡尔梅洛神父对此意味深长地说：“在我们马扎里诺，一向的规矩是：‘谁说谁就死，谁不说，谁就活。’”

当法官表示困惑不解时，卡尔梅洛惊奇地喊道：“法官先生，您生活在什么世界上，难道您不了解西西里岛吗？”

法庭的成员是否知道，黑手党的手甚至已经伸到监狱里的不合他们心意的人身上了呢？就在这次对马扎里诺“僧侣匪帮”审判前不久，意大利的报纸曾报道了一个年轻的西西里人的命运。这个年轻人根据“荣誉社”最高法庭的命令于1961年12月份的8天时间内，在自己的牢房里折磨死了12个人。而杀死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的加斯帕雷·比肖塔的命运如何呢？

但是法庭的滑稽剧仍然继续上演。罪行的主要见证人，被杀害的安杰洛·卡纳达的遗孀和他的弟弟都拒绝提供证词。在判决前几天，这个寡妇撤回了要求赔偿损失的起诉。此外她还给法庭打了电报，否认辩护人以她的名义作的声明，在最后的一次会议会上所宣读的这个电报里，她驳斥了外界试图对她施加压力，黑手党曾无耻地向她勒索金钱，对她进行迫害等说法，并在电报中说，她确信，这些教会的神父是无罪的。

当黑手党徒也向其他的证人打了招呼之后，这些人也都否认了原来的证词。药房主人卡洛扬尼就是如此行事。显然他不想让人再放火烧他的药房；下令逮捕修道士的那位宪兵军官的汽车房里爆炸了一枚炸弹；证人安东尼奥家的葡萄藤被剪断了，橄榄树被砍了几十棵，五头公牛也弄成了残废。罪犯们留下了条子：“你给警察说什么要想将来，记住，你什么也没有看见。”

调查持续了3个月。法庭作出了很多旁观者所预言的那种最后判决。萨莱米和阿佐里纳这两个农民分别被判处30年监禁。尼科莱蒂被判了14年徒刑，而“天主的士兵们”都被宣判无罪。

当审判长宣布判决之后，在有大批宗教界高级人士出席的旁听席上，爆发了一阵疯狂的欢呼声。就在这一天，这些修道士都被释放，胜利返回自己的修道院。

他们又作起弥撒，进行祈祷，继续听取马扎里诺及其郊区的善男信女的忏悔并赦免其罪过。

迪·贾科莫检察官在他的起诉书里描绘了西西里岛令人震惊的落后情景：无知和愚昧充斥全岛，因此佃农往往落入黑手党的魔掌。检察官把“荣誉社”形容为“西西里岛”和“全民族的耻辱”，而把马扎里诺的托钵修士的修道院称为敲诈勒索和杀人匪帮的中心。然而检察官的这些话都没有任何作用。法庭对黑手党修道士的判决是基于“迫不得已的需要”，而以乞讨为生的修士们在银行里都有大笔存款，法庭却置这种明显的罪证于不顾。

可是这次审判毕竟还是使全国舆论哗然。法庭的判决对名誉扫地的宗教界人士有利这一点，引起了愤怒和风暴。有

两个检察官提出了上诉书。法庭陪审员的法律顾问也要求重新审议这个判决。

1963年夏天，报界再次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马扎里诺托钵修士的罪行。如果将对这些罪行的描述装订成册，每本300—400页，将有10本之多。在复审时，有15名律师为这些修道士进行了辩护。检察官的起诉演说进行了16个小时。他列举事实证明，这些修士们并非是牺牲品，而是犯罪的真正组织者。经过宣誓的陪审员法庭开了12个小时的会，最后做出判决：卡尔梅洛、阿格里皮诺和韦南齐奥都判处13年徒刑。只有维托里奥神父这一回没有被关进铁窗，因为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实。

判决宣布后，被判刑者的亲友和同伙疯狂地喊叫：“杀人犯们，你们把无罪的人投进了监狱！”

这些宗教界人士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1965年2月“僧侣匪帮”的律师们终于使最高法院取消了判决。只是对那3个分别被判处14年到30年徒刑的世俗农民的判决仍然有效。

对匪徒灵魂的关怀

战后美国当局把大量的意大利裔匪徒驱逐回意大利。因为很多人认为，有组织的犯罪是从外国传到美国来的，所以他们认为采用这种措施似乎就可以结束美国的犯罪现象。然而象查尔斯·卢恰诺，拉里夫·利果里和乔·阿多尼斯这样的黑手党头子们，即使他们干走私毒品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也不会亲自出马，而是通过别人之手。这伙人从遥远的意大利继续指挥着“我们的事业”的活动。

在被驱逐的黑手党匪徒中有很多小匪徒。他们还没来得及积累足够的钱财以应付不时之需。克罗切教区的布兰迪诺神父想帮助他们在重新获得的祖国里“适应”新的环境。在此以前这位教堂神父已经照顾过一些罪犯。这位前随军神父在1945年后，对被英国人和美国人判决的意大利战争罪犯特别关心。为了突出显示自己对他们的同情，他用两枝笨重的柯里特式手枪装饰了自己在罗马附近修道院里的一个修道室。

布兰迪诺神父感到痛心的不是意大利失业者可怕的贫穷状况，而是被美国驱逐出境的那些无业的杀人犯的命运，他们不适应意大利的那种对他们来说艰苦的和不习惯的条件，因此经常寻找非法返回美国的途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墨西哥的边界实现了这个愿望。还有一些匪徒则想法和意大利的犯罪集团挂钩。

布兰迪诺神父向卢恰诺以及其他一些富有的黑手党人求助。卢恰诺则向在美国的黑手党百万富翁呼吁。于是很快一些没有写明地址的首批捐款就寄来了。罗马的上层社会，也向这些不干正事的“穷困”的匪徒表示了自己的心意。当玛丽娅·杰列济娅·普契尼公爵夫人，把一张支票作为救济罪犯的基金，交给布兰迪诺神父的一刹那，摄影记者为他们拍了照。这位精力充沛的神父借助于这些丰厚的捐赠，为被驱逐出境的匪徒们建立了一个俱乐部。

从美国被驱逐出境的罪犯当然随身带着“生产工具”。有哪一个专家会自愿地和自己的工具告别呢？后来警方揭露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实：匪徒们曾不止一次从这位神父提供的庇护所出发，进行强盗袭击活动。因此警方便不得不消灭这个强盗巢穴。

圣·安德烈的十七只手

在阿普利亚区福基市附近，有一座圣·乔瓦尼·罗丹多修道院。这个修道院里的黑手党开辟了一个特别的生财之道。在这个修道院里有一个名叫皮奥的神父。关于这位神父流行着一个传说，仿佛在他的身上出现了圣斑——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伤疤的象征。“荣誉社”善于巧妙地利用意大利天主教徒的宗教虔诚。当然首先利用了人们对身上有圣斑之人的圣力的笃信。有很多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都愿试一试皮奥神父所创造的神功。不幸之人成群结队，蜂拥而来。

这里一下子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一家又一家旅馆和饭店拔地而起，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朝圣者。而这些建筑的主要承建者是黑手党。即使住宿的价格，也由黑手党操纵。希望出席皮奥神父作弥撒的人络绎不绝，日夜排队等候；渴望向能创造奇迹的神父忏悔的人，不得不按顺序登记。钱多的人，可以通过这位有圣迹神父的代理人给自己买个方便。而贫穷的朝圣者也可以拿出少量的钱缩短等候的时间。但是所有这些人都要被领到一个暗室里。在那里一个冒充“圣皮奥”的人在几乎是一片漆黑之中显示自己的“奇迹”；那些善男信女还可以买到录有修道士祈祷和作弥撒的唱片。据有权威的神父说，这些唱片储存有神奇的力量；最后，信徒们还可以买到从皮奥神父伤口上揭下来的染有血迹的绷带。机智的记者们买了这些“圣物”；并在实验室里进行了化验分析。由于被血染红的绷带有几百公尺之长，因此他们自然怀疑这是骗局，而化验调查的结果，对于意大利的信徒们来说，犹如一

颗炸弹爆炸：纱布浸染的是鸡血！这件丑闻引起了强烈的愤怒，为了平息广大受骗者强烈的愤懑情绪，教会当局被迫开始调查此事。

黑手党很早以来就开办了买卖圣物和教会里各种敬奉上帝物品的生意。它拥有出售教堂蜡烛、圣像、雕像以及其它圣物的不可分享的专卖权。从美国返回故乡的匪徒，在那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掌握了资本主义大发横财的种种手段。黑手党在他们帮助下在南北美洲掌握了新的推销市场。

意大利《时报》公布了一批有关黑手党贩卖圣物的有趣的统计材料，其中有圣·安德烈的17只手，圣·埃特恩的13只手，圣·菲利帕的12只手，圣·泰克拉的10只手，施洗礼者约安的60个指头和圣·尤里安的40颗头！让·达克的21套骑士盔甲已经运到美国。一起运去的还有：弗兰齐斯克·亚西斯科的同样数量的僧衣以及圣·别尔纳杰塔的50个念珠。在所有这些圣物中最珍贵的是摩西的手杖。他用这根手杖把犹太的孩子们引向迦南乐土。

1965年10月罗马附近的阿尔巴诺修道院的托钵修道士安东尼奥神父被揭露为香烟走私犯的同伙。梵蒂冈被迫采取措施以防止丑闻象浪潮一样传播开来。教皇保罗6世任命了一个修道院监察委员会，调查教会人员与黑手党以及其它罪犯的联系。

不论怎样调查教会黑手党案件，通过教会法庭也好，民事法庭也罢，可以有把握的预言：和调查黑手党在经济领域中犯罪所获的结果相比，这种调查不会带来任何新的东西。“荣誉社”同西西里和意大利的统治集团结合得太紧密了。不动摇这个社会制度的根基，就不可能消灭黑手党。

巴勒莫匪帮之战

记者 巴勒莫市政厅真的允许黑手党建立对建筑行业的控制吗？

省长 如果您有兴趣想知道，黑手党在建筑行业是否也象在修建市立公园、供水系统、甚至墓地等方面取得了同样的成绩，那么我们应当回答说，在这个岛上，凡是产销需要中间人的地方，黑手党的事业到处都很兴隆。

摘自1963年9月天民党党员、巴勒莫省长萨立沃·利马博士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材料

酒吧间的主人盖塔诺·加拉托洛焦急地在门后等待着。他的保镖朱塞佩·利康德罗，这个受过美国培训的西西里匪徒小心翼翼地从房子里走出来，仔细地向四处张望了一下，看看有没有危险。几分钟以后，他给他的主人发了个暗号。然而身材高大的加拉托洛还没有来得及把身后的门关上，突然一辆黑色的小轿车飞驰而来。从疾速驶过的小汽车里乒乒乓乓向他射来一排子弹，加拉托洛当即应声倒在地上，一命归阴。

这位被认为是巴勒莫港口区属于新黑手党的“圣水帮”的头子被打死了。大口径的鲁巴拉枪铅弹把他的全身打了个稀巴烂。这种杀人武器使任何人都不怀疑，凶手是老黑手党的

人。1956年7月的这一天发生的这场凶杀案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的。这次罪行成了“新”“老”两个匪帮为争夺统治权而进行的残酷斗争的开端。

冲突是从下面一件事先爆发的：市政厅决定拆除立在公园区内的一座半倒塌的破旧的市场大厦，并要在阿克瓦桑塔港口区(属“圣水帮”控制)开辟一个新市场，而老市场的黑手党也和卖蔬菜水果的商人一起迁了过来。他们在这里对每一个橙子，每一个西红柿，每一袋子土豆收“税”。然而统治阿克瓦桑塔的是加拉托洛领导的、自称是“圣水帮”的新黑手党。他们不能容忍在他们统治的地盘上出现任何竞争者。这个匪帮想在自己控制的新市场向商人们“收税”，但是“老头子们”却不肯让步。他们用杀害盖塔诺·加拉托洛的手法表明，他们将始终坚持对这个行业历来的权利。

没有多久报复行为就接踵而至。“圣水帮”的杀手首先弄死了他们的头子的保镖。只有他才能出卖他们的头子。不久警察在意大利的北部发现了他的尸体。而就在这个叛徒被杀后不久，一个做水果蔬菜生意，名叫迪·克里斯托法罗的“老”黑手党头子，在和敌对匪帮的血战中付出了生命。

接着双方进行了一连串新的互相袭击。一个“老”黑手党家族的代表朱塞佩·格雷科被打死了。过了几天，他的女婿帕拉罗波利也跟着进了坟墓。由于双方的经济利益范围互相交错，所以争权夺利的斗争也开始激化。很快巴勒莫的所有黑手党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斗争。

尼诺大叔的戏弄

在巴勒莫的郊区维拉巴特，黑手党的首领安东尼奥·科托内象一个绝对的君主统治着一切。他和他的朋友卢卡诺·利乔一起搞一项赚钱生意——贩卖牲畜。他是几个屠宰场的老板，在银行里的存款有20亿里拉。这位尼诺大叔（人们还这样称呼他）常常到纽约，同“我们的事业”的老板乔·普罗法奇会晤。有时科托内还用电话和大洋彼岸的朋友通话。

但是不久他的安宁生活被打破了。以朱塞佩·迪佩里为首的另一个黑手党家族来到了维拉巴特。朱塞佩·迪佩里靠走私香烟发了横财，所以他不放过机会炫耀自己的金钱和权势。这一点使按黑手党老传统行事的尼诺·科托内非常恼火。他决定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暴发户自量些。

有一次迪佩里的手下人走私运来370箱香烟，并把这些香烟藏在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到了第二天他们打算继续转运这批货时，烟箱却不翼而飞。迪佩里听说，是科托内匪帮的人把烟箱偷了。他强压怒火，向他的竞争对手讲述了香烟箱被盗的详细情况。科托内冷漠地听了他的诉说，答应进行调查。

确实不错，过了不久大部分烟箱都“找到”了并还给了迪佩里。但是不久在藏有香烟的房子里，突然来了4个警察，他们没收了这些走私商品。

在这次突然袭击之后，迪佩里家族的黑手党分子们才清醒过来，动脑子想了想，这是怎么回事。这才恍然大悟。与此同时，科托内并不抵赖，相反他非常详细地向所有的人讲

了，他怎样让4个年轻人穿上了警察制服，巧妙地耍弄了迪佩里的人。

香烟消逝了，而且这次是一去不复返了。朱塞佩·迪佩里还遭到了羞辱：竟然蓄意损害他的“权威”，对此这个黑手党人是不能容忍的。

1956年8月22日尼诺·科托内遭到了许多“荣誉社”黑手党分子在这一天所遭到的厄运。杀人凶手叫安杰洛·加拉托洛。他就是酒吧间老板盖塔诺·加拉托洛的兄弟。“老”黑手党搜寻了他一昼夜。而警方此时推测有可能要发生罪行。枪手用鲁巴拉面对面朝加拉托洛开了枪。

1956年8月26日港口区黑手党的一个族长，科托内的老朋友尼科拉·亚历山德罗遭到了杀害。接着“老”黑手党又动用了鲁巴拉。这次谋杀的对象是朱塞佩·迪佩里。但是他没有被杀死。这个受了伤的族长企图逃出“老”黑手党的势力范围之外，逃往意大利的北部。在第一次对他谋杀未遂的3天之后，在科尔梅尔湖，一排鲁巴拉子弹终于打在了他的身上。这一回枪手弹无虚发，朱塞佩·迪佩里被打死了。

棺材生意

每一个巴勒莫人都知道，黑手党甚至在死人身上还要赚钱。对西西里人监护了一辈子的“荣誉社”，甚至在他们走向坟墓时，也对他们寸步不离。

黑手党人卡尔梅洛·纳波利控制着巴勒莫的殡葬行业。棺材作坊都在克拉捷莱大街、朱基其和鲁阿·福马基犬道和巴吉切洛夫大街。这些工厂属于三个最大的企业家：尼科

拉·维特拉诺,大安东尼奥·特林卡和小安东尼奥·特林卡。在“荣誉社”的帮助下,这些生意人能够找到经常的销路,而且千方百计阻挠想打入他们生意圈子内的人。

直到今天在巴勒莫还流传着一个殡仪馆老板的故事。此人异想天开竟然妄想同殡葬业的上述3个庞然大物相对抗。他规定了比较低廉的服务费用,所以马上就有顾客登门。但是他的第一次买卖就成了他的最后一次买卖。整个事情是从抬棺材的人不来开始的,当后来找到另外一班人来抬时,送殡的行列也就出发了。可是在途中抬棺材的人却一下子突然摔倒了。死者的亲友大吃一惊,装着尸体的棺材咕咚一声摔落在地。尽管如此,送殡的行列总算到了教堂。可是要举行安魂祈祷仪式又不得不等很长时间,因为神父和他的助手当时都不在教堂里。后来费了很大周折才把一个神父找来。他表示歉意说,事先有人打电话告诉他,似乎安葬要往后推迟一天。安魂祈祷仪式后,送殡的行列向墓场进发。所有的人都深信,命中注定的种种意外之事总算过去了,可是谁知突然又响起了爆竹声,马受了惊吓,拉着灵车乱跑起来。人们花了很长时间,费了很大气力,才让受惊的马平静下来。把灵柩送到了墓地,可是到了墓旁,惊魂未定的死者的亲属才知道,不久前另外一个死者已经安葬在这里。当这位棺材匠最终总算把棺材送进墓穴时,他才明白这一天和棺材一起埋葬的还有他的买卖。

另外一些干这个行业的小业主办事比较聪明。他们和维特拉诺和特林卡事先商量好,每办一次殡葬业务,要给他们两家缴一定数量的钱。此外,在把死人埋葬之后,黑手党的人还总是把鲜花和花圈从墓场上收回来,然后卖掉,但是把

钱都装在自己的腰包里，对此这些小业主都保持沉默，绝不声张。

西西里方言把棺材叫做“塔布吉”，卖“塔布吉”使黑手党分子增加了额外收入。黑手党不仅在巴勒莫卖棺材，而且还把棺材送到郊区销售。这样一来，黑手党便非常巧妙地把棺材用作运送“热门货”的工具，把那些被警方搜捕的人装进带有通风孔的棺材里，送往比较安全的地方。

从某些时候起，卡尔梅洛·纳波利除了经营“塔布吉”、鲜花和墓地外，对能发横财的卖牲畜行业也产生了兴趣。但是这个行业早为黑手党的各个匪帮所控制，所以和这些匪帮发生冲突已是不可避免。

有一天纳波利的一只心爱的狗丢失了。过了一天有人给他寄了一个包裹。里面包的是那只狗的头。另外除了一张传统性的死亡威胁信之外，里面还装有一张四边有黑框框的讣告。讣文是：“我们非常沉痛地宣告：我们亲爱的朋友卡尔梅洛·纳波利与世长辞。”

从此，他这个已被宣告死亡的人每次出门都随身跟着保镖，而且总是到熙熙攘攘的繁华街道。平时他总是在与警察局毗邻的快速咖啡馆里喝咖啡。然而正是在这里，他遭到了无法逃脱的劫数。1956年7月，一枝冲锋枪从菲亚特牌汽车的车窗里伸出，通过橱窗向咖啡馆里猛射，卡尔梅洛·纳波利当场被击毙。一位偶然和他并排而坐的老人和他同时遇难。

警方立即封锁了这个区的所有街道。这一次仍然未能找到杀人犯的一点踪迹。而黑手党徒纳波利的朋友们却比较走运。他们找到了杀人凶手并用私刑把他处死了。警方对被弄得血肉模糊的尸体进行了辨认。被杀死的人叫维托·弗雷

纳。他属于控制着墓场、市立公园和小公园的那个黑手党家族。

1956年夏天，很多黑手党徒死于非命。有70名以上的“荣誉社”成员见上帝去了。黑手党的最高委员会必须进行干预，采取了坚决措施。黑手党的先生们和族长们签订了和约。互相凶杀引人注目，如果进一步流血就会招致警方采取相应措施。

怎样当上市长

在50年代初叶，在巴勒莫市，先是点点星星，而后犹如雨后春笋，各种各样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高耸于古老的宫殿和富豪的别墅之上。这些庞然大物仿佛从自己的高度傲视着那些简陋的茅舍。将近15万市民在这些简陋的茅舍里过着毫无作为的生活。用玻璃和水泥建造的摩天大楼和富丽堂皇的别墅是西西里岛经济繁荣的象征。意大利北部的康采恩和外国的垄断集团利用了西西里岛的经济大发横财。据说经济繁荣已经来到了西西里岛。然而贫苦的人却和从前一样，依然是这种“经济奇迹”的旁观者。

每块土地的价格急剧上涨。租金、代售酬金和建筑费用也都随之上升。土地行业的投机买卖吸引了不少黑手党的冒险家。这里的帐不是以几千里拉计算，甚至也不是以几万、几十万里拉计算，而是以数百万或数十亿里拉计算。

1956年在黑手党内部权利斗争炽烈之际，一个年轻的公务员，当然是天主教民主党成员，开始官运亨通：萨利沃·利马被提名为巴勒莫市主管公共事务的负责人。他希望以此

为基础，继而登上市长的宝座。利马有步骤地巩固自己的权力，加强与各方面的社会联系和事务交往。这样一来，黑手党的投机倒把分子就都优先获得建房权、营业执照和贷款。

当时巴勒莫的一个名叫保罗·邦塔或者叫保利诺先生的黑手党头子的生意十分兴隆。在殡葬黑手党的总首领科洛杰洛·维茨尼先生时，邦塔和卡洛杰罗·维茨尼的继承人真科·鲁索并排而行。1945年邦塔和保皇党议员埃尔内斯特·普里蒂蒂亲近起来，并创办了几个俱乐部。那些无事可干的贵族们可以在那里纵情狂赌，消磨时光。当邦塔感觉到保皇党已丧失其政治影响时，他改换了方向，决定投靠更有前途的天主教民主党，而且他没有费多大周折就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堂妹玛加丽塔·邦塔切是爱国妇女天主教联盟的主席，天主教议员。红衣主教鲁菲尼是她的靠山。正是她为邦塔引线搭桥，让他结识了萨利沃·利马大夫，目的是让这个黑手党徒能从事地皮投机生意。邦塔把自己赚来的钱基本上都投资于象“西库拉电气公司”那样的大工业公司里。这家电气公司的大部份股票都属于美国人。当以共产党和社会党人为首的全意劳动者工会1959年决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西库拉电气公司生产委员的选举时，邦塔倾尽全力不让全意劳动者工会代表的名字进入选举名单。而公司经理却振振有辞地对愤怒的工人说：“保罗·邦塔在帮助我们，没有他，我们就没有水和土地来扩大再生产，让失业者就业。”

在做大买卖的黑手党分子中间，有一个名叫瓦萨洛的人。在他扶摇直上，飞黄腾达，跻身于城里的显赫人物的行列之前，原是一个卖帽子的商人。瓦萨洛从地方银行和钱庄

得到40亿里拉的贷款。甚至国家银行也在没有任何担保的情况下向他提供贷款。瓦萨洛把学校的房舍租给省行政管理当局。仅此一项每月就收入7800万里拉。后来，在调查这个黑手党分子的活动时，揭发出来一些令人震惊的事实。瓦萨洛得了钱，但租出的都是一个还没有建成的学校。在推迟了七个月之后，学校总算开了学。但是由于很多建设工程没有完工，学校仍然不能使用，纳税人不得不再从自己的腰包里拿出更多钱来。

巴勒莫市议会的共产党议员们在记者招待会上向新闻界的代表详细介绍了使社会轰动的一些文件。根据这些文件得出的结论是，西西里首府的建设计划，在对建筑行业的黑手党有利的情况下，至少改变了7次。共产党议员还宣告，确有一个要拆除那个以凄惨而闻名的乌尔卡多内监狱的计划，因为出现了一个要买下这座监狱所占地皮的有利可图的购买者——黑手党。

“装满炸药的朱利叶塔”

黑手党经营的一项相当赚钱的买卖就是贩卖毒品。在西西里有一个名叫恰泽雷·曼杰拉的人领导着这行买卖。他在巴勒莫附近的奇尼济小镇定居以前，靠在芝加哥经办赌场和贩卖毒品而积攒了百万财富。这个城市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财运亨通的商人和慈善家。曼杰拉捐了相当数量的钱建立了一所孤儿院。根据城里一些有威望的人的建议，他被选为天主教传教士团的主席。这是教权主义联盟的最高机关。就是这位“慈善家”领导着近东、西西里和美国之间的走私贩毒活

动。在1962年1月，他的前任在那不勒斯机场突然死亡之后，他就领导起这个庞大的走私集团。但是这位秃顶的曼杰拉并没有比自己的前首领多活多久。

有一次在从巴勒莫往美国私运毒品时，曼杰拉考虑到安全问题，命令把交接的地点改为西西里的南海岸。受曼杰拉委托负责此次走私行动的年轻黑手党人卡尔切多尼奥·皮扎从中间人手里收了一包海洛因。他对自己的初次成功感到很满意，然后就坐上轮船到纽约去了。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钱存入了曼杰拉的一个心腹的名下。但是这笔款数小于原先商量好的数目，而且从纽约传来的消息也十分出人意料：那里收到的海洛因的数量也少于发货的数量。显然有人“捞了外快”。一名横渡大西洋的海船上的海员和皮扎自然成了怀疑对象。美国分支机构对第一个怀疑对象进行了严刑拷问，后来查明，这个海员无罪。

在巴勒莫，皮扎被送到黑手党的法庭受审。在这里审理也以宣判皮扎无罪而告终。但这个判决并非一致通过。安杰罗和萨尔瓦托雷·巴尔贝拉兄弟坚决要求判处死刑。很可能这并非由于他们和这个穿着考究的同伙之间的不和起了主要作用，而是出于严肃的业务上的考虑。因为皮扎和巴尔贝拉两兄弟是巴勒莫市建筑行业的竞争对手。1962年12月皮扎被杀害了。巴尔贝拉匪帮的重要成员彼特罗·托雷可能是杀害皮扎的凶手。

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之后不久，于1963年初萨尔瓦托雷·巴尔贝拉失踪了。后来在阿格里琴托附近的乡村公路上，警方找到了他的那辆被毁的汽车的残骸，但却没有车主的踪迹。

1963年4月的一个晚上，曼杰拉和“圣心修道院”的修道

士们会见之后回家时发现，一辆小汽车挡住他家门口的通道。也许是漫不经心的车主把车丢在这里了吧！他嘟嘟囔囔骂着走出自己的汽车，想把那辆挡住他家通道的小汽车推开。他家的看门人急忙走来帮助他的主人。而当曼杰拉刚一按丢弃在那里的汽车门上的拉手时，突然一声巨响。原来这一辆朱利叶塔牌体育赛车装满炸药。两个人都被炸得粉身碎骨。周围很远的窗子上的玻璃都被震碎了。警察只找到了曼杰拉的皮鞋、帽子和钱包。就这样安杰罗·巴尔贝拉把新的凶杀武器引进到西西里岛黑手党的武库中来。

当安杰罗·巴尔贝拉从西西里逃走时，对他参与这个罪行的最后的怀疑也就消失了。他在罗马作了短暂的停留之后，便来到了工业城市米兰。

1963年5月的一个晚上，身份证上写的是工业家的，39岁的安杰罗·巴尔贝拉正在他的朋友雷吉诺·乔瓦尼的别墅里作客。夜里1点钟时，他从屋里出来上了汽车。但是这个黑手党分子还没有来得及把引擎发动起来，突然有两辆汽车挡住了他的去路。从汽车里跳出几个人来，向他猛烈开火。巴尔贝拉受了伤，但是他临危不惧，从汽车里爬出来进行还击。袭击者逃跑了。根据流血的痕迹判断，他们有两个人受了伤。

在圣·维托雷医院里，从巴尔贝拉身上，即从他的肩上，手上，胸腔和腹股沟部，取出了4颗子弹。医生们还在他的身上发现了旧的枪伤疤。巴尔贝拉已经脱险。他对警察提的问题给予否定的回答：“我一个也不认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干，我是一个正派人。”

米兰市警察局向巴勒莫询问的结果表明，一条“大鱼”落

入了警方之手。在巴尔贝拉匪帮的帐上记载着：敲诈勒索，贩卖毒品、走私、杀人6起，蓄意谋杀4起，用装满炸药的朱利叶塔牌赛车谋杀未遂两起，至少绑架过4人。

汽车盖下的炸弹

以在米兰对安杰罗·巴尔贝拉谋杀为起点，开始了对他的匪帮及其支持者斗争的新阶段。曼杰拉的两个专门从事走私贩毒的朋友，里米和外号叫托托的萨尔瓦托雷这兄弟2人决定使用匪徒们用之有效的武器——左轮手枪。

而第一批受害者是巴尔贝拉的最亲密的朋友，米西里梅里的黑手党头子马莫·格勒索先生和他的儿子。有一天他们两人从家里出去，从此就象陷进了地层下面，谁也没有再见到过他们。

1963年6月18日晚一辆银白色的朱利叶塔牌汽车停在了博尔加塔·乌季托雷贵族区，安东尼奥·贾乔大街一家门前。巴尔贝拉匪帮的52岁的“商务经理”彼特罗·托雷塔就住在这里，两个人下了汽车，走进了房子里。

没有过几分钟，就听到了枪声大作。两位来客中的一个从三层楼的阳台上跳到人行道上，旋即向汽车爬去。正等候在那里的朱利叶塔牌汽车的司机，打开了车门，把受伤的人拖进汽车里，这个受伤的人，在昏迷中被送到邻近的一所医院，不久就一命呜呼，解剖的结果表明，他身中4弹。

不久警察在托雷塔的住宅里找到了第2个被雇用的凶手。他也被4颗子弹打死了。而托雷塔在警察来到之前就藏了起来。被打死的两个“枪手”的名字是：季罗拉马·科米尔

雅罗和彼特罗·加罗塔莱。过去很少有人向警方谈到过这个人。显然竞争者想消灭托雷塔。

1963年6月30日下午离维拉巴特不远的契库利警察所的电话铃响了。一个不知姓名的人打来电话说，在城里的一条街上停放着一辆朱利叶塔牌汽车，而且谁都不知道是谁的汽车。一批专家迅速赶到了现场，从表面看，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但在汽车的后座上，他们发现了一个大气罐，上面联结着一个不知是什么原因熄灭了的缓燃导火线。

警察检查了附近的咖啡馆，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现。当一个宪兵揭开发动机盖子时，突然一声轰鸣，6个警察当场被炸死。第7个人，即那个宪兵，在送往医院途中也一命归阴。

对黑手党的一次大猎捕

这个血腥暴行的消息传到罗马时，正值保罗教皇6世加冕盛典喜庆高潮之际。在全意大利，从阿尔卑斯山到西西里岛的南端，掀起了愤怒的浪潮。广大社会舆论要求查办契库利案件的罪犯。

在这些日子里，巴勒莫处于紧急状态。城里的气氛紧张到白热化的程度，凡是不能立即找到车主的可疑汽车，统统用沙袋围起来，然后炸掉。

宪兵队搜遍了全城各区，装甲车也在街上来回巡逻，晚上进行了大搜捕，打开了所有的探照灯，燃放了信号弹，目的是使匪徒们难以逃脱。巴勒莫的大街小巷处于戒严状态。车站、海港和飞机场都由武装部队加强防守。巡逻快艇沿着海岸线游弋，以切断匪徒们从海上逃往大陆的通道。宪兵队借

助于直升飞机和警犬搜查了巴勒莫的四郊。搜查和搜捕连续不断，而且不仅仅限于巴勒莫。

1963年7月15日宪兵队包围了巴勒莫附近的一个名叫沙拉的小山村。搜查的结果是，逮捕了安东尼奥·曼格雅弗里达、乔治·潘杰扎和温琴佐·迪·贝拉。这些人在1961年因犯杀人罪受过审判，但都被上诉法院宣判无罪。

然而得以成功地找到这些杀人犯的功劳不属于警察，而属于一个瘦小的妇女。她的名字叫弗朗切斯科·赛里奥。她是被杀害的萨尔瓦托雷·卡尔内瓦莱的母亲。是她打破了“噤口律条”，说出了杀害他儿子的凶手们的名字。她的行为在西西里岛引起了轰动。

萨尔瓦托雷·卡尔内瓦莱是社会党党员，沙拉劳动局的书记。他反对大地主诺塔巴尔托洛公爵夫人的恣意妄为，愤怒地揭露了把佃农的大部分收成肆无忌惮地据为己有的黑手党分子。卡尔内瓦莱号召佃农把根据土地改革法应属于他们的土地夺回来。

黑手党警告卡尔内瓦莱，要他停止他的活动。为“荣誉社”效劳的公爵夫人的管家想收买他，但是卡尔内瓦莱拒绝了他的建议。

1955年5月15日上午，32岁的萨尔瓦托雷·卡尔内瓦莱在邻居们的众目睽睽之下被枪杀在大街上。当天晚上这些黑手党的杀人凶手偷了40只母鸡，按照黑手党古老的习俗，庆祝了他们的胜利。

死者的母亲弗朗切斯科·赛里奥发誓说：“图里死了，我永远也不能让我的儿子死而复生，但是我要和杀害他的凶手进行斗争。”

1963年7月15日弗朗切斯科·赛里奥获悉，杀害他儿子的凶手被逮捕了。但是那些更大的匪徒藏到了什么地方呢？契库利罪行的一个可能的参加者，彼得罗·特雷塔又藏在了什么地方呢？

在议会里，共产党议员们要求采取具体措施对付黑手党。共产党议员吉罗拉马·里考西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站在了反对黑手党战士们的最前列。在他历次的发言中都揭露了政府所奉行的拖延政策。早在1958年，议会任命了一个调查西西里黑手党罪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开了100多次会。其成员走遍了西西里岛的每一个地方。调查的结果塞满了很多文件包。

委员会建议制定一个对付“荣誉社”的法案。司法部和内务部的工作人员起草了一个草案。但是使很多意大利人感到惊奇的是，在这个草案里，“黑手党”这个词却没有提到过一次。两个部的工作人员给这个法案的标题是《对有组织犯罪特别组织的防范和制裁》。在这个法案里，黑手党分子被称为“涉嫌并参与犯罪组织的人”。

很多报纸都提请社会舆论注意，第一个调查黑手党犯罪活动的委员会远在90年前就被派到地中海的这个岛上来过。在那些年代的年鉴中写道：“1875年11月4日晚上5点钟，西西里岛犯罪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敬爱的委员们’，乘坐伊尔·梅萨杰罗号军舰抵达巴勒莫……”这也许是关于这个委员会活动的惟一有益的报道。

契库利犯罪事件发生后，舆论界都期待着，委员会最终会挖掘和砍断“荣誉社”的根系。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副主席的是共产党议员吉罗拉马·里考西。有一次他在谈到黑手党

时说：只有彻底切除这个恶性肿瘤，正义才会重新在海岛上降临。在共产党人和其它左派政党的压力下开始了一场“反黑手党”行动。1964年1月15日在诺尔曼宫这个委员会和地方议会举行了联席会议。接着这个委员会在高涨的社会舆论的推动下开始工作。

佩佩大叔的“我们的在天之父”

1964年2月调查黑手党罪行委员会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告发，很早就被警察搜捕的黑手党分子彼特罗·托雷塔似乎就落脚在巴勒莫市郊的一个区里。

手执武器的行动小组的宪兵，根据匿名信所报告的情况，封锁了托雷塔可能隐藏的居民区。他们仔细查看了6套房子和两个商店。在托雷塔姐姐家的搜查也没有什么收获。突然一个爬到房顶上的宪兵发现，一根电信号装置引线从托雷塔姐姐的住室直通到一所暗室里。要找的匪徒就藏在那里。

惊慌失措的托雷塔企图从窗子里逃走，然而无数突然亮起来的探照灯照得他什么也看不见。托雷塔举起手来说：“请不要开枪，我没有带武器。”在他隐藏的地方，宪兵们发现了3枝冲锋枪，1枝手枪和很多发子弹。

彼特罗·托雷塔被指控杀害了13个人。他只否认参与了契库利那起汽车爆炸事件。关于发生在安东尼奥·贾乔大街那件杀人案，在第一次审讯时他厚颜无耻地说：“我从前没有见过这两个年轻人，他们进入我的住宅纯属偶然。一看到我他们就得意忘形地向我开枪。他们把我的大腿打伤，也纯属偶

然。”

警方的大猎捕进行得并非都那么富于戏剧性。1964年2月5日西西里黑手党的头子，人称佩佩大叔的真科·鲁索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动向警方投案。他来到卡尔塔尼塞塔警察所，对值班人员说：“您甚至无法想象，我是多么高兴和你们认识。”

但是刚刚把他关在警察所的单人小牢房里，黑手党就开始活动起来。辩护书和请愿书纷纷涌向各级法院。在一份请愿书里写道：“我们所有下面签名的人声明：真科·鲁索先生一直是位无可指责的人，是位品德高尚，笃信宗教的人，而且是穆索梅里著名的政界人物。他经常关心提高他所热爱的那些人的物质福利。”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两万五千个城市居民，其中也有天主教民主党党员、穆索梅里省省长的签名。

至于请愿书上提到的著名的“政界人物”，这一说法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在1960年大选时，真科·鲁索曾提出代表穆索梅里市天主教民主党竞选议员。

所以无怪乎真科·鲁索的朋友、卡尔塔尼塞塔市天主教民主党书记温琴佐·诺托律师说：“真科·鲁索是一个可尊敬的人，在各方面都是一个高尚的人。他一向不遗余力地支持弱者和帮助穷人。作为犯罪组织的黑手党并不存在。黑手党这只是一个概念。它的意思是为人宽厚，殷勤待客和热爱亲友。”

不言而喻，宗教界对这位黑手党头子被捕一事也不会袖手旁观。在穆索梅里市的圣·安东尼奥教堂里，帕斯库亚莱·希法诺神父在其布道结束时，向信徒们发出呼吁说：“现在让我们为佩佩大叔念诵一遍我们的在天之父。”

这位极为关心拯救真科·鲁索灵魂的神父，在会见意大利的一位记者时，非常激动地阐述说：“在穆索梅里，全体宗教界人士无一例外地都在要求释放真科·鲁索的清愿书上签了名。对此难道您还不明白吗？有20名教会的神职人员签名，以表示对这位被公开叫做西西里岛黑手党头子的支持！”

这一次，这个头号大坏蛋又轻易地滑了过去。他被流放到大陆5年。他的新的居住地点是伦巴迪亚省，贝尔加莫市附近的一个叫洛韦雷的小村子。这是依照他的心意选定的。就这样鲁索的罪行又未能受到惩处。司法机关引用了新的专门条款从法律上解释了放逐他的理由。根据这个条款，凡是涉嫌参加黑手党的人，可以让他脱离他以前熟悉的环境。国家要为真科·鲁索每天支付700里拉的生活费。

“反黑手党”行动在继续进行。1965年8月2日鲁索重新被捕，并被押解到巴勒莫。1965年8月2日罗马警方又给另一个黑手党头子78岁的弗兰卡·科波拉戴上了手铐。此人在堪萨斯城和拉斯韦加斯颇有名声。1948年他被美国当局驱逐出境。卢恰诺和曼杰拉死后，科波拉成了西西里岛同“我们的事业”进行毒品贸易的中间人。

意大利当局早就知道科波拉的罪恶活动，但是不能，更确切说，不愿意对他采取制裁措施。此外，1958年，科波拉在西西里被选为吉罗拉莫·梅塞里的天主教民主党议员。这个梅塞里早在1938年到1940年当过意大利驻芝加哥领事馆的领事。后来在墨索里尼时代又担任过高级职务。那么科波拉是否和梅塞里认识呢？

1958年科波拉在巴蒂尼科受到隆重欢迎。1963年10月28日一个目击者向参议院调查委员会讲到了后来发生的事情。

“弗兰卡·科波拉在大选的前几天来到巴蒂尼科。恰好他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见到了我。他要我投梅塞里的票，并说：‘我们应当帮助他，以后他会给我们好处的’。”科波拉通过了自己的亲友和熟人组织了一个广泛的支持梅塞里的运动。大选的日子到了，黑手党使用行之有效的鞭子加蜜糖的政策。而科波拉的助手们确实是用大馅饼引诱选民投梅塞里的票。就这样吉罗拉马·梅塞里被选为参议员，在地方政府里任外贸国务秘书。

既然“荣誉社”的根系已经深深扎入所有的经济部门和社会机构之中，那怎么能会根除“荣誉社”呢？

1967年10月23日在卡拉布里亚省卡坦扎罗市体育馆，开始了意大利历史上对黑手党的最大的一次审判。为了安全起见，在用高大的钢丝笼围着的被告席上坐着113名黑手党分子。

选择卡坦扎罗作为“正义的讲坛”的这一决定，是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司法部才通过的。在“荣誉社”的威望和权势都很强大的西西里，举行本世纪最大的审判实在太危险了。

就在获得优厚报酬的律师们，千方百计企图推翻对这些黑手党分子的指控时，1968年1月在西西里的西部发生了地震。数万人无家可归。“荣誉社”一下子活跃起来，企图乘自己同胞不幸之机，大发不义之财。农民被迫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卖掉自己的家产。黑手党分子夺取了分发救济物品的救灾款的非常关键性的岗位，并以40%的利息向走投无路的人放高利贷。甚至在重建被破坏的房子时，“荣誉社”也捞到了不少好处。

卡坦扎罗的审判进行了14个月。结果，安杰罗·巴尔贝

拉被判处了22年徒刑。彼特罗·托雷塔被判了27年。这两个黑手党头子不仅亲自犯了很多罪行，而且在巴勒莫匪帮之间发动了残酷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使很多人付出了生命。在这次审判中，其他黑手党分子判得都很轻，刑期分别为3个月到4年。还有40名黑手党徒因“证据不足”被宣判无罪。这次审判象以往历次审判一样，并未触及犯罪集团的致命神经。

白色死亡

众所周知,即使在西西里,黑手党也改变了自己的面貌。封建的黑手党时代,即征税员和年轻打手们的时代,鸟枪和骡子的时代的黑手党都一去不复返了。60年代模式的新的黑手党已经把它的活动区从农业区转移到巴勒莫市,进入了经营不动产的商界。它抛弃了不久前还使它具有秘密团体的外貌和名声的假面具。现在,黑手党不仅由大企业、工业巨头、豪商组成,而且大政治家也是其成员。

摘自1973年1月18日米兰《晚报》记者采访雷思大学教授多梅尼科·费尔南德斯的报道

事情发生在1970年9月16日。49岁的新闻记者毛拉·德毛拉于晚上10点钟离开了巴勒莫市一家进步报纸《时报》的编辑部大楼,驱车回家。在他的住宅旁边,他看到有3个男子在树荫下等人。毛拉刚下汽车,这3个人就向他走来,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最后这位新闻记者又坐上汽车和这3个陌生人一起,不知向什么地方急驶而去。毛拉·德毛拉的女儿从开着的窗子里看到了全部情况。根据谈话的语调她得出结论,他父亲至少和其中的一个人很熟悉。

自此以后,毛拉·德毛拉失踪了。第二天警方在巴勒莫郊区找到了他的汽车。即使经过了非常仔细的检查,也没有

发现毛拉·德毛拉和3个同车人的指印。

这位西西里岛的进步记者被认为是研究黑手党及其内部权力斗争的错综复杂情况的专家。揭露“荣誉社”累累罪行的大量报道和文章都出自他的笔下。在毛拉失踪的前几天，毛拉·德毛拉写道：“今日的黑手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它已不象以前那样嗜血如命，但却比以前更加危险，因为它既不留下任何人证，也不留下自己血腥暴行的痕迹。然而，人们发现，在1963年黑手党还无情的枪杀新闻记者、法官和宪兵，而今却不再触动他们，因为黑手党不希望以此引起对自己的注意。”由于这种对黑手党极其错误的估计，毛拉·德毛拉没有多久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72年夏天，在意大利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一个拒绝透露姓名的神职人员公布了巴勒莫的一个名叫朱塞佩·帕的黑手党枪手的忏悔辞。整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就在9月的那天晚上，当这位新闻记者在他的住宅旁边下车时，这个和毛拉·德毛拉相识名叫朱塞佩·帕的人向他走了过去。他把他的两个伙伴介绍给了毛拉·德毛拉，然后说，这两个人能够给他讲出关于马太伊一案的重要细节。所谓马太伊一案是指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的前主席马太伊的神秘之死。记者毫不犹豫地同意和他们一起去详谈。当记者被送到一所住宅时，黑手党分子给他注射了麻醉剂，然后对他进行审问和严刑拷打。至于匪徒们想从毛拉·德毛拉嘴里了解些什么，朱塞佩·帕没有说。这伙黑手党分子把这位记者扣留在他们的秘密住宅里长达19天。然后用救护车把他送到港口城市阿格里琴托。10月8日黎明，匪徒们又把他送到一个渔船上。到了那里，他或者失去了知觉，或者已

经死了。然后被放到一个铝制的箱子里，被抛进了大海。

必须判断一下，上面所描绘的事情的经过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有一点肯定的是，黑手党不止一次地采用这种手段，必须使那些对黑手党不利的人永远消失，无影无踪。当时毛拉·德毛拉本人就曾多次写过这种事情。他写道：“白色的鲁巴拉在黑手党的势力范围内无声无息地制造着恐怖。它悄悄地不见血迹地枪杀了对‘荣誉社’不利的人。它并不因此就变得不那么野蛮。这种杀人手段被视之为‘白色死亡’。用这种方法杀人不留任何痕迹，也不加重刑事律师、法院专家和法医的负担。惨遭黑手党杀害的人永远消失得无影无踪。任何人、任何时候也探听不出来他们命运的任何消息。”

为什么黑手党要残酷杀害毛拉·德毛拉呢？人们都知道，这位记者在被杀害之前正在调查恩里科·马太伊的死亡情况并在为意大利导演弗朗切斯科·罗西搜集素材。这位导演当时正在拍摄一部关于马太伊的影片。（此后没有多久这部影片就拍完了，在搬上银幕时，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恩里科·马太伊》）。有一次弗朗切斯科·罗西在他所拍摄的《谁杀害了萨尔瓦托雷·迪？》这部影片里已经提到黑手党这个题目并在影片中批判地分析了西西里匪徒之王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死亡的原因和黑手党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的根源。

有充分根据可以提出这样的看法，即记者在调查马太伊的神秘之死的情况时，一定接触到一些以前人们所不知道的秘密，在他失踪前不久，他曾对他的一些朋友说：“我现在已经收集到一些材料，如果事情进行得顺利，我就应当立即被授予新闻学教授。”此外，他还说，他知道所有参与密谋杀害马太伊人的名字。有一次他对导演弗朗切斯科·罗西说：“我

现在只有几个细节还没有弄清楚。一般说来，这个案子将是一个轰动一时的大案。很多人都会为这个要案感到震惊。”

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的前主席恩里科·马太伊由于建立了统一的石油和煤气工业体系。从而给予了英、美、荷强大的石油垄断联合组织“七姐妹”以沉重的打击。他向阿拉伯石油开采国提出了比这些康采恩更为优惠的石油供应条件，从而引起了这些康采恩对他的愤懑，因为在此之前，正是这些康采恩操纵着石油价格，确定租让条件。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的这位主席又和苏联签订了购买苏联石油的协定，并和苏联讨论了从苏联向意大利铺设煤气管道问题。这一点更被视为是对其垄断统治的特别严重的威胁。

恩里科·马太伊多次受到威胁说要杀死他。他的私人飞机的飞行员贝尔图奇被迫经常对飞机进行保护。1962年10月27日载着马太伊的飞机从西西里的卡塔尼亚起飞到米兰去，在飞机就要降落时，飞机失事了。当把飞行员和这位国家石油公司的主席从飞机的残骸中弄出来时，两人都已死于非命。在卡塔尼亚机场，一些目击者看见，在飞机起飞前不久，飞行员贝尔图奇曾被叫去接电话，有几分钟的时间，飞机处于无人照管状态。

意大利的历史学家米凯里·潘达莱奥内写了7本关于黑手党的书。他被认为是精通“荣誉社”历史的专家。他认为肯定有一个外号叫胖墩儿的查理·马切洛是美国黑手党组织“我们的事业”的成员。此人于1962年10月参加了在突尼斯举行的美国石油工业家的秘密会议。会后，他途经马德里，在马太伊飞机失事的前两天，飞到了卡塔尼亚。

从那时候起，很多年过去了，而马太伊的案子却依然还

是个谜。然而，毫无疑问，在毛拉·德毛拉的失踪和马太伊的飞机失事的事件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联系。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黑手党对这件事情插了手。

总检察长之死

这一天同巴勒莫的总检察长，65岁的彼特罗·斯卡洛内的其它工作日相比，几乎没有任何不同之处。在西西里岛首府的市中心，他让他的儿子下了汽车，而他自己则继续乘车来到托钵僧公墓，在那里象往常一样，他向他的妻子的坟墓献了一束鲜花。在回家的路上，他必须经过巴勒莫市郊区的一条名叫奇普雷斯的偏僻狭窄的小巷。突然一辆小汽车挡住了他的去路。接着从里面跳出几个人来，用冲锋枪向斯卡洛内的汽车猛烈开火。总检察长的司机当场被打死，而彼特罗·斯卡洛内本人被子弹打伤11处，在送往医院途中，因失血过多，一命呜呼。

对于这场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凶杀案，警方所能找到的唯一证人是一个11岁的小男孩。在警察局里第一次对他询问时，他这样描绘了当时所发生的犯罪场面：一辆白色的菲亚特牌汽车突然挡住了一辆天蓝色的菲亚特牌汽车，即斯卡洛内的汽车的去路。从里面跳出了两个人。另外两个人是从一家大门里出来的。这4个人一齐向天蓝色的菲亚特开枪，然后他们都坐白色菲亚特疾驰而去。但是他记不起来他们是从哪一家大门里出来的，也记不清他们的模样。可是在随后几次询问时，这个小孩却突然改口，说小汽车不是白的。

尽管抓了很多人，但是真正的凶犯却没有抓到。不过从犯罪的特征来看，谁也不会怀疑这是黑手党干的。在当时，关于这位官员，未必可以说，他在和“荣誉社”的斗争方面表现得特别尽心尽力，相反，近来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所以应议会及黑手党调查委员会的要求，最高司法委员会决定把斯卡洛内调到大陆的阿普利亚去。上面提到的那位研究黑手党问题的权威，米凯里·潘达莱奥内在就彼特罗·斯卡洛内被杀害一事，回答记者问题时说：“这个决定等于判处了斯卡洛内的死刑。这位巴勒莫的检察长对黑手党的内幕情况知道得太多了，而根据这个罪恶组织的法典，凡是谙熟西西里黑手党隐私的人，决不能放他们出岛。”

巴勒莫的总检察长是不是黑手党自己的人？！这个推测似乎有些骇人听闻。《时报》也发表评论，谴责斯卡洛内和这个组织的勾结。被杀害的检察长的家属愤怒地驳斥这些污辱性的言论，并以诽谤罪向法院控告了《时报》的几个主要编辑。

控告《时报》总编辑和5个编辑的案子转到了热那亚法院审理。这个决定的理由是，这场诉讼与西西里岛没有直接关系。

1973年7月一位宪兵军官把厚厚的一封公文放在了热那亚的法官马里奥·德鲁卡的写字台上。里面装着关于彼特罗·斯卡洛内活动的详细的调查报告。在55页用打字机打出的报告里揭露了这位已被杀害的总检察长与黑手党的联系。

彼特罗·斯卡洛内于1906年出生在西西里岛西部的“荣誉社”的堡垒城市卡拉弗里迪。1933年他在巴勒莫的司法机关里开始了他一生的事业。而他的升迁和进阶应归功于“荣誉社”。1949年斯卡洛内成为这个城市的副总检察长。当“芒

杰列普雷之王”，凶残的匪徒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在这个地中海城市胡作非为时，这位检察长，正如常说的那样，是既为我们的人效劳，也为你们的人效劳。很多涉及黑手党罪行的报告和匿名信都莫名其妙地不翼而飞。调查工作一拖再拖，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调查都是毫无结果。于是档案材料都扔在档案柜里，上面落满了灰尘。

1963年，也就是在他被任命为西西里岛首府的总检察长的前一年，斯卡洛内收到了巴勒莫市政厅的一捆将近10公斤重的文件，里面装有对建筑公司和地产经纪人的丑恶行径和国家公务员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的揭发材料。此外还装有黑手党所犯罪行的文件。而斯卡洛内则尽其所能使这些文件沉睡了3年。后来，当他最终不得不把这些材料提交法庭审理时，于是立即就有57人被起诉受审。令人遗憾的是，没有1个人被判刑。所有的被告都是处以少量的罚款而了事。

然而这位总检察长是不是在捍卫黑手党的利益？由于他同科莱奥内的黑手党头子卢卡诺·利乔一案的瓜葛则引起了对他的真正的怀疑。1969年6月10日利乔因犯了无数的杀人罪和其它罪行被送交法庭，但是却以公式化的理由，即“证据不足”被宣判无罪。被这个不公正判决所激怒的西西里省总检察长立即提出了上诉。两天以后，又重新发出了对利乔的逮捕令。这时，巴勒莫的总检察长斯卡洛内则利用了复杂的法律决疑手段，取消了对这个罪犯的逮捕令。理由是逮捕令只有在被缉捕的黑手党分子的常住地科莱奥内才具有法律效力，而利乔就利用这一点躲进了罗马的一家私人医院里。

在转送给热那亚的马里奥·德鲁卡法官的材料里，有一

些关于这位巴勒莫总检察长的新奇的信息。原来斯卡洛内的姐姐嫁给了一个名叫维托·里多的人。此人是一个与很多起凶杀案都有牵连的著名的黑手党家族的成员。1942年当彼特罗·斯卡洛内还是一个区的法官时，他曾是朱塞佩·贝尔托里尼结婚的证婚人。而这个贝尔托利尼则是黑手党头子弗兰卡·科波拉的挚友。此外彼特罗·隆哥是斯卡洛内儿子的教父。关于隆哥，米兰《全景报》记者马诺·康托雷写道：“这个黑手党徒的名字即使对那些黑手党问题专家们来说，也是第一次听说，是个新发现。他平时总是隐居在幕后，尽管正是他把斯卡洛内引进了‘荣誉社’，而且后来还成了斯卡洛内和犯罪界的领导人之间的中间人。”

然而，又有一起司法机关的丑闻大概引起了比斯卡洛内案件更大的反响。1973年4月5日53岁的罗马警方首脑安杰洛·曼加诺大约在晚上8点钟返回罗马南区的寓所。在他家的附近，他被一个陌生人用手枪击中5枪，受了重伤。曼加诺是公认的最能干的刑事警察之一。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于1974年5月抓获了科莱奥内的黑手党头子卢卡诺·利乔。侦查人员怀疑弗朗切斯科·科波拉组织了对曼加诺的这次未遂的谋杀。于是他下令，窃听他的电话。然而科波拉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后来到1974年初才获悉，这是西西里人、罗马上诉法院的总检察长斯潘奥洛事先通知了这个黑手党分子。这条消息犹如一颗炸弹爆炸。斯潘奥洛的罪过还有：在罗马的司法宫里很多极为重要的庭审调查报告都被埋藏在档案堆里；许多录制有证人证词和被告供词的录音带都进行了伪造。除此之外，这位罗马上诉法院的总检察长还经常向他的“黑手党朋友们”通报法院的调查情况。当然他的这些朋友们

也非常慷慨地付给他报酬。

向意大利北部输送黑手党

“荣誉社”很早以来就秘密存在于意大利北部，其最早的受害者是农民。据统计，仅仅从1960年到1970年就有230万人从南方迁往北方。这些黑手党“臣民”的迁移为黑手党开辟了一个新的孳生土壤。其实国家也很关心这个地区的开发，因为根据1965年制定的法律，凡是涉嫌黑手党的人首先要被遣送到意大利北部。当局想用这种方法切断黑手党的传统联系。一位担任过检察官，在任职期间因与黑手党斗争积极，而博得公众敬重的议员切扎富·特拉诺瓦说：“通过这种向北方流动的办法，西西里人促进了黑手党‘杆’菌的输出。这些犯罪分子遍布意大利全国，甚至蔓延到在此之前还对黑手党一无所知的地方。”

1974年4月在意大利全国黑手党分子被强制迁入的地区共约有1374处。按照规定，所有被流放的人，在日落后和早上8点钟前，不准离开自己的住所，而且每天必须到警察局登记一次。然而这些限制措施并不妨碍犯罪分子们利用电话去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正如后来所查明的那样，有些黑手党分子还乘坐飞机对他们西西里的同伙进行短暂的访问。

“绑架集团”

1974年2月一个名叫彼特罗·托里埃利的百万富翁，在

匪徒们那里当了52天的俘虏之后，被释放了。他的家属大约付给强盗们12.5亿里拉的巨款，才把他赎回来。

托里埃利的别墅的看门人女儿的未婚夫是西西里人，名叫米凯勒·古察尔迪，他主动提出为黑手党效劳充当中间人。他曾几次把这位米兰的百万富翁的妻子送到秘密会面地点，在那里分批缴纳了赎回自己丈夫的赎金。在他和匪徒们打交道时，他注意到他们的一些习惯，这些习惯给警方侦察这伙匪徒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另外，还有一个情况也对侦破此案起了重要作用。这就是在给强盗们的3亿里拉中有1万里拉是假票子。后来警方在看门人的妻子的兄弟家中找到了一些给强盗们的假钞票。此后不久，一个偶然的过路人，在一条沟里发现了一个装满钱的帆布袋子，里面装的也是那笔赎金中的假钞票。于是米西蒂和米凯勒·古察尔迪及其弟弟卡尔杰洛都被逮捕。在巴勒莫调查的结果表明，这两兄弟与黑手党都有联系。

警方希望其余的那些假钞票能够使警方找到绑架集团的同案犯，但是这一希望落了空。而且尽管他们觉察到古察尔迪同曾因是黑手党而被判过刑的、出生于巴勒莫的陶尔明的7个兄弟有联系。

宪兵和警察两次搜查了陶尔明的离米兰不远的卡尔文查诺的乡村住宅。在清理了畜栏里的粪便和干草之后，他们才发现了一个小门。在小门的下面隐蔽着一个通向一间钢筋水泥小屋的地道。在这间小屋里找到了5个月前被绑架的一位都灵的27岁的工业家路易吉·罗西·迪蒙特勒拉。

很早以来人们就怀疑黑手党在意大利组织了无数的绑架活动。报界在回想到由“我们的事业”的头头阿尔贝特·阿纳

斯塔吉亚所领导的臭名昭著的“暗杀团”时，曾谈及到“绑架集团”。这些匪徒在富人中间选择绑架对象。他们甚至掌握有银行情报。有些专家认为，这些匪徒甚至比金融机关还了解他们所绑架对象的财产状况。这些匪徒往往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密切注视着他们所选择的绑架对象，然后根据精心制定的计划进行绑架。

在侦破另一起绑架案时，警方同样使用了表明与黑手党有联系的间接罪证。1972年中期，阿戈斯蒂尼·科波拉神父与被绑架者家属就赎回工业家卢卡诺·卡夏纳所需的款数进行了谈判。这位百万富翁是1972年8月16日被绑架走的，只是在过了半年之后，花了巨款才被放回来。而1974年5月在拿不勒斯被逮捕的这个神父原来就是黑手党头子弗朗克·科波拉的孙子。而且就在这位神父的住室里，警方发现了弗朗克·科波拉这个很久以来就被通缉的可怕的黑手党分子。

陶尔明的案子也是黑手党转向意大利城市的一个例证。1964年在巴勒莫逮捕了42岁的贾科莫·陶尔明和他的兄弟温琴佐。3年之后，法院以抢劫、偷盗和集团犯罪判处贾科莫11年半监禁。1970年1月他被提前释放，然后被强制迁移到米兰东面的特雷维利奥。在那里，这个普普通通的黑手党分子花了8000万里拉买下了几座农家宅院，并和一个当地的姑娘结了婚，又把他的几个兄弟都叫到了这里。很久以来，已有好几百个黑手党分子都以这种方式在意大利北部安家落户。在这里他们靠走私香烟和武器、贩卖毒品和经营娼妓业，或者介绍安置从南方故乡来的老乡们的工作获取大量的收入。

在侦破了陶尔明的案件之后，罗马警方发布命令今后不

再把西西里的黑手党分子放逐到意大利北部。而参议员楚卡拉认为这个措施采取得太晚了。因为黑手党分子已经打入了意大利的工业领域。这位参议员对自己所谈的情况非常了解，因为他领导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花了5年时间调查了意大利北部的大工业中心的刑事犯罪活动。

如果说，巴勒莫是“荣誉社”在西西里的堡垒，那么在意大利大陆，米兰也就起到了同样的作用。警方进行的历次丑闻性的逮捕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一点。

1974年5月16日早晨7点钟，在米兰的里帕蒙蒂大街的一所豪华讲究的深宅大院里，警方把卢卡诺·利乔从床上叫起来。这位科莱奥内的黑手党头子在失踪了4年半之后束手就擒。警察在他的床头柜的抽屉里，找到了3枝手枪。后来查明，这个到处通缉的黑手党分子，用可尊敬的帕朗扎尼先生这个假名字，已经在这里平平安安地住了一年多。“他对人总是那样亲切，那样和善和彬彬有礼。”他的一位女邻居，对这个亲手杀过30条人命的怙恶不悛的杀人犯，就是这样看法。这个极其危险的匪徒曾经在罗马的一家私人医院里，做了两次整容手术，改变了自己的面貌。警方只是根据指纹才把他揭露出来。

与这位科莱奥内的黑手党头子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两个保镖：易格纳齐奥和塞佩·普拉罗两兄弟。是他们的行踪把警察引到利乔的秘密住宅里来的。当在一个农家宅院里找到了被黑手党绑架的工业家罗西·迪蒙特勒时，警方经过调查后确认，当地还有另外好几座荒废的院子被西西里人买了。其中有一座院子就是利乔的保镖普拉罗两兄弟掌管。他们两人在米兰还拥有两座酒馆。后来查明，这个生意只不过是

们真实活动的掩护罢了。他们的真正活动是保护住在豪华公寓里的黑手党头子卢卡诺·利乔。这个黑手党头子就是从那里领导着分布在各地的毒品走私网，而且警方认为，也正是在那里制定绑架计划。

黑手党会完蛋吗？

这个辛迪加组织的权力和影响是如此之大，甚至可以把它叫做有组织的犯罪政府。

摘自参议院调查有组织犯罪委员会在黑手党分子齐泽法·瓦拉契的轰动一时的供词公布两年之后所做的结论。

自1962年以来，议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就在调查黑手党在意大利的犯罪活动。从那时候起，关于“荣誉社”及其成员打入司法部门、国家行政机关、政党机构以及银行界的情况，已经写出了大量的总结报告。1970年末，当新闻记者毛拉·德毛拉遭到杀害，愤怒的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这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热那亚的检察官、天主教民主党的议会代表弗朗切斯科·卡塔内伊承诺，要在最短期限内完成调查工作。但是他又补充了一句说：“我们将不会触动政治家，也不会点出他们的名字。”

1972年5月25日经过大肆宣扬的黑手党罪行调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发表了。然而瑞士的《新时报》的记者评论说：“正如所料，在这个报告中缺乏对很多现实问题的分析，也没有最重要的证词和准确的消息。黑手党犯下的一些严重罪行的事例在这个报告中也没有得到反应。”

在1972年意大利议会大选之后，组织了一个新的黑手党犯罪活动调查委员会。尽管人们都非常怀疑，身为建筑行业主席的西西里议员乔瓦尼·马塔同黑手党的土地投机分子有牵连，但是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仍然让他参加了这个委员会。意大利的《快报周刊》把这一任命称之为一大丑闻。

这个新的议会调查委员中的左派政党的成员为了表示抗议拒绝参加这个委员会。调查委员会的新任主席，天主教民主党议员路易吉·卡拉罗在就职以后说，他认为，上一届委员会“已经有非常大的进展”，他现在只需要把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就行了。

策划这个阴谋的主要人物是天主教民主党成员、内务部长、西西里人弗兰科·雷斯蒂沃。雷斯蒂沃的议员生涯是从巴勒莫黑手党传统的选区开始的。这个选区成了许多与“荣誉社”有联系的政治家进入首都乃至进入内阁的跳板。当时受到各种危机冲击和无力单独解决国内迫切问题的天主教民主党阻挠议会委员会所进行的关于黑手党罪行的调查工作，采取拖延和暗中作梗的态度。因为认真调查起来，大概就能把黑手党和天主教民主党之间所签订的罪恶协定揭露出来。彻底揭露这些罪行就等于许多身居要职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乃至整个政治制度的自我揭露。

令人起敬的商界

1967年5月加利福尼亚的社会学家唐纳德·克雷斯教授说，现代模式的“我们的事业”对美国的威胁，要比30年代的阿尔·卡帕内时期的匪徒大得多。美国总统林顿·约翰逊任命

的新的调查委员会主席、前总检察长尼古拉斯·卡琴巴赫也承认，“社会公众对有组织犯罪活动的严重加剧都漠然视之。”

加鲁瓦大学教授约翰·加迪内通过研究“我们的事业”在美国的一个中等城市的活动，得出结论说：“市长、警察局长和很多公务员年年都靠一个赌博辛迪加养活。”

当然美国刑事犯罪迅速增长的原因和美国社会有组织犯罪的整体化，绝不能用意大利裔美国人(或在美国的其它种族)特别狡猾来解释，也不能用他们的性格特殊来解释。无论在“我们的事业”的历史上，或在其它的类似犯罪组织的历史上，其根源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本书就包含有关于这类问题的大量的例证。这个社会的弱肉强食法则，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错综交织，各级当权者甚至是捍卫秩序的人(从政府官员，到街道交通管理员)对法律的无视，这一切才是犯罪现象加剧的根源。资本主义的道德宣扬：“不惜一切地发财致富。”而文学、报刊、电影、电视大肆鼓吹的正是这种道德，促使滋生出一批又一批新的犯罪分子。

经济因素是犯罪率不断增长的基础。美国前司法部长克拉克·拉姆塞伊也指出了这一点。在他所写的《美国的犯罪现象》一书中，我们找到了下面一段论述：

“美国的犯罪活动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譬如白领犯罪分子，他们隐匿财产，逃避缴纳所得税，从事盗窃，诈骗，欺骗顾客，从而每年攫取几十亿美元。有组织犯罪分子通过经营赌博业、放高利贷、贩卖赌品、敲诈勒索、卖淫业、向国家公职人员行贿，捞取数以亿计的美元，此外他们还经常使用暴力，必要时，甚至还行凶杀人。但大部分犯罪动机出于经济因素。在警方侦破的八起大案中，有七起是针对财物，

也有不少的罪行是针对个人。譬如说，强盗式的袭击和凶杀也都和夺取别人的财产有关。我们的宣传与现实情况不符合也导致了很多人犯罪。这些犯罪说明了在我们这个社会充满了伪善行为。”

接着克拉克得出结论说：

“如果我们的社会真地想制止贩卖毒品、赌博和卖淫，那么就应当经常做宣传教育和说服工作……对竞选运动的财政拨款就是这种假仁假义的典型例子，而我们却被迫容忍这种现象。用来进行竞选活动的大部分款项，首先是参议院和联邦最高机构选举时所需的大部分经费，都不是依法筹集来的。譬如，联邦的法律规定，总统候选人在选举运动中所花的钱数，不得超过300万元。但是在最近几次的选举中，各政党所花的钱则超出上述数字的好多倍。”

美国公众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我们的事业”已经成了国家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美联社1972年9月8日的一篇报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这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谈到了下面的看法：

“美联社帕洛阿尔托消息：明尼阿波利斯一家大公司的领导人，34岁的西西里人塔斯卡认为，任何一个美国企业家都可以在一个有影响的黑手党人那里获得有益的一课。塔斯卡在帕洛阿尔托（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声称，黑手党极其严密的组织性是几百年来黑手党富有生命力的原因之一。这位年轻的企业家还说，黑手党只需要通过三四个‘决策级别’就可以办成一件大事。可是在美国的商界，根据情况有10个级别。黑手党里面的官僚主义最少。所以它和某些工业公司相比，能够更容易更快地适应新的条件。此外黑手党

的个人决策也非常有效力。塔斯卡强调说，他决不是为黑手党的非法活动辩护。然而研究黑手党这个组织，也许会对提高国家的经济效率有益。”

这就是一家大通讯社的一则严肃的新闻报道。

犯罪也是做生意

然而不应当忘记，“我们的事业”只不过是组织犯罪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大的一部分。意大利人移居美国所形成的特殊条件，促使产生了有组织犯罪的特殊形式，而且其水平已超过西西里黑手党所能达到的水平。但是这决不能用作反对意大利人和在美国的意大利移民的借口。不管怎么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意大利毕竟是拥有一个最强大的共产党的国家。而且在意大利裔美国人中，也有不少争取社会进步的正直而勇敢的战士。本书的读者不应当忘记，在这本研究有组织犯罪的著作里，对黑手党和“我们的事业”之所以进行研究分析是因为它们的特殊组织形式非常明显地说明了犯罪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联系。在这方面，本文同样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些例子。此外，有组织犯罪也并非只是美国和意大利所独有的现象。关于这个问题，也可以举出不少证据。

譬如说吧：1966年5月初，英国的一个统管夜总会和舞厅的康采恩“麦卡集团”经理处的代表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经理处遭到了一伙组织严密的敲诈勒索匪徒的压力。有一天，这些家伙突然来到他们那里，提出愿为“保护”这个公司的下属企业效劳。在遭到拒绝后，这些敲诈勒索匪徒开始用恐怖手段威胁顾客，干扰“麦卡集团”的餐厅、酒吧间、夜总会和舞

厅的正常营业。此外，这伙匪徒还威胁说，他们要砸碎这家康采恩“麦加集团”的所有家具和设施。

1973年8月，有一千多人乘坐专门租用的飞机和非常豪华的轿车来到了日本的比婆港，聚集在地方监狱的门口。所有的人都焦急的等待着，一直等到监狱的大门一下子打开，从里面走出一个名叫蒲田茂正的人来。聚集的人们雷鸣般地高呼“万岁”！迎接他的出狱。这个被释放的罪犯，被舒适地安排在一家最豪华的旅馆里，以便在那里以适当的形式庆祝这个事件。

这个曾被监禁的囚犯，因犯杀人罪被剥夺自由11年。他是“蒲天帮”的头子。这个帮共计有3,500个组织得非常好的日本刑事犯罪分子小组。根据警方的不完全统计，这些小组共联合了近14万“亚库查”，即黑社会分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日本，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有了巨大的发展。匪徒集团控制了大城市娱乐区的赌场、夜酒吧间、土耳其澡堂和妓院；贩卖毒品，进行房地产投机，对街上的小商小贩、小店主、咖啡馆老板进行敲诈勒索；还用赛马搞赌博欺骗。他们还象美国的大鲨鱼一样，大放高利贷，并独霸娱乐和职业体育行业，收购股票，还派出一队一队的匪徒对付罢工者。他们的关系网一直伸延到日本最有影响的政界和财政巨头那里。

日本匪徒的活动和意大利、美国匪徒的活动惊人的相似。在六十年代末，日本各地的匪帮效法“我们的事业”也组织了一次各大匪帮匪首的会晤，通过长时间的谈判，划分了势力范围，从而结束了各匪帮之间，由于一方侵犯了另一方的势力范围所引起的竞争和火并。日本匪徒拥有最现代化的武器，从各种型号的冲锋枪、手枪、轻机枪到火箭筒。这支装备精

良的日本匪徒大军，每年要犯下从敲诈到凶杀的恶性刑事案件60万起之多。

日本匪徒同样也有自己的“荣誉法典”。按照日本武士道，即封建武士的习俗，凡是参加匪帮的人都应该经过一年的考验，然后才向自己的“欧亚布恩”，即首领宣誓，表示真心和绝对服从，还许下诺言，为了维护“团体的荣誉”而不惜生命。各种不同官阶的匪徒都往自己身上刺大量的花纹，而且为了证明自己“对库米”即帮派的忠诚，砍掉自己左手的小指头。

从某一时期起，日本统治集团就在自己的公务中利用所谓的执法突击队。这是一支由受过柔道和空手道训练的亚库查组成的暴徒队。他们对左派政治家进行恐吓威胁并充当工贼。为了获得相应的报酬，日本的黑手党还向他们感兴趣的康采恩提供所谓的“索凯亚”，即换上了警察服装的匪徒。日本国家广播电视台告诉听众说，正如调查所表明的那样，在258家商行中，有251家每年要向黑帮支付500万日元到6,000万日元。日本的第三家大报《每日新闻》就这个问题发表评论说：“我们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们经常抱怨有组织犯罪率的增长，而同时却又继续不断的向匪徒辛迪加支付巨款。如果我们的社会真正想结束这种有组织的犯罪现象，首先就必须制定政策，禁止使用刑事犯罪分子。”

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受了犯罪率空前高涨之苦。例如，1971年11月13日，西德的一家杂志《明镜周刊》发表了一篇使进步的舆论界感到担忧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15万刑警人员大军直接投入于犯罪浪潮。近10年来在联邦德国，刑事犯罪数量的增长，比人口的增长快3倍。1966年仅仅由于刑事犯罪而受到惩处的人几乎达到200

万之多……这个数字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创了纪录！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昼夜之内，平均要发生杀人或企图杀人案5起，强奸案17起，抢劫汽车170辆，每小时要发生盗窃案130起。

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朝一日有组织的犯罪会自行消灭吗？

不，不会消灭。相反，它将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具有空前的规模。

在纽约，一伙匪徒绑架了一家公司的机械师。该公司为“天才俱乐部”集团信贷公司提供印刷机。这伙匪徒利用这个机械师印制了5000份信贷卡，并编制了这个信贷社所有成员的名单。

这伙匪徒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全部价值都记在“天才俱乐部”对此一无所知的成员的帐上。还有另外一伙纽约匪徒使一家航空公司遭受了两万美元的损失。他们通过邮局订了一些飞机票。在订飞机票时，他们提供了一家大商行的信贷帐号。

“我们的事业”的匪徒们与那些不劳而获，用欺骗手段取得各种回扣，或用伪造的营养品牟取暴利的商人们有什么不同呢？近几年来，这种伪造商品在资本主义世界非常盛行。

有记者问，这种类型的刑事犯罪在联邦德国具有多大规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黑森州检察长鲍尔就此问题回答记者说：“每天都获悉大量的事实，证明在纳税时，在从国家领取补助金时，都存在着极其大量的欺骗现象。”西德现在的经济制度必然引起保险欺骗。既然在我们的社会里，机敏灵活被承认是基本美德，那么当年美国人所宣扬的一句箴言就

无形的主宰着一切。这句箴言是：正派是美德，生意是生意。其实在我们这里，正象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一样，人的表面地位具有决定意义。这种表面地位首先表现在小汽车上，自然这种表面地位就导致了人们对成功的相信更甚于道德和正派。这一来，成功决定了手段的选择。

成功决定着手段！在美国，反毒品局同非法经营毒品的行为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但是在越南作战的美国军队里，吸食和贩卖毒品几乎成了合法的事情。美国的高级官员认为，士兵的意识在受到了毒品的麻醉之后，他们就可以更凶残的杀人。据专家估计，在越南的美国士兵，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都吸食带有大麻的香烟。

美国的陆军准将赫尔利·莫尔曾经说，他的士兵中间的嗜毒症，“根本不是什么灾难，只不过是破坏了道德美学准则。”即使在美国的军队里，“我们的事业”也掌握了贩卖毒品的垄断权。关于此事的后果，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在1971年2月报道说：“大约有30万士兵从越南回来后都成了嗜毒者。这些受害者在越南买的那一剂毒品，在美国国内要高达100美元。为了弄到所需要的钱，这些嗜毒者什么罪都会犯。遗憾的是，这些士兵在越南都学会了怎样杀人……对于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来说，越南战场距离祖国的犯罪之地，仅只是一步之隔。”

国际黑手党

无数的事实说明，近年来黑手党企图把它的活动扩大到别的国家，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荣誉社”在法国取得

的成就最大。在那里黑手党分子同科西嘉岛上的匪徒们建立了秘密联系。勒阿弗尔和马赛至今大概是从近东经西西里岛，向美国运送毒品途中的主要的转运地。

1965年12月，反毒品局的工作人员逮捕了美军后勤部门的军官格尔曼·康格少校。此人的所在部队驻扎在法国的奥尔良市。当少校回到美国时，警方仔细搜查了他所乘坐的、拖挂在一辆汽车后面的舒适的卧车里的东西。在水箱里，他们发现了95公斤的纯海洛因，接着在美国和法国逮捕了一大批人。警方抓住了康格的主子弗朗切斯科·焦加尔基，或者象人们称呼他的那样，叫弗朗科·吉奥。他是臭名远扬的黑手党分子约翰尼·吉奥的弟弟。随后又进行了调查，终于查清了毒品的转运路线：从西西里岛黑手党分子那里弄到的走私品，在科西嘉岛匪徒的参与下，被运送到法国，然后再把“商品”运到美国，交给他的保证人“我们的事业”。后来康格交了10.8万元的保证金，才被释放。

大不列颠也成了黑手党活动猖獗的地方。1960年这个国家通过了一项允许赌博的法律。于是一下子在英伦诸岛就出现了1300家赌场，其中有300个在伦敦。1965年5月，内务部长卡拉根说：“赌徒都乘坐大型喷气式客机从世界各地云集伦敦。这些做黑生意的人都在美国刑事犯罪分子所控制的赌场上狂赌。”“我们的事业”及时得悉了大不列颠通过了这条关于赌博的法律，便毫不迟疑地利用了这个机会。费城的黑手党头子安杰洛·布鲁诺控制英国赌场。1963年他飞抵伦敦，想弄清楚在这里做生意的可能性。如今他已被公认为是这些赌场的无冕之王。

无数的事实证明，黑手党同样盘踞在西德。在慕尼黑出

版的《南德意志报》，在其1974年1月13日至14日的一期中报道：于是，两年以前，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用电传机向联邦刑事警察组织发了指示，下令逮捕38名在法兰克福的意大利匪徒集团的成员。刑事警察局的工作人员，窃听了匪徒们从他们设置在离中心火车站不远的一家小酒馆的总部里打出来的电话。了解到这些黑手党分子的全部计划，其中包括通过电话雇人进行暗杀活动。

后来才弄清楚，是意大利驻什图加特领事通知了西德警方说：有几十个意大利匪徒已在卡尔斯卢厄和巴登·巴登定居下来，并和那些控制着赌场的大商行合作共事。

科隆的一家叫做《资本》的经济杂志，在其元月份的一期上写道：“刑事犯罪分子的合法联盟的触角已经延伸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黑手党通过非法安置意大利工人劳动就业，从贩卖人口中大赚其钱。他们贩卖毒品，部分地控制了水果和蔬菜的批发交易和收购，卖盗窃来的艺术品，并向意大利的商人和侨民强征“保护税”，从而经常让人们想到他们的存在；最后他们还靠狂赌和卖淫业大发横财。

在澳大利亚也发现了黑手党。1964年1月18日夜，在墨尔本响起了黑手党用来进行报复的传统武器鲁巴拉犬吠般的枪声。被杀死的是39岁的安东尼奥·莫纳科。他是一个大批发商，向墨尔本最大的市场“胜利女神”市场昆士兰州和塔马尼亚岛供应水果和蔬菜。就在这里，黑手党以它传统的风格开始了他的活动。“荣誉社”想用这次凶杀向其它犯罪集团表明，它已夺取了对这个地区的最大市场的领导权。

自1958年以来，多梅尼科·意大利扬诺一直是控制“胜利女神”市场的黑手党“家族”的老板。这一家族从每公斤转运的

货物上抽取1%的好处费，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个市场商品的年周转量估计为4500万吨。1962年意大利扬诺寿终正寝。由于继承问题发生了激烈争吵。意大利扬诺的亲密朋友和继承人，37岁的温琴佐·安吉列达于1963年4月4日被打死。半年之后，另一个这一权位的觊觎者多梅尼科·德马尔泰也被鲁巴拉打翻在地，但是他没有被打死。他忠实地恪守黑手党第一条戒律。当他在警察局被询问时，他始终守口如瓶，一言不发。

黑手党分子在加拿大活动特别猖獗。在这里，美国的“我们的事业”建立了一些分支。黑手党分子除了进行传统的敲诈勒索外，也不放过钻进这个国家合法商界的的机会。譬如，警方查明，举世闻名的蒙特利尔的“克劳恩安全公司”的各个商行和多伦多的“L·D”电气产品公司的各个商行都是黑手党的企业。“克劳恩安全公司”属于阿巴拉琴匪徒会议的参加者卡尔明·加兰特。他用这家公司掩护贩卖毒品。而掌握另一家公司的是，黑手党分子阿尔伯特·迪·帕尔马。同时他还为妓院贩卖姑娘。

“我们的事业”向加拿大大力渗透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了探讨这个问题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警方首脑温尼别加就这个问题发表讲话时说，黑手党在曼尼托巴省的影响越来越大。东海岸的蒙特利尔和西海岸的温哥华被认为是“我们的事业”的主要中心。座谈会结束时，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警方的所有部门联合一致，群策群力去同黑手党作斗争。然而这个决议仍然是纸上谈兵而已。

两年之后，即1967年，人们才弄清楚，蒙特利尔已经成了乔·帕南诺黑手党“家族”运送毒品的转运点。在维托·杰

诺维塞死后，他所领导的托马斯·埃博利“家族”和斯特凡诺·加马迪诺“家族”也在蒙特利尔弄到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在加拿大，如同在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只要为犯罪率增长所创造的理想的和适宜的社会条件不改变，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就会层出不穷，日趋猖獗。

冷漠的社会

美国社会，也可以说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有一个首要的座右铭，这就是：“要发财致富！”因此犯罪和暴力不仅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且显得光采荣耀。英国《每日论坛报》记者报道了他访美的情况：天黑以后，在曼哈顿散步，正象在美国很多其它城市一样，不能说没有危险。在美国每走一步，都要冒着钱包被盗，贞节被辱和生命被害的危险。每逢晚上坐在电视屏幕前，你的血会因屏幕上的残忍和暴力在血管里凝固冷却。一连几小时演员们都竭力象野兽似地战胜对方。也许正是这种对人们心理的恶性刺激促使其良心的泯灭。

真的，社会舆论的工具确实能使很多公民的良心泯灭。在纽约的奎因斯区调查的结果引起了很大轰动。就在这个区的大街上歹徒一刀子杀死了一个28岁的姑娘。受害者曾反抗了35分钟，当时至少有40个人亲眼目睹了这一暴行，但是他们却没有一个人给警察局打电话报案。社会学家就这次暴行向一些目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去帮助这个受害的姑娘或者给警察局打电话？这些目击者却回答说：“连我自己也不知道。”“那一天我太累了，我自己的事还管不完呐！”“我从来不管别人的闲事！”

近十年来对于每个美国人来说，成为严重犯罪受害者的危险性增加了1倍。1969年在美国发生了一万多起凶杀案。被盗金额达6200万美元。有87万多辆汽车丢失。1969年强盗式袭击的数字和前一年相比增加了13%，和1960年相比增加了160%。美国司法部新闻秘书在评论到这个惊人的数字时说：“谁也无法推测出犯罪率增涨的趋势，而犯罪率增长的原因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最大的谜。”

就这样，司法部拒绝承认有组织犯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而它之所以拒绝承认，是因为这会使人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存在产生怀疑，所以当局便回避问题的实质，却宁愿正视“事实”，并对犯罪的发展趋势表示哀叹。1965年7月，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委员会在其报告中说：“通过对犯罪材料的分析，你会看到犯罪的惊人规模以及犯罪对美国生活的所有的影响范围。在美国的一些城市里，有一些区，那里有一半居民因为害怕被抢劫，夜晚不敢外出；有三分之一的人避免和陌生人交谈；有五分之一的人精神不安，一直想着搬家。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自卫都买了一枝火枪。仿佛封建时代一样，看家犬又成了时髦的东西。”

与此同时，该委员会得出结论说：遗憾的是，应当承认，统计数字表明，犯罪率在不断上升，而且这个统计很不全面。例如，恶性案件的数字急剧增加，但受害者并没有向警方报案。这个统计数字也没有把那些欺骗顾客和商人的犯罪计算在内。而这些人毫不怀疑自己受到了蒙骗。此外侵吞别人财产、人为的哄抬物价、隐匿财产、偷税漏税、贪污受贿等等，所有这些违法行为都可以使得刑事犯罪的数字大大地增加。

一个美国记者对联邦调查局的这个报告发表评论说：“对

于美国来说，暴力和残忍正象除臭剂和止疼片一样，成了美国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身旁就有犯罪现象

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终日就生活在犯罪现象的旁边。他的私人财产，他的生命和健康每天都在遭受威胁，但是对此他却安心忍受。1972年12月18日《新闻周刊》以“身旁就有犯罪现象”为题发表文章，其中写道：她是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上了年纪的妇女。这种人在城市里总是无声无息地消磨着自己的岁月。在旧金山，她住在声名狼藉的坦麦伦区的一家便宜的旅馆里。她的朋友是那些经常聚集在大厅内电视机旁的房客们。她每天上街到最近的一家小型自助餐厅去吃饭。有一天晚上，当她回家的时候，在大街上被人袭击，遭到了毒打和抢劫。自此以后，她每时每刻都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她连续数日，白天和黑夜，老是木然地呆在旅馆的大厅里，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旅馆里的房客。后来她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当她的老朋友或熟人想来看望她时，她却拒绝开门，害怕其他生人和他们一起钻进她的房间。后来，有两个星期没有人看见过她。最后，旅馆的服务员决定爬进她的房间里，以便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当她的房门被打开时，他们发现，这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四肢伸开地躺在地上，她已死了一个星期。在她的死亡证明书上写道：她死于精神紧张而导致的胃溃疡穿孔。胃溃疡是经常吃不饱的结果。而死亡的真正原因是恐惧症。

这家杂志的意见是：广泛肆虐的犯罪活动已经成为各地

的普遍现象。对于美国人来说，大门上安装把锁已是司空见惯之举。而晚上都拒绝出去打桥牌，最多只能打到太阳落山；在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上，不换零钱也成了习惯。至于高等学校设立武装警卫，也成了平常事。总之，几乎所有的人都经常存在一种不安全感。

《新闻周刊》接着写道：美国人和犯罪现象生活在一起这一事实，证明了人们对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的不可思议的适应能力。为了安全地在美国现代街道上行走，只有交通规则已经不够用了。还需要遵守一系列专门的防护措施。比如，要尽量离幽黑的门洞远一些。走路要走在人行道的边上；要随身带着第二个钱包，里面大约放五元钱给强盗们准备着；在接近自己家门时，要把钥匙准备好……一个名叫加勒马的居民对记者说：“如果我在街上偶然碰到一个年轻人时，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他的鞋子。”据他说，流氓都穿网球鞋，似乎是这种鞋能帮助他们更快地逃离犯罪的现场。尽管有很多防护措施，但是这个人还是被抢过两次。他说：“我的运气还好，这两次只受了点轻伤。”有很多遭到抢劫袭击的受害者都说，很想买枝枪。然而当局却一再警告，说什么对他们来说，保存武器不是什么自卫，而是更大的危险。而这些受害者一如既往不听当局的劝告，照买不误。很多人对“我的家就是我的要塞”这一俗语心领神会。在华盛顿的泰贝尔·艾伦特大街建造了一座非常讲究的摩天大楼，共有820套住宅，昼夜都有武装警卫把守。每个居民都有两个专用的通行证。一个是去汽车房，而另一个是乘坐电梯。此外，每一层楼的入口处都安装有特殊的锁……卡尔文·蒂尔顿和他的妻子梅丽住在普雷塞季奥·海特斯贵族区。这里，不久前一伙撬锁贼一

次把整个房子里的东西洗劫一空。用大篷车运走了房子里的全部陈设和财物。于是蒂尔顿夫妇给自己的房子安装了一道厚厚的铁门，又额外装上了几把锁和外部传话装置。蒂尔顿还设计了一个能够辨认出任何来访者的声音，看得见其外貌的巧妙的装置。

那么国家呢？警察呢？《新闻周刊》的看法是：尽管在美国各个城市，开展了全国性的、规模空前，耗资巨大的打击犯罪活动的运动，但是在这方面对国家和警察局不应有什么特别的奢望。警方每年从国家领取的资助金约为8.5亿美元。警察的数量也在增加，而且都是用非常完善的新技术装备起来的，如直升飞机，袖珍计算机和无线电电视装置以及其它的巡逻装备。但是商人和房产主都认为，当局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是不够的。正是他们通过建立私人警卫部队和精巧的信号系统，促进了这一工业新兴部门的繁荣。普通公民在自己的街区建立自卫队，轮流在他们所住地区巡逻。不过，老实说，这些防范措施收效甚微。

狼狽为奸

尽管警方拥有袖珍计算机和直升飞机，但是警方仍然非常软弱无力。当然，这不是偶然的。在纽约，凶杀案的侦破率一年之内从83.3%减少到78.1%。纽约刑事警察督察员约瑟夫·麦克拉费南辩解说：“我们必须调查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犯罪活动，而不能只找杀人犯。”

这位督察员对某些警方人员和罪犯之间，象以往那样，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却只字不提。1968年12月《生活》

杂志写道：在芝加哥的21个区的10个区内，“我们的事业”都定期向反抢劫和非法赌博处的领导官员行贿。今天，阿尔·卡帕内仍象颇有声望的电影明星博良和克莱达那样遐迩闻名，倍受欢迎，而他的继承人至今仍然大权在握。1963年夏天，在芝加哥召开了民主党代表大会，推选美国总统候选人。当时约翰·达尔科的名字也被列在代表名单里。此人最初作为一个小黑手党分子在阿尔·卡帕内匪帮里开始了他的生涯。30年代“换代”以后，“我们的事业”派他出席伊利诺州的代表大会。1951年达尔科进入了芝加哥市政厅。他把“我们的事业”里的很多罪犯，都列入市政管理局的领工资者的名单里。最后达尔科领导了芝加哥最重要的第一选区，终于成了一个最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除此之外，他还当上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委员。芝加哥市市长、民主党最有力的人物戴里公开说，约翰·达尔科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达尔科决定不参加芝加哥民主党代表大会，他认为派他的心腹维托·马尔楚洛去那里更为合适。顺便说明一下，马尔楚洛也是一个黑手党分子。那么当局怎么样呢？当局采取了坚决的行动。不过那些行动不是用来对付犯罪分子，而是对付那些聚集在民主党大厦旁边，抗议美国东南亚政策的人。在一个专门委员会的调查当时在芝加哥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的报告里，寥寥几笔指出了身穿官服的人们的过分的残忍。而一个外国记者却比较准确地描述了这些事件。一批一批的警察连续两个晚上对这个大城市进行恐怖活动。在法律的掩护下，不受惩罚地从事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从严重伤害人体到肆意抢劫。

美国警察对进步力量，其中包括对黑人运动所采取的恐

怖活动，助长了有组织犯罪活动。这种恐怖活动似乎转移了警察的注意力，使他们忘记了他们的主要责任就是保护公民的权利。但是“我们的事业”并不威胁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拉尔法·萨列尔诺在70年代初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黑手党的研究文章。根据他的看法，“我们的事业”至少帮助了25个人被选进了参议院当参议员。而伊利诺州有15名议会代表被“荣誉社”完全收买。萨列尔诺查明，新泽西州的候选人科尼利厄斯·加拉赫尔是黑手党分子乔·齐卡列利的朋友。而更为有趣的是，加拉赫尔是议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对同有组织犯罪进行斗争的各个机构进行监督！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克雷斯教授的估计，在美国花费在选举运动中15%的经费是“我们的事业”提供的。不久前他得到这样一个消息：众议院主席的私人顾问迈克尔米克和他的一个当律师的朋友，就代表着一个为旅馆提供各种供应物品的黑手党康采恩的利益。迈克尔米克还利用自己的影响释放了两个被判刑的黑手党分子。

当时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支持把警方的经费增加6100万美元，而且在1970年7月29日签发了在首都华盛顿加强和犯罪现象进行斗争的法令。这个文件是各州类似法令的基础。1971年1月29日总统签署的这个法令生效。它使警方有可能把“嫌疑分子”放在“拘留所”里拘留60天，并扩大了警方窃听电话的权利。但是很快表明，这个新的法令对“我们的事业”没有构成任何威胁，而美国当局却开始广泛利用这个法令，去反对国内的进步运动，更加残酷地镇压进步力量的示

威活动以及美国黑人战斗组织的兴起。

不言而喻，“我们的事业”这个有组织犯罪的秘密团体，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土壤上，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条件下才能够产生和蓬勃发展。在美洲大陆有一个国家，其国内已经彻底消灭了有组织的犯罪。这一点之所以能够成为可能，并非是由于警察和司法机关人为的作用，而是由于改变了社会关系。

1959年1月1日在古巴发生了革命。深受人民欢迎的起义者进入了哈瓦那市。在此之前幸运人卢恰诺和迈耶·兰斯基已经也在这个岛上建立了自己的王国。政权的更迭使匪徒们丧失了收入的来源。如果说在独裁者巴蒂斯塔时代，一个黑手党分子只要25万美元就足以可以买到10个赌场的拥有权，而革命政权则禁止赌博，绝不同他们搞任何交易，所以在巴蒂斯塔政权垮台后不久，来自“我们的事业”的匪徒们就从古巴跑了出来。昔日黑手党的赌场都变成了人民的财产，并改建成工人俱乐部，成为劳动人民休息的场所。

社会主义的古巴，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拥有庞大的警察机构和现代化技术的美国所无力完成的事情。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消灭犯罪现象，并永远铲除犯罪的根源。

代 结 束 语

70年代“荣誉社”又一次经历了缓慢的权力更迭时期，而就在一年代的末期，作家克劳斯·波根和霍斯特·茨波尼克完成了自己对黑手党发展史的调查研究。

近十年内，几乎所有那些在1931年使黑手党“美国化”的“先生”们都退出了“舞台”，其中一些人已经安然长眠于九泉；另一些人则不明不白地，或在无法说清的情况下告别了人世；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受之无愧”地休息了。

第一个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是权力无限的“王中王”萨尔瓦托雷·卢恰诺。尽管意大利当局对其监视严密，但直到最后一天，他都没有停止自己的犯罪活动并一直同大洋彼岸的“弟兄们”保持着密切联系。

为这个大名鼎鼎的黑手党头子所举行的葬礼的盛况，是历代威严的国王执政以来，拿不勒斯从未有过的。1962年1月28日，豪华壮观的送葬行列缓慢地穿过全城。四匹披挂着闪闪发光的金挽具和金线绣花马披的高头大马，拉着镀金的灵柩台，上面放着用花山覆盖的，昔日权大无比的黑手党头子的遗骸。第二天，深受敬重的红衣主教格维多·萨恩·马尔金诺在位于塔索大街死者的别墅里，为卢恰诺做了安魂弥撒，而且只邀请了黑社会的头面人物。遵照死者的意愿，他的骨灰被运到美国，并于1962年2月7日安葬在纽约附近的

圣约翰公墓。在墓穴上只刻下了一个“卢卡尼亚”，幸运人就是带着这个姓氏问世的。

1946年从卢恰诺手中接过其“事业”，并定期把一份靠犯罪买卖赚来的钱，送给自己的伙伴卢恰诺的弗兰克·科斯泰洛，于1973年2月，因心肌梗塞而过世，享年80岁。这个匪首的真名叫弗兰切斯科·萨维里奥。这一点，还是在他死后，社会公众才知道。

维托·杰诺维塞先生1969年因心脏病急剧发作而死于斯普林菲尔德监狱。他是由于走私毒品于1959年被囚禁在这里的。当局所以能把这个对数千人的生命负有罪责的匪徒关进牢房，只是因为杰诺维塞的竞争对手，用10万美元买通了一个小刑事犯波尔索，让他出庭指控维托先生。

卡洛·冈比诺先生对自己为夺取“我们的事业”的最高王位而搞的血腥阴谋所获得的成果，也没能享受多久。1976年10月，美国黑手党这位76岁的“教父”，也因心脏病发作去了另一个世界，离开了自己位于纽约科尼——爱伦区价值数十万美元的奢侈住宅。当时，各个国家的一百多家电视广播公司，播放了卡洛先生国王般的葬礼盛况。“我们的事业”的所有精粹人物，都出席了在布鲁克林区圣玛丽亚教堂举行的盛大安魂仪式，然后一望无际的黑色高级轿车的行列，为这位“王中之王”送殡，伴他走完最后一段路程。在临葬的致词中，对死者的“功绩”和“伟大人格”大肆颂扬，将其吹捧为爱国主义者、慈善家和为学术和文化事业提供钱财的赞助人。

此后不久，在离纽约肯尼迪机场不远的一家不大的旅馆里，所有各“家族”的先生和委员们都拥戴新王卡尔米内·加兰蒂登上“我们的事业”一度空缺的宝座。根据研究美国黑手

党专家的看法，这一选择是在“我们的事业”中一位颇有影响的匪首乔·帕南诺的支持下实现的，因为加兰蒂被认为是帕南诺在纽约“工作”时期的左右臂和挚友。而且乔·帕南诺的儿子萨尔瓦托雷·帕南诺就是黑手党的这位新的王中之王的律师。

同维托·杰诺维塞一样，加兰蒂总把自己装扮成一条“小鱼”，尽管他在美国有组织犯罪界，有着庞大的联络网和显要地位，但却尽量不引起当局和警方对他的特别注意。曼哈顿上等人居住区的邻居们，都知道加兰蒂是个谦逊而令人敬重的商人，是一家化学干洗店的老板。每当这位满头苍发，身穿出自高级裁缝之手的服装的先生沿着东河岸溜狗的时候，谁都想不到，同自己并排而行的，乃是一个极为险恶的匪徒。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他亲手就杀死了一百多人。

1978年卡尔米内·加兰蒂因被指控走私毒品曾蹲了一段监狱。在纽约的中心监狱里，狱方的看守和这位黑手党先生武装到牙齿的私人卫队，都同样尽力地守护着加兰蒂。

1979年7月12日，加兰蒂同自己的贴身保镖和亲信，一起在曼哈顿一家意大利人开办的、舒适的饭店的凉台上吃饭，突然来了四个头戴面具、手执自动武器的陌生人打断了午餐……当警方赶到现场时，这位昔日的重量级拳击运动员，昔日的“杀手”，昔日的美国黑手党的“王中之王”，外号人称“雪茄迷里洛”的卡尔米内·加兰蒂已经脸朝下趴在石板地上，在他身旁，心爱的雪茄还在冒着烟……人们怀疑这次谋杀是安杰罗·达拉克洛切干的，此人系“我们的事业”最高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是同加兰蒂争夺美国黑手党最高权力的对手。

1980年3月，69岁的安杰洛·布鲁诺被人打死在自己的汽车里。此人一直是费城“家族”的族长，控制着新泽西州的世界赌博新都——大西洋城。一个月之后，警方发现了布鲁诺的一个亲信的尸体，此人参与杀害了自己的族长。法医从上面取出十四颗弹头的尸体，被塞在一个塑料袋里，里面还装了几张撕成两半的，票面为20美元的钞票，按照“新”的黑手党的习俗，这意味着死者表现了过度的贪婪。警方认为，杀害安杰洛·布鲁诺的原因是，布鲁诺家族同如今由波尔·卡斯泰拉诺领导着的纽约冈比诺家族，在大西洋城的赌博业方面，产生了利害冲突。这就说明，“荣誉社”自存在以来的多年里，它同社会相互关系的性质，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俗话说：换汤不换药。黑手党一代代的更迭换班，实际上并未触动其神圣之处——组织结构和习俗成规。而且随之而来的，始终是犯罪买卖范围的拓展，投资范围的扩大以及“工作方法”积累的增加。从传统的小型敲诈过渡到高级形式——“上流的”或者说是“白领阶层”的犯罪。现代的“我们的事业”联盟由24个家族组成，联合了近五千名成员，其事业的总周转资金，据美国司法部的谨慎估计，达12000亿美元之多。让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具有5350万人口的法国，其每年的国家预算才大约是这个数字的一半。

当然，要靠万能钥匙和金属撬棍或者自动手枪谁也搞不到这样的资财。当代黑手党的主要力量在于，把从犯罪活动搞来的暴利，用于合法买卖的扩大再生产。纽约前警察局局长拉尔夫·萨拉诺有一次说：“一桩大买卖没有黑手党的效劳是不会成交的。是我们亲手播种了孳生强盗行径的种子，黑

手党只是收获而已。”

1978年，一个有组织犯罪专门调查委员会确认，黑手党分子把通过犯罪手段搞到的钱投资到46种合法生意之中。据美国司法部的资料表明，“我们的事业”拥有十万家公司的股票，其中包括煤炭、石油、冶金、汽车制造等行业，其全年成交额超过120亿美元。这些公司及其他许多行业的，数额为一万美元的股票，都在“我们的事业”手里。

著名匪徒阿诺德·罗思坦开导自己的同行说：“罪行只有在不是用枪，而是用脑子完成的情况下，才具有意义。”所以，黑手党分子通常都装扮成生意人為自己捞取好处，他们的犯罪活动都蒙上了一层令人敬重的外形。1976年末，《合众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载文说：“如果在不同程度上都同暴力有关的赌博、高利贷、贩毒、工会讹诈等，以前被认为是黑手党的传统行当的话，那么如今黑手党则选中了比较文明的掠夺手段。新型黑手党分子一般不再持枪撞进银行，而是从正门而入并受到门卫颇有礼貌的欢迎。他们大搞欺骗勾当，出卖伪造的钞票和有价值证券，支付空头支票，并从银行强行搞借贷。如今黑手党经常是不放一枪就夺走了整个公司和企业。”

近年来，“我们的事业”成功地熟悉了对其来说是一门新的活动领域——银行业。年轻一代的黑手党人借助大学文凭，一下子就控制了华尔街，从而向黑手党父辈表明，今天强大的实力不在于有多少钱，而在于有多少有价值证券。有了这些证券就可以买进、卖出和创造各种公司和银行。如果把有价值证券也可以伪造估计进去（而且黑手党早就得心应手地掌握了这一手艺），那么伪造有价值证券对新型黑手党分子也不算怎么复杂的事。1976年瑞士的《世界周刊》报道说，美国

黑手党往瑞士“输入”了一千张秘鲁一家公司的假股票。根据提供的文件表明，这家企业的资产为40亿美元，每份股票的相应行事价格被定为6.5万美元。后来，只是由于苏黎世警方及时揭露了这一欺骗行为，才防止了这次为数2.5亿美元的诈骗活动。

1977年初，美国国会的一个下属委员会获悉，在国内和海外（主要在瑞士和比利时）黑手党所控制的银行里，存着偷来的和伪造的有价证券总金额竟达250亿美元！

黑手党在外汇方面的捣鬼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美国记者杰克·比坎曾试图深入探索“我们的事业”在这方面活动的秘密。1973年元月22日在巴勒莫机场，他遇上了一个名叫安杰里诺的人并谈妥以5000美元的代价，从他手里搞到一份关于黑手党大规模搞外汇非法勾当的文件，而且上面指明具体执行者及其头目的名字。但第二天比坎就被绑架并被押解出境，送到了芝加哥。在这里黑手党分子对他审讯了好几个月，还使用了麻醉剂。1974年初，意大利警察局的中士安杰洛·索里诺被人打死在巴勒莫街头，后经比坎辨认，此人就是那个安杰里诺。“比坎事件”最后以这位“过份好奇”的、胆敢探查“我们的事业”外汇活动奥秘的记者被解除工作而结束。

随着电子计算技术在银行业务中作用的日益扩大，黑手党分子开始用更加“高贵的”手段撬开保险金库：用电子计算机取代他们过去使用的黄色炸药和复杂的钳工工具。要实现上述目的，犯罪分子只要窃取到带有银行情报的程序将其破译，然后将必要的资料输入到计算机里就足够了。上述活动，对拥有大批技术精湛的“顾问”的黑手党来说，一般情况下并

不费什么特别的力气。美国的“太平洋系统电子公司”副董事长说，同在银行电子计算机方面搞鬼有关的犯罪活动，每年要使美国的商业活动付出3亿美元的代价。

经济犯罪乃是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最高形式，是“古典”匪徒们望尘莫及的。那些“白领阶层”的犯罪分子，只用坐在写字台或电子计算机前，就把银行数亿美元的保险库洗劫一空。与此同时，那些一般匪徒则冒着被判长期徒刑，甚至关进毒气室处死的风险，去搞武装抢劫，而得到的金钱则要少得多。根据美国司法部的看法，“白领人员”的犯罪分子每年要盗窃约两千亿美元，其中最大一份落到了“我们的事业”的手中。要知道，这个数字几乎是美国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

“我们的事业”所经营的非法商业活动中，最赚钱的行当之一，是走私毒品。据美国出版的资料表明，1980年有4600万美国公民花费250亿美元用于吸毒，比1974年增加了50倍。继墨西哥政府使用效力极高的除草剂，组织毁掉了非法种植的毒品原料——印度大麻之后，哥伦比亚又成了向美国黑市提供这种毒品的最大的来源地。“我们的事业”利用当地居民的一贫如洗，促使他们扩大大麻生产。这并不要求黑手党分子费多大力气，因为种植印度大麻对哥伦比亚农民来说，其收入要比种植咖啡和棉花高出五六倍。目前，在哥伦比亚这种毒品的种植面积大约有20万公顷，而该国依靠非法经营毒品的收入已超过其传统出口商品——咖啡的销售进款。然而，从中获利更大的是“我们的事业”，其批发商人每公斤大麻给当地农民10至12美元，而在美国市场上一公斤这样的毒品的零售价，大约140美元。

世界上最大的可卡因黑市的提供者是秘鲁。在玻利维亚

和厄瓜多尔也分布有大量的古柯种植园。而哥伦比亚，则是黑手党把可卡因从这些国家运往美国的中间转运站。在这里，古柯叶在秘密的地下实验室里，先被加工成膏剂，然后经过处理变成晶体。据《时代》周刊的资料表明，每年有大约100万美国人购买可卡因，其总金额为200亿美元。从拉丁美洲农民手里以120至140美元搞到的一公斤毒品，在美国的零售价是1.6万美金。

海洛因如今已经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象征。西西里的黑手党（“荣誉社”）和美国的“我们的事业”向每天要吸食海洛因的西欧大约20万和美国、加拿大约100万居民，提供海洛因。除此之外，还有60万左右每周服用三次的买主也购买海洛因。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商品象海洛因这样赚钱。在黑市上，其批发价每公斤在8000到1.2万美元之间浮动，而零售价则高达100多万美元。

西西里很早以来就是海洛因走私通道之一。近年来，由于国际政治新的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南越傀儡政权的垮台，这条通道的作用便大为提高。一些美国黑手党分子以经济顾问的面目，于六十年代初着手在东南亚，以工业化手段垦植大片的鸦片种植区。“我们的事业”和自己犯罪生意的老伙伴——美国中央情报局协调行动。在这些地方，通过公开的恐怖行动；在那些地方，则依靠威胁、恫吓；而在另一些地方，又借助收买手段，从而在六十年代中期，在该地区把鸦片的产量提高到800吨，比1952年高20倍。美军在越南战争中失败后，“我们的事业”不得不转移到近东的“金三角”地区。但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使意大利——美国黑手党的走私买卖受到了明显的打击，因为革命政府于1978——1979年

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旨在压缩罂粟的种植面积，建立对鸦片生产和销售的严格管制。黑手党打算利用东南亚“金三角”地区老的毒品原料产地的企图，最后也以失败而告终。纽约“家族”派往泰国同当地批发商人建立联系的三名密使中，只有一个人奇迹般地侥幸溜走。在“我们的事业”这个昔日的王国里，早有一个华人黑手党——“三合会”牢牢扎根于其中。这个秘密犯罪集团的特征是，比意大利——美国黑手党更隐秘，互相包庇的法规更加严酷。它大约在三百多年前产生在东南亚，在自己多年的存在中，完全垄断了这一地区的犯罪生意，并在香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秘密的、设防极严的王国。

当今的黑手党头子弗兰克·蒂耶利，菲利浦·拉斯泰利，安东尼·科拉洛和卡尔米内·贝尔希科正干得挺热火。驾驶员、海员、无线电电子设备和通讯专家，港务人员和雇佣杀手形成一支完整的大军，都为黑手党的秘密航线效劳。尽管美国当局每年都是从走私分子手中查获数千吨毒品（1980年没收了2500吨大麻，170公斤海洛因；1979年没收3300吨大麻，460公斤海洛因），但黑手党的黑货却很少成为当局的猎获物。这一点首先应归功于，《禁酒法》时期黑手党逐步完善起来的，搞走私的巧妙策略；其次是美国政府以优惠条件向自己的公民提供的极好的运输条件——从高速快艇到B—26轰炸机；最后应归功于极为现代化的电子设备。在黑手党的运输船只上，设置有红外线夜视器；飞机上安装着能发现地面雷达监视站的电子仪器；各指挥点也配备有技术设施，黑手党分子从这些指挥点，领导着接收走私货物的行动，而且各个点上的设备，不亚于弹道火箭的发射台。所以，指挥着海

防军的海军上将约翰·赫恩的话便不难理解了。他曾抱怨说：“当局能抓获的只不过是运进国内毒品的十分之一而已。”

同昔日美好的《禁酒法》时代一样，如今，在海防军的舰船同黑手党分子之间，经常发生真正的海战。1977年洛杉矶警方首脑曾要求市政府拨款购买潜艇以便同走私分子作斗争。但是，无论如何，那怕是最现代化的潜艇或火箭快艇，都无力对付黑手党久经考验的武器——贿赂。一次付给替“我们的事业”效劳的美国海防军官员的贿金，就达15000美元之多。

在已往的十年里，意大利西西里的“荣誉社”和美国的“我们的事业”之间的关系更加牢固、亲密。据意大利的《时代周报》报道，从1970年至1979年底，仅西西里黑手党分子的杀人数字就增加到一千，其中一半左右出自巴勒莫黑手党分子之手。“新型黑手党”的“枪手”的履历表上可能填满了“下落不明”或“死因不明”之人的名字。然而这种刑事犯罪的统计数字的最大特征，并不是死于黑手党手下的人的惊人数量，而是他们的社会构成。近年来死于“枪手”之手的人中间，有政界头面人物，社会活动家，司法界和警方代表、高级官员和工业、银行巨头。关于“荣誉社”的荣誉法典规定，从来不准黑手党徒杀害代表政权、法律和秩序的人物的这一观念，已经过时。如果说传统的黑手党认为，对那些不听话或执拗的人，还是要先说服一下为好，那么新黑手党则干脆把他们除掉，而且明目张胆，残酷无情，好让其他人也胆战心惊。正是这种恶运落在了莫洛·德·莫洛的同事，著名记者马里奥·弗兰切斯的头上。他于1979年1月底，在没有接到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突然被“枪手”所杀。

按米兰记者维托里奥·斯吉拉尔的说法是，黑手党打仗时从来不发“信号”，故意让人注意的作风不合它的心意，而且黑手党也从不随意杀人，它总是猛烈打击威胁其事务或阻碍其事务“正常进程”的人。

1980年8月6日，就在西西里首府的市中心卡沃尔大街，新黑手党的“枪手”朝巴勒莫总检察长、64岁的盖塔诺·科斯杜开了枪。在此事件的前三个月，科斯杜批准了对56人判决前的起诉羁押。这些人因涉嫌是黑手党和参与贩毒而被扣押。在签发逮捕证时，这位总检察长说：

“五天前，即5月4日，宪兵上尉埃马努爱里·巴吉利被人打死。这一罪行令人清晰地想起了另一起罪行——警官助理包里斯·朱利亚诺的被杀。根据这两起案件来看，犯罪分子都是要力图除掉掌握真相的人……”

这一系列暗杀事件的序幕是发生在1979年6月21日的一件事。这一天，一位警方上士在巴勒莫机场大厦里发现了两个带着大批美元的“外交官”。于是，这位48岁的巴勒莫警察局行动处的长官，曾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反毒品处实习过半年的包里斯·朱里亚诺，便开始对这笔60万美元的主人，进行全面调查。经验表明，携带如此巨额现金旅行，一般都同走私毒品有关，所以朱里亚诺当即把在巴勒莫机场查到60万美元一事，通知了美国同行，并对可能在那里发现走私结算线索的银行的存款手续，进行了细致的清查。很快，一条线索把警方引向了贝科利·吉拉迪大街五号。这是一幢座落在小手工业者和贫苦人居住的安静的街区的楼房。警察们收获可不小，搜出四公斤纯海洛因、十枝手枪和卡宾枪以及不少子弹，还有一个笔记本，上面记有用代号标记的电话号码，此

外还有一个黑手党“家族”的大批彩色照片。这座房子的主人叫列奥鲁吉·巴加列拉。此人以黑手党首脑卢卡诺·里乔的左右臂而鼎鼎有名。

掌握了事实后，朱利亚诺便得出结论：里乔“家族”把搞绑架弄来的钱用于走私毒品。

根据最新资料表明，黑市上卖出的海洛因的三分之一都要通过西西里。意大利警方估计，卖出这个数量的毒品所得的收入每年约20亿里拉（等于意大利全部黄金本位储量的40%左右）。1980年，鸦片原料收获量，据专家估计为1600吨，从中提炼纯海洛因60吨。美国和西欧反毒品专家怀疑，在西西里、米兰和意大利的其他一些城市，暗设有对鸦片原料进行化学加工的大型中心。而正是包里斯·朱里亚诺通过抓获了一名专门从事吗啡加工的土耳其化学家，才首次证实，在西西里岛上有一个对毒品原料加工的大型中心。

巴勒莫的这位警官助理转给美国的一些情报，不仅支持了上述说法，而且弄清了美国黑手党内部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如在布鲁克林区“乔和梅丽”意大利小饭店，打死“我们的事业”的头子卡尔米内·加兰蒂一事，就是一例。这次谋杀花了五亿美元。美国黑手党把这笔钱委托给自己的银行主米凯利·钦多纳保存。后来，1976年9月3日，钦多纳在美国银行界排第十四位的“富兰克林银行”破产了，这笔钱就失去了下落。钦多纳事件作为国际上狡猾骗子搞的一件大型金融骗局，几乎长时间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大新闻。还是后来于1981年5月底突然爆发的，围绕着秘密的共济会“P—2”分会的丑闻，才使社会公众有可能，以新的眼光看一下这个买卖人的形象。正如调查结果所表明的那样，这个在

意大利最有影响的秘密权力中心，“一直从事着反对意大利共和国”的破坏活动，并得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国统治集团的物质支持和保护。无怪乎该分会“尊敬的师傅”^①杰里曾被邀请到美国华盛顿参加里根总统的就职仪式。在“P-2”的962个成员中，有三名意大利部长，有军队、安全保卫和经济部队^②的高级官员、参议员、国会议员、高等法官、银行主、工业家和意大利黑手党的最高首脑等。

米凯利·钦多纳1920年出生于西西里，后来以在黑市搞小型粮食投机而起家。要不是五十年代受到幸运人卢恰诺的青睐，可能他最终也不过成为一个小律师或企业主而已。自五十年代被重用起，开始了这个精明能干之人的飞速升迁。在米凯利先生庞大的财政王国里，黑手党的钱，经过“漂白”，洗去了“非法”的杂色，然后这些钱再被用去搞交易所和外汇投机，其规模就连那些见过世面的骗子手都咋舌不已。除此之外，还要对那些必须要收买的政府和政党的活动家提供财政支持。1973年意大利爆发经济危机时，钦多纳非法地把500个意大利大工业家和政治活动家的资本转到了瑞士银行，以保护他们免遭货币贬值之灾和逃避纳税。在这位“黑手党银行家”的挚友中，有秘密的共济会“P-2”分会的会长里秋·杰里，意大利内阁总理朱里奥·阿德列奥蒂，意大利参议院主席阿明托雷·范范尼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

在钦多纳破产并被来路不明之人绑架后，深感手头拮据的“我们的事业”的最高委员会决定，加快步伐往美国搞一大

① 共济会中的一个级别。

② 专门同走私和炒卖外汇作斗争的军队。

批海洛因。要在短期内搞一场这类行动，在其组织者面前摆着不少令人头痛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难题，只有非常老练的走私分子才行。而据反毒品部门专家的看法，在美国，当时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萨尔瓦托雷·因杰利洛，约翰·冈比诺和斯帕托拉兄弟三家族。他们分别活动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和新泽西州。也正因此，巴勒莫的警官助理包里斯·朱利亚诺才决定调查斯帕托拉兄弟——因杰利洛——冈比诺在当地合营的“建筑公司”。

1979年7月21日早晨，“舍利夫”（朱利亚诺的朋友和熟人对他的昵称）走进了一家咖啡馆。他习惯每天上班前在这儿喝杯咖啡。可这一回他喝的不是咖啡，却饮了黑手党枪手的子弹。

审判员切查利·泰兰诺瓦一直负责调查这一案件。这位巴勒莫检察机关的普通侦查员所以一举成名，是因为他揭露了西西里黑手党领袖卢卡诺·利乔，并准备起诉判处这个外号人称“无面人”的人终生监禁。泰兰诺瓦后来曾作为意大利共产党提名的独立左派分子，两度被选进议会并参与黑手党罪行调查委员会的工作。

1977年夏天，泰兰诺瓦又返回巴勒莫检察机关工作，继续朱利亚诺开始的调查工作。但是，1977年9月25日早上，泰兰诺瓦突然被埋伏在他家门旁的“枪手”的子弹击中。

看来，黑手党一直暗中注视着调查的进程，并有条不紊地除掉“关键”人物。后来巴勒莫总检察官盖塔诺·科斯塔继续调查事件真相。

1979年10月18日警方终于找到了绑架钦多纳的人的踪迹。这条踪迹又通向了斯帕托拉——因杰利洛——冈比诺“建

筑公司”。在此之前不久，这家公司的海外伙伴约翰·冈比诺到过维也纳，在这里人们把“米凯利先生”转交给了他。此人就是钦多纳，他是被黑手党徒乔杰弗姆·马加鲁佐和托尼·卡鲁佐搞到维也纳来的。在维也纳会见时，“我们的事业”以保全钦多纳的生命作为交换条件，得到了一份从意大利非法运出货币的五百名身居要职的人员名单。一向不对自己的债户让步的“荣誉社”，这一回仍忠实于自己的准则：大概这张名单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已补偿了钦多纳破产后，黑手党那五亿美元的损失。至于破产者本人，对“荣誉社”已经不再有任何价值，因此他被送到了美国司法机关手里。1980年6月13日，钦多纳以金融投机罪被纽约法庭判处25年监禁。

从与巴勒莫这家建筑公司有牵连的毒品走私和绑架事件开始，线索向前延伸，又涉及建筑行业的大型诈骗、竞争者之间的恫吓和肉体上消灭固执己见的人。同斯帕托拉兄弟、罗查里奥和温琴佐一起，他们的伙伴因杰利洛也被关进了监狱。至于冈比诺的布鲁克林“家族”的成员，意大利警方却鞭长莫及。

1980年3月上旬，米兰警方接到美国反毒品部门同行的通知，其中谈到“埃马努埃尔·阿达米塔去了米兰，注意监视他。”这个专门从事运送毒品的黑手党徒的名字，意大利警方早有所闻。

阿达米塔3月14日到达米兰。第二天就从万采格洛邮政分局寄出了四个大硬纸盒。地址是纽约、7414、布鲁克林大道十八号，收件人为“意大利立体声中心”。此后，阿达米塔同自己的两个哥哥，卫生技术设备和电焊专家多米尼科和安托尼奥去了饭店。米兰警方从这里把这兄弟三人直接押往圣

维托利监狱。在阿达米塔寄往美国的盒子里，警方在唱片下面发现了47个密封焊接的锌制容器，里面装的是41公斤纯海洛因。与此同时，在美国，收件人——“意大利立体声中心”的同伙，冈比诺的两个弟弟朱塞佩和罗查里奥也被逮捕，此外，抓起来的还有他们的亲戚罗查里奥·毕祖托。至于长兄约翰·冈比诺这回却一身干净安然无事。

在发生这些事之后，巴勒莫总检察官科斯塔下令加快侦破速度，并把斯帕托拉兄弟——因杰利洛——冈比诺“建筑公司”和里乔“家族”这两个案件联为一体。

29岁的宪兵上尉埃马努爱里·巴吉利受命调查里乔“家族”。而唯一的调查线索是一张照片，它是过去在搜查贝科里·吉拉迪大街五号那座楼房时发现的。照片上的背景是一座带有游泳池和壮观的花园的豪华别墅，前面是一群黑手党分子簇拥着一个50岁上下的人。此人宽下巴，头发梳理得十分光洁。在寻找这座别墅的过程中，巴吉利在博罗尼亚省的布特里奥顺便发现了一座海洛因大型储藏地。为此，一批黑手党分子被关进了监狱。

1980年5月4日，大约在半夜，宪兵上尉埃马努爱里携同妻子和小女儿参加完市政府举行的隆重宴会后回家。在一条大街上，来自黑手党的“死亡瘟神”已经在等待着他们……

如果说，站在“荣誉社”非法买卖大路中央，挡住其去路的法律和秩序的代表，一下子死于枪手的枪口之下，那么那些给黑手党送来神话般利润的毒品买主，则是由于吸毒而缓缓身亡。1980年初，美国卫生部声称，国内大约有70万长期嗜毒者，其中每年有一万人死于自己的致命恶习。

至于社会上其余一部分人，黑手党则准备好了，让他们

作为毒品买卖的间接牺牲品，比如，据联邦调查局的资料表明，1970年美国发生了7450万起严重犯罪活动，其中包括杀人、武装袭击、强奸和抢劫。十年内，这个数字扩大到1.1750亿，比人口增长速度几乎高七倍。1980年在美国记录在案的恶性罪行大约1200万起，撬锁偷盗310万起，暴力犯罪120万起，抢劫46.5万起，杀人2.3万起。警方查明，这些违法行为的半数以上，犯罪动机是不惜任何代价极力搞钱买毒品。吸毒者一般的经历都是从吸食用几美元就可以买到的大麻开始，最后发展到每天注射海洛因，其价格为每注射一次150到200美元。要靠诚实的劳动挣这么多钱，一个中等水平的美国人，要工作三四天才行。

黑手党不断扩大自己赚钱买卖的范围，打入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些新领域，把影响扩展到一些新地区，而且在自己的活动中，使用越来越现代化和越来越巧妙的方法和手段。

黑手党早就把有组织犯罪的经营转变成了大型实业。不过，无论卡帕内，也无论卢恰诺及其他一些老一代的先生们，大概谁都没有料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种敲诈的收入将会达数百亿美元。谁也没有料到，同“荣誉社”其它一系列犯罪活动一样，即使在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时期，这方面的收入也不会减少。认识这个乍一看来，似乎有些离奇现象的前提，首先潜存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潜存于伦理道德准则的衰退，潜存于资产阶级社会对强权和贪婪精神的培育，潜存于大量新闻宣传手段造成的社会意识迟钝和社会组织的不良发展。由于这一切，同早在美国黑手党初建时期一样，黑手党成员的许多罪行，已经在他们的同胞中，不再引起愤怒和抗议。此外，有组织犯罪收入的急剧增加，

也是同这一组织内部结构的完善分不开的。

在赋予卖淫以普遍化和高度组织化的特征之后，黑手党又从消极的征收“保护费”，转为积极地“刺激需求”。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商活动中，广告是对公众意识进行有目的指导性影响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合法公司一向不惜钱财用于发展这一事业。对有组织卖淫进行敲诈的黑手党分子，通过把宣传自己“商品”的广告，变成高额利润的源泉，又一次使那些搞大型买卖的，老奸巨猾的鲨鱼们大为吃惊。

大约在六十年代开始了淫秽作品的时代。它实际上是宣传黑手党“肉欲商业”的潜力和对顾主施加精神压力的有力武器。今天，为了燃起淫荡的欲火，黑手党吸收了一批由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性学家及其他一些专家组成的，精通本行业务的常备队伍。根据美国出版界的资料，八十年代初，国内淫秽作品的成交额超过50亿美元，其中“我们的事业”占据1/3。

黑手党分子不仅敏感地注视着“肉欲商业”市场行情的浮动，而且千方百计要扩大这一市场。大约270家专门出版儿童淫秽作品的美国杂志，刺激了西方对儿童卖淫需求的急剧增长。于是，黑手党立即对市场的这一需求做出反应，表示愿意向达官贵人提供年龄在5至7岁的幼年女仆。这些小女孩要不就是黑手党分子从穷人手里买来的，要不就是由于天灾失去爹娘，无人照管被黑手党分子所抚养，要不干脆就是拐骗来的。

现代黑手党并非仅能每年制造几百吨毒品，恣意妄为地把人变成鬼，以及直接从美军军械库里窃取武器，用其武装国民，去进行不宣而战、互相残杀战争，它还可以依照

客的愿望，去偷任何一个火箭发射系统或者盗窃用来制造原子弹的铀。1981年初人们才知道，圣路易斯的黑手党分子，就的确曾打算遵照某个国家的意旨，去盗窃停泊在大西洋中美国海军最新的，带有核弹头的潜水艇。只不过是出于偶然，在这一盗窃行动开始前的几天，警方从自己的情报人员那里得悉了此事。在圣路易斯被捕的黑手党分子承认，他们还曾打算发射一两枚火箭，“试试”这个货如何！后来，同出现这类事情后总是如何行事一样，有影响的庇护者暗中了结了这桩不合心意的丑闻。

黑手党在刑事犯罪方面享有法律豁免权的原因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不应忘记违法行为和犯罪现象，一直是建立在人剥削人基础上的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样的社会里，被允许范围的界限不是由法律，而是由官职大小和存款多少而决定的。在黑手党好多世纪存在的历史里，其位居要职的庇护者的大名早已广为人知。但直到七十年代初，对黑手党同政界、联邦和地方政权的关系究竟有多深这一点，却很少有人有一个真实的概念。

“水门事件”发生后，在对美国情报部门的活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揭露出黑手党同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关系。后两者在“同破坏分子作斗争的特别行动计划”中，不仅唆使匪徒打入共产党及其他美国进步组织，而且还让他们搞一些旨在杀害外国政治活动家的阴谋。

1975年6月21日将要传唤66岁的黑手党先生萨尔瓦托雷(塞姆)·甘卡纳，出席由洛克菲勒领导的，就中央情报局参与上述阴谋而组成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甘卡纳在此前一年，才定居在上流人士聚集的芝加哥郊区的欧克公

园。大概这位“芝加哥王”知道自己命中注定不会有一个安宁的晚年，所以他那豪华的别墅安装了装甲门、防弹玻璃和完善的电子信号系统。但在6月19日深夜，上了岁数的老仆人闻到了食品的焦糊味，立即到防备森严的厨房里去，在那里发现他的主人躺在血泊里。他已经被打死，头部和胸部中了六弹，而且是从近处开的枪。炉子上带豆的小灌肠还在冒着烟……任何人，其中包括几周来，一直监视着甘卡纳住处的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都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根据子弹的轨线和死者身体的位置，犯罪侦查学家得出结论认为，这位黑手党先生是被他很熟悉的人打死的，因为他没采取任何保护自己的举动。

下令永远封住这位主要见证人之口的那个人，显然是害怕甘卡纳的供词，把黑手党参与谋杀外国政治家未遂一事，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参议院洛克菲勒调查委员会查明，六十年代初，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赞同支持，早在其前任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所制定的，暗杀一批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解放运动领导的计划，并批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吸收“我们的事业”的先生们参与暗杀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员，因为这些“先生”们的利益在古巴也受到了损害。1961年，前联邦调查局特工罗伯特·梅休同甘卡纳及其左右臂约翰·罗杰里和理查德·赛恩挂上了钩。他以中央情报局的名义对这几个黑手党分子担保，今后不再对他们进行刑事追究，并给了他们15万美元作经费去组织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及其他一些领导人。同年春天，甘卡纳往古巴派去了自己最优秀的暗探，而他本人，则从美国中央情报局设立在迈阿密的秘密基地，指挥该暗探的行动。情报局

居然准许这个大名鼎鼎的黑手党分子涉足于这一秘密基地。但是，这次精心策划的行动失败了。

黑手党的关系网线路从国家情报部门又向前延伸到当局最高层，而且这个线团越抖搂就越清楚地表明，新一代黑手党分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个别政界人物或国家官员施加影响，对这些人可以收买或者揭发他们的违法行为。现代的“我们的事业”往往通过以巨商富贾的身份，全面打入所有的国家设制的办法，从而使自己手里掌握了有效控制政府活动的大量可能性。只有当合法的控制手段不再是那么有效时，才诉诸于暴力。

1978年底，美国国会的政治谋杀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1963年11月22日在达拉斯刺杀总统肯尼迪乃是一场涉及多方面的阴谋所导致的结果。除了军事工业集团、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之外，“我们的事业”也卷入了这一阴谋。委员会还点了四个人的名字，他们是芝加哥黑手党头子塞姆·甘卡纳，载重汽车司机和仓库管理员工会前主席杰姆斯·霍德，黑手党佛罗里达州家族首领桑托斯·特拉费坎特和新奥尔良及路易斯安那“家族”族长卡洛斯·马尔切洛。而且还确认，早在1961年真名叫卡罗杰洛·米纳诺利的马尔切洛就在新奥尔良把“我们的事业”的头头们召集到一起，着手制定暗杀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的计划。

但正如人们所知，同黑手党分子打交道，只要缺乏确凿

组织之一的杰姆斯·霍法无声无息地失踪了。

1977年在调查这一神秘失踪事件真相时，偶然搞清楚了另一件事，这就是1973年在“水门”旅馆撬锁的前夕，美国总统尼克松从“我们的事业”手里拿到了100万美元现款，其中50万是新泽西州的黑手党首领安托尼·普洛文查诺在拉斯韦加斯偷偷地转交给白宫的专差信使的，其余50万则是通过艾伦·多尔夫曼交给了尼克松。

七十年代，美国当局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旨在制止匪徒犯罪活动。在美国的26个最大的城市里，都建立了同有组织犯罪作斗争的专门机构，并把联邦调查局的财政预算和人员的五分之一，用于这些机构开展工作。从1975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联邦调查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围剿敲诈分子”的行动。结果，于1980年对600个在名声很坏的港口工人工会里从事敲诈活动的黑手党分子提起了公诉。尽管仅对110个黑手党分子判了刑（一如既往全是小人物。“我们的事业”的首领们只是受了一点小小的惊吓），当局却让人们看到，它不打算姑息罪犯。“我们的事业”所遭受的又一次打击是在1977年。这一年政府曾一度使载重汽车司机和仓库管理员工会前领导人离职。黑手党分子把该工会为数22亿美元的养老金广泛用于实现自己的目的，从而破坏了法律。但是看来“我们的事业”并非一切都丢了，因为这笔钱——美国人将其称之为“匪徒银行”——乃是现任总统罗纳德·里根竞选活动的主要经济来源。

60年代末，纽约警察局前首脑拉尔夫·萨勒诺曾警告说：“总要有那么美好的一天，这个‘辛迪加’会挑选出一个合乎自己心愿的总统来。可能这位总统并不清楚多亏了谁，他

才进了白宫，直到黑手党向他，更确切地说向我们大家出示了结帐单，才恍然大悟。”如果说当时这种担心似乎有些夸张的话，而如今可就未必能找出一个人会不同意这一预言。多年来，一直暗中紧紧伴随着，最大的资本主义强国之政府的黑手党魔影，已具有了实际形式，并以主人的身份步入了白宫走廊。在美国现任总统里根周围，就有不少以同犯罪联盟有牵连而闻名的高级官员。据加利福尼亚的《超政治》杂志报道，这类高级官员中有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劳动部长诺万，国会议员莱索特，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莱布，前美国驻爱尔兰大使麦肯以及其他一些人士。而在这些人中，不能不提一提里根的密友和总统就职庆典的主要司仪官弗兰克·希纳特拉。里根在就任总统之后一个月就下令把拉斯韦加斯一家赌场的营业许可证还给了自己的这位朋友，因为18年前美国最高法院因希纳特拉同黑手党的芝加哥家族的首领们有牵连，从而吊销了他的营业执照。

就这样，有组织犯罪社会地位演变的漫长过程，最后以“荣誉社”同官方携手一致而告终。由于具有无情的生存戒律，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对社会条件急剧变化的灵敏适应能力，黑手党已经变成一个为数众多的，极有保障的社会阶层。大多数老一辈的“先生”都是农民、长工和小商人。这些人都是直接发展黑手党非法买卖的自生匪徒。而后来取代他们的则是受过很好的犯罪技艺训练的新型黑手党徒，他们还完美地掌握了政治、经济、金融、法律、原料基地等领域的知识，并精于日本徒手自卫术和柔道技巧，熟悉用于冷战和枪战的所有武器的品种，深谙走私、敲诈、银行和外汇投机的奥秘。今天的“荣誉社”大概可以被比作为一种庞大的机器，其

广泛伸延的分支笼罩着资产阶级社会所有的政治、社会、经济设施，使其有可能对该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实行有效地控制。无论法律怎么严格，无论怎样征讨，也无论掀起什么运动，都不能使资产阶级社会摆脱这一怪物。有一次，芝加哥家族年迈的先生尼科拉·真蒂莱说：“黑手党不是诞生于今天，也不是明天就死亡，因为它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A·苏斯洛夫